
白崇禧
回忆录

白崇禧回忆录

苏志荣　范银飞

胡必林　等编辑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25印张　250千字

1987年5月第一版　1087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25,000册

统一书号：11185·78　定价：2.15元

（内部发行）

出 版 说 明

白崇禧，字健生。原国民党桂系军的主要将领，陆军一级上将，素有"小诸葛"之称。1893年生于广西省桂林县南乡山尾村。他十四岁就开始接受军事教育，先后在广西陆军小学、武昌陆军预备学校、保定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从见习少尉官发迹至国民党军队的总参谋长和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等要职。祖国大陆解放后，在台湾担任国民党军事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66年11月16日去世。

《白崇禧回忆录》的所有史料，均由白崇禧口述。国民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陈存恭、马天纲、陈三井、贾廷诗，自1963年2月开始，直到白崇禧去世的前八天止，先后访问白崇禧一百二十八次，并逐次对谈话记录进行整理。1980年至1985年间，香港《中报》月刊陆续发表了整理稿。

南昌陆军学院将《中报》五年多来的连载资料收集起来，并进行了编纂。在编纂中，为方便读者研究，把全书内容按作战时期和形式调整为六篇二十七章，另冠以篇目标题，并将其中重大事件列成年表，附在书后，以便查阅。同时，对某些有出入的史实，作了考查和必要的附注；对重复多次的叙述进行了删节；将文中攻击性的词语，诸如"共匪"、"匪军"等，均改为"中共"、"共军"。另外，还将文中所有繁体字改为简体字，并对一些错、漏、别字和标点符号作了纠正或添补。原文中的照片因不清晰，均去掉

不用。其他一概未作改动，以保持原资料的本来面目。主要目的是为研究者提供中国现代军事历史参考资料，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历史参考资料。对其中反共反人民的唯心史观，相信读者是不屑一顾的。

《白崇禧回忆录》记述了白崇禧从军、参政几十年的主要经历；阐述了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抗战等战争中的战略思想、战略方针；分析了一些重大战役敌对双方的作战决策、兵力部署、战斗经过和经验教训；介绍了中国远征军出兵印度、缅甸，与美、英等盟国军队协同作战的情况及国际交往；还披露了国民党内部的一些矛盾和斗争；等等。此书从一个侧面，为研究中国现代军事史提供了一定的参考资料。

目　　录

第　一　篇

少　年　时　期

第　二　篇

初期军中生活

第 三 篇

誓 师 北 伐

第 四 篇

国 共 之 内 战

第　五　篇

抗　日　战　争

第　六　篇

军　训　八　年

第一篇
少年时期

第一章　家世、家庭状况

一、家　　世

我是广西省桂林县南乡山尾村人。据白氏族谱所载："吾族始祖伯笃鲁丁系元朝进士，原籍江南江宁府上元县民，住水西门内。至元三年，以廉访副使莅任西粤，追后致仕回籍，殁后葬金陵南门外，地名夏家凹。公之次孙永龄官名伯龄，于明洪武十三年游宦部属，分发出京，又莅任粤西。龄偕兄弟永清永秀等仍随入粤，因而落籍桂林，惟永秀公后代繁倡，相传明太祖禁止人民用外国姓，乃更伯为白，而白氏之传流自兹始矣！"自伯笃鲁丁公相传，至十五世我太高祖考榕华公，少时家贫，有志向学，乃由南乡进桂林城，到本家白某所开之商店佣工，在铺上半工半读，店主嘉其有志上进，鼓励他去考试，举于清朝乾隆甲午科，赐进士出身。曾任四川开县知县，调署茂州、直隶州知州。后年迈告归，定居桂林山尾村。

时榕华公署茂州，直隶知州，当地人烟稀少，农田、害虫甚多，尤以蚂蝗为最，人畜农作多被啮伤，耕地因而

荒芜，蔓草丛生，人民生活非常艰苦。榕华公乃教民掘土造窑以烧石灰，而以石灰散播田中，因发高热，蚂蝗蔓草为之烧死，而草灰又可作肥料，农产乃渐有收获，州民感戴不已，特载之于地方志中。此民国二十八年我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驻于重庆时，中国回教协会开县支会数位代表造访所面告。他们还告诉我："榕华公笃信回教，于本县知事任内，协助教务甚力。曾题'认主独一'之匾额赠送开县清真寺，至今仍然悬挂寺中，邑人视同珍宝。"

二、家 庭 状 况

榕华公之后裔，自珮、自玉皆科甲出身，或中举人或为秀才。递传至白氏族谱之第十八代，即我先考志书公。公别号友三，三十五岁时与桂林西乡罗锦墟马全记之大女结婚，即我先妣马氏。时年二十四，婚后生七男四女，夭折者男三人女一人。长成者男四人，即崇勋、崇伦、崇禧、崇祜；女三人，长女年妹适海、次女德贞适马、三女三妹适傅。

志书公自幼耕读，至十九岁准备应试，师事白石老师。因于书房习作联句所用之音韵与其师不尽相同，受不当之处罚，遂愤而弃儒从商，于桂林西乡苏桥墟开设永泰林商店，经营糖、油、豆、纸等什货，生意尚好。因所雇之账房李瑞芝操守不佳，于志书公患脑病归真后，掌握了所有账目，以致债主至门相逼，而我家所放之外债，李氏悉据为私有。我兄弟因年幼不能接管店务，该店遂停止营业。家中变卖房田偿还债务，因而生活日趋困难。

第二章　早年之教育

一、早年之教育

清光绪二十四年，我行年五岁，就读于私塾，启蒙老师始为毛庆锡老师，继则为李玉田、白莲洲两老师。启蒙时，老师叫我读《三字经》中之"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垂于后"八句。嗣后，以三字经、五言诗、千字诗、对子书、幼学琼林、四书、诗、书、礼、易、春秋、左传等为教本。每日晨间须向先生背诵前日所习之功课；每月初一、十五则须背诵所有教过之功课。背诵若有错误，处罚方式轻则面斥，重则打手、罚站、罚跪等。我于私塾五年，在读书方面侥幸未受过处罚。

我九岁时，六弟崇祜(宗璺)六岁，共师事白莲洲。在书房中，有同村毛长林者，年十七，于同学中年龄最长，品德最坏，性情暴戾，常欺侮我兄弟二人。每月初一、十五，他勒令同学供其金钱、食物，名之为进贡。其座位恰于书房通往厕所之间，同学路经该处，他若不高兴，动辄打人，名之为纳路税。我与六弟向憎恶其暴行。初一，十五既不"进贡"，大小便时绕道而行，避其凶锋。他见我们不屈服，气愤至极，常常责骂我兄弟，或殴打崇祜。我虽恼怒，因年龄幼稚不敢与之斗力，乃与崇祜密商非以智不能取胜。某日下午放学，乘毛下五级高之石阶时，我出其不意，在后用力一推，毛滚滚而下。我乘机踢之两脚，迅速跑开；匿藏我家背后之山岩内，叫崇祜回家禀告我的父亲，说明毛在书房之恶迹，以及我不得已而报复之经过。毛因面部、膝部受伤，流血甚多，毛之家人向父亲责难。父亲虽不满毛

在书房横行无理之行为，但仍愿赔偿其医药费用。父亲对我因受辱而报复之行为则不予深究。毛之家长复向白莲洲老师报告，白虽明察事之起因，为维护纲纪，将我棍责，并告诫毛以后不准再欺侮同窗。此虽是我读书以来第一次受处罚，然而毛之“纳贡”、“苛捐”亦因而取消，同学称快。

我十岁以后读毕四书五经，其中以书经之洪范篇最难记忆。某次，我反复诵读，不能熟记；而翌日恰为初一，又要背诵已学过之经书。我读至深夜，犹不能记，急得痛哭。当时母亲在旁作针线相陪，劝我休息，待晨间早起诵读，必可熟记。翌日拂晓，母亲唤醒我再读，果然很快便能记忆，而旧功课亦一一及时温习完毕。我幼时读书，每当夜间温习，母亲必定相伴，见我有艰难之状，则予以劝慰，虽时隔数十年，昔日之慈颜懿训至今犹历在目。

父亲见背，chuxiao叔志业公以蒙馆教松弛，欲送我至六圹墟新成立之小学校就读。他亲自带我至罗锦墟见我八舅父马公小甫，请于送其子马献芝入学之便，连同送我及chuxiao姨娘之子白冠贤往六圹接受新式教育。我八舅父嫌贫爱富，只允我于其店中做学徒。chuxiao叔当场反对，立即带我回家。约同本村乡老，敦请白莲洲老师主持私塾。我与六弟崇祐就读年余。会吕元甫、吕伯刚、李仲义诸先生创立会仙小学，距我家约三华里，我与崇祐走读两年有余。

我十四岁考入陆军小学校（报名时为符合规定，虚报十五岁），全省报名千余人，只取一百二十名，我名列第六。蔡锷为总办。蔡是同盟会员，鼓吹革命思想。同学多受其熏陶，纷纷剪发，以后于陆军中学中凡无辫者，几尽为广西学生。我入陆军小学不及三月，患恶性疟疾，忽冷忽热。半年过后，因功课旷废甚多，无法参加甄别试。蔡总办见我

入学成绩优异未令退学。病延一年，家人以为长期如此殊非良策，不如医愈后再投考学校，便决心向校方申请退学。

十六岁，我与崇祐投考广西省立初级师范（当时师范分优、初二级），以第二名录取。校长廖道传办学认真，同学莫不慑服。入学后，我因屡次考试名列第一，按照学校规定被选为领班生。

在初级师范，我与崇祐共宿一室，当时有同学何树信者，系桂林城内人，因成绩不能与我竞争，怀恨在心，常以"乡下人"取笑我与六弟崇祐。我素不理会。一日，他乘我不在，至我室内以恶言詈骂宗墨，适我归来，问何事？何云："呸！乡下人！"我不禁大怒，以为大丈夫不能受辱，狠狠地将何打倒地上，再踢他两脚以示惩罚。此为我做学生以来，第一次打架。何趋报告校长，优、初两级同学闻之皆来劝我，见校长时不可承认打倒何某。我以为一人做事一人当，未接纳众人之意见，并整理行李，对宗墨说："若校方决定开除我，我立刻回家，汝务必努力读书。"诸同学因知何之为人，乃推举代表向校长陈情，说明何侮辱我之经过。后经校方调查事由之始末，以为我不该殴人，而何不该欺侮同学，我被记一大过了事。

二、参加北伐学生敢死队

在师范年余，辛亥革命爆发，我与陆军小学同学多人，加入广西北伐学生敢死队。家中长辈闻之纷纷反对，我感于民族革命之大义，毅然随队北伐。家中派人至桂林北门城口把守，欲迫我回家。事为我所知，乃私将武器装具托交同学，我穿便衣由西门出城，绕经老人山，溜马山，往北门城外与大队会合。

广西北伐学生军系私人志愿组成，不受国家薪饷。学生自备费用由桂林随协统赵恒惕所统领之广西混成协出发，每人发给"七九"步枪一支，子弹一百五十发，羊毡一张，黑呢外套一件，水壶饭盒杂囊等物。行军至全州，永州、因沿途道路坎坷难行，我与多数同学之脚面皆为草鞋磨破，脚底亦为路石所梗伤。幸至永州，改乘民船，押解辎重取水道经湖南之祁阳、衡阳、湘潭等地。至长沙复改乘轮船经洞庭至湖北汉阳之蔡甸、梅子山参加南军阵营，与北军相峙。

当时南北正酝酿议和，和战未定，故南军警戒前线甚严。我于夜间放哨，因天气寒冷，风雪交加，瞬时变成雪人。但我初上前线，内心兴奋无比，其热诚足以御外迫之寒气。

未几南北停战。赵恒惕之混成协调驻湖北孝感，我们随之至孝感。学生军出征时因携带银钱衣装有限，战时又无法换洗，以致发蓬面垢，多有生虱者。驻于孝感，每当丽阳和暖之日，即是我们洗澡捉虱之时。后湖北都督黎元洪知我们穷困，特犒送酒肉，津贴每一学生十元银洋。我们为保持不受政府津贴之清誉，仅领其酒肉。此种苦干、硬干、死干之精神，赢得各方所赞佩。

南北议和成功，各省之学生军均奉命解散，编入南京陆军入伍生队，至南京受入伍训练。半年期满，送入武昌陆军预备学校。该校学科课程与旧制高中相同；军事课程以步兵典范令为主，为期三年。我毕业后，派往北苑卢永祥之第十师入伍半年，目的是要我们了解军营生活。入伍期满，即升入保定军官学校。其间二年乃在训练我们成为青年初级之军官。其学科以战术、筑城、地形、兵器四大教程为主。毕业后，授以上士阶级，分发至部队当见习官半年，然后再升为少尉军官。与今日之制度略有不同。

第 二 篇

初期军中生活

第三章 回广西见习

保定毕业，我与徐培根、陆权等二十余同学，自愿请求分发至新疆当见习官。大家想训练一支边疆新军，为巩固边防增强国防之用。我动身前，书禀先妣，并与诸兄弟辞别，言此行意在效法张(骞)班(超)立功异域之壮志。

及至北京，向训练总监部，按章领取旅费国币交通银票伍百元。原定由京奉路经东北，转乘西伯利亚火车，经土西铁路至阿里木铎，然后换公路至迪化报到。恰巧此时苏俄红军于列宁领导下，推翻尼古拉政权，白党谢米诺夫退据西伯利亚，我们无法经过西伯利亚，因而打算由陕甘出玉门关入星星峡。不料陈树藩盘踞陕西与北京政府为敌，不准我们通行。训练总监无路可至新疆，改分发我们回广西原籍见习。我回广西被派至陆军第一师第三团。此我回广西之始，也是我第一次未实现去新疆之志愿。

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我与五、六个同学被派回广西第一师第三团任见习官。当时，谭浩明为桂省督军。谭是陆荣廷之旧属。广西有新军新一师由陆荣廷之儿子陆裕光任师长，旧军有韦荣昌、林振廷、韩彩凤、沈鸿英等之部队。

这些旧军多为广西巡防队编成，或由绿林匪帮招安而来者。因陆荣廷是绿林出身，由苏宫保（元春）招抚者，故陆主政广西，他很爱用招安政策。

见习期间，广西为了护法，与湖南组织湘桂联军，谭浩明为联军总司令，出师援助湖南。部队行至汨罗江以北，被吴佩孚打败，乃退守衡阳、邵阳（宝庆）一带。会第一次直皖战争发生，吴固急于调兵北上，遂与湘桂军议和，桂军乃回师广西。此后，谭甚感桂军缺乏训练，谋求改良，由督军署成立模范营，委马晓军先生为营长。马毕业于日本士官第十四期，知道我们接受过新式教育，遂请求调我们到模范营，我初至模范营，官职为代理少尉连副，因见习官规定为上士阶级。见习半年，升少尉，不久升为中尉连副，再越民国六年晋升为第一连上尉连长，夏威为第二连连长，黄绍竑为第三连连长，张淦为第四连连长，黄旭初为副营长。模范营之学兵以高小初中毕业为主，亦有少数高中毕业或肄业者。训练期间为一年半。以后统一广西，此营之学兵多升为中下级军官，成为广西建军之新干部。

第四章　剿匪与禁烟

广西西南左江流域，如太平府属之绥渌、扶南、养利、上思、思乐等地，因为该属地瘠民贫，且在十万大山附近，匪患特别猖獗。谭督军知道模范营训练比较精良，特调往剿办。广西之匪势因政府历年惯用招安政策，兵来受招安，兵去仍做土匪，故匪患益见严重。因为政府力量强大时，匪徒即应招抚，相安一时，当匪帮力量强大时，又聚集为匪。此招安政策不能收彻底之效果，结果变成了鼓励侥幸

之徒购枪为匪，结队抢劫，待其势力蔓延，政府即招之出山，编为巡防队。做匪打劫可以升官。这种鼓励莠民为匪政策使民众受害太深。每当政府派兵前往剿办时，匪徒至多缴上制的步枪即可得一自新证为护符，待官兵一退，匪徒又携密存之好枪横行于地方。古人所谓"卖刀买牛"，广西之情形则是"卖牛买枪"。广西民情骠悍，遍地皆山，匪徒若藏在山洞中，根本很难清剿。所以当时广西被形容为："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

广西政府对待股匪采用招安政策，始自陆荣廷做督军时。因陆在清朝时，原为龙州县一名清兵，某日购买牛肉，在龙州乘船渡河适与法国领事同渡。所购之牛肉为使馆豢养之犬所吃，陆气愤至极，乃将该犬踢入水中。领事馆人员行文至县府，要求惩办陆荣廷，陆惧罪而逃，遂落入绿林。陆虽为匪，但他专入安南抢劫法国人、安南人，而将所获接济贫苦人家，所以甚得贫穷人民所拥戴，因而势力日益庞大。后陆为苏宫保(元春)所招抚，由队长而管带而边防督办。待辛亥起义，王芝祥以桂督相让，陆遂掌握了广西之军政大权。陆因自己是被招抚而起，所以他一当政，便惯用招安政策。谭浩明与陆为郎舅，而谭之发祥地也在边区，因而陆谭结合最坚固。

模范营既奉命剿匪，鉴于招安政策决非长治久安办法，马营长于是开会商讨。我在会上坚决主张剿重于招。会中决议四连分别担任追剿任务，有应招或俘虏之匪徒皆归我处置。当时我驻扶南县渠黎墟，匪招安数约二百以上，择其中屡次招安之惯匪如谭鉴章，他在苏宫保时即由小匪招安一直到老，约八十余人，实行管训，由我负责。我与他们住在一间屋子朝夕相见，使之不疑不忌。我请马营长至

龙州水口谭督军公馆请示谭督与陆老帅（当时人多尊称陆荣廷为老帅）枪决所招降几次以上之惯匪，以绝后患。陆闻之大怒，问马云："如此做法，若各地之匪闻之皆不来招安，广西全省地方之治安谁敢负责?"马之个性最和顺，不敢与之申辩，颓丧而归，将详情告我，抱怨我不该使得他去受气。我闻之默然，但仍认为斩草务必除根，决定独断独行。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我对招安之匪首等八十余人放假三日回家过节，严令他们务必于限期内归营。等他们归来，我佯言，据报告他们在外有非法行为，责备他们不该辜负我优待之德意。他们一致保证绝无其事，我说："控告的人仍住在隔壁之学校中。他说他能认识抢劫者之面貌。为众人之清白着想，你们似乎应该前往让他认一认，如果他是诬告，我一定要重罚。"他们亦以为然，乃鱼贯而至该校。我事先于校中已暗令郑连副昌濬率兵两排埋伏，因而一一将之逮捕。其中有一人力大而将捆绑之绳索用力挣断，正拟逃脱，当场被士兵开枪打死。留在我连长室内之匪首尚有八人很机警，一闻枪声，忙问我发生何事。我当时答以恐怕卫兵走火，借口出连部外查询，令埋伏连部内之一排士兵将室内诸匪一并逮捕。当日早间即将诸匪枪决。即日呈报马营长云："匪徒于晚间抢枪谋叛，事起仓卒，因不及请示处置办法，恐有误戎机，用紧急处分将全部匪首八十余名枪决。"马闻之大惊，深恐陆、谭震怒。我说是我做的，愿负全责。马报告陆、谭，陆、谭见已成事实，我幸未受责备。此后太平府所属各县道不拾遗，绥禄居民，为纪念马公剿匪之功，自动为马公建立生祠。从此招抚政策改为进剿政策。这是广西清乡剿匪史上一件大事，由我这一个小小连长创始。

匪、烟、赌是广西三大害。匪既肃清，赌因当时我官卑职小无权禁止。但是我严厉推行政府禁烟之命令。

广西谭督军原本严禁种鸦片，然而滇黔两省允许人民种烟，故运输经广西出广东、香港者为数不少。政府为税收之故，亦不能彻底禁止人民吸烟。各地多有"谈话室"，实在便是吸烟室。且民间流传"吸烟可以避瘴气"之谬说，所以边地益发有瘾君子。当时，滇黔两省烟土运入广西之途径有两条为主：

1. 左右江——浔江——广州

2. 龙州——钦廉——广州

人民因吸烟，憔悴不堪。驻扎在百色之巡防队因与烟商勾结，政府禁之命令常常形同具文。谭督军鉴于长久如此，将无可用之兵。他见模范营剿匪有功，年轻而有朝气，于是调我们至百色驻防。当时之模范营已扩编为团，编归广西陆军第一师，每团下属三个营。部队抵达百色后，马团长召集全团营连长会议，转达谭督军禁烟之意，要大家努力禁烟，为桑梓造福。

我这时还是连长，驻防于通云南之剥隘河流域。上自罗村口，下至禄丰墟为本连防地。我的连部在禄丰，派一排驻在罗村口与云南之剥隘墟相对。该处居剥隘上游，为滇省运往广西之鸦片屯积地。我之一连是原模范营第一连，火力配备很强，有马匹、轻机枪等。

黔省烟土运入之途径，由黄绍竑负责查缉，黄部驻于田西附近之黄兰逻里一带。黔烟多由驼马千百成群运至百色，换取食盐、棉纱等物。

滇烟之量与质比黔烟多而且好，不少商人向我活动，望我稍予以方便，皆为我回绝。烟商见我不为利所动，转

而活动百色道尹黄成槁。黄是武鸣人，因与陆老帅同乡，故颇有声势。黄向马团长游说，马团长向我转达黄之意思。我以本团曾在百色会议中宣布奉谭督军之命禁烟而婉拒之，仍不许滇烟入广西。黄见马团长向我游说也无效，乃令其警备队长私带道尹公署封条至云南剥隘，由烟商购买之烟土，伪装为道尹公署所查封运回百色。途经罗村口，为我部下早已探听清楚，电话我详情。我知其必经禄丰，遂沿河岸架设机枪，待其船至，强迫停船将烟土与枪缴收。该队长拿出道尹公署封条，说那是道尹署警备队长带兵，在滇桂边境缉私查获，并非私烟。我说："这批烟土明明是于剥隘所购置，何故谓为查获所得？且云南允许种烟，何能谓之查获？退而言之，百色道尹之警备队长有何权至云南省境内查缉烟土？"该队长知我已知悉详情，向我下跪求饶。我没收其烟土，放还其人员枪支，分电谭督军、马团长、黄道尹办理之经过。所以电黄者，为的是减少牵连，因此事若根本揭穿，马团长亦有关系。所没收之烟土由我派专人送至百色，丝毫未动。

因为查缉烟土是一优差，据说历任驻禄丰者未有不满载而归，少者大洋数万，多则十数万。当时，广西通用小洋，一元大洋价值等于小洋十元或五元。烟商总是与滇黔一样，用大洋居多，因此关系，带给我许多麻烦。黄绍竑于桂黔边界又禁之不严，传闻其部属常常受烟商之惠，更增加我治理部队之困难。

我连为步枪兵三个排，另有轻机枪一个排。其中有一个排是马团长亲至容县他的家乡招募而成，份子甚为复杂，其中土匪出身者数名。他们见我禁烟严厉，无利可图，于是萌有他心。某日禄丰附近藏匿之匪徒乘我至百色团部开会，

与本连驻禄丰训练之新兵一排勾结，以不能做烟土发财来攻击我，诱惑那些新兵叛变。他们里应外合，连中之新兵被胁迫，枪械以及我最心爱曾于全省赛中跑得最快的黄色马一匹，悉为胁迫而去。我的勤务兵韦忠廷逃至百色告我兵变，我闻之大惊，因为在军队中兵变非同小可。我报告马团长后，星夜调回分散附近查巡之二排兵力，赶至禄丰，经三昼夜追至八角山仍不见匪迹。我心中甚为焦急，盘问附近居民，皆说曾见如此一批人。我见士兵多有倦容，乃令休息后再事搜索。我乘此用望远镜向四周了望，突于半山腰发现我所坐之黄马。我知道匪徒一定藏在附近之山谷中。我将二排士兵疏开成战斗队形，吩咐他们见了叛兵不可先开枪，要先高呼“白连长来了”，然后开枪。士兵们照我的命令行事，匪徒听闻我来了，皆仓皇而逃。新兵原来被迫叛变的，自不愿随匪而去。我收回所失之部队、枪械与马匹，且获匪之枪支与物品不少。归来后，我不但电陈马团长请求处分，自以为轻则入监，重则难以想象。幸而马团长待我很好，电报向谭督军说明叛兵是他所招募的，与我无关，并陈述我剿匪之功，治军之严，禁烟之认真，而且我已追回了叛兵，请从轻处罚。不久马团长接奉谭之复电云：“此次兵变，该连长追剿办理妥捷，殊堪嘉奖”等语。我奉电真是喜出望外。真是感谢谭督军之宽厚，马团长之爱护。

兵变后，有人对我说：“黄季宽（绍竑）禁烟很宽，你禁烟太严，这是兵变之主要原因。”劝我不妨从宽。我大不以为然，我说如果因噎废食，则国家、社会岂有安定之日！我仍然严禁滇烟进入广西。

第五章　统一广西和两广统一

一、统 一 广 西

民国十年底，孙大元帅于广州成立大本营，委朱培德为滇军总司令，谷正伦为黔军总司令，沈鸿英为桂军总司令，彭程万为赣军总司令，许崇智为粤军第二军军长，李烈均为参谋长，胡展堂为文官长，当时蒋中正先生任粤军第二军参谋长，准备北伐。十一月十五日，总理、胡先生（汉民）等移节桂林，欲假道湖南出武汉，因赵恒惕倡联省自治、反对革命军经过湖南，大本营遂移至韶关，委李烈钧为第一军军长，统率滇、黔、赣、桂等军，进攻江西兼取鄂东。许崇智之第二军率粤军出岳州攻武汉，此为当时革命之形势。

当大本营移驻桂林时，陈炯明因怀异心，不敢与总理见面，避至南宁，赶走了陆荣廷与谭浩明势力。大本营遂委马君武先生为广西省省长，马晓军先生之模范团改为田南警备司令部。当时，我已升为模范团第一营营长，黄绍竑为第二营营长，夏威为第三营营长。大本营既改道北伐，粤军悉调回广东。广西境内成为真空状态，省议会复推举陆荣廷为善后督办，谭浩明为边防督办。各地纷纷组织自治军维持治安。马君武先生原是一位没有实力的省长，此时他的职位岌岌可危。自治军中以百色附近之刘日福、陆云桂二人力量最大。我当时仍驻防禄丰，黄、夏之部队则分驻于滇、桂要道，故田南警备司令部之力量非常微弱，自治军时有来扰之虑。

一日，自治军于拂晓之际，包围司令部，我因公也在

司令部，众人虽事先有所警觉，但缺乏经验，以致刘、陆等人缴了驻防百色之部队的枪械，而又包围司令部。马晓军司令被逮捕。我见形势危急，坠城墙而逃出，而召集夏威之一营与我驻禄丰之部队（黄绍竑之一营已全被自治军解决），由逻里旧州、坡脚，渡红河，至贵州之南龙，求援于黔军刘莘园、陆荫楫等人。刘、陆是保定的同学，以前到广西打陆荣廷与我们相处甚欢，后来他们退回贵州时，部队多患恶性疟疾，我们又派兵护送，因为有此关系，所以我们才敢效法申包胥哭师秦廷。

至南龙，刘、陆善待我们，卖烟土相助，又派兵巡守红河，以防自治军渡河追击。我们既得粮饷，又得刘、陆之支持，稍事休息之后，由坡多渡河攻打西隆。当与自治军隔河相峙时，我于夜间查巡战线，行至一山坡上，高约十余丈，在坡脚之北。因对岸是敌机关枪阵地，当晚天雨而黑暗，当到山坡时随从亮手电筒引起对面敌人扫射，因将电筒熄灭，路滑而跌落于山坡之下，折断左腿锁骨，昏迷约十数分钟，醒来不能行动。我认为部队不能因我受伤而停止攻击，乃将全军交由夏威指挥，不幸部队前进西隆，在沿红河某山顶处受挫。我见情势非常不利，不得已第二天卧在担架上指挥部队进攻。事前，我告谕官兵此次返回广西，乃胜败存亡之事，望大家戮力同心。我睡在担架上，若攻击失败，我决与之同死不退。官兵甚受感动，一鼓作气，击败刘日福、陆荣桂等人之自治军，乘胜追至百色。马司令至此方获释放。我因亟须赴广州就医，遂将兵权交给马司令。马统率部队由陆路开往南宁。当时，马君武先生因缺乏支持，征得李宗仁将军（当时李是“定桂军”旅长）同意，与我同船至南宁转往广州。行近桂平，李

之营长俞作柏欲抢劫船中之枪械、财物，与守船兵发生枪战，马君武先生之亦太太，中流弹而亡。抵桂平，马晓军司令之营长刁兆柱，见我与马君武同行，以为我与粤方相勾结，软禁我一晚，嗣后查知我是到广州医脚，乃不加害而释放我。至广州，住院治疗，照X光像片，始知左腿锁骨折断因时日过久，已长了假骨，无法再施手术。休养一年后，虽左脚稍短，一生的行动尚称方便。

马晓军司令带领队伍由百色经南宁而至广东之钦州，廉，州欲与广州革命军相勾通，因见行军艰苦，局势复杂，遂将部队交给黄绍竑。以后沈鸿英回桂林，盘踞平乐、富贺、梧州一带矿产与物质丰富之地区。沈之秘书黄毅庵是黄季宽之堂兄，黄因此关系被沈委为旅长，驻防梧州。沈之部队长冯葆初亦以一旅人驻于梧州。梧州是广西商业、军事之要点，沈以二旅人驻扎该地。粤军第一师李济深之部队则驻于梧州下游，广东之封川德庆、肇庆等地。

黄绍竑于梧州因接近广州革命政府，暗派陈雄(字杰夫，毕业于保定军校六期)为代表驻在广州。黄因其部队原是归我指挥，所以常令陈雄与我商讨广西将来发展之途径。我们衡量国内的形势，广西之前途不外有三：一为附合北洋军阀；一为支持赵恒惕等人所倡言之联省自治；一为归附广州之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政府。北洋军阀是我们所厌恶。联省自治非统一全国之良策。经再三研究，终于决定参加以三民主义建国为号召的广州革命政府。

既经决定，我以全权代表身份往河南士敏士厂谒见孙大元帅，表示广西竭诚请求加入革命行列，并申述广西统一对于革命之重要性。孙公也深以先统一两广再统一全国为上策。他立即委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第一军总指挥，我

为参谋长。辞别时，孙公以诚挚之态度对我说："我无枪、无粮、无饷；只有三民主义。"我说："广西统一不需要孙公的物质支援，所需者仅是革命之主义信与仰而已。"我持孙公之委任状潜回梧州，将经过告之黄绍竑。革命方向既定，第一步须解决冯葆初之部队。冯的力量甚大，装备优良，我们不敢贸然行事。先与粤军李济深接洽，李亦接奉广州革命政府的支援指示，答应事发后必派军相助。李部因近梧州，朝发夕至，我们得此外援，声势益壮。

某晚，黄绍竑于梧州河面宴请冯，冯不知有诈，欣然赴约。酒过三巡，黄突拔出手枪指向冯，事起仓猝，冯只得俯首被捕。冯部因黄绍竑事前已派兵分别监视，毫无反抗，一一缴出枪械。我们获得枪支二千余。沈鸿英驻于八步的部队，闻变本想开来梧州，因被粤军牵制不敢移动。冯部被解决后，我们一面通电就任广西讨贼军之职位，一面电请粤军支援，李济深派徐景唐旅之郑演达步兵团进驻梧州。陆云高盘踞濛江口之平南县，亦相继被我们解决。

正当我们向广西内地推进之际，驻于广州之广西军独立师师长陈天泰以援助我们统一广西为名，循西江回师广西。所部有四五千人，其人虽能征惯战，但不学无术。我们虽知其归来必定鱼肉地方，然而其部队庞大，非我们之力量所能抵拒。故外表极示欢迎，内部则积极戒备。陈不知我们计划，派其参谋李澜柱至梧州商洽。我欢宴他于梧州河面之花艇，请与李相识之梧州亲友作陪，大家打麻将以延宕时间。我吃到一半故意说因另一处有应酬，暂时离席，其实我离席后就乘坐汽艇上戎墟，转乘车赴都城方面指挥部队对陈作战。

我们当时之部署：主力由黄绍竑统领防守中路，俞作柏担任左路，我担任右路。另请肇庆之粤军拊击陈之侧背，希望以钳形之势攻其前，粤军蹑其后，一举而歼灭之。我沿西江而下，左路俞作柏迂回敌后。中路夏威部先与陈部接触，为陈部所败，战线仅赖黄绍竑之一营兵力维持，战状危急万分。俞作柏因迂回路程过远，不及赶到，适我率领征讨陆云高时所收编之蔡少平、黄超武部兼程而至，敌我两军因相距甚近，前线官兵已肉搏冲锋，陈天泰手持自来手枪督战，与我相距不及百米，他面上的大麻子均看得清楚，我在蔡少平阵地与蔡同站在一处，我两人均向陈开枪，督军前进。战况激烈，战至最后五分钟，陈部始溃，我们乘胜逐北，与左路军相会，围攻陈部，陈天泰被俘，缴得其枪支数千。此役因历时只一日即将陈部缴械，粤军不需参战。陈被俘后与我见面，我多方安慰他，并送他衣服及旅费，放他由都城乘船回香港转广州。

陈天泰因我主张纵囚，释放他到香港。不久即返回广州，向大元帅府控告我们，大元帅府拒绝受理。后来黄绍竑至广州，住于东亚酒店，陈聚集他的旧部，包围东亚酒店，黄越楼顶而逃，幸得脱险。不然，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纵囚之是非真难论断矣。

战胜陈天泰，我们之力量大为增强，统一广西的责任也更为加重。丹竹之卢某，江口之陈先觉，彭化之张春如先后被收编或缴械。其中以解决张春如最为艰苦，因为彭化地形险要，他的碉堡阵地又建筑坚固，步兵进不去，子弹又打不穿。后经我使用山炮，张之阵地始被攻破。至此所余之大敌一为陆荣廷，一为沈鸿英。

我们的力量因不足与陆、沈抗衡，欲联合驻浔州（桂平）

之李宗仁旅长。李原是粤军林虎的营长，后来林虎回粤，所部由李编为一旅。黄绍竑派我为代表前往劝说参加讨贼军，愿拥他为首领。起初李不愿意。我与李之参谋长黄旭初商议，若李率其所部与讨贼军合作，登高一呼，四方必定归服，功劳岂仅在于广西。黄亦以为然，经他委婉劝说，李不表示赞成，也不反对。李是陆荣廷之部属，我只身前往劝他反陆，于今想来，颇似入虎穴取虎子。

李考虑多时终与我们合作，但用定桂军名义，我即与他商讨，应先打陆荣廷还是沈鸿英？他主张先进攻沈，因为沈的部属强暴，罪恶显著。陆有善名，舍恶攻善，不易号召民心。我主张先攻陆。因为第一、陆当时驻在桂林、南宁，为广西政治中心，防务空虚，易于进攻；第二、陆与湖南相通，湖南又得吴佩孚援助，应于其支援未至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第三、攻打沈鸿英，胜了，陆之势力犹在，广西仍然不能统一；败了，则更不能打陆吴。当时我们之处境如楚汉相争之韩信，联陆则沈败，联沈则陆败，所以我坚持联弱攻强，避实击虚。讨论三日毫无结果，我以为兵贵在速，对黄旭初说："无论李旅长是否同意，讨贼军进取南宁，必须假道桂平。"李见无法推却，遂与我们合作，定名为定桂讨贼军，共袭南宁。当时陆荣廷与沈鸿英相持于桂林城，南宁城防空虚，不攻而克。陆既被围于桂林，又失南宁之根据地，情势恶劣万分，幸得湘军叶琪，廖磊之援助，始能突围逃入湖南。

我们占领南宁后，于谭浩明公馆宴请诸军将领，当众推李宗仁为定桂讨贼军总指挥，黄绍竑为副总指挥，我为前敌总指挥，兼参谋长。此种安排事先已得李、黄之同意，而李表示我若不做参谋长，他不做总指挥。宴席间之推举，

只是一形式而已。事后向广州大元帅府备案，亦为大元帅府所承认。

人事安排既定，俞作柏怂恿黄绍竑以武力解决李宗仁之部队，取而代之。黄对我说，我大以为荒谬。我对黄说："洪杨之失败，非曾左之功也，洪杨内讧，自毁其事业也。若以占领南宁即起内讧，我不欲见失败之日，愿先卸职他去。"幸黄深明大义，不为小人所间，不然广西统一事业，将毁于俞之手中。

联军成立后，我与李宗仁将军率兵进攻柳州、庆远一带陆荣廷部之韩彩凤、韩彩龙兄弟。韩彩凤素有赵子龙之称，其主要防地于柳城县之上雷镇，韩彩龙则在庆远(宜山)。沈原有一师兵力驻于柳州，师长杨祖德闻联军到达，令所部由柳州撤至雒容，无非想保持观望态度。我们洞悉其意，由李监视杨，而我进攻韩部。我与韩彩凤之部队于柳城上雷镇相遇，韩见我只有二十八岁，夸言童子军不堪一击(因为我的部队都是戴童子军帽)，态度甚为骄傲轻敌。殊不知一交战后，我军战力雄厚，激战多月，未分胜负。我见韩部慓悍，难以武力取胜，乃改用智取。一日，我诈与驻在雒容之杨祖德通电话，望他某日某时与联军配合进攻韩部，将电报线作长途电话线，故意让韩部接获此项电话。韩因而分上雷之兵力监视杨部。韩前线力量既减，我指挥部队猛烈攻击，韩部溃败。我军克服前水镇时，获得韩字之大帅旗一面。我乘胜进攻庆远韩彩龙部，未经激战，韩部即败，韩彩龙因足疾行动不便，吞鸦片自杀。得他掳获灰白色骏马一匹，枪二千余支，其残部向桂林逃窜。我特准韩彩龙部下护送韩之灵柩回里安葬。

沈鸿英见联军势如破竹，知迟早自己必为攻击之目标，

派其总指挥郑瑞征之侄郑右文师长，以商议会攻陆荣廷残部为名，到浔州（桂平）开会，侦探我们之虚实。郑部驻扎于鹿寨、梅江，他沿柳江而下，见我们之力量分布于梧州、庆远一带，武宣并无大力量。我根据谍报人员之报告，洞悉郑此行之任务，待他归去后，料他必建议沈鸿英进袭武宣。因为武宣是桂平之门户，而桂平则是邕梧交通之要道，故为敌我必争之地。黄绍竑将军调其驻防梧州之部队由吕焕炎率领自江口出发，经盖岭至武宣；我则率领钟祖培部乘一营火轮拖船，经一昼夜而赶至武宣。我抵武宣之第二天，郑右文即率兵蜂拥而至。我们只有一营兵力，不敢作野战，闭城拒敌，待援反攻。敌方炮火很猛烈，我们居之文庙，亦被击中。白日我尚可恃武宣坚固之城墙抗御敌人，晚间敌人则有越墙进攻之虑。每晚我发动团练、县民，携带各种油类、棉纺织物等于城巷，装成许多油灯用竹竿伸出城外，照耀四方。敌人见无隙可乘，故不敢爬城。日间若敌人迫近城池，我方出战逆袭，迫敌退却。总之，我之战术使敌人不得靠近城边。为此维持二昼夜，待吕焕炎部队赶到，城内外夹攻，郑瑞征不支而败，遁走黄冕、榴江、鹿寨。此时黄绍竑将军又发动徐景唐、夏威之部向八步、贺县、平乐沈鸿英之老巢进攻。

为了配合黄之攻势，我指挥驻于柳州之部队进攻桂林。由柳州通往桂林之道路，以蓝马、里定一途为险要，我料沈必驻有重兵，故而选择由永福通往良丰之小路，沈军果然不察。至良丰时，沈之部队犹在聚赌，待沈部发现，我已绕过良丰，沈部才仓皇撤退。我军行抵桂林城外之将军桥，我亲自侦察阵地，布置炮兵阵势。沈部于我阵地之前方，也布置了机关枪阵地，双方遂发生激战。我方陈一足被敌

人之机枪射中腿骨。我军得炮兵之掩护，渐迫近桂林城。我集中兵力攻打南门、西门。故意放松北门，不久沈鸿英部即由北门向湖南之永州(零陵)武冈撤退，我遂占领桂林城。时民国十四年，我与先室马佩璋女士结婚即在此一时期。婚后不久，柳州因唐继虞围攻告急，我派侯仁松留守桂林，自已统率部队驰援柳州。唐继虞为何围攻柳州，有补叙之必要。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唐继尧突然就大本营副元帅之职务，派龙云率三个军出广西下广东，乃弟唐继虞率三个军经贵州、湘西至武汉。当他未出兵之前，我们特派上校参谋孙华佛赴昆明，向唐报告广西人民历经战事，生活艰苦，请其部队勿经广西。唐称此行乃国家大事，兵行在即，不能改变，并委黄绍竑、李宗仁各为旅长，致送烟土一百担作为军饷。据孙回来报告，昆明武华山唐之副元帅府，华丽无比，厅中铺挂悉为黄色绫缎，俨如王宫，其侍卫皆官拜少将，一切全凭唐之喜好，无制度可言。我们分析孙之报告，知唐欲逞野心势必出兵，乃决定于滇桂边界抵抗唐部。当时，沈鸿英、韩彩凤之残部分别于湘桂、黔桂边界窥伺。我们自知力量不足以抵抗唐部，乃利用唐杀范石生父亲之仇，派人至广州，与范联络，以允助范回滇为条件。此项建议，范与广州革命政府皆表同意。范部尚未开至广西，而龙云已下南宁，李德邻将军退至宾阳昆仑关。会范部来，李与之会合回攻南宁，龙云善于防守，相持很久。龙向唐继尧请援，唐因部队已出广西、湘西，云南已无可动用之兵，遂令唐继虞由湘西回师助龙。唐继虞由三江、柳城进迫柳州，以图分散我们围攻南宁之兵力。唐之三个军中，以吴学显一军比较杂乱，其余王洁修、张汝翼二军都

是惯战之师。黄绍竑除积极于防御工作外，驰电要我派兵援助。当时之情况，沈部不能援柳，非先击溃唐继虞之师，不能解南宁之围。此即我增援柳州之经过。

我离桂林不久，沈鸿英之子沈荣光率其父之残部又袭击桂林，侯仁松因大意失守，沈部入城，掳掠无所不为，我家中及先岳父家中皆遭其残害，白氏亲戚多以为未受我之利，反而因我而受害。先室马佩璋女士为躲避沈部之残暴行为，藏于桂林德国医院中。我于途中虽闻桂林失守，因柳州危急，无法营救。

柳州战事激烈，李石愚守城身亡。我率部赶至柳州城外，稍事休息，即赴附近高山观察阵地，见敌人主要交通为沙布之浮桥，欲断绝敌人之补给，必先毁其浮桥。我下令炮兵队向浮桥开炮。炮兵连长罗傅英报告我，部队中只剩五发炮弹。幸第二炮即命中浮桥，城中守兵闻援兵到达，与我内外夹攻，唐继虞之三个军溃不成军，复因浮桥被毁，无路可逃，被俘虏者不少，我以五六千人之众与唐之三个军相战，未及半月即将之解决。柳州之围既解，黄绍竑重新将所属部队归我指挥。我入城之后，吕焕炎告诉我，我到达之前一日，城中因情势紧急，有卜问战事者，得卜辞二句：

勤君不用忧强虏，

白马将军一箭摧。

众人视之不解其意。翌日见我骑白马至，皆欢喜无比。深信唐军必败。我闻之一笑，以为是迷信，然而可奇者：我平日所坐之黄色马，因在全州八石山追击沈鸿英时，不幸折断前足，所以我到柳州时，改乘了俘虏韩彩龙所骑的白马，而卜辞中即有“白马将军”之语。

唐继虞既败，我挑选俘虏中百余人，由一官长带领，拿着我的名片由柳州至南宁见龙云，名片上大意写着："南宁鏖战多日，损失必多，特送上云南子弟以作补充。"意图打击龙部之士气。另外我暗中通知李德邻将军盼其断龙之归路，消灭龙部，以便范石生顺利回云南。李判断龙必经扶南、同正、左县、靖西而入云南，特派纵队长俞作柏防守此一路线，俞为人自私、好利，知龙部入广西时携带许多烟土存于龙州，于是乘龙部回滇之际往龙州抢烟土，而放弃堵截任务；若俞遵守计划，配合范石生之追击，龙部多有生还之希望。待范石生追至滇桂边界，唐继尧之援兵也及时赶到，龙云、胡若愚与唐会师，合击范石生，范军大败。广西得范部支援而击退唐之滇军，唯以未能助范回云南为憾事。至此，广西虽解除邻省之患，内部尚有韩彩凤、郑右文之残部盘踞于思恩、宜北一带。

伍廷飏奉命率领梁朝玑、苏祖馨、(福甫)、徐启明进剿韩彩凤、郑右文残部。伍因宜北、思恩地僻路远，驻于宜山，仅派苏、徐等人前往。韩、郑见伍不进，袭击宜北。宜北虽被攻下，而郑右文亦被苏祖馨所击毙。郑系保定军校第一期学生，与徐启明是同学又是小同乡。据说郑与徐换过帖，与李德邻将军也换过帖。因此种关系，郑尸得徐运回家乡榴江安葬。郑部解决后，徐启明向三江追击韩彩凤，韩退入湖南。

柳州之唐部解决，我回兵桂林打沈荣光。未经接触，沈部何次三、何品三即退至西江、义宁。沈退至百寿(古化)占领金竹坳、三大炮等险要地区。我率领徐启明、郭凤岗、夏威之部队，渡西江河攻击。我见沿途遍地竹林，敌人行止难以捉摸，遂决定用声东击西诱兵之计。我令徐、夏部

队暗中在西江部署，我扬言回师桂林，其实我急行军进攻文宁。沈荣光听我回桂林，复入西江抢掠。徐、夏待沈部一入西江即将之包围，我也兼程赶回西江，合力消灭沈部。

陆荣廷、沈鸿英之残部完全消灭后，广西之军政时期方告结束，定桂讨贼军改为督办公署，李德邻将军为督办，我仍当参谋长，黄绍竑将军为行政长，负责全省行政，此民国十四年之事。此后，主要工作为整编队伍，一共成立九旅，分别由夏威、胡宗铎、黄旭初、俞作柏、钟祖培、伍廷飏、吕焕炎、刘一福等负责，每一旅辖两个团。

广西虽告统一，但是广东方面因申保藩占领钦、廉；郑本殷盘踞琼崖，仍是分割的局面。广西之统一，得粤军第一师李济深之助力不少，我们自然有协助粤军统一广东之义务。我们派胡宗铎攻打申保藩，助李济深统一广东南路，李亲自指挥两广部队在琼崖登陆，广东始告统一。

二、两 广 统 一

广西协助广东统一南路后，两省各自统一之工作既告完成。然而两省归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则尚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民国十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国府派汪兆铭、谭延闿二氏至广西劳军，在梧州与李宗仁、黄绍竑就两广统一问题交换意见。李、黄派我(我当时是参谋长)至广州商谈，期望得一结果。我于二月十九日致电李、黄，报告在粤进行之情形，电云：

"吾省军政前途，今后纳入革命轨道，前电均已略陈，是为钧座所明悉。如负担革命工作，完成革命任务，在理论上与事实上，均非将军、民、财三政与广东融成一片，直受中

央之支配不可。政治关系省内，一为关系全国，自成风气实不可能，军队更改编制，尤与财政关系密切。即以军队而论，广东革命军确实能重改良士兵生活，月饷十元至十二元，吾省若收财政自理，士兵生活必难解决，结果必有貌合神离之象；而于政治建设方面，其结果必将演成闭门造车之情形，将来必为革命之障碍，而国家之命运亦必因此而受坎坷。连日与中央诸公磋商，若吾省能将军队，依照广东编制，政治能接受中央策略，财政由中央支配，则一切问题当能与中央合策，由中央统一筹划，互相调济。则此后对于革命任务，固属共同负担，而于补助给济方面，亦以痛痒相关，不能秦越相视矣。禧知两公对于革命重要性已有深刻认识，对于革命工作已有坚确决心，历年奋斗，其目的在救中国，非救区区之广西也。禧抵粤以来，见中央对广西仅抱联合态度，一切设施规模太小，目光只在粤省，非统一全国机关，对于将来革命之发展，诸多妨碍，以对汪、蒋、谭诸公自动提出先将两广确实统一，此种主张驻粤各方极端赞许，想两公必然赞同。现因体念上级长官，以图节省电报往来时间起见，由汪先生提议中央特别委员会，讨论两广统一办法，先将军事财政统一，再及其他。条件议决案，由禧携回南宁，请两公认可后，复请中央军事政治委员会议决定，由国民政府执行。十八日开始讨论，两公有何意见，速电示为祷。"

李、黄两人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三月二十四日国民政府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会中拟具两广统一方案。三月十五日将案提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主要内容有三项：

1. 广西政府接受国民政府命令处理全省政务；

2. 广西军队全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3． 两广财政受国民政府之指挥监督。

三项决议案，立即付之实行，首先实行第二项。三月二十四日，国府任命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黄绍竑为党代表，我为参谋长。四月一日，将广西原有之第一、二军及各纵队撤销，改纵队为旅。第七军编为九个旅，第一旅至第九旅之旅长为：俞作柏、刘一福、黄旭初、伍廷飏、夏威、胡宗铎、钟祖培、吕焕炎以及我。各旅辖两个团，此外有两个独立团，一个入伍生团，炮、工兵各一营，及入伍生一队。

其次实施第一项，关于处理政务之事。六月一日，改组省政府，黄绍竑为省主席。

第三项关于统一两广之财政，其中以军饷最重要。实施起来也比较困难。因为广西于清季为协饷省份，靠湘粤支助；民国成立，中央取消协饷，广西自食其力，因地瘠民贫，财源有限，若军饷照粤省之标准，本身无法筹划，势必依赖粤省补助，而当时之财政部亦困难重重，无暇兼顾广西，因而第三项未能彻底实行。所幸广西军队惯于刻苦耐劳，不在乎军饷是否与粤军一致。

我以全权代表在广州时，国民政府因感于未有帮助广西统一之工作，不便以命令加诸广西，令之与广东合作。我为革命前途着想，希望广西加入革命行列后，能唤起他省觉悟，故自动提出两广统一。此项提议不独粤方之同志深表赞同，幸为李、黄二人所接受，两广统一于国民革命史上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北伐军能统一全国，悉赖以两广统一为基础。

第三篇

誓师北伐

第六章 第一次北伐

一、决心北伐

两广统一后，广州革命政府准备北伐。组织了军事委员会，成立国民革命军，当时汪精卫任国府主席，蒋公是委员长。蒋公要找位参谋长，我以参谋部次长职正好住在广州(李济深是参谋总长)。承蒋公之邀，要我担任参谋长。我以责任重大不敢接受，蒋公态度诚恳，很难辞谢，我请他与李德邻商谈。李因广西部队需人指挥，不愿我离开，蒋公说只借用数月，待攻下武汉必定归还。我事后揣测蒋公一定要我任参谋长之原因不外有二：第一，我是保定毕业的学生，而当时各省带兵的将领多半出身于保定；第二，统一广西时，我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后来攻下武昌，因东路军第一军之第一师王柏龄，第二师刘峙在浙江境内失败，而何敬之将军于福建与周荫人相持不能及时援助。蒋公征求我的同意，调我至东路军，从此我参与西征东征之役，从未回过第七军。

汪精卫任国府主席时，政治总顾问为俄人鲍罗廷，各军中亦设有政府顾问。鲍之权势很大，可以出席中央政治

委员会之会议，提供意见。鲍之阴谋在于分化国民党。当时，国民党中有跨党之共党分子不少，此因为总理在世时，希望以三民主义潜移默化共产分子，故定下联俄容共政策，准许共产分子加入国民党。总理所以能与俄国发生关系，因为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正为资本主义国家所包围，境况艰困不堪，总理去电慰问鼓励，列宁感谢不已。总理于民国十年进驻桂林时，俄国派越飞前来谒见，因而有总理派廖仲恺、蒋公赴俄答聘之行。

俄国之政治顾问，名义上虽至广州助我们北伐，暗中实是发展共产组织，其工作对象为党内党外及军中之基层人员，故共产分子于国民党中所掌握之机构，多是政治、组织、农民、工人等部。当蒋公在黄埔建立军事政治学校时(后改为黄埔军校)，教官中许多都是共党分子，学生中有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共党分子的组织，专吸收黄埔学生为主。后来国民党见情势不妙，才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与之相抗。北伐时八个军之党代表如第一军周恩来、第二军李富春、第三军朱克靖、第四军麦朝枢、第五军李朗如、第六军林祖涵、第七军麦焕章、第八军彭泽湘*，其中周、李、林都是老共产党员。而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副主任郭沫若也是共产党员，足见当时共党在军队中渗透之严重。我们虽洞悉共党之阴谋，因为国际环境之逼迫，以及俄国援助山炮、野炮、飞机等武器，故不得不与之合作。原先共党因本身羽毛尚未丰满，不主张提前北伐，中央见军阀割据

---

* 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国现代史》中所述，北伐开始时，国民革命军八个军中，只有二、三、四、六各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分别为中共党员李富春、朱克清、廖乾吾、林伯渠。据李宗仁回忆第八军党代表为刘文岛。——编者(下同)

相斗，人民成了鱼肉，生活痛苦不堪，决心不理会共党之反对*，按照计划北伐。

二、劝唐生智参加革命军

如要北伐，必须先打通湖南之一关。湖南为赵恒惕之势力。赵提倡联省自治，民国十年国父想假道湖南北伐，因赵之反对而改道江西。我们如要路经湖南，是不可能之事。湖南之力量，谭祖庵率领部分力量至广东组织成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程潜也在广东自己成立部队为第六军。赵之第四师唐生智驻湘，因在地理上与广东接近，力量也是四师中最大者，我们利用赵、唐间之冲突，策动唐归服国民革命军。赵见大势如此，将省长交唐代理，自己至武汉附和吴佩孚，赵之嫡系部队叶开鑫仍驻在湖南。赵虽离去，唐之态度还是摇摆不定。政府派我与陈铭枢秘密由广州经韶关至长沙，劝唐脱离赵恒惕独立，归向革命政府。唐因吴佩孚委叶开鑫为湖南讨逆军总司令讨伐他，向我提出三点要求：

1. 如加入革命政府，革命政府是否愿意在军政上支持他抵抗叶开鑫？

2. 谭祖庵、程潜曾被他击溃，他如加入革命政府，二、六两军是否会加以报复？

---

* 1926年2月，中共中央曾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指出"党在现实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州政府的北伐"。4、5月，在广州召开的广州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和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都提出了发动北伐战争的要求，催促国民政府"从速出师北伐"，"拯救处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宰割下之水深火热中的民众"。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北伐的积极态度。陈独秀曾对北伐持不同的看法，但他并不代表整个共产党的态度。在国共两党的努力下，才开始了北伐战争。

3．希望二、六两军出江西，不要路经长沙。

我告知唐，如果他表明态度，革命政府自然支持他抵抗吴佩孚。湖南之军政完全由唐负责。关于第三点，革命军之策略是打击吴佩孚，放任孙传芳。孙是江、浙、赣、皖、闽五省联军总司令，势力雄大，二、六两军之任务乃在赣湘边界监视孙之活动，自然不会调入湖南。我向唐保证，如二、六两军有不利于他之行动，第七军将支助他。湘桂是邻省，我与唐又是保定之同学，唐得我之保证，才表明态度，归附革命政府。

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之前，吴佩孚因唐生智附和革命政府，派叶开鑫攻击唐部。唐不能抵抗，退至醴陵、攸县、衡阳、宝庆一带，情形危急。我因对唐有支援之诺言，乃令七军之钟祖培兼程驰援。今之监察委员王赞斌，当时是钟部营长，首先率兵赶至。唐部见第七军来援，士气百倍，才稳住了阵线。以后第四军之叶挺也到湖南，合力击溃叶开鑫，收复长沙、岳州。唐之部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

三、誓师北伐

唐生智之部队既编为第八军，我们积极准备北伐。北伐前夕，蒋总司令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战斗序列：第一军之第一师、第二师出湖南；何敬之将军统领东路军，预定由广东之东江、潮梅经福建至浙江。当时福建是周荫人之部队；第二、第三、第六三个军在赣湘边界监视孙传芳；第四、第七、第八三个军担任北伐军之正面由湖南攻武昌；第四军在中央，第七、第八两军分别担任左右两翼。黔军袁祖铭、王天培也由常德指向鄂西。

第四、第七、第八三个军出师后，有三次会战，即是汨罗河会战、汀泗桥之役、贺胜桥之役。

右翼之第七军进攻汨罗江，第四军在中央由平江挺进，第八军沿武长铁路在汨罗河口。唐之另一部则驻在常德，此役吴佩孚之部队不支而败。汀泗桥之役，我们虽然获胜，其激烈之情状不如贺胜桥之役。贺胜桥是武长铁路之要镇，也是进攻武昌必经之途。吴佩孚亲至此地督战。我军经过两战之后，弹药甚为缺乏，每人至多有子弹一百五十发，后方的补给机构也无法筹划。我当时在前线指挥，将领们纷纷打电话向我请援。我答复说："缺乏子弹只有刺刀赶快冲锋，革命军之补给靠前方，不能靠后方。打败敌人，敌人之装备，便是我们之补给。何况打下武汉，汉阳之兵工厂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些话虽是极不合理，但当时之情形的确如此，我只好壮他们的气。所幸将士努力，第四军由中央进攻，第七军由右翼迂回敌后，第八军由左翼攻击，连破吴佩孚三道防线。吴虽砍杀退兵枭头示众，也阻不住前线之崩溃。战后我们在吴军中得吴之指挥命令，事前他对击败我们很有信心，称我们为赤军（因为当时尚是联俄容共时期）。

（一）俄军机若乱飞苍蝇

贺胜关既下，大军继续进攻武汉。第四、第七两军攻武昌，第八军由嘉鱼渡长江打汉阳。守武昌的是陈家谟、贺对庭、刘玉春等部队。武昌城坚，第四、第七两军占领城外之洪山炮兵阵地，城内外相互发生炮战。我方久攻不下，爬城也不成功，知不可力攻，不然损失太大。请随军之俄国顾问加仑将军，派俄机轰炸城内蛇山之敌人炮兵阵地及无线电台，但是俄机或借口雨天，或雾天，或有风

天，总不肯起飞。我们屡屡催促加仑将军，加仑将军说，红军之飞机在国内都是天之骄子，出外更是不听指挥。当时之俄机，全由俄籍机师驾驶，技术很差，既无仪器指挥，全凭眼睛观察。有一次十余架由广州飞韶关过大庾岭至长沙，有的在宝庆降落，有一架甚至在江西吉安敌人阵地迫降，方本仁、邓如琢等人未见过飞机，用大麻绳系住，恐其飞走。所以北伐时虽有俄机，实无帮助。当时陆空联络也差，如我攻南昌时，正当我指挥部队渡赣江，突然有几架红军飞机在上空盘旋，以为我们是敌人，猛烈扫射不已，死伤不少。从此我知红军飞机作战能力差，以后很少依赖他们。

攻武昌，飞机、炮兵无效，步兵爬城，又不成功。这时孙传芳之部队与第二、第三、第六等军在江西已发生接触。总司令部由武昌转移江西萍乡、高安。第七军也由武昌城外撤退，由鄂州入赣北，指向九江。以后武昌之贺对庭开门投降，陈嘉谟被第四军俘虏，第四军也调入江西。当时第二军在江西樟树与邓如琢对峙，无甚进展。第三军在万寿宫与邓俊彦之北军胶着。第六军与部分第一军，攻入南昌，邓如琢由樟树回师救南昌，第六军措不及防，程潜骑马由生米街渡赣江，逃至赣江西南整顿。第七军于赣北箬溪，遇孙传芳之劲旅谢鸿勋，谢作战负伤回到上海，不久病逝于上海；于王家铺与陈调元、王普接触，陈、王大败而逃。第七军之原定作战计划是指向九江，李德邻以为九江城坚，沼湖太多，不如乘胜打德安。攻德安，先胜后败，战事很激烈，吕野新、吴寿苛等团长相继阵亡。不久第四军贺耀祖之独立第一师也赶至援助。第七军获得支援，占领德安以北之高地马回岭，德安不战而下。蒋总司令关

怀赣北之战事，派我前往视察，李德邻派参谋黄远镇带一排兵至半途接我，等我到达前线，他们已肃清前线。

马回岭既下，九江之周凤歧不战而退入浙江，当时周与革命军已有了联络。占领九江，孙传芳在南浔铁路之主力被解决。第四、第七两军在九江的战果，鼓舞了第二、第三、第六等军之士气，继续向南昌反攻。唐福山守南昌，革命军久攻不下。敌人之外援随时可以到达，而第二、第三两军又为敌人所牵制，蒋总司令非常焦急。我判断敌人一定反攻，于是在生米街准备船只、浮桥，撤退围攻之南昌部队，全力肃清南浔铁路之琉璃车站，以孤立南昌。总司令要我指挥第六、第七两军部分兵力，夜攻琉璃车站，我以为晚间敌我不分，不如拂晓进攻。正当此时，万寿宫方面之郑俊彦因失败率领三个军之兵力退至马口。总司令派我为追击司令，带领第七军陶钧之一旅，第二军之第六师、第三军之七、八两师，星夜追击。此时，十四军之赖世璜也由赣南调至赣北，事前我们因未有联络，黑夜中遇着刘士毅之一师，双方发生激战。后来从俘虏身上获得用以联络之红白色衣带，才知是自己之部队。我要刘士毅连夜绕过马口，毁掉敌人通往余干之浮桥。郑俊彦见我军追至，只身而走。其下辖之三个军，因前无去路，后有追兵，乃派一军使前来投降。

(二)蒋先生要杀三俘虏

我当时有如初生之犊，什么也不惧畏，由军使陪同，亲至敌人阵地视察，敌方之三个军长王良田、李彦青、杨赓和，见我突然而至，不胜惊诧，他们要求我不缴枪械。我对三人讲解革命情势后，准许三人携带少量枪支由南浔路回至孙传芳处，其部队则归我指挥。三军长行至九江，

我打电报至庐山向蒋总司令报告处理经过。总司令复电不赞成我的处理，说我之行为无异资敌，因为孙传芳仍然是我们之劲敌。要我将三人捕捉送至汉口政治部。当时总政治部之谍报人员金佛庄派至南京工作，被孙传芳之情报人员识破而枪毙。总司令闻之很生气，一面打电报给邓演达，令其于三个军长中任挑选两个枪毙，一面打电报给孙传芳说："我已枪毙你两个军长，如你尚残酷待我工作人员，你还有数万军队在我手中。"我至九江，犹不知蒋总司令如此大生气。他的机要秘书潘宜之将情形告诉我。我立即谒见蒋总司令，申述我之意见："革命军以收揽人心为目的，务使敌人感恩怀德。孙传芳杀金佛庄因为他是谍报人员；我们如杀孙之俘虏，难免不遭受'白起坑卒'之批评。"蒋总司令不以为然，说电报早已发出。我见事已不可挽回，只好黯然辞出。邓演达接奉电报，枪毙了王良田、杨赓和。多年后，我在陈调元处遇见李彦青，李突然下跪，谢我救命之恩，其实只是他命中注定不该死，与我毫无关系。

四、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

革命军进攻江西，孙传芳所部经奉新、高安、樟树、箬溪、王家铺、德安、马回岭诸战役，主力已被击败，守南昌之孙传芳部队蒋镇臣、唐福山投降革命军后，收编为第十一军，由朱培德总指挥处理。当时南浔路方面之情形，朱培德之第三军在琉璃车站，程潜之第六军在永修，李宗仁之第七军在德安并指挥第四军一师及贺耀祖之独立第二师。九江之周凤岐部队被李将军击溃后，退入浙江，但是他与革命军间已取得默契。陈调元、王普之部队则由瑞昌退入安徽。郑俊彦、卢香亭也率领残部逃入浙江。南

昌未攻下之前，孙传芳在江西之势力较革命军雄厚；南昌攻下后，孙之部队或降或逃。孙的六个方面军除第四方面之周荫人、第六方面之颜景宗外，其余第一方面之邓如琢，第二方面之郑俊彦，第三方面之卢香亭，第五方面之陈调元皆创伤甚重。此时在江西境内之革命军为：第一军之第一、二师，第二军三个师，第三军三个师，第四军两个师，第七军四个旅，与贺耀祖之独立第二师。在江西，名义上我是参谋长，然而蒋总司令偶而也派我领军出战，如至樟树，督饬第二军作战，至德安铺佐李德邻将军，最后任命我为追击指挥官，追歼郑俊彦部之王良田、李彦青、杨赓和三个军。该三军自军长以下均缴械投诚。此为我在江西大致之情形。

（一）计划进攻上海南京

攻下武昌后，吴佩孚之势力可谓所存无几。我军占领江西后，孙传芳之势力也损失二分之一以上。革命军在二处伤亡亦大，亟待补充。这时，黄埔第四期之学生刚好毕业，送至南昌。蒋总司令即将我前俘虏王良田、李彦青、杨赓和三个军所得之枪支分发给该批学生，编为第十三军，任命我兼军长。后来我实在无暇兼顾，改派熊式辉接任。当时各省也时时供应弹药、兵源（因山西、四川兵工厂尚未归中央统一），其分配之工作，皆由蒋总司令决定。

我们此后工作，在于筹划如何略取上海南京。其战斗序列大致如下：

北伐部队分江左军、江右军及东路军。江左军由李将军宗仁指挥，沿长江左岸，由江左之安庆出合肥、蚌埠；程潜将军统率江右军，沿赣北皖南，由芜湖出秣陵关直取南京；东路军由何应钦将军指挥，负责由福建而浙江，攻

取上海。江左、江右之分纯以长江为准，面对江河之下游，居左者曰左岸，居右者曰右岸。唐生智之第八军出武胜关入河南。

当时国内之敌军情形大约如下：吴佩孚之残部在河南，奉军入关与之会合攻击南口之冯玉祥，并攻击山西之阎锡山。冯为国民军总司令，已与国民革命军有联络，后来他在南口失败，转入西北出潼关至郑州与革命军会合。阎为北方军总司令，后经娘子关出师加入革命军侧击奉军。孙传芳尚保有皖、江、浙三省。褚玉璞、张宗昌之直鲁军则在皖北、鲁南。

（二）蒋委员长委我为前敌总指挥

东路军以对付孙传芳之残部为主，何敬之将军因为率领第一军之第三师、十四师以及福建张贞之民军进攻福建之周荫人部，由潮梅转战松口大埔，一时不能至浙江，所以出浙江之东路军由刘峙指挥第一军之第一师（王俊）、二师（刘峙）、二十二师（陈继承），第二军之张辉瓒，陈仪之十九军残部以及投降后改为二十六军之周凤岐部队。孙传芳守浙江之部队指挥官是孟昭月。东路军在战略上以攻击浙江之孙部掩护右军右侧背，然而孟之势力雄厚，东路军于兰谿、桐庐带，被孟部击败。蒋总司令据报，非常焦急，对我说："何将军在福建对周荫人部以判断作战情况非半月后不能调入浙江。东路军在浙江已遭受失败，势不能久等。浙江战事不利，不仅江西大本营根据地受影响，且使江右军也受威协。东路军非兵力不足，乃系指挥官指挥不当，你我两人应前去一人。"我知道蒋总司令之意思，说道："总司令是全军之统帅，岂可往局部指挥，如总司令不以我才能浅薄，我愿前往东路服务。"蒋总司令听我表

示愿赴前线，非常高兴，三日之内为我成立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任命我为前敌总指挥，调总部参谋处长张定璠为参谋长。总部机要秘书潘宜之为政治部主任。指挥部成立前，在名义上颇费周折，因为东路军已有总指挥，为了便于指挥，所以在总指挥部下又设前敌指挥部，蒋总司令为此事问我有何意见，我回答说为了革命，任何名义我在所不计。李宗仁在九江听闻我要到前线，愿意将第七军拨四团人给我作基本队伍。当时，第七军在江西境内一共只有九团人，我认为力量合则坚强，散则脆弱，四团人于我无用，于李则大有帮助，我辞谢他的好意。只请他于第七军选三百人作为我的卫队营，李派黄瑞华为卫队长带了三百余人至南昌候我使用。所以前敌指挥部除此三百余卫队及严重新编成之二十一师外，别无其他新的队伍。

(三)出战前酩酊大醉

我发表为前敌总指挥之后，朱培德、唐生智、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等主要将领在南昌为我饯行。我向来不饮酒，当晚因众人热烈招待，我饮一瓶白兰地，众人大为惊奇。我生平不饮酒，一则因为信奉回教之故；一则因我八岁时，在私塾读书，孔子圣诞，同学们饮酒庆祝，我喝得酩酊大醉，一晚毫无知觉。事后，先母严厉告诫，从此我滴酒不沾。南昌饯行酒是破了戒。

前敌总指挥部成立妥当，第四日我便出发。出发前，我接悉内子马佩璋夫人将由武昌动身前来南昌，然而前线危急不敢久等。第五日我之眷属抵达南昌时，我已在途中，总司令打电报给我："兄出发之次日，嫂夫人即前来。夫妇不乃相见，此中正之过也"。

我由南昌出发经上饶、玉山，至浙江常山。我未到常

山时，前方败军已有部分散兵退抵常山，我为了虚张声势，沿途拍电至常山，以示大军不日到达，下令常山县政府封两万人的船以备军用。我抵达常山时，县长亲自出外封船未回，县府秘书千秋鉴殷勤招待。他告诉我此行一定打胜仗，我问何以见得，他说，前一夜扶乩得诗一首云：

百万雄兵胸中罗，大纛东来喜气多，

天意也知归党国，舆图一片白山河。

当时连日下雪，大地一片白色，白山河可以作此解释；但我姓白，白山河也可以指我。所以千秋鉴认为得了神喻一定打胜仗。当时浙江民间还有一个谣言，说是杭州之西湖镇压白蛇精之雷峰塔倒了，白蛇出现了。我固然不迷信，然而这些谣言未尝不可用来鼓舞士气。

(四)克服杭、沪

我在常山休息了一晚，第二日至衢州，召集团级以上干部训话，勉励他们努力作战。会二十一师来到，我将二十一师及原先退下之部队由江的左岸调至右岸，故意在白天行军，让孟昭月之谍报人员知道，以为我之重点在右岸，孟队伍果然向右岸移动。行至兰溪，我将右岸队伍夜间又秘密调回左岸，右岸仅留薛岳一师及李明扬新编之独立团，命令他们若敌人来攻，务必死守，以牵制敌人之军队。后来孟虽知我军之重点转移，已来不及渡江，而我军已向桐庐、浪石铺敌前渡河，用强行军连夜经凤山庙进入新登。孟之总部在新登连夜撤退至杭州。我在新登俘虏孟之副官，令其持我的名片往见孟，孟知杭州难守又撤至上海。仅此一战，便占领之杭州。

当我在衢州时，何总指挥电报指示，要我退守仙霞岭之常山、江山，待其解决周荫人后，再会师进攻，以免被敌各

个击破。我奉电未有决定，因为南方部队宜攻不宜守。攻则气盛，守则气馁。不久，我又奉到蒋总司令电报："衢州为战略要点，战守由兄自决，中不遥制。"何将军要我退守，蒋总司令要我自决，我经慎重考虑后，决定不退不守，采取攻势。因薛师在游埠方面牵制敌人，使我亲自督率二十一师在浪石铺敌前渡河成功。杭州顺利克复。

我进入杭州，老百姓箪食壶浆迎接革命军，如有伤患，无不妥善招待。孟昭月退回上海后，张宗昌派他的第八军毕庶澄前来援助。孙传芳打电报给毕，竟云："遍山遍野所发现的民众大都是赤军（指革命军）之便衣队居多，务必小心。"所谓便衣队实是散布山岭之间欢迎革命军之老百姓。毕不知我们已占领杭州，兼程赶来，甫入浙江境内即被我军击溃，逃至上海。我攻下杭州半月，何敬之将军才由福建至杭州。我们次一步之作战目标便是上海。

五、占领上海

（一）租界外国士兵放枪恐吓

进攻上海之前，何将军在杭州召开一次军事会议，参加人员只有我与苏俄顾问蔡巴诺夫及各军师长。蔡巴诺夫主张杭州由少许部队留守，主力绕长兴、宜兴出武进（常州）、吴县（苏州）、昆山，切断京沪铁路，断绝上海之外援。我除了认为蔡巴诺夫之意见可行外，还主张分一部分力量沿沪杭铁路挺进，因为革命军已占领嘉兴，正准备前进。蔡巴诺夫因为听闻齐燮元与孙传芳相战时，为了渡淞江在淞江相持数月，坚决反对我之意见，何将军很难决定，宣布暂时停会，以便疏导双方意见。我面报何将军："我知道淞江之障碍，已令铁路局准备铁篷车，前端装置

俄制之762山野炮；敌方最坚强之阵地，莫如淞江三十四号桥之桥头堡，而此地也是我军必经之途。若铁篷车能抑制敌人桥头堡之机枪阵地，工兵即可破坏敌方防守之铁丝网，我军前进则无问题。”何将军听我有如此部署，始同意我之意见。第一军之第一师、第二师、第二十一师及第二十六军归我指挥沿沪杭铁路前进；第三师、第十四师、第十四军之两师、第十七军之两师，以及第十九军一部分由何将军统率出长兴。杭州则由陈仪留守。这一计划因为是我建议的，我由炮兵营长蒋璧陪同坐了铁篷车亲至前方督战。所幸敌人之机枪掩体多被我方炮兵摧毁，工兵扫除了所有铁丝网，大军顺利渡过淞江，占领松江城，毕庶澄沿江防守之部队，因第一师刘峙在淞江下游渡河进攻，毕部被压迫入上海闸北车站。刘峙乘胜追至上海公共租界，租界之外国士兵向天空放枪，阻止革命军前进。我派员告之租界守兵将领：“于今为革命讨伐军阀之时期，租界原是不平等条约之产物，今姑不论，如果你们阻止革命军前进，必须负一切后果。”租界之守卫人员见我方态度强硬，不敢再横蛮阻挠。毕庶澄退入闸北，以为租界之外籍士兵会阻止革命军，所以我们到闸北时，毕军正在做饭。毕军见我军至仓皇撤退，上海垂手而得。后来毕庶澄因作战不力被张宗昌所枪毙。革命军所以能轻易占领上海，未遭受很大之困难，与钮永建活动上海税警来降有很大之关系*。

（二）兼任上海警备司令

克复上海，蒋总司令任命我兼任上海警备司令，革命军因纪律良好，故而未发生严重之外交事件。

* 1927年3月22日，周恩来等同志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解放了上海，北伐军第一军第一师才不折一兵不费一弹进入上海。

上海是全国商业、经济中心，世界列强各国于上海多有租界；上海又是共产党之大本营，也是黑社会最活跃之地区。当时是容共时期，部队中不少政工人员都是共产分子。所以治理上海是一件相当麻烦之事。

我治军有二项特别规定：一、严禁赌博；二、不准携带便衣，因为携带便衣既增加行军之困难，于战时激烈时官兵又容易换便服逃亡。然而租界政府也有特别规定，凡携带枪支，着军服进入租界一律禁止且遭扣留。我的部属因不谙租界之规定，被租界政府逮捕者不少。我再三交涉无效，乃下令驻守租界边界之中国士兵，凡外籍人士入中国地区者一律扣留，以作报复。租界当局因而不得不与我协调，只要我方人员不携带枪支，无论着何种服装，一律准许入租界。

(三)拒见杜月笙

我不许部下带便服，我自己当然也不穿便服。因为如此，当时还发生一件有趣之事。各国驻上海领事知道我是新任命之警备司令，特由领事团之团长挪威总领事率领至龙华拜会我。我当时很年轻，三十二岁，穿的是灰色军服，他们有的初还以为我是下级军官。某次，法领事于法租界设宴招待我，我向法领事说："我是中华民国之军人，必须穿中华民国之军装；我平日出入都有卫兵保护，入法租界当如此，如勉强我及我的卫兵遵守租界之规定，我绝不赴宴。"法领事同意。我的卫兵携带枪支前往，法领事除殷勤招待还派兵沿途保护。

我负责上海治安时，绝不理会黑社会人物。我不许陆军接受黑钱(过去驻防上海之陆海军，分配黑钱之比例大约陆军占三分之二，海军占三分之一)。杜月笙至龙华见

我，我概不接见。有人对我说，杜曾捐献大洋四万八千元，对革命军有功。言下之意希望我能予以一官半职。我说杜月笙捐了四万八千元，革命军可以还他伍万元，名气不以滥假，官职岂可随便送人。

六、上海清党

民国十三年，中国国民党改组时，总理提示"联俄、容共、农工"三大政策。其中联俄、容共政策是不得已的。因为对内而言，总理想不用武力解决共产党，使之加入国民党，潜移默化，为实行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而努力；对外而言，我国当时在国际间尚处在不平等之地位，受各种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如关税不能自主，如军港、商港之租借，如内河之航行权，如治外法权之庇护不法外人，若我们要收回时，如在粤之革命政府拟收回粤海关，而英国之军舰即开入白鹅潭，将炮衣卸下，炮口对准海关，所以总理想联俄以增强援助，抵抗帝国主义。讵料共党分子包藏祸心，自加入国民党，处处从事农、工、学、商、兵运动，时时制造矛盾，使农民反对地主，工人反对资本家，店员反对店主，学生反对教师，士兵反对官长，以此发展组织，使整个社会不安。同时，共党由苏俄供应武器，在两湖发动农工大暴动。社会中的农、工、学等基层组织全被共党所把持，军队中的政工人员与党代表也多是共党重要分子。此时党内党外、军中几乎无不充满了共党人员。例如第一军党代表为周恩来，第二军党代表为李富春，第三军党代表为朱克靖，第四军党代表为彭泽湘，第六军党代表为林祖涵等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敬恒、蔡元培、张人杰、张继、古应芬、李宗仁等见党国危机四伏，于十六

年四月二日在上海莫里爱路总理遗宅开会，检举共党借容共政策，在国民党内部发展组织，实行篡窃国民党颠复国民政府之阴谋。同时，蒋总司令自九江乘舰抵达上海召见我，面示清党之决心。并召集薛岳之第一师，及刘峙之第二师各级干部训话，第一师中之中下级干部有参加青年军人联合会者为数不少，当场便有人责问蒋总司令太右倾。蒋总司令见黄埔学生中竟有少数军官表现如此左倾，更坚定清党之决心。

(一)上海商务工厂乃中共总机关

上海是全国之经济、商业中心，当地约有四十万以上有组织之工人，共党之全国总机构——商务印书馆之工厂，便设在上海，其工人有手枪、手榴弹等武器。蒋总司令因了解上海之情形，问我实行清党需要多少军队，我说："只要调出薛岳之第一师，留下刘峙之第二师及周凤岐之二十六军便够了。"蒋总司令又问我需时多久，我说："三天差不多，至多不会超过一星期。"总司令再三嘱咐我要小心，注意防范共党之势力。薛岳因第一师中共党分子太多，被总司令免职回到广东，第一师被调至镇江；该师原来驻守之吴淞口，上海兵工厂等重要地点则由第二师接防。

共党得知第一师将被调离上海，发动各界代表至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挽留第一师，拒绝第二师。我接见代表们，问他们为何拒绝第二师？代表们说："刘峙参加过西山会议。"我反问道："西山会议在北平召开的，刘峙一直在部队中，何时参加过该会？"有的说他的精神去参加了。我知道这些代表全是受了共党之唆使至龙华胡闹。我严肃地告诉他们："调动军队是总司令决定的，我不过转达命令而已。我无权过问总司令调兵之事，众人更是无权过问总司

令调兵之事。再说，国民革命军原是不分彼此的，无论第一师或二师驻防上海都是一样的。”代表们见我态度强硬、坚决，才知难而退。

（二）调虎离山　内外策应

第一师调离上海后，我着手部署清党之工作。四月十二日拂晓，先肃清商务印书馆的工厂。在开始行动前，我知道商务印书馆工友中有不少系地方帮会分子，所以我派员与上海帮会首领杜月笙、黄金荣等密商，借得工会之符号衣服，分给采取行动之人员，化装成工人混入工厂，以策应外面包围之部队。事前，我还派人与驻沪法国领事交涉，请其准许清党之部队经过法租界，因为由法租界至商务印书馆工厂是一条捷径。法国领事初不允许，我说：“共产党是国际之敌人，他们以打倒帝国主义为号召，我们应该合作清除才对。”经我晓以大义，法领事才表示同意。清党工作我原定三日至七日完成；不料四月十二日早上，便突破了共党在上海之大本营——商务印书馆工厂。逮捕了共党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总书记侯绍裘，以及其同党多人，经清党委员会依法审判后只将为首倡乱颠复之汪寿华、侯绍裘两人枪毙外，其余附从共党分子，或施以感化，或交清党委员会予以处分，至于传说中集体枪毙若干人之事，完全是共党之恶意宣传。

（三）莫斯科百万人大游行抗议

共党因上海之组织被清除，发动工人大罢工。他们运动数万人至龙华，包围淞沪警备司令部，请求释放被捕之共党分子。我见他们来势汹汹，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事件，特在司令部门前架设机关枪，不许群众进入司令部之营区，只准他们推举代表入内。我接见他们代表，首先问他们是

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员，我解释共产党员借容共而加入国民党即发展组织阴谋篡窃党权颠复祖国，故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检举共党之祸国阴谋，中央实行清党，你们如果是国民党员，应回去劝告他们率队回去，如系共产党员，我正奉命清党依法要扣留讯办。当时还在清党，他们当然不敢回答是共产党员，都说是国民党。我说："既然是国民党员，便应该服从中央监察委员会清党之决议。不但不应该至此作无理之请求，更应该劝导工人服从党之决议。"他们无理可说，只得出外向群众解释。后来莫斯科知道上海清党之消息，发动百万人抗议大游行，他们的口号是：反对上海屠杀民主人士，反对白色恐怖政策。据说，在"白"字下面，还注明了白是白崇禧。

上海清党之后，各地纷纷起而响应。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清共；夏斗寅原想用武力逼使武汉政府清共，可惜被叶挺打败；唐生智在河南因他的多数将领要求，也开始清共。蒋总司令在徐州会议上也表示，若武汉方面能清党，驱逐鲍罗庭，宁汉还是可以合作北伐。后来武汉方面，一面受国内舆论之压迫，一面感觉与共党难以相处，也实行清共，不过不如南京、上海之彻底。武汉方面既肯清共，宁汉重新合作。这时，冯玉祥之国民军因感于国民革命之大义，出潼关合附革命军。十六年六月二十日，蒋总司令与冯玉祥在徐州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会中决定冯之国民军由平汉路开至河北，南京方面之革命军则北上打山东。会议完毕后，我便回到南京准备渡江北伐。

清党是国民党之生死存亡关头，不清党不但北伐大业无法继续，就是国民党也有被共产党分化瓦解之危机。共党分子既不见容于国民党，从此转入地下活动，所以才有

以后江西之叛乱(指南昌“八一起义”——编者)。

七、龙潭战役

(一)龙潭战役前之形势

龙潭战役在北伐战史上是最重要之一仗。孙传芳为何敢发动龙潭之役?是役之前,我方军事部署如何?当时国内政治情状若何?皆有一说明之必要。

1. 决心清党

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于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占领杭州,三月二十二日占领上海。何将军指挥东路军之主力协助程潜之江右军于三月二十三日占领南京。陈调元、王甫等系孙传芳之将领,见革命军势力强大,也于三月四日投诚革命军。因而浙、皖等地全为革命军所掌握。蒋总司令因感于共产党蓄意颠复党国之行为,三月二十六日至上海指示决心清党,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敬恒、蔡元培、张人杰、张继、古应芬、李宗仁等在上海莫利爱路总理遗宅召开中央监委会议,检举共产党假借容共政策,在国民党内部发展组织,篡窃国民党之阴谋。当时决议咨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全国推行清党运动。共产党所以在国民党内部能迅速发展,与汪精卫之政治野心实有莫大之关系。十六年,汪自法国回国转至汉口,以国民党左派领袖自居。他在汉口大呼“革命的向左边来,不革命的滚开去!”这种论调自然能适合鲍罗廷之意志,因而鲍罗廷一面分化国民党内部为右派、左派、西山会议派;一面利用汪精卫在党内之地位,煽动对革命缺乏认识之国民党员。所以在武汉之中央委员、国府委员,不是共党分子,便是共党之同路人。有的虽明知鲍罗廷之阴谋,但是在当时之政治形势下,噤

若寒蝉，鲍罗廷遂更畅所欲为，共产党益发向各阶层渗透。十五年十一月，革命军占领南昌后，蒋公与中常委员张静江等密商，原议定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由广州迁至汉口。因武汉方面受鲍罗廷控制，乃决议迁来南昌，而徐谦、邓演达等纷纷反对，甚至公开宣称如果中央政府与中央党部迁至南昌，他们将另在武汉设立中央政府。蒋公为了息事宁人，搁置了将国府迁至南昌之意见，改在武昌开国民党第二届第三次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决议定汉口为首都，迁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至汉口。鲍罗廷于是更能施展其“挟天子以令诸侯”之阴谋。

共产党利用中共政府中与群众易于接近之组织，如农民部、组织部、青年部、妇女部等，积极参加并把持发展其组织，经常挑拨农民为了要求减租反对地主；挑拨工人为了要求加工资反对厂主；挑拨店员反对店主；挑拨学生反对教员。整个社会为之不安，社会秩序为之大乱，所以当时之情形是共产党发展至某一处，某一处便随之发生学潮、工潮、农民暴动。有人批评国民党只掌握住悬虚的职位，如中央之院长、部长、地方之省主席等。所谓悬，因其地位高；所谓虚，因其缺乏基层。共产党所掌握的全是社会之中下层。所以后来的情形发展为：革命军拼命与军阀作战，而共产党轻易便控制革命军之后方。

在军队中，共产党势力也很大。党代表几乎全是共产分子。凡作战计划、人事命令、帐目报销，都须经党代表盖章副署才生效。北伐初期，八个军之党代表中如周恩来、李富春、林祖涵等人，全是资深的共产党员。其他如师、团、营、连中之党代表也为共党所把持。此外，总政治主任是邓演达，副主任是郭沫若。政工人员在部队中，无

不宣传世界革命、唯物史观。若有人读三民主义，便被认为是右派、落伍分子、反动分子。

清党以后，军队中之共党分子纷纷逃走，但是党代表之制度还是存在。其实兵贵神速，若领导二元化便难于指挥。俗话说："成于一，败于二三。"其理便在于此。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红军盛行党代表制度，铁木辛哥元帅认为此制度妨碍指挥作战，力主废除。后来红军军事失败，斯大林认为其原因便在于废除党代表制度所致，又恢复该制度，但是仍然无法挽救红军之颓势。朱可夫将军做统帅时代深知党代表制度不利于军队指挥之统一性，于是以红军官兵已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勿须有党代表，再度废除党代表制度。党代表制度是最落后之制度，红军十月革命后，所以施行这种制度，主要因为无法控制白军之思想。但是军事是瞬息万变之事，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如何能让二人共同负责？党代表、以及军中之共党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便是共党破坏革命军组织与纪律之两大武器。

军队既为共产党所渗透，其下一步之目的，便在于蒋公之去留。当国民党第二届第三次会议在武昌举行时，鲍罗廷利用多数左倾之票数，改组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为委员制，各级委员五人，撤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之机构，改由军事委员会指挥革命军。军委会也是委员制，设委员九人，党政提名五人，军方提名四人。因而共产党借党政之代表，便可插足军事之最高决策机构。此外又扶植唐生智反蒋，目的不外压迫蒋公他去。"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只要蒋公下野，三军无统帅无主，共党之阴谋便可以得逞。列宁临终时，向左右亲信之人员说："委员制是使政治混乱的制度，要想某部门弄坏则用委员制。"鲍罗廷的目的

在求中国政局动荡以便混水摸鱼，所以在国民党内部，尽力推行委员制。

2. 南京会议

革命军占领南京之后，十六年四月八日，蒋公至南京召开会议，根据总理曾经说过南京是可以建设为首都诸地方之一(其他地方如武汉、北平、西安、兰州等)，建议定都南京，欢迎武汉之中央委员至南京共赴国难，并有专电致汪精卫。四月十二日，上海清党后，各地紧随清党。武汉军民因受各地之影响，渐渐觉悟共党祸国之阴谋，故有夏斗寅兵迫武昌，许克祥起义长沙(所谓马日事变)。夏许两部虽为亲共部队叶挺所击败，但是对武汉政府未尝不是一大刺激。汪精卫见全国趋势所向，也开始分共（不敢用清共二字)。嗣后，鲍罗廷由西北回国，加仑将军因我之保证，经上海回国。

加仑将军原名布鲁歇，为俄国白军之将军，后投效红军。曾受高等教育，待人和善，学问渊博。他因为是革命军军事总顾问，我是总司令部幕僚长，两人经常接触，所以我知之甚深。平日行军，他素不坐轿，好骑马；我从小即有骑马之嗜好，人马总是形影不离。每次作战，总司令部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加仑将军必定提出数个方案以供参考，其胸怀甚为宽大，无论是否采纳，全不在意。大体上言，自北伐以来，加仑将军与我们相处非常融洽，蒋公待之殊厚。他回国后，一度任苏联远东军司令，后因军事机密为日本间谍所窃，被斯大林治以死罪。蒋公接得驻苏大使杨杰之报告，想保其性命，乘孙科因外交问题以特使身份赴苏时，嘱其转达斯大林，请派加仑将军至中国做他的私人顾问。斯大林告诉孙，加仑已被枪决。

我们当时最接近之敌人，在江北有孙传芳，在皖北有张宗昌、褚玉璞。孙号称有十一个师一个混成旅，总数约五万人；张宗昌之直鲁军号称十一个军、两个师、一个旅；褚玉璞号称四个师、五个旅。张褚之军队虽多数只有番号，但合计不会少于十万人。是时，奉军已入关，对我们也是一大威胁。在第二路军渡江北伐之前，蒋总司令曾有一计划准备分四路北伐：

第一路：以已渡江北上在津浦路作战之原江右军程潜、鲁涤平等部为第一路军，沿铁路北进。

第二路：以已在皖北之原江左军李宗仁、陈调元等部为第二路军，由皖北指向陇海路西段包围徐州。

第三路：以武汉唐生智及刘佐龙部为第三路军，由旧京汉路北上。

第四路：以何应钦所率之原东路军部队为第四路军，由镇江渡江攻淮阴直出海州、陇海路东段。

这个计划还未实现，而宁汉两方即告破裂。预定之第三路军唐生智等部，已成同舟之敌；第一路军之程潜、鲁涤平两部，也放弃前进计划而投向武汉。李宗仁、陈调元之第二路军受其影响，不得已退保芜湖、大通。何将军之第四路军也因局势改变，将占领扬州之部队撤至江南。唐生智一面勾结奉军，一面与孙传芳互通声息，目的在谋南京。十六年五月十七日，蒋总司令有电报给我们三位总指挥说："……唐孟潇托杨丙与奉方妥协似有头绪，故奉方拟移河南部队来津浦路助张褚攻宁。此息甚确，情势严重，各方已有协以谋我之势。如我不能将孙张两逆于最短期间肃清，则以后更难应付。务望督促前敌将士共赴同仇。……"龙潭之役后，我们于孙部中也查获孙唐勾结之证据。孙之

作战命令中有云友军唐某所部已到达某线云云。

3． 三路北伐

四路北伐之计划虽因唐生智与程潜之变节受挫，但是革命事业绝不因此受阻。蒋总司令决定继续北伐，改战斗序列为三路：

第一路总指挥何敬之将军，下辖第一军、第十八军（由杨杰第六军编），第十四军（赖世璜）、第十七军（曹万顺）、第二十六军（周凤岐）、第十军（王天培）及第三十一军（李明扬）。

第二路总指挥蒋总司令自兼由我代理，前敌总指挥陈调元，下辖三十三军（柏文蔚）、三十七军（陈调元）、二十七军（夏斗寅）、新编第十军以及暂编第十一军。

第三路总指挥李德邻，下辖第七军（夏威）、十九军（军长胡宗铎、由刘佐龙之第十五军改编）、四十军（毛炳文，由湘军第一师贺耀祖部扩编），以及叶开鑫之四十四军。

第一路军由镇江、扬州，沿运河向宝应、淮阴压迫孙传芳部，孙部节节后退。第一路占领涟水、海州、莒县等地。

第二路分三个纵队渡江。第一纵队指挥官贺耀祖率领第四十军由南京之大胜关渡江至津浦路西侧之汤泉、乌江镇、滁县等地，向张宗昌进击，第二纵队指挥官杨杰率领第一军之第一、第三两师及第六军（欠第十九师）由乌江镇戒守在滁县，与第一纵队合师后占领八张岭。第三纵队指挥官陈调元率领第三十七军，出东西梁山，经和县移向津浦路。

第三路军由皖北，经蚌埠、宿县等地指向徐州。

我指挥第二路军攻郯城、红花埠、宁宜等地。宁宜城

坚，由方永昌防守。方发誓与城同存亡，城内屯粮丰富并准备各种燃料以防我军偷城。时逢雨季，攻城益发艰苦，我调三十七军之野炮队前来参战，因道路泥泞，马队无法运炮，特征集附近农家之水牛，经千辛万苦，才将野炮运至宁宜城附近。原定计划希望用炮轰塌宁宜城一角，无奈后援不继，炮弹缺乏以致不能达成。正当我苦攻不下之际，奉蒋总司令电报，要我留少许部队监视宁宜，其余回师，会攻徐州。我行近八义集即与敌接触，敌人蜂拥而来，而徐州城又不闻枪炮声。当时之可能有二：第一，我军已入徐州，但是敌人不应该愈打愈多；第二，我军可能已撤退，但是总司令部并未有命令给我。我军虽然时时破毁敌方运兵之列车，然而敌人援兵还是不绝于途。如此相持两天，第三日，第二路参谋长系上海市长张定璠转来总部撤退命令。徐州撤退之最大原因，便是李德邻先生指挥之第七军为了予防唐生智，止于芜湖、安庆不能前到。我既奉命，开始撤退。为了节约时间，我不顾白昼撤退之危险性，令部队沿运河两岸往南退。陈调元部队原是后卫部队，因被敌方骑兵冲断，不能及时赶至八义集，但是杨杰之部队还未通过，如我先杨杰而去，杨很可能被敌军包围。我于是统率数百广西籍之卫队，担任后卫任务，待杨部到达，占领阵地，我才离去。部队路经骆马湖、宿迁等地，遇土匪骚扰，我命令部队，只要无人员伤亡，勿予理会，因为我们须兼程赶回江南，不然，随时有被敌人截击之危险。

第二路军撤回江南，第一路军也相继沿运河向江南撤。第一路军在江北浦口以北、和县一带曾留守一短时期，后因蒋先生下野，我们为保存实力以待第二次渡江，所以决定将第一路军完全撤回长江以南防守。

蒋总司令下野后，张学良派代表与张宗昌会晤：愿助其打南京。孙传芳又得唐生智之支持，所以敢发动龙潭战役。

（二）龙潭战役

1. 蒋介石下野

第一次渡江北伐，因徐州之役受挫后，各军实力略损，士气尤为消沉。高邮、宝应一带敌人，逐渐向南京压迫而来，武汉方面又内忧不已。蒋总司令见党国危机四伏，为促使本党同志觉悟，北伐大业不坠，在十六年八月十二日辞去总司令职务，避开武汉攻击之目标，回到浙江奉化。他临去之前，召集我们三位总司令谈话（我已为第二路总指挥），说明他必须离去之苦衷，望我们本同舟共济之心，为革命事业而奋斗。我们三人虽然挽留他，也不能改变他的去志。蒋先生下野后，军事上之遣调悉由军委会处理，实际上军委会由我们三人负责，一切命令由我们副署发布。当时军委会通令各军："此次蒋总司令辞职，中央已议决挽留，在蒋总司令未回任以前，一切军政军令即由本委员会负责处理，各部队仍隶本委员会统一指挥，应努力革命工作，胜利终属吾党，此后无论何部调遣悉听本委员会命令，不得擅自移动"，同时还下达一道防守命令：

第一，南侵之敌人，孙传芳所部之先头部队，于津浦路方面已到达浦口，于运河方面已逾宝应。西侵之敌人为张宗昌之部队，与国民党革命军鹿钟麟之步兵及郑大章之骑兵在砀山、钜野等处接触。

第二，我军为得时间之余裕，以便联合革命军全体势力及西北军北方军一致出师，大举北伐起见，拟暂利用长江天堑扼要防守。

第三，防御部署：

第一路军担任乌龙山（不含）以东长江下游一带之防务。

第二路军除以第三十三军担任合肥六安间之防务外，其余各军应担任东西梁山(不含)以西长江上游之防务，但第三十七军应位置于芜湖。

第三路军，应担任乌龙山以西，东西梁山以东(均含该地)长江中段之防务，著以第四十军先位置于含山、和县，然后向当涂采石镇移动。第四十四军位置于慈湖镇及铜井镇等处扼要防守。

海军除以主力任南京江阴间之警戒外，应各以一部游弋长江上下游严密警戒。航空队侦察长江以北之敌情为主。

2． 龙潭战事爆发

以上之防御区分，系以第二路军位置皖省以应付皖北之敌人，并对长江上游警戒；而以第三路军位于南京附近，应付津浦方面之敌人，以第一路军位于京沪一带以应付运河方面之敌人。所以，与龙潭之役最有关连的是一、三两路军，但是我因为赴上海筹款，回程中行至无锡车站接镇江十四师卫师长立煌电话，始知龙潭战事爆发。我就近指挥第一路军在杭州淞沪整顿之部队。何将军则指挥第七、十七两军及第一军之二十一师、二十二师、警备师，当时京沪有线电报电话已断，我与何将军毫无联系，但是大家在战略上仍然配合一致，形成夹攻，这完全是精神协同之故。第三路军主要防守长江以南之地，其防御配备：

四十军担任慈湖镇(不含)至大信镇之线。

四十四军担任江宁镇(不含)至慈湖镇之线。

十九军担任由新河镇西南端二道桥(不含)至江宁镇之

线。

第七军第二、三两师担任由乌龙山炮台至新河镇西南端二道桥之线警戒。第一师位置于雨花台附近，各独立团位置于南京城内。

第一路军何将军根据军委会之指示，再区分其部队之防御配备如下：

第一路军担任沪宁间由乌龙山至吴淞一带之防务，拟暂取攻势防御，沿长江配备警戒，而以主力位置丹阳附近待机出击。

以上是我方之部署。敌人之情势又如何？孙传芳之军队由运河两岸向镇江南京压迫；张宗昌、褚玉璞主力向徐州以西。直鲁军铁甲车队沿津浦路向浦口，唐生智、张发奎之部队也循江而下，图谋南京。何键之江左军至安庆时，被唐任命为皖省主席；刘兴之江右军至芜湖时，被任命为江苏省主席。张发奎兵发之后，行至九江，汪精卫见国内政治环境复杂，策动张改道回广东，谋取根据地。张于是由南浔路而下，取道韶关回广东。张部抵南昌时，贺龙、叶挺叛变。贺、叶率领二万人，经赣南窜回广东潮梅，想占领海口，以便接受苏联军援。张部即回广东，南京之压力稍为减轻。

蒋公下野，除了三军无主，军饷也是一大问题。因广东短时接济不上，财政部向上海银行界借大洋一百万，当时上海之银行以交通、中国两银行最大；但是这两家银行不愿大量借钱给政府。他们又在租界内，财政部对之莫可奈何。何、李两将军嘱我至上海代财政部长向银行界交涉。他们所以要我去，是因为过去凡当上海警备司令，只要不认真查禁烟、赌，就有奸商按月送相当贿赂分给驻沪的陆海军，

但是我负责上海警备时，不许陆军接受贿赂，不许军队坐霸王船，不许部队利用商船携带私货，尤其清党之役，将上海共党清除，上海之商人对我很感激。我任东前总指挥时，在衢州军饷一时不能拨到，我与衢州商会商量，用我的官章发行五十万大洋票。后来我接到军饷，立刻不折不扣将军票赎回，所以上海之商界对我的印象很好。我到上海，上海人心惶惶，多数人家准备五色旗欢迎孙传芳，但是上海之银行团经我再三交涉，还是借了六十万元。

交涉完毕后，我由上海回南京（八月二十五日），行至无锡车站，据报告前行之快车因铁道被孙传芳部队破坏，全车倾复。我心想一定是敌人有计划破坏铁路，为了安全，我令铁甲车先行保护，行至牛镇，铁甲车又翻了，我知事态严重，打电话至镇江问卫立煌。卫告诉我，孙传芳已占领龙潭，敌军正由金山、焦山乘船渡江，刻正堵击中，要我迅速调兵援助。当时与我同车的人只有胡宗铎、宋子文（政府请他至南京主持财政部），以及数百卫队，通南京之有线电话已被破坏，无线电器材因笨重倔劣无比，我们随身又未携带，如果打电话到上海，要用无线电转南京。我在无锡车站就地取材用车站电话指挥沪杭一带第一路军之第二、三师，及十四军。我当时兼通信兵、补给司令、指挥官，如此不休不眠之生活经过六天六夜，指挥第一路军之部队参加该战役。

3． 龙潭战役的激烈经过

孙传芳部队向镇江方面渡江的是佯渡部队，主渡河点是大河口、划子口。孙之主力曾占领乌龙山炮台、青龙山、黄龙山及南京城郊之尧化门外、龙潭车站、水泥厂。龙潭之役以黄龙山之战事最激烈，其他地方也是几得几失。

长江天险，孙部能安然渡江与海军之暧昧态度有关。我接获密报，得知海军总司令杨树庄态度不明，乃由无锡打电话给杨，先之敌人已占领龙潭，要他开出舰队守住渡口，切断敌人之后援，敌军炮兵因见我舰队开炮，彼亦炮击我兵舰。适有英舰经过江中忽被炮击，英舰不知是何方发炮，为泄忿计，乃猛烈地炮击黄龙山，敌军阵地多半被毁；我第七军才能乘势冲上黄龙山。龙潭之役的第六日（十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刘峙、卫立煌占领士敏土厂。我在该处遇到何将军，两人相见，亲切逾常，一则因为内心激动无比，二则大家预料战争必定胜利，心情愉快万分。我与何将军虽然在数日内未完全联系，但是两人攻击敌人之部署，恰巧是腹背夹攻。所以后来何将军每谈到龙潭之役，认为完全是精神协同，才获得了胜利。

龙潭之役，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之战略、战术，只是尽量抽调后来之兵使之开赴前线拼命，全是打硬仗，所凭借的又是士气而已。譬如我在镇江时，刘峙虽撞车受伤，还是与何竞武到前方指挥作战。当时很多败兵从前线退下来，我带百余卫队前往夏蜀山押阵督战，途中与自前线退下之五十八独立团相遇，团长是桂永清。我告之夏蜀山地势重要，要他重回去坚守阵地，这是我第一次认识桂永清。后来桂做了参谋总长，还与我谈起此事。

孙传芳渡江之前，曾有万全之准备，他在江北利用密布如网之运河支流，操演船只。孙传芳认为过去在福建、江西、浙江之挫折，悉因缺乏破釜沉舟之决心，所以龙潭之役他不但亲至水泥厂督战，凡运兵完毕之船只一律调回长江北岸由大刀队看管，颇有济河焚舟背水一战之壮志。因此龙潭之役后，孙本人固然逃回江北，其部属几全被俘

虏，不过孙部被俘之高级干部，于押运至南京途中，被逃脱者不少。

龙潭之役前，我方曾接获敌人准备渡江之情报。我方当时之策略是采取后退配备，第一线沿江布置少许部队，主力控制后方机动地点，若敌人果然敢渡江，准备半渡而击之。不过海军初期之态度，确出乎我们预料之外，以致孙部能迅速渡江。

总观龙潭之战，孙传芳利用了最有利之时机：蒋先生下野，唐生智有二心；革命军徐州受挫。他选择大河口、划子口等地渡江也是最有利之地点。划子口对岸便是栖霞山，乌龙山炮台。占领该等山地，一则可以掩护登陆部队，二则可以威胁南京。南京一旦被占，革命军之政治力量将被瓦解。而且京沪铁路以东之地区，田坎皆为南北方向，登陆部队即可用作天然进攻之掩体。

龙潭之役，孙传芳既得绝好之机会，何以会失败呢？孙之失败不是指挥错误，也不是战斗力不强，主要原因有三：

① 参加龙潭之役之革命军以一、七两军为主。一、七两军都是国民革命军之主力，对三民主义有信仰，有信仰便有力量。

② 我由沪回宁，在无锡指挥第一路军，与何将军无形中造成夹攻形势。

③ 孙部渡江后，渡口被革命军所抄袭，后援不继，加以海军态度明朗，孙部之补给可说完全断绝。反之沪宁之间补给方便。双方经六昼夜之苦战，有无补给自然成为决定胜负之重要因素。

是役，双方死亡很重，我与何将军在士敏土厂会师后，肃清残敌，清理战场。当时敌我双方真是尸体遍野，骸骨

盈野。我们发动士敏土厂工人及红十字会收尸，结果收不胜收。据说半年之内，火车经过龙潭，尸臭仍然逼人。抗战胜利还都后，三十六年我在国防部长任内为纪念龙潭战役之阵亡将士，特令本部工兵署副署长黄显灏设计建筑会师亭于龙潭之山上，并为文以记其事，刻石以志念。落成以后，还请何上将约同当年参与龙潭战役之将领到会师亭向烈士默哀致敬。

回忆龙潭战事结束后，我们打电报至奉化向蒋公报告战事之经过。蒋公甚为嘉勉。行政院长谭组庵先生当时因奔走宁汉之间的和平，也在南京，他设宴慰劳作战之将领，席间亲笔写一副对联送给我，云：

"指挥能事回天地，学语小儿知姓名。"

龙潭之役在北伐大业中是最重要一仗，因为胜利了才能西征消灭唐生智之反动力量，才能迁都南京，稳定国内政治局面，促使徘徊观望之友军加入革命行列——如阎锡山之北方军在龙潭战役前便与革命军有联络，但畏于奉军迟迟不敢明白表示态度。龙潭战役之胜利对奉军是一大威胁。阎鉴于革命之趋势，很快便附和了革命军。如果龙潭之役失败，不但江、浙、闽、赣、皖五省重归孙传芳，唐生智之势力一定高涨，其他抱游离态度之友军，更远离革命军。如此，革命军能否再回广东重整旗鼓，便是一大问题。所以说龙潭之役是北伐大业成败极大之关键。

第七章　西征讨唐

西征是北伐期间不幸之事，是革命阵营受共党之挑拨而自行分裂之结果。西征之前，自北伐誓师以至龙潭之役，

革命军之进展异常神速，两广、湘、赣、闽、江、浙、皖等省都在短期内为革命军所占领。我记出下列革命军发展之几个重要日期，以证明革命军发展之迅速。

一、唐生智野心极大

革命军于十五年七月九日在广州誓师北伐。因有三民主义之号召，蒋总司令之领导，所以民众倾心，三军用命。当时义旗所指，有如拉朽摧枯。七月十一日进驻长沙，安定湖南（实际上誓师之前，革命军已开始支援湖南唐生智部队）。九月一日围攻武昌，六日占领汉阳，七日克汉口，十月十日下武昌，直趋武胜关，湖北因而底定。十一月七日占南昌，*十二月九日入福州。这不过是半年之内之事。十六年二月十八日攻占杭州，三月二十二日占领上海，二十三日克复南京。**所以出师以来未及一年，平定两湖、闽、赣、皖、浙、以及江苏局部，其进展之速度不可谓不惊人。龙潭战役之后，革命军本可乘胜逐北，西联冯玉祥，北联阎锡山，会师北平，讨伐张作霖，平定东北，如此北伐大业一定可以提前完成。不幸在此期间，唐生智叛变，革命军不得不分兵西征。

唐生智之野心甚大，政治欲望很高，加以鲍罗廷、汪精卫之煽动，其气焰更是不可一世，想以武汉为根据地与蒋总司令分庭抗礼。唐一面派代表杨丙至奉天与张作霖商谈合作，因张学良也曾在蚌埠会晤张宗昌、褚玉璞，准备会攻南京，阎锡山与冯玉祥则由奉军监视，所以唐生智敢自豫东撤下第八、三十五、三十六等军东犯长江下游。这

* 应十一月八日占南昌。

** 应三月二十四日克复南京。

是杨宇霆之私人代表亲向我们说的。唐另一面派蒋百里至徐州见孙传芳，孙也派代表至汉口与唐会谈。唐这种叛逆革命军行为，我们在龙潭之役于孙之部队中，也获得有力之证据。唐反复无常之态度固然导致革命军徐州之役的失败，导致龙潭战役之爆发，也因为有龙潭之役，我们才得消灭孙传芳之主力。

龙潭战役爆发时，唐生智派何键率第三十五军主力盘踞安庆，一部分驻合肥、和县；三十六军军长刘兴率主力盘踞芜湖附近，一部分进至大通，唐军每至一地则撤当地之行政首长，安置自己之心腹。当时唐发表何键为安徽省主席，刘兴为江苏省主席。我们为避免腹背两面作战，尽量不与唐部发生冲突。

龙潭战役之后，一般情况如下：唐部在皖北；张发奎之第四路军回广东；冯玉祥与奉军及直鲁军在豫皖边界相持；阎锡山观望未定；中央为收战后追击效果，铲除心腹之患，一面令何敬之将军统率第一路军二次渡江北伐，一面决定下讨伐令西征唐生智。

二、西征军之战斗序列

西征军总指挥程潜，副总指挥李宗仁。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宗仁兼，下辖第七、十九、三十、三十七等军，分布在长江北岸；第四路军总指挥程潜兼，下辖第六、十三、四十四等军，分布在长江南岸；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下辖第三、第九等军，分布在赣西北之修水、铜鼓、萍乡等地；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下辖方鼎英、李福林、黄绍竑、范石生诸军，在广东之韶关，广西之全州一带；鄂西有第九方面军鲁涤平之第二军，李燊之新编四十三军，方

振武第九方面军总指挥则驻在襄阳；豫南有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统率豫军各部队；此外，海军第一舰队（江防舰队）司令陈绍宽率领大小各型舰艇，空军司令张静愚统领航空第一队，航空第二队，水上飞机队，皆参加西征之战斗序列。

以上之战斗序列，或有人怀疑，以程潜一向立场何以委他为西征军总指挥？龙潭战役爆发前，程中第六军之共党分子的阴谋，确曾脱离革命军投向武汉方面。但是清党后，程察觉国内革命之趋势，加以龙潭之胜利，程于是又重回革命军之阵营。程是三湘人士，而唐生智之根据地又在两湖，所以军事委员会任命程为西征军总指挥。

当时，唐生智号称百团，如一团以一千五百人计，也有十五万人。其实可供指挥的，只有第八、三十五、三十六及湖北省防各军，余皆乌合之众，临时拼凑而成，战斗实力不大。所以敌我比较，我方势力优厚得多。唐师出无名，精神上不能号召军民。两湖又被革命军包围，完全处在内线作战之劣势。所以其失败乃是势所必然。

龙潭战役后，唐生智知道革命军对他一定有所行动，而且孙传芳之力量被消灭，唐在军事上所受之压力愈来愈重，遂自芜湖、安庆等地撤退至皖鄂边界。唐之策略是在罗田、黄梅、广济、田家镇、武穴等地陈兵防守，意图革命军追入鄂境，则个别击破；在鄂西对付鲁涤平则采取攻势，调第八军吴尚之第二师，熊震之独立第一师，程汝怀之鄂省第一师袭击鲁军。对鲁涤平不在鄂西，部队由张辉瓒代理军长，张派三师人守荆门，唐部屡攻不下。俟方振武之二师援兵抵达荆门，唐军不支而败。革命军第三路军占领安庆时得知唐部撤往鄂东，准备集中部队调至长沙、北岸与三路军一战。于是三路军调第三十七、四十四两军为总预

备队，由胡宗铎之第十九军居右翼，李总指挥德邻自己率领第七军居中央，左翼由叶开鑫之四十四军防守。陈调元之炮兵队也调至中央归第七军指挥。炮兵队与总予备队尚未参战，唐部便在宿松、太湖遭遇失败而退守罗田、广济之线。唐之三十五军首先在桐城被三路军之第十九军击溃，退至广济时已毫无斗志；三十六军在田家镇虽然凭险防守，经三日之激战，也被四十四军打败。三十五与三十六两军是唐之精锐，既先后溃败，其他部队不得不退却。四路军因长江南岸敌人较少，战事不多，故调二军兵力至北岸援助三路军，自己仅留第六与十三两军防守。

三、唐生智下野出国

朱培德之第五路军原定出修水、铜鼓向岳州、通城、武长铁路推进；未及出江西，唐部便被解决。第八路军原已向衡阳、永州推进，后因广州之张(发奎)黄(琪翔)事变，乃撤回以解决此内部问题，与第四军在东江潭下相遇，发生激战，双方损失甚重，第四军之许志锐师长也在是役阵亡。后来张发奎因军事失利而下野，将部队交缪培南指挥。缪率部逃入江西，后为中央所收编。唐生智因广济、武穴之军事失败，在汉口召集高级将领开会，提出三条意见：

1. 用全力打通河南，与奉张联络再行反攻；
2. 集中兵力死守武汉；
3. 个人下野，保存实力以便将来再起。

结果第三条为多数所同意，唐生智不得已，于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通电下野，并以巨金买日本轮东驶出国，所部由李品仙指挥，分别向鄂西、岳州撤退，至是盘踞武汉之唐生智军全部肃清。

以上所说全是陆军之行动。但是在西征战役中，海空军之帮助很大。海军虽是江防舰队，船只不多，然而发挥力量，一可以掩护登陆，二可以截击敌人渡江，沿江扰乱敌人之阵线。海军之行动经常较陆军为先，每当陆军出击敌人之前，海军或绕至敌后破坏敌方之补给线，或敌前摧毁敌方之阵地。因为我们无线电不灵，有线电架设不容易，海军常担任通讯工作。如占领安庆后，我们特在安庆留军舰一艘以作传达命令之用。此外，海军输送粮饷军械之功也不小。如果没有海军之协助，唐生智之海军力量虽然不大(如决川号等)，对我方军事亦是一大威胁。

西征之役得空军之助不少。北伐期间空军力量虽然不大，作战力很弱，既不能盲目飞行，装备又非常简陋。尤其在容共期间，红军之飞机极难于指挥。清党之后，我们曾向日本、英国、意大利等处订购水陆各型飞机，虽然指挥听命，因为数量太少，只能作侦察敌情，传达情报之用，是陆军极好之耳目，偶尔也能收扰乱敌人之效果。当时国内除革命军之外，只是奉张有飞机，但是我机从未与之发生过空战。

西征之军事大体可分为二阶段：进攻武汉，肃清湖北由程、李两位总指挥负责；底定三湘由我负责。我当时仍然是二路军之总指挥。唐军退回湖南后，李品仙、何键、刘兴曾联名打电报至汉口，要求和平解决，并派代表至汉口商谈。正当和平有望之际，不幸十一月十七日广州发生张黄军变。李、何等人以为中央又多一敌人，兵力一定分散；而第八路军因亟待解决内部问题，又撤回指向永州、衡阳之部队；加以党内左派人士如汪精卫之煽动，于是认为有机可乘，改变求和之初衷，暗中积极部署。中央见此非用军事

解决不可，不然终成肘腋之患。十七年一月初，我奉军委会之命至汉口主持征湘计划。当时，敌人之力量计李品仙、何键、刘兴、廖磊、熊震、周荣光、罗震等部约三十三团，驻在湘鄂边境之岳州、湘西一带，归李品仙指挥。其余门炳岳、危宿钟、何宣、戴斗垣、周斓、陈汉章等部约十七团，驻在常德一带由叶琪指挥，有采取中立态度之模样。敌人之主力位于平江附近，一部沿汨罗江南岸配置，左翼依托于洞庭湖，其计划是等我军进至相当地点后，即由右翼转取攻势以压迫我军至汨罗江畔，会合原驻防于汨罗江岸之力量夹击我军。

后来根据探报，得知敌人之部署是以李品仙之第八军，及独立第一师位置于白雨湖、花园沙堰一带，以第三十六军及第十七军位于张家碑、澄潭、鲁肃山至横楼一带；另以第三十五军为江北军经藕池口进攻新堤。程总指挥为了应付敌人之军事行动，在我未至汉口主持攻湘军事前，曾部署如下：

1．以第三路军沿长江两岸前进，集中新堤准备向临湘及岳阳进攻；

2．以第四路军沿武长铁路两侧前进，集中蒲圻荣阳由羊楼司、通城，截断长岳，进攻湘阴、长沙；

3．以第五路军集中铜鼓、萍乡准备向浏阳、醴陵进攻，威胁长沙侧背；

4．以第四十三军李燊部队集中石首、公安准备向常德前进，截断敌退湘西之路，并乘机进攻长沙。

我到汉口后，深感第三路是西征军之主力，不应陷在长江两岸敌人力量薄弱之地，即与程总指挥商定变更部署以第三路军使用于通城、平江方面进攻金井、长沙。这项

部署的改变，与以后之军事发展有密切之关系。

十七年一月十五日，我方正面各军开始攻击岳州；二十一日全线实行总攻击。我军之主力由通城出平江，压迫敌军于汨罗江畔，意图一鼓歼灭敌人。

在此以前，各部队已开始行动，一月十二日第四路之四十四军，驻在乌口附近；第六军于新店镇羊楼司附近；第十三军于羊楼司大河坪市附近；第三路之第七军，第十九军于通城附近，全部集中完毕，向目标前进。海军也炮击岳州，空军出动担任侦察任务。前线之敌人，因士气不振，于一月十七日放弃城陵矶、岳州向汨罗江溃退。

四、为将之道，决心而已

稍后，程总指挥到达岳州，我也到了通城，准备指挥全线于二十一日拂晓攻击，不意二十日晚右翼叶开鑫之四十四军忽然叛变，由黄沙街向左翼第六军之侧背猛烈袭击。第六军猝不及防，损失很大，而对面之敌人廖磊，与刘兴之部队又乘机渡至北岸，情况十分危急。此时程总指挥已退回武昌，他打电报给我，说是第六军损失惨重，要我退守蒲（圻）通（城）再图挽救。

但是当时之情形：叶开鑫已叛变，敌人廖磊、刘兴之部队已开始渡江，而我们之计划是二十一日拂晓才发动总攻击。如果遵照程总指挥之命令退却，可能全面溃退，观望之友军将变为敌人。所幸第三路军因部署变动，第七、十九两军被调至汨罗江北岸，未受四十四军叛变之波及，我乃召集夏威、胡宗铎二位军长，告以程总指挥之意思，并表示我决心继续渡江。第十四军军长陈嘉佑因与第六军为邻，所以也知道程给我之退却电报，我原是不想让他知道

的。我回电给程，请他坚守武汉，其他地区必要时，任其放弃，而我将照原计划而行。二十一日拂晓，第七、十九两军由汨罗河涉水渡江成功。我军渡江时，与李品仙之部队相遇在江边发生激战，李部大败。第七军乘胜逐北至金井（李之总部所在地）、长沙。李部既败，刘兴、廖磊已渡至江北之部队也被我军切断，缺乏后援而失败。这一仗无战术可言，主要是我有决心，三军用命。战争是瞬息万变的事，往往胜负便决定在转瞬一念之间。昔桂永清任驻德武官时，因仰慕兴登堡之参谋长鲁敦道夫之名，多方托人介绍，望能趋前求教。后如愿以偿，桂请教为将之道，鲁敦道夫沉吟片刻答道"决心！"桂再问是否尚有其他，鲁不答而言其他。后来桂奉召回国，因嫌鲁敦道夫之解释过于简约，临行请求再晤见一次，鲁仍然答复为将之道"决心"二字而已。这是桂回国后亲自告诉我的。我想西征之所以胜利，"决心"二字最为重要。

这一仗之后，李品仙等之部队纷纷往湘西逃去。湘西李燊之部队虽向常德而来，但毫无战斗意志。我们在长沙按照追击计划进行，我由湘潭至宝庆。当时蒋总司令已复职（十七年一月五日），连续打电报给我，要我尽快结束西征，率兵北上参加北伐。是时，冯玉祥与阎锡山在平汉平绥线与奉军对峙，奉军因阎之态度不明，恐其骚扰后路，不敢长驱直入。阎一面因受奉军强大力量之压迫；一面因冯玉祥撤退，右翼完全暴露，再三向蒋总司令求援，说是他有四百门以上之重炮在平型关、娘子关以外，如不及早援助，将会全部损失，所以蒋总司令一再催我北上，甚至指示如果部队不及运输，要我先至北方，安定军心。冯阎的代表，也纷纷南来望我早日成行。我于是派张参议震欧为

代表，由宝庆至叙浦追踪李品仙，盼他们就地停止逃逸，接受收编，即日结束战争。我们打了胜仗，而居然向敌人请和，这是北伐战史中一大笑话，但是实际情形非如此不可。因我与李品仙、廖磊、叶琪等人因是同学同乡，一见如故，而且彼此之间本来无所芥蒂，只是在唐生智之指挥下不得不对我们作战耳。李等欣然接受我们之接见，分别改编为三个军(李品仙是第八军，叶琪是十二军，廖磊是三十六军)由百余列车装载，浩浩荡荡经粤汉路转平汉路北上。我遂遵照蒋总司令之意旨，先行北上。

西征时，还有几件事值得一提：

第一件事：我们占领武汉，湖北省没有省政府，执行全省行政的是政务委员会。因为原来湖北之亲共政府，受共产党之控制，一切都改委员制，行政效率很低。社会中因为农、工、商、学经常闹风潮，显得很混乱。湖南受共党的影响较小，还是有省政府，主席原由唐生智兼，唐下野后，改由鲁涤平代。

西征之前，我和李德邻将军在南京便商定好，克服武汉后，湖北省主席一职，由张知本先生担任，一则张原是湖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之一，专负责民政；二则他的道德学问皆是为众人之模范。当时除张之外，湖北人当中胡宗铎也是一位人才，他打仗打得好，我们不愿他去任行政工作而埋没了他的军事才能，而且占领湖北后，清乡也是一重要工作。所以在南京时，我们便内定向中央保荐张知本为省主席，胡宗铎为清乡督办。张、胡二位配合得很好，一年之内，不但地方安定，税收也大增加，据说张移交时剩余二千万元。由此可见，共党盘踞地方，完全是鱼肉之乡，他们掌握武汉多年，结果湖北是民不聊生，而我们只做了

一年，便有良好的结果。

第二件：西征军胜利后，我回到长沙，正准备收编部队北上，六弟崇祜承湖北省财政厅厅长张难先发表他为武汉统税局局长，我事先毫不知悉，他就职后写信告诉我。当时我听说很多亲友因六弟就了新职，纷纷由桂林赶到武汉谋职，我很担忧。因为第一点，六弟自三岁时过继给老业公猊叔，我的猊婶得肺痨病，他从小便亦染上肺疾。他曾在桂林师范学校毕业，黄绍竑当广西省主席时委他做过广西梧州中关税务局长，但肺病一直未痊愈。武汉税务局业务繁重，他的身体一定难以支持。第二点，武汉税局的业务很广，又是富有的机构，亲友到武汉求职，他不能不安置，如果有了差池，不但他免不了受牵连，就是我也免不了受人评论。我自从参加北伐，每到一处，绝不安排私人，比如占领上海偌大的地方，我未利用一个人做财务或经济职务。我为人如此，当然不愿因胞弟受累，也不愿见他受累。所以我一面写信给张难先谢谢他栽培六弟之盛意，说明六弟身体很差，望他另选贤能；一面写信给崇祜，望他至庐山休息，我愿负担一切费用，结果他去上海休养，未及一年便在上海病故。

第八章　第二次北伐

我奉命北上，路经河南新乡，因冯玉祥驻在该处，特下车拜会冯，不意冯亲率领文武官员在车站欢迎，执礼甚恭，令我非常过意不去。我第一次会见冯是在徐州开会，这是第二次与冯相遇。

我的目的是到石家庄与阎锡山会晤。阎是日本士官六

期学生，在我想象中他一定具有士官学生矫健、精干之精神，因为我所见之士官学生如蔡锷、蒋百里、程潜、赵恒惕等人都是这一类型。谁知我见了阎，全不是想象中之人物，他身穿棉衣裤、棉鞋，留两撇小胡子，显得非常衰老，他是五台人，一口方言很难懂，声音又很小。我转达蒋总司令要我北上之意，告诉他我的部队将陆续运到，他非常高兴。他对我说："你来了，胜过十万雄兵。"又云："如果西北军不撤退，我不会着急的。"由此可见冯玉祥完全是不讲信义的人。

不久，第一列车运来了门炳岳的一师人。门部在正定下车，不料戢翼翘的骑兵军已迂回至正定后方，门部一下车便与戢部发生激战。后来奉军之侦察机发现我方之援军有百余列车，才退回关外；因而发生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之事情。*

第九章　向编遣会议提出军队实边之建议

北伐完成后，全国舆论有裁兵建国、裁兵救国之呼吁。这也是事实上之需要，因为当时全国的军队约有一百五十万人，而国家之总岁收只有五亿元左右，中央之财政不胜负担，非裁兵不能谈建设。十八年一月，中央召集各集团军总司令开编遣会议。我因奉命率领第四集团军在北平之一部到新疆充实边防，未有参加该会，但是我有一个建议请李济深出名代为提出。因他当时是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广

---

* 第八章到此显然没有完结，但在搜集到的材料中没有找到下文。

东绥靖主任，不在四个集团军之内，其地位较为适宜。我的建议因原稿已失，今只能说其大概。这个建议可分案由与实施要点二部：

（一）案由：自民国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滦州会战消灭直鲁军以后，全国可说没有军阀再有抵抗力量；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张学良易帜，归顺国民政府后，全国完成统一。根据总理之建国大纲，北伐完成应该结束军政时期，开始训政时期。训政时期当以建设人民之心理，使之了解三民主义，建设国家为主。若要维持百万大军，当然没有力量从事政治、经济、文化之建设。要是裁兵，若处置不当，纠纷立起，也不是国家之福，因为，各集团军的部队少则十万八万，多则一、二十万，而且士兵与将领之间经多年相处都有深厚之情感，再以区域关系，而想各将领脱离他们的部队不是容易的事。“裁兵不难裁将难”，自古都是如此。因为有鉴于此，所以我本着良知而有实边之建议。

（二）实施要点：全国分中央、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及东北六大军区。第一军区管辖南京、上海、武汉、广州、北平、西安、郑州等重要地区；宁、青、甘、陕等西北四省属第二军区；察、热、晋三省属第三军区；川、康、滇、藏等西南四省属第四军区；东三省属第五军区；或称为东北军区。各军区所不管辖之地区统统属中央军区。全国之海、空军也为中央军区指挥。我在建议中指出如果中央能制定一种法规，令各军区共同遵守，各军区之编制、人事任命、政治训练、军事教育，如果能够统一，先建立各军区间之互信，然后树立共信，则部队一定可以国家化。我还建议各军区之军需统一，军队不得干涉地方行政，军饷由中央直接发放，不可截留地方税收，废除军以上之方

面军，军是战略单位，每军下辖三个师，每师下辖三个团；各军区成立后由军事委员会召集各军区人员成立点验委员会，监督枪械、马匹。如此，中央既不失监督各军区之权，而各军区一定乐于在中央指挥之下从事发展边区。

我在建议中避免用“裁兵”二字，因为我的建议不重在裁兵而重在实边。实施总理之兵工政策是本建议之主要精神所在。边疆地区有许多宝藏，只因为交通不发达未有开发，如果成立军区让各部队从事开发工作，不但解决了国家财政之困难，也安置了北伐期间有功勋之将领；不仅给他们以地位，而付以建设之重任。这个建议我想是可以行得通的，因为今日在台湾的荣民在蒋经国将军领导下从事各项建设，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我的建议案李济深是否提出，提出后是否讨论我不得而知。因为武汉事件发生后，我便匆忙地离开北平回到广西，以后见了李济深也未提过此事。不过，当时我据闻中央有意委冯玉祥为军政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冯、阎因不满中央之措施，编遣会议开幕不久便各回到自己防地了。

至今，我深信北伐之后，中央如使各集团军间之心理教育，先统一起来，划清各军间之职权，在三民主义之旗帜下建立互信、共信，军队一定可以国家化，以后之陇海路战事也不会发生。

第四篇

国共之内战

第十章 中国共产党之产生与发展

一、联俄容共政策

苏俄于十月革命——首都革命——成功后，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情势非常孤立。欧洲诸国出兵攻击，列宁与之几经妥协，诸国才肯撤军。莫斯科政权一面为了解决孤立的情势，一面为了达成其赤化世界之阴谋，遂组织共党第三国际，指挥各国共党。共党第三国际以马克思主义为号召，向各国灌输共产主义。民国九年五月，第三国际派维丁斯基为代表由俄来华。因陈独秀于民国八年已开始宣传阶级斗争，所以维丁斯基来华后，立刻介绍陈独秀至莫斯科参加共产党。陈在俄经短期之训练后，回国与李大钊组织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共产党产生之简单经过。

民国十年第三国际职工代表李特诺斯克* 与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马林来华指导中共之活动。同年七月一日，

---

* 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国现代史》，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是尼可尔斯基。

陈独秀、李大钊在马林指导之下于上海召开第一次中共代表大会，参加的人数共有十三人。马林指示与会之人士：“中国共产党人数太少，无法组成强大之民众团体，不能公开活动，必须依仗国民党之扶持，在国民党左派卵翼之下从事活动，借国民党之力量发展自己之组织。”这是马林指示中共之伪装策略。民国十一年，中共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有三项决议：

1． 正式加入共产国际，为共产国际之中国支部。

2． 讨论中共活动之策略与路线。

3． 遵照共产国际之命令，中共党员可以个人之资格加入国民党。

根据第一项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国际共党之一分子；根据第三项所以有以后跨党分子之发生。

民国十二年一月十二日第三国际对中共发出中国革命问题之决定：“中国国民党是中华民族革命之唯一大党，因为中国工人独立运动力量非常薄弱，不能成为一强大之社会组织。”根据此一认识，第三国际觉得年轻之中国共党应与国民党合作——但不是合并——，无论在任何场合中，务必打出共产党之旗帜，增加人民对共产党之印象。第三国际为了贯彻国共合作之政策，进而取信国民党，于民国十二年，特别派第三国际中央委员会委员越飞来华晋谒国父，商谈国共合作之问题。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国父与越飞在上海发表联合宣言，宣言说：“……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独立之获得。

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逸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越飞所以同意共产制度与苏维埃制度不能实行于中国，其目的乃在分散国民党之注意力，使共产党易于在国民党内渗透。

民国十二年六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有一决议，就是特别着重广州国民党统治下之工作，利用国民党之掩护发展农工运动。共产党曾经在上海召开中央全体委员会议，讨论在国民党掩护下如何扩张共党之势力，吸收国民党内之优秀分子，分化国民党等问题。

所以，在上述之各阶段中，我们发现共产党在第三国际支援下第一步设法加入国民党之组织，第二步利用有利之环境传播其思想。因此，我们可以毫无疑义地说中共自创建以来，即是苏俄之附庸组织。

民国十三年，国父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主要通过外交上之联俄与内政上之容共与工农等政策。联俄容共政策之决定有其时代之背景。国父困在广州情势孤立，而英、美、德、法、日等帝国主义之目的者在扶植军阀，延长不平等条约、治外法权与经商等特权，他们最不乐意看见中国之革命成功，所以多方阻挠革命之大业。正当此时，俄国推翻帝制，打倒帝国主义之革命突告成功，列宁并派人到中国表示支持。国父于四面楚歌之际，忽得国外之支援，遂有联俄政策之产生。或有人怀疑联俄政策固有时代之背景，但是中国共产党原是很弱小之一组织，为何又加以姑息而允其加入国民党？因为国父认为共党既形成组织，如让其自由发展，会于国民党之建国步骤发生冲突，不若容纳于国民党中使之潜移默化为国民党而工作。而且越飞也曾答应国父，共产党确可为国家之统一与建设

而努力。以上所述，完全是联俄容共之客观条件。至于农工政策，旨在谋农工之福利，为二五减租等，与共党后来所宣传之农工政策迥然不同。

容共政策仅允许共党分子个别加入国民党，其条件要服从国民党之纪律，从事国民革命之工作。但是李大钊、谭平山等加入国民党后，在党内领导共党之活动，积极发展组织，所以他们之人数短期内由三百人发展为一千五百人，至第二年，即民国十四年，共有党员一万人以上。他们当时之口号是“革命”、“前进”等极为吸引人之字眼，年青人容易被其吸收。不独如此，共党还在军校中公开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吸收共党之预备党员(C·Y)，破坏军队之组织。因为左倾分子之势力扩张，所以有三月二十日海军局局长李之龙欲借中山舰谋害蒋总司令之事件，幸及早发觉，李之阴谋被粉碎。* 第三国际因见于中共之羽毛未丰，不能与国民党决裂，所以中山舰事件后解散青年军人联合会及所有左倾分子之组织，更换军事总顾问矶山加为加仑将军，以示与国民党继续合作。

二、北伐期间共党之阴谋

民国十五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共党因力量微薄，唯恐不能控制国民党，极不赞成北伐。** 后共党见北伐既成事实，遂尽量令其分子加入国民党，争取党代表、政治部等与社会之群众及军队之基础易于接近之组织。所以，

* 中山舰事件也叫“三二〇事件”，是蒋介石为了篡夺革命领导权制造的阴谋事件。具体过程请见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

** 见第三篇第六章“决心北伐”一节。

国民党之军队每到一处，共党即极力发展组织。当时，青年军人联合会名义上虽告解散，实际上仍然存在。共党所争的不是政府中之高官贵爵，而是基层之组织，如学生、农、工、军队，因为他们以为只要基层工作做得完善，其他职位自然垂手而得。宛如建筑，只要基础坚固，何忧没有高楼大厦？由此可见他们之用心是很深远的。

北伐时期国民党之重要干部都随军北伐，只有李济深等人留守广州。鲍罗廷当时对外是国民政府顾问，实际上操纵一切。他乘国民党重要干部赴前线之际，在后方努力发展组织，革命军攻占南昌后，本想将国民政府迁至南昌，因鲍罗廷嗾使徐谦、邓演达之反对，扬言如果国民政府迁至南昌，他们在汉口将另树旗帜。中央不愿北洋军阀当前之际而内部分裂，所以搁置国府迁南昌之议，而迁至汉口。国府迁至汉口，鲍罗廷益发得其所哉，他一面煽动已至郑州之唐生智回师安徽与孙传芳勾结攻打南京；一面利诱已抵河南之第四军返回九江，后来第四军回到广东，因而有张（发奎）黄（琪翔）事变。此外，他建议废除革命军总司令之职，由军事委员会指挥三军，当在打击蒋总司令之威望，逼使蒋总司令自动去职。总之，他一手利用汪精卫，一手利用唐生智与张发奎打击南京。所幸龙潭之役胜利，西征打走唐生智，不然武汉政府在鲍罗廷把持下，其发展之后果，实不堪设想。

民国十五年五月一日，共党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攻击陈独秀为右倾之机会主义者；提出土地改革，农工群众民主专政方案，并全部接受第三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提纲之命令："在乡村实施农工革命，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第三国际根据上项纲领密令共党六项

任务：

1. 改革武汉政府，增加共党领导力量；

2. 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选择共党积极分子参加；

3. 武装二万名共党党员；

4. 精选五万名农工分子参加国民党军队，彻底改造国民党军队，排出反动将领代之以共产党员与国民党之左派分子；

5. 成立革命法庭，严厉审判反革命分子，法庭之主席由国民党左派人士担任(按：其目的在使国民党内部互相残杀)；

6. 励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豪绅之土地。

以上第三国际之密令，我曾问过当时在武汉任警备司令之李品仙将军，据李说确有此事，而且武汉政府之清共也因为发现了这项密令，觉悟共党之要求合作，只不过是培养羽毛之掩饰。武汉既有清共，宁汉故能重新携手，国共四年以来之合作，至此才正式宣告解体。

三、共党之暴动

民国十六年内，共党四处流窜，实行暴动政策。第一次是张发奎由河南回师攻南京，至九江受汪精卫之策动，由南浔铁路转南昌，张之军长贺龙，师长叶挺叛变向广东流窜。第三军军长兼江西省主席朱培德之警卫团长朱德受周恩来、张国焘之煽动也在南昌叛变，因为力量弱小被革命军击败，南窜经瑞金、长汀等地至广东潮汕，沿途被粤桂联军围击，损失重大，后化名为王楷至韶关投附范石生，不久又叛变逃至井冈山。朱德是云南讲武堂毕业之学生，为朱培德一手扶植的人，所以有人开玩笑说："朱培德培朱

德不德。”

贺龙、叶挺之残部逃至广东由彭湃率领退至海陆丰。十月间在海陆丰发动暴动，掠杀地主，分配土地，焚毁田契，完全是今日共党三反五反之作风。后经国军“围剿”才告平定。此外，刘志丹也在陕西渭南、华阴领导共党暴动，经国军进击，率残部至延安与高岗合作建立根据地。

以上所说十六年间共党暴动，其规模之大，动乱之深，皆不足与十二月十一日广州之张黄事变相比。

张发奎既奉汪精卫之命令，到广东争取地盘，李济深，为避免与之冲突，将广东政权拱让给张。张占领广州不久，黄琪翔、叶剑英等人在广州寿苟岭彦堂军校发动张之警卫团、教导团暴动，成立苏维埃政府，焚烧掠杀，市民死伤者不少。待广西军东来与陈济棠、李济深之部队会合才击败张发奎。张因受不了广东人之指责，逃至香港，将所部交缪培南。缪退至东江潭下与广西军相遇，一是铁军，一是钢军，双方发生激战，据说激烈之情况不下于龙潭之役。粤军师长许志锐阵亡，桂军师长梁朝玑、团长余芝方都负了伤。此役，桂军所以猛勇作战，一面因为反共意志坚强，一面因为张发奎之军队已指向西江，准备攻打广西。当陈济棠之部队与张发奎之军队相峙之时，陈军已现败迹，幸广西军及时赶到才扭转危局。这一仗本不会发生，只因中共从中煽动，结果造成偌大的牺牲。

第三国际眼见共党之暴动处处失败，所以当共党在第三国际布哈宁指导下于莫斯科举行第六次全国 代 表 大 会时，曾有如下之决议：

“在中国境内武装暴动，推翻国民政府，建立苏维埃政府，由莫斯科训练一万名青年干部，分批回中国领导共党

活动。”

四、共党红军之成立

共党因暴动失败，内部派系倾轧加以觉悟分子纷纷脱党，地下组织多数瓦解，毛泽东乃率残部窜至江西永新之井冈山组织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朱德加入之后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是军长，毛泽东是党代表兼前敌委员会书记。共党在这个时期订下游击战略四则：第一，敌进我退；第二，敌退我追；第三，敌驻我扰；第四，敌疲我打。红军三大纪律：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第三，一切缴获品归公。以及八项注意事项：第一，说话和气；第二，买卖公平；第三，借物归还；第四，损物赔偿；第五，不打骂人；第六，不损害庄稼；第七，不调戏妇女；第八，不虐待俘虏。

除了朱毛在井冈山组织红军第四军；彭德怀、滕代远在湘鄂边区组织红军第五军，后被国军击败，率七、八百人逃至井冈山。十八年一月因国军大举进剿井冈山，共党突围窜至赣西南一带。徐向前、许继慎在豫鄂皖边区组织红军第一军；贺龙在湘西聚集土匪成立红军第二军；罗炳辉在江西吉安收集联防总队四百余人组成红军第三军；方志敏在江西宜阳（弋阳）鼓动民团叛变成立红军第十军；张云逸、邓小平在广西成立红军第七、八两军；彭湃在广东东江成立红军第十一军；高岗、刘志丹在延安成立红军第二十六军。红军之番号虽然很多，但是有的只有数百人或者千余人。其中除彭德怀因为是叶琪之团长，朱德是范石生的团长，所部是国军的配备，其余的皆以民团之配备为主，因而装备低劣，战力薄弱。

共党实行立三路线——李立三是托派人物，曾去过俄国多次——发动全国总暴动，长沙、吉安一度为共党所攻陷。政府察觉情态严重，于民国十九年起乃大规模清剿，先后经五次围剿，一次用兵三十三万，最后一次是六十余万，共为时四年，始将共军之老巢瑞金等地平定，迫使共军向西南各省逃窜，五次围剿广西曾派兵参加，但我未有前往，详细情形无法得知。

共党初期之叛乱，策略是以城市领导乡村，曾经攻陷长沙、吉安，进逼南昌、九江，旨在包围武汉，策动全国大暴动，后四处窜扰，因分子复杂，力量不充实未有大功，彭德怀占领长沙不久也失败。所以毛泽东改变以城市领导乡村之策略为乡村包围城市。这个策略不但在赣东南、赣西时使用，就是抗战期间与抗战胜利后，一直使用此策略。以城市领导乡村——以点打面——但是支持这种策略须要有良好之军备与训练优良之军队，这是共党在当时所缺乏的。然而以乡村包围城市，以面打点——只须有足够的人力，严密之组织便可以，这是共党所具有的。毛泽东改变策略之后，每当国军占领一城市，他们即占领附近之农村，结果国军补给困难，通信不灵，所以常常失败，处处吃亏。

国军第五次围剿，实力强大，共党不能再在江西立足，经赣东向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处转移，结果逃至陕西延安与高岗相配合。共党在转移时期，只在桂北曾经受到创伤，死亡七千余人，被俘近二万人。

第十一章　剿共之作战

剿共时期自民国十六年至三十六年止，其间二十一年，

大小战役无数，我虽未直接参与其事，但每一战役都是我将士用血肉所涂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择其重要者加以说明，以便后人了解其间胜败之原因。

一、"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豫、鄂、皖三省边区剿共，时间在江西五次围剿之前，双方用兵十万以上。始时中共徐向前之第四军团盘踞大别山区，三省各自剿讨，共方势力日渐强大，蒋委员长见省之力量难以支持，遂于武汉成立豫、鄂、皖三省剿共总司令部，分左中右三路进剿。蒋公自任总司令兼中路总指挥，左路总指挥为何成濬，右路总指挥为李济深，分别以大别山之徐向前为攻击目标。是时除徐向前外，共方贺龙之第二军团以鄂南之洪湖为根据地，四出扰乱。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淞沪抗日战争爆发，徐向前乘政府注意力转移之际，向东流窜占领安徽之霍邱，渡淮河欲切断平汉路，进迫武汉，因国军严密防范，阴谋未逞。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成立后，颁布战斗序列与最高指导原则。所谓最高指导原则："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战略采攻势，战术采守势"。军事手段则分隔离、封锁、包围、歼灭四阶段。

左路军何成濬由安徽之六安、霍山向西；中路军由河南之潢川、光山、固始向南；右路军之第三纵队由湖北之武胜关东向麻城、黄陂压迫，第四纵队在罗田、英山堵围。徐向前因各部队逐渐向大别山集中，自知不支，遂由广水以南向豫、鄂、陕边界流窜。至此，徐向前之力量虽未被全部消灭，但其老巢金家寨则为国军所占领。卫立煌率兵首先攻占该地，为鼓舞士气特易名为立煌县。

贺龙以洪湖为根据地，经常窜扰汉水两岸应城、天门、潜江、沔阳等地。左路各纵队得江防舰队咸阳号、得胜号之协同，在新堤、监利等处巡防，贺龙因在汉水两岸节节失败，损失重大，率残部二千余人北窜，欲与徐向前配合。终被国军围剿而毁其计划，乃不得已窜至鹤峰，徐向前则窜至川北。这次围剿之最大战果，便是倾复徐、贺二军之老巢。此外，用兵之经验也提供以后江西五次围剿莫大之参考。

二、江西五次围剿

江西五次围剿，我因为本身未有参加，只能谈其概要。古云："前车之鉴"。我所以要谈这一段，乃希望从经验中取得教训。

(一)第一次围剿

共军于中华民国十九年乘陇海路发生战争，所有国军北调参加讨逆，中央之注意力转移之际，在江西叛乱。前此，共党实行"立三路线"——城市领导农村，——曾经占领江西之湖口、吉安，湖南之长沙、岳州等地，目的希望煽动农村之暴动，后因共军未经训练，缺少弹药而失败。共党退回江西老巢后，毛泽东改变战略以农村包围城市，组织民众，提倡党政军一元化，化整体为有机体。凡共军占领区以内无论老弱妇孺都要接受政治、军事之训练，甚至残废者也要接受谍报之训练。因为有此种顽强严密之组织，故能实行总体战，造成广大的作战面，国军凡入其地区，缺乏基层组织，物质之供应、消息之传递，完全陷入绝境。共党之组织原甚严密，用此方法所造成之军政一体，自然更是坚固无比，故毛泽东能在宁都、东固等地区建立

根据地。中央见共势力日大，遂在南昌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由第二军团总司令鲁涤平兼任行营主任，调六、九、十九三路军入江西分进合击，空军也协助作战。当第十九路军于福建未能如期开赴集中地，而第六、九二路军又未能到齐时，鲁指挥直属部第十八师张辉瓒开始进攻。张因军事战不敌共军之总体战，全师覆灭，其本人被俘虏，被枭首钉在木板上由赣江顺流而下，影响士气非小。检讨此战役失败之原因有：

1． 轻敌，当时共军之兵力有第一、二、三、四等四个军团，在民间又有严密之组织，但我方在三路军尚未集齐前，便下达攻击令，所以造成十八师全师覆灭之惨局。

2． 共军战术是总体战，我军则是纯军事战，我军墨守成法，以旧式战术对新式战术，其优劣胜败不问而知。

第一次围剿失败，影响以后之军事很大，因为以后之将士所闻张辉瓒全师覆灭，心理上对共军产生了莫名之畏惧，无形中增加共方之声势。

(二)第二次围剿

民国二十一年一月，共军将得自国军之枪械，扩张军力为十一个军约五六万人。在江西广昌、石城、瑞金、闽西、赣粤边境扰乱。中央遂决定进行第二次之围剿，以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指挥，代行剿共总司令职。兵力计有第五、六、十九、二十六等四个军，共十一个师。共方是何将军负责剿攻，兵力又比以前增加，遂有人主张(如彭德怀)放弃江西，退入川黔保存实力；有人主张化整为零，散入农村。最后毛泽东决定反围剿，于现地抵抗。共军主力集中于黄陂、龙冈，欲引诱国军深入以便各个击破。国军得空军第一、三、五队之协助向永丰、宜黄、南丰、吉安、兴

国、泰和等地集中，向黄陂、龙冈分进合击，准备围共军于赣南。这次军事之部署与主将人选都比第一次理想，结果还是失败了。考其原因：

（1）部队虽多，未经选择，因地理、历史之关系，故存有互相观望，保持实力之陋习。互信不立，共信不生，所以被共军以内线作战方式各个击败。

（2）战术上还是不重保甲，不重民间组织，以纯军事战对总体战，我方之兵力虽比共军多一倍，但兵法云："倍则攻之，十则围之。"故就兵力而论攻击则绰绰有余，包围则尚感不足。

（三）第三次围剿

民国二十一年五月赣南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共军将掳获之武器扩编为七军一师约五万三千人，占领广昌、临川等地，主力集中于宁都、信丰等地，并与赣北、赣西北、赣东北之共军相呼应。蒋总司令于元月二十一日亲赴南昌策划第三次围剿，何部长为前敌剿共总司令统一指挥，改编各路军为军团，分左右两集团军进剿，兵力共十一个旅，以及新编之第十三、二十八、七十七、十二等师与第四十三旅。赣州、吉安等地还有守备军以防止共军后窜。各军以宁都为目标，左右两集团军分六路进攻，战略是将共军包围后击破。七月一日开始行动，九月一日至三日国军先后至黄陂、南康附近，当包围几近完成时，广东因反对南京宣布约法，发生所谓广东事件；而日军又占领沈阳，侵略吉林、黑龙江。中央政府于内忧外患交迫之下，不能专心剿共，第三次围剿因而停止。*

---

* 第三次"围剿"从7月1日至9月15日，国民党军先后被红军歼灭17个团共3万余人，故围剿被打破。

（四）第四次围剿

二十一年十一月，国军在何将军指挥下发动第四次围剿。毛泽东仍然主张就地反围剿，周恩来主张乘国军集中未定时，先各个击破，双方争执不下，后由第三国际裁决，采取周之主张。何总司令分剿共军为左中右三路，主力在中路。第一、二、三纵队向宜黄、临川以南之金墟、浒湾集中，第十六师为预备队由峡江、吉水向乐安、宜黄集中。十一月中旬共军一部佯攻阳丰，主力攻金墟、浒湾，扰乱我军集中地，延误我军集中时间。此时，日本人侵我长城，中央调兵北上，第四次围剿军事又告停顿。*

（五）第五次围剿

国军经第一次至第四次围剿之失败，损兵折将，尤以武器弹药损失为多，共军因而扩张为三十八个师，八个独立团，五个独立营，号称十五万人，蔓延至四十余县，掠夺民粮民枪，势力日益雄厚。蒋总司令于二十三年五月，亲至南昌行营开会检讨，策定第五次围剿之计划。最高指导原则仍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战略取攻势，战术取守势”，并且第一次运用党政军联合总体战。军队部署分北、西、南、东四路。北路由顾祝同将军指挥，西路由何键指挥，南路由陈济棠指挥，东路由福建三十九路军负责，后因闽变，改由蒋鼎文负责。此次共调动六十五个师，二个旅，六个团，另有空军一部，总计兵力约六十二万。

军事开始行动时，北路之第八纵队出共军不意，攻占赣、闽边境之黎川，切断赣、闽两省，与赣南、赣西南共方之交通联络。共军受此打击殊感困难，屡次想夺回此据

* 第四次“围剿”从2月22日至3月21日，国民党军三个师几乎被红军歼灭，其余部队纷纷后撤。

点均遭失败。共军见国军实力强大，乃煽动李济深、陈铭枢在福建叛变，成立“人民政府”并派兵支援，旨在解除国军之封锁，减轻压力，所幸中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调兵平定。因此次变乱，东路改由蒋鼎文担任，继续执行围剿之计划。

二十三年二月，东、北两路军以分进合击之姿态向共军进攻，筑碉堡，修道路，逐渐完成共区之封锁线。过去，人民在共党强力压迫下，不得不替它工作；于今见国军得胜，纷纷摆脱共军残酷桎梏，组织铲共义勇队，人心归向，士气高昂，我方军事著著得胜。共党欲挽回颓势，经苏联指示以碉堡对碉堡，在驿前、宁都、古龙冈、兴国、长汀一线，建筑要塞，以图借此作顽强之抵抗。国军见共军改变战术，乃调整军队，以第十纵队归北路指挥，继续向南围剿。十月，北路军分三路破其要塞地带，占领石龙、古龙冈、兴国；东路占领宁化与南路相连接，缩小包围圈。共军知大势已去，而士兵、人民因国军包围缺乏食粮、弹药，尤以食盐最为缺乏，据说人体长期缺乏食盐体力将大为减弱，共军乃不得不设法突围。南路军因未遵照中央筑要塞之指示，共军故能从赣州、信丰间突破南路军之防线，向湖南、桂北、黔西、川西等边境流窜以达陕西之延安。共军突围时尚有十万余人，其高级将领多随部队流窜。检讨第五次围剿所以能成功：

(1) 改变纯军事战为总体战：筑堡、修路、组织民众、成立铲共队，争取面之作战。

(2) 兵力增多，符合“十则围之”之兵法原则。

(3) 前四次围剿之失败，从其中获得不少教训与经验。

三、长途追剿

朱、毛率领一、三、五、七共四个军团约十万人取道赣州、信丰间，窜出江西，中央命令何键之西路军，薛岳之第六路军，周魁元之第八纵队，以及二十三、五十三两师，均编为追剿军，由何键任总司令指挥追击。中央分电黔、桂两省于边境协助堵剿。

(一)桂北围剿

江西剿共，国军采用碉堡围攻战术逐次缩小范围，共军势日蹙，不得不放弃老巢，贸然突围流窜。二十三年秋，肖克率众二万余人为先驱，自赣入湘，于九月二十日自道县、洪水关、永安关等地附近窜入广西之灌阳、新圩、文市及全县之石塘，兴安之界首，续由资源、龙胜，绕湘桂边境之绥宁通道窜至黔东入四川。当共军窜经灌阳一带洪水关等地时，遭遇全县民团之痛击，被歼灭一师之众，获机枪五十余挺，步枪千余枝。至十月上旬，朱、毛部之主力军第二、五、七及新编第八共四个军团约十余万人，由朱、毛率领蜂拥入湘，打算沿肖克之旧径西窜。当时广西全部兵力只有两个军共十五个团，即使配合各地民团也无法与共军之势力相比；因此在战略指导上，决定沿恭城、灌阳、兴安一线之各县要点，占领侧面阵地与之作战。置重点于右翼，准备乘其长驱入境之际，拦腰痛击。策略既决，遂征调桂北各县之民团约十二个团队，于全县、灌阳、兴安、龙胜，预料共军必经之地，沿途择要埋伏，并以黄镇国之第四十三师于兴安、韦云淞之第四十五师于灌阳附近作机动使用。全县之守备由民团之指挥官陈恩元负责。龙虎关之守备由民团之指挥官蒋如松负责，各率民团四团

防守。并请湘省派刘建绪到全县协防，我亲自坐镇桂林指挥。十一月二十一日，部署甫定，共军已抵境界，首先扑攻龙虎关，双方发生激战，终因防线过长，共军乘隙由永安关以北地区窜陷文市，直趋咸水，经三昼夜之苦战，适第四十四师王赞斌部自江西调回，星夜驰往增援，湘军张亮基部也抵达全县接防，我方士气顿壮。韦、王、黄三个师由防线向北出击，同时陈恩元在全县指挥民团南入夹击，切共军首尾为数段，并包围其一部于文市、咸水，俘虏共军七千余人，获枪械三千余支。我方为纪念此一大捷，特摄有七千俘虏之影片。此外，因民众与民团之合作，厉行空室清野政策，共军所经过约六十公里之正面，找不到颗粒粮食。共军因无法补给，陷于饥饿，计饿毙者不下万余人，朱、毛见无法在广西停留，所以急由龙胜、三江以北地区向贵州逃窜。

检讨这次战役如刘建绪之部队能努力合作，战果更大。当刘部甫入全州，我们为尽地主之谊，特备酒肉款待，望其饱食之后，协助共同作战。我们派飞机侦察刘部是否行动，驾驶员回来，很愤愤地说："他们不在剿共，而在'抗日'"。原来刘部架着枪在睡觉，驾驶员说的日不是指日本，而是指太阳。

（二）黔滇追剿

共军窜入贵州东北后，中央重新调整剿共部队，以刘建绪为第一军团辖第一路；薛岳为第二军团辖二、三两路向西追剿。第二十五师、五十六师移驻瓮安、黄平，截其流窜。十二月二十四日贵州全省部队在黎平、清水河完成堵剿部署不久，被共军突破防线，向剑河、三穗等地北窜，占领台江、镇远后分两路西窜，一由瓮安，主力由息烽北

窜。经国军夹击才转向滇黔边境。中央编滇黔部队为二路，第一路辖第五、八纵队，以何键为总司令，指挥徐源泉围剿湘西之共军；第二路辖第一、四纵队以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在滇黔边境堵剿。朱、毛在滇黔境内经国军之堵剿、围剿后，补给困难，实力大减，五月三日北渡金沙江至四川与徐向前在川康边境之毛儿盖相会合，后经国军在定县截击，大部溃散；北窜陕西延安与徐海东、刘志丹相勾结。朱、毛窜至延安时，约仅剩余二千五百多人。贺龙、肖克本想沿金沙江向北打通国际路线，经国军截击，败而退与朱、毛共流窜延安。此次长途追剿，共军损失人数约二十余万。国军所以不能将之完全歼灭的原因，主要是部队素质不一，未能同心戮力；以致形成追击迟缓，堵击不力的结果。譬如，共军窜至贵州时，国军不仅堵不住，反而被其打败；龙云部队若戮力剿共，共军根本不能渡过金沙江。

四、西北围剿

二十四年秋，毛泽东至延安与徐海东，刘志丹合股后，想利用西北特别环境打通国际路线，争取外援，并谋与伊犁之俄军合作。蒋委员长为根绝共患，防止其与俄合作，特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总司令，指挥晋、陕、甘、宁、青诸省兵力；阎锡山之太原绥靖公署与朱绍良之兰州绥靖公署也归剿共总司令部指挥。当时，最高指导原则还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战略采取攻势，战术采守势"，并在陕北共区筑碉、修路。当时共军所剩无几，正当一举而可平定之际，不意日本在绥远百灵庙制造纠纷。共军即把握时机提出联

合抗日之口号，欲借此取得人民之同情，煽动友军，宕延时间以重整实力。二十五年一月下旬，共军扩张部队为五万人，毛泽东见国军在陕北力量强大，不能发展，乃亲率三万部队东渡黄河向山西骚扰，阎锡山虽有准备，因兵力单弱，后得中央之支援始将毛军击溃，毛又返回延安。经此次打击，共军损失不少。此时，日本又兴百灵庙战事，两广事件爆发，共军判断中央必分散兵力北上南下。所幸不久两广事件平定，百灵庙抗日战事胜利，日方未有继续扩大事件，国军剿共军事未受多大影响。贺龙、肖克率部由川康边境向北移动，欲与共军合作，在辉县被国军围剿损失惨重；毛泽东又被围于环县，情状万分危急。正当此一举功成之际，张学良、杨虎城受共党之煽动，劫持蒋委员长，发生所谓双十二事件。张、杨经蒋委员长之人格感召，全国舆论之压迫，向国民政府请罪，张亲自陪送蒋委员长回南京；剿共至此遂告一段落。苏俄指示共军乘此机会向国民党输诚以求生存。若不是张、杨之鲁莽，共军当时当被消灭无疑，绝不会有今日大陆沦陷之悲剧发生。

五、教训与经验

剿共之教训与经验。共产党是我们的敌人，要认识他才能战胜他。兵法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不知己而知彼，一胜一败；不知己而不知彼，每战必败。”为了提供后世史家之研究，我特叙述自己之认识于下：

(1) 共方是有主义、有组织、有国际支持之政党，绝不能以旧式打家劫舍之土匪看待。

(2) 共军占领区之组织是结合党政军民一体，也是总体之组织，面之组织，全民之组织。共区之人民无论老、

弱、妇、孺，残废都要接受政治与军事之训练，按其体能分配工作。

国军自十六年迄三十六年，于二十一年之剿共历史中，以江西五次围剿之规模最大。五次中四次失败，最后一次成功，推究其成败原因于下：

1．四次失败之原因：

（1）不了解共军之本质；

（2）不注重组织；

（3）以纯军事战对总体战，不能超越旧时战争之原则，不能活用新式战争之原则；

（4）低估对方兵力，所以有张辉瓒全师覆灭之惨痛教训；

（5）内忧外患使得第三与第四两次围剿中止于功败垂成之际。

2．第五次围剿能成功之最大原因，是筑碉、修路、建立保甲，组织民众，以总体战对总体战。

第五篇

抗日战争

第十二章　战前敌我情势之分析

一、敌　　情

1.　日本侵华之历史性。明代万历年间，日本大将丰臣秀吉已有征韩侵华之野心。万历十八年，丰臣秀吉要求假道朝鲜进攻中国，并要求朝鲜为先锋，几经磋商，朝鲜未允日本所请，因而发生冲突。朝鲜是中国之藩属，当明廷得知日本进兵之消息，亦派兵相援，战争结果互有胜负，此后丰臣秀吉病逝，日兵才自朝鲜撤兵，但其侵略朝鲜之野心并未因此抑止，且仍继续不已。

2.　公元1867年，抗战六十九年前，日本新君明治天皇主张维新改革。在此以前，日本为幕府政治，大权操之于地方。自明治起结束地方割据之局面，中央统一，打破封建制度。明治天皇为人英武，野心勃勃，对外侵略更加积极。对国内分北进、南进二派，北进派亦即大陆政策派，以中国为侵略之目标，此政策为陆军所支持；南进派即海洋政策派，主张向南洋、澳洲扩张，此派为海军所支持。两派人物多是野心之士，争执不已，结果以大陆政策派胜利。从此，日本政

府便以北进政策为国策。实行这种政策之具体行动，便是甲午战争前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之事。甲午之役更是日本政府执行这种政策之表示。是役，中国大败，虽然中国海军之吨位倍于日本，但是渤海一役，大小舰队几全部覆没，陆军复败于朝鲜境内，结果赔款割地（台湾、澎湖）了事。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占领旅顺、大连，进而吞并朝鲜。这些事实都是明治天皇时代日本推行北进政策之结果。

3. “九·一八”沈阳事变之前，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有一秘密之奏章，其中要点可以摘要记录如下：

(1) 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2) 欲征服中国，先征满（东三省）蒙（内蒙之热、察、绥）。

(3) 欲征服满蒙，必先征服朝鲜。

自“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政策变本加厉之后，其势力随之发展——由满蒙之特殊地位扩大为东亚门罗主义，东亚共荣圈，欲独占中国。

4. 中日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参谋本部之参谋长金谷范三所拟定之日本国防作战计划预定步骤中，有四点：

(1) 为了巩固日本本身之国防，应确保满蒙之安全，因此必须占领中国黄河以北之地区。

(2) 利用华民为日本耕作；利用中国市场倾销日本货。为了充裕战时之物资，满蒙有无量之马匹可供征用，粮秣尽量征收；必要时可夺取华民之牲畜，杀伤其农民以利日之军事。

(3) 华北产业丰富，田地生产富庶，战时须纳入日本之军政范围之内。日本在该等地区应扩大贸易，设金融机构，发行军用票，委托当地官厅收税，以作铁道建筑费用。

(4) 为求战时制胜俄国，须迅速占领海参威、北库页

岛等沿海之地区与岛屿，使日本国防无后顾之忧。此外，中东铁路之运输，须向贝加尔湖方面发展。

以上是金谷范三预定计划中的四点，只有第四点与侵华战争无直接关系。

5． 日侵华之步骤。北进政策既定，其侵略之步骤如下：

当日未吞并朝鲜前，国内舆论，朝野上下，一致都说该地是日本国防之第一线；待吞并朝鲜后，又倡定满蒙是其生命线，"九·一八"事变后，突然占领东三省、热河，组织伪满洲国，日本国内之舆论又提出一种谬论，以为东北与华北相邻，常受华北之威胁，华北军备必解除武装，政治特殊化，如此日本之国防才能安全。这种步骤之发展由东北而华北，而黄河，而长江，而珠江以至全中国。总之，日本占领中国后，方感其国防安全。其得寸进尺、贪得无厌之心理，宛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6． 日本对外交之横蛮。日本对华外交素来不讲国际公法之条规，惯用强暴手段，违背外交常轨。欧美各国在我国只有经济之利益与商业之企图，犹有理可喻；日本在我国，因有占领土之野心，故其外交人员极其横蛮；而且外交人员多半由驻华之军政人员兼代，所以交涉对象亦以我国地方之军政首长为主，其旨在分化中国内部，制造猜疑之心理。譬如何(应钦)梅(津)协定便是一例，这次协定因为我方事前军事未有整理完善，为避免与日方直接发生冲突，所以忍辱吞声订下了这项协定。日本政府不照外交常例办理交涉，又以军人为后盾，使中国政府不得不屈服。日本政府煽动中国内部分化无所不用其极，如民国初年因利用袁世凯做皇帝之心理与北方政府签订二十一条约，待

袁世凯洪宪登基之后，又帮助蔡锷反袁。当时日本在天津办有《顺天时报》，梁启超为反对袁氏帝制曾撰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投向该报，事前为袁氏所知，曾以二十万银元为条件，请该报勿登梁文，该报既收了袁之金钱，翌日照登不误。站在南方政府的立场，当然欢迎《顺天时报》尽量登载不利于袁世凯之文字，但是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唯恐中国内部不乱，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

7. 日本侵华之借口。日本向国内外宣传，因人口膨胀，三岛之面积不能容纳，生产有限，而消费无穷，故极须向外扩展。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因为科学进步，医药发达，人口骤增，每年约增加一百四十万人。抗战时期据调查日本三岛之人口约为六千五百万，韩国约二千万，台湾约七百万，共计约一亿人口。日本因此借人口过剩向满蒙移民，其实是侵略满蒙；因为满蒙不但有广大的地区与丰富的出产，尤其是地下资源为日本之新兴工业所必需。

8. 日本平时与战时之兵力。据抗战时调查，日本平时兵源之补给陆军约有十七个师团(一师团有二个旅团)，四个独立骑兵旅，两个独立炮兵团，三个独立重炮团，每一步兵师团中至少尚有一个炮兵团；台湾为守备之用特编有混成旅；满铁有兵力六个大队。所以平时兵力总计约二十四万五千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调四至五个师团至东北，动员约十万人，故陆军增加为三十四万。

日本实行征兵制，战时若自二十岁至四十岁征调可动员三百万人；若年龄上提至十八岁，下延长至四十五岁，可得五百万人。海军平时之吨位约八十万吨，战时增加至一百二十万吨。海军人员动员五十万。空军当时属于陆、海军，尚未独立，平时约一千五百架，战时七千架。驾驶

员约九千八百人。

9. 日本之教育。日本之教育本着国防方针而拟定，完全是军国教育。小学教课书中便记载我国产物、资源如何之丰富，旨在从小加强他们的印象，引诱并鼓励他们向中国发展。日本国民豪侠好义，素有忠君爱国的精神，受武士道的影响很大；学校教育中，不仅传授科学知识，还要训练学生好勇斗狠。日本国民这种坚强之性格，若不是日本政府驱使向外侵略，将是世界上了不起之第一等民族。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国内舆论以为能战胜俄国全赖日皇英明领导，或某些人作战之功劳，唯独日皇以为应归功于小学教员。因为日俄战争以前，日本屡受俄国之欺凌，小学教员剀切教诲学生，应立志为民族、为国家雪耻，所以培养了敌忾同仇的心理，故能于一九〇四年一战击败俄国。由此可见教育乃国家的根本，此种力量，国家之执行者可以使之为善，亦可使之为恶。

民国十三年国父北上，路经日本时以"大亚细亚主义"为题，发表演说："今后日本有二途可供发展，一是王道主义，一是霸道主义。日本若从王道主义，日本两国乃兄亲之邦，先进的应该提携后进，共存共荣，若从霸道主义，则是侵略他国。"最后结论，国父希望日本能慎重选择，并厚望日本能行王道而绝霸道。日本的元老派中，如犬养毅、西园寺公都是反对侵华政策的人物，尤其是西园寺公具有远见，又日本币原外相说吞并中国之东北，宛如吞食炸弹。自犬养被刺，日本少壮派军人更是蛮横嚣张，待军人内阁兴起，议会中的元老与朝廷里的重臣益发噤若寒蝉。以后，南进派的军人见北进派侵华大有收获，野心勃勃偷袭珍珠港，触发太平洋战争。若不因此导致美国中途参战，我国

抗战的情况更加艰苦。

日俄战争以后之日本与德国同为远东与欧洲之支柱，两者若不是穷兵黩武而遭受崩溃，苏俄绝不能于欧亚两洲有所发展。可惜两国执政人物导民于战，置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此不独中国之不幸，日、德之不幸，尤为世界之不幸也。

二、我方之情形

全国人无论军心、民心，精神上、心理上都一致认定"日本是敌人"。众人看清了日本攫取东北，要求华北特殊化，其阴谋乃是逼近长江沿岸，占据中国。二十五年双十二事变后，蒋委员长回南京，全国军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之抗日情绪高涨，纷纷要求政府抗日。政府知道如果再忍，将丧失全国之军心与民心，乃毅然决然宣布抗战。当时我方之力量约有二百七十个师。

三、毅然入京共赴国难

中央既决定抗战，八月二日奉蒋委员长电召，命我入京共赴国难。我与李德邻先生、李品仙、夏威、廖磊、黄旭初等人商量，众人皆反对我入京，唯恐中央对我不利。我回家与先室马佩璋女士商量，她平日虽不过问政治，但了解国家大事，要我自己决定，可说当时只有她一人不反对我入京，给我精神上不少鼓励。我自己认为："抗日是两广素来的主张，也是国民一致的要求，于今，抗日时机成熟，正是吾人报效国家之时。如果自己不到南京，不但辜负蒋公之德意，则往昔揭示之抗日口号乃是自欺欺人，必将为国民所唾弃。"蒋委员长派其水陆两用座机由德籍驾驶员驾

驶至桂林接我。四日下午我由桂林起飞，同行的有潘宜之、黄季陆、刘斐等人。道经南昌，本想着陆休息，因大风雨，机场积水很深不能下降，遂直飞南京，原定在下关机场降落，也因积水而改在南京下关水上机场降落。飞抵南京大约是下午三时，在机场迎接之老友计有张岳军、何敬之、程颂云、朱一民、张文白、谷季席诸先生，当晚蒋委员长在军官学校召见，并以晚餐招待。后来据他人说，我抵南京之第二日，日本报纸报道我入京，冠以大标题："战神到了南京，中日战争终不可避免！"

抵京不久，蒋委员长发表我为副参谋总长，何敬之将军是总长（以后训练总监部改为军训部，我奉命以副参谋长兼任部长职）。

中央为全面抗战在南京召开全国军事会议，冯玉祥、阎锡山、刘湘都参加，刘湘在会议席上表示决心抗日，愿出兵五百万。有人说冯、阎、刘肯参加会议与我入京有关，我想未必然，因为抗日已是全国一致之要求。

第十三章　飞南京参与制定抗战计划

一、制定抗战之计划

民国二十六年六月六日，日本军阀按照侵华预定计划将驻屯平津之河边旅团，集中于北平近郊之丰台。七月七日晚日军在宛平县芦沟桥演习，借口搜索失踪之士兵，袭击宛平县城，我方驻军宋哲元之第二十九军，冯治安师之吉星文团，以守土有责，奋起抵抗，遂发生了芦沟桥事变。这次事变乃日方按计划而行，并非偶然。何以言之？

因为当时日军无论在外交或舆论方面都直接或间接表示要扩大塘沽协定之范围，扩大冀东殷汝耕之伪组织，撤退驻防北平附近之第二十九军。日方此类要求或见诸报章，或出诸广播，其目的不外乎在鼓舞其国内之野心人士。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蒋委员长在庐山向中外发表严正之表示，其要旨如下："中华民族乃一爱好和平之民族，国民政府之外交政策本此精神，对内要求自存，对外要求共存，因而切望中日两国间之纠纷与问题能纳入外交正轨，得以和平解决"。蒋委员长分析过去我国所以一再对日本忍让之态度说："……我国羸弱，国人对自己之国力、地位，要有明确之认识，对自己之力量要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必须先求和平；过去数年对日外交所以要委屈忍痛，原本此道理"。蒋委员长并提出二十四年时国民党五全大会中所表示之对外政策——"和平未至绝望，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为对日基本国策。所谓最后关头，乃指全民为求国家民族之生存而牺牲生命财产之时，绝无中途妥协之理。妥协即是灭亡，为求最后胜利，全民务必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委员长这种真诚之呼吁，卓越之见解，旨在提醒日本军阀之觉悟。无奈日军阀迷信于武力，仍按原定计划，进行武力侵华之政策。自二十六年七月上旬至八月上旬，一月之间日本除驻天津附近之河边旅团外，陆续调陆军入华北，计有：驻屯东北之关东军骑兵，自国内调来之第五师团，二十二师团之第二旅团，酒井旅团（独立旅）及伪满军约共十万人以上。

"七·七"事变后，日军分三路进攻北平，宋哲元（时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第二十九军军长）因军队驻地分散，虽在丰台附近抵抗，但形势不利，遂于八月四日放弃北平，

但天津之保安队也曾予日军重大创伤。自此之后，日军在各地挑衅，二十六年八月九日日军武装部队侵入上海虹桥机场，冲入警戒线滋生事端，我方驻军不得不加以干涉。日方以此为借口，集中军舰派陆战队登陆上海，要求撤退驻沪之保安队，经我方严词拒绝，八月十三日，日方集合驻沪之陆军、海军陆战队约一万人进袭上海保安队，遂发生了震惊中外之淞沪战事，而中日全面战争亦因此揿开了序幕。

禧于二十六年八月二日奉委员长蒋公电召，于八月四日飞抵南京，对抗日战争我方之作战计划奉命参与。大本营之对日军作战指导原则，即为以后各战区所根据之作战要领，简述如下：

对日战争之指导：日本之侵华政策订自于明朝，历代相沿，自民国二十年"九·一八"后更为积极。中央有感于中日战争终不可免，为未雨绸缪计，亟力备战。

第一，战争指导方针。我们以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完整，争取民族自由、生存，建立三民主义富强康乐之国家为目的。对日之凌辱一再忍让，原望争取时间，俾积极建设国防，充实军备，增进国力。待和平绝望之时，举全国力量对敌进行持久消耗战，当时我们的口号是：奋斗到底，以求最后胜利。

第二，备战时期之指导大纲。对日战事必须有充分之准备而行之。对日之挑衅，一本委员长之指示"和平未至绝望，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作基本国策、委曲求全，所求者为宕延战争爆发之时间，以便于备战时期增进国力，充实军备，整编国军，充实国防，整理交通通讯，开发资源，发展军需工业，实行征兵制度，普及国民军训，策定整军五年计划（二十三年——二

十七年完成）。

第三，军事。整顿军事教育，举办庐山训练，提高军队素质与军队技能，促进精诚团结，增进国军战力。备战未完成以前，对敌之挑衅，务求限于地方性，以免爆发全面战事。

第四，政治。全力贯彻攘外必先安内之主张，先肃清国内之动乱，绥靖地方，安抚边疆，使内部安定然后方可一致攘外。

第五，外交。向世界各国揭发日本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之阴谋。提醒英美之警觉，使全世界皆知日本是破坏集体安全之祸首，期借此获得国际对我之同情与支援。

第六，财政。稳定金融以利我战事之进行，宣布法币政策，对战时所需要之财力、物力、粮食、日用品，以及军需等物品，谋求自给自足。

二、对日战争时期之指导大纲

以破釜沉舟之决心，运用全国之人力、物力与敌人抗战到底，以求最后之胜利，纵令情况艰险也不中途妥协。指导大纲因时机之不同而分有三个时期：

1. 第一期（消耗战）。敌人以优越之装备，期于短时间内消灭我野战军，进攻我军之重要地点，迫我作城下之盟，达成速战速决之目的。我洞悉敌人之阴谋，此时期内之战略指导：以空间换取时间，为保持实力避免与敌人决战，除部分兵力重叠配备于平汉、津浦、平绥各线，牵制敌人、消耗敌军实力外，主力分布于长江流域，诱敌入山岳地带，使其优越之装备不能发挥效力，以奠定我长期抗战之基础。

2. 第二期(持久战)。武汉会战之后，我方主力退守于西南山岳地带，扩大战场。敌人因兵力不足以分配于偌大中国之战场,乃准备战争长期化,变更速战速决之战略为以战养战，因而由攻势转为守势。我方鉴于敌人战略改变，亦改战略指导大纲为积小胜为大胜。一面在前线发动有限攻势，与在敌后发动广泛之游击战，消耗敌人之实力，并加强沦陷区之管制，尽全力阻止资助敌人之物资输入，迫使敌人困守点、线，破坏其以战养战之策略。民国三十年底，太平洋战事爆发，我与盟军并肩作战，战略指导由持久抵抗转为攻势防御，我军在大陆牵制敌人兵力约一百二十万，同时派遣远征军赴缅甸与英美共同作战，打通中印公路争取外援，获得新式装备，支援太平洋盟军之海上攻势。当时国内之战事进展：光复广西之桂(林)柳(州)，肃清桂省之敌人，转而进攻雷州半岛，进出广州，收复广东以作为反攻之基地。

3. 第三期(反攻时期)。国军战斗力充实后，决定以全力配合盟军作战，发动大规模之攻势,消灭当前之敌人,收复已失之土地。正当我军肃清桂省敌人，拟向广东进攻之际，美国向日本广岛、长崎投掷二枚原子弹,日皇召开御前会议，以为无法抵抗此种科学利器,遂决定无条件投降,我向广东进攻之计划因而中止。不久，日在华之军队分别投降,我全面抗战,经过八年之艰苦奋斗终获得最后胜利。

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央知日本侵华乃不可避免之事，于二十一年拟定第一期国防计划，准备至二十七年止,整编六十个调整师。二十六年芦沟桥事变发生,紧随着爆发“八·一三”淞沪抗战,我方未及完成该计划,中日战争便全面爆发。(按：该计划原定自二十三年开始征兵,二十

五年起至二十七年止，每年整编二十个师）八年抗战获得最后胜利，固然依赖蒋委员长英明之领导，与全国军民之同心协力，然而此一国防计划，使战前有所准备，于最后胜利不可谓之无关。二十三年以前，国军装备不一，枪支配备或多或少；武器种类繁多；战术思想，战斗动作极不一致，或学德、日，或效英、美，而纷杂不一。编制有一军由二师编成者，有三师编成者；或一师有二旅者，或三团者不等。再加以地方色彩，个人主义弥漫于军队之中。中央见兵多而不能作战，将多而不能听命，为应付日本侵华之骤变，在二十三年开始整编军队，所以选择在二十三年者，因为自这一年起至抗战军兴，是国家安全而统一的时期。整军的步骤可以分为下列数点：

（一）国军之整备。统一编制，各军、师、旅、团中之编制务必一致。

1． 充实装备。在此之前，国军之装备甚为复杂，本国所制之枪械有汉阳、上海、太原、沈阳、洛阳、巩县等兵工厂之出品，与各省土制的枪枝及日制之林田式。经此次整军，各部队使用之枪枝多能配合，并有一定之制式。

2． 精兵主义。减少大单位，充实小单位，过去番号虽多，但是兵源不足，结果一师人缺额有一千或二千者不等。实行精兵主义，充实小单位，预定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装备六十个调整师为基础，另建立特种部队，尤其机械化部队等。二十六年芦沟桥事变，六十个调整师虽尚未完成，然而规模已具，此外尚有骑兵十师、轻炮兵三十团、重炮五团、高射炮七团、战车二团、装甲汽车二团、工兵三团、化学兵五团、通讯兵五团、交通兵四团、铁道兵一团、铁甲车五个大队等。

（二）实行征兵制度。征兵制度为现代国家国防所必须，也是促进全国皆兵之优良制度。中国古代所谓文武合一，兵民不分，孔子以六艺教学即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中的射、御，便是对学生讲求军事训练。征兵制度之优点乃在于平时国家无须负担巨额之军备，战时全国皆是兵源。现代之科学战争，因为武器厉害，兵不只要多，还更要精，如果要达成这项目的，便只有实行征兵制度。我国至宋代，因宋太祖重文轻武，中央集权，内重外轻，杯酒释兵权解除了边疆将领的权力，而且废除了征兵制度，以致金兵入侵，不能抵抗。可见征兵制对国防之重要性。

北伐完成以后，中央见募兵制度所召集之兵员良莠不齐，不能适应现代战争之需要，遂于二十二年公布兵役法（广西于二十三年便遵照兵役法实施征兵制度），二十五年三月一日开始征调。预定自二十五年至二十九年五年当中，全国设置调整师师管区六十个，各配一调整师。

（三）建筑国防工事。于全国重要战略要点建筑国防工事，加强力量，中央组织国防工事建筑委员会，指导在沿海建立要点与要塞。

（四）江防要塞。整理南京、镇江、江阴、福州、厦门、虎门等江防要塞，设置炮位，重修要塞之建筑物。

（五）实行国民军训

1. 壮丁训练。派军官至各县召集壮丁，以备兵源补充，因为征兵制度实施不久，尚不敷实际之需要。

2. 学校军训。征兵制度实施后，军队编制扩大，各军官学校毕业生派充军队之基层干部，不敷应用，乃实施学校军训，以补军事学校训练之不足。

（六）军需工业。扩充兵工厂之设备。当时国内之兵工

厂能大量制造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山野炮、一千公斤以内之炸弹，各种信管与化学防毒面具等。

（七）经济动员准备。详细调查工、农、矿各业之状况，以制定战争时期发展经济之计划。

（八）交通、通讯之整建。建立东南、西南、西北各省之交通线与通讯网，与各省之长途电话线，以利作战时之指挥。计划中所以不包括华北者，因为该地已为日方势力所控制。

（九）防空建设。成立防空学校，训练防空人才，购置高射炮、照明器材，当时防空学校校长为黄镇球将军，黄将军曾留学德国，专攻防空。抗战时期，他评述全国之防空设备，以广西为最优。因为第一，广西各乡镇间设有通讯网，传达消息方便，各乡镇长受过军事训练，富有防空常识；第二，空、地联络良好；第三，我购置德制七五口径之高射炮。当时，全国划分九个防空区，组织防空情报网，至二十六年春各区情报网可以相互衔接。

第十四章　第一期作战

一、中日两国兵力之比较

（一）日本战时之兵力

日本之现役兵有三十八万人，预备役兵有七十三万八千人，后备役兵有八十七万九千人，第一补充兵役有一百五十七万九千人，第二补充兵役有九十万五千人，各种兵役共计四百四十八万零一千人。战斗兵属于现役、预备役、后备役者共计约有一百九十九万七千人，此外皆是后勤兵役与补充兵役。日本陆军有十七个师团，海军有各种舰艇一百九十万吨，空军共有飞机二千七百架，其中属于陆军

者有一千四百八十架，属于海军者有一千二百二十架，预备机与补充机，皆包含于此数目中。

（三）中国战时之兵力

1． 陆军。我国现役兵共有一百八十万。我国于二十五年方实施征兵制度，故兵力远不如日本。我国除一百八十万现役兵之外，预备兵役、后备兵役一无所有。二十五年为应付时局训练壮丁得五千人，待中日战争爆发，乃准备训练一百万壮丁，因准备未周，不能普及，未能达到目标。至于学校军训，至二十五年底止，高中与同等学校学生合格为预备军士者约有一万七千九百五十四人，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合格为预备军官者仅八百八十人，当时我国兵力，陆军部队计步兵一百八十二师、四十六独立旅，骑兵九师、六独立旅，炮兵四旅及二十独立团，工兵三团，化学兵五团，防空兵及高射炮兵七团，通讯兵三团，交通兵四团，铁道兵一团，保护铁道之铁甲车五大队。我国因版图辽阔，战时预定使用于第一线之兵力约有步兵八十师，九个独立旅，九骑兵师，炮兵二旅与十六个独立团，工兵、通讯兵及特殊部队亦配合使用。所余之一百多师兵力尚需驻防各地，维护治安，担任镇守之职责。日本为战时体制，乃征一兵制之国家，备战工作甚为完善。我方仅有一百八十二个师，既无预备役，又无补充役，若战时部队有所伤亡，补充困难，如淞沪之役，士兵伤亡之数字高达全体会战之兵力的四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因备战仓促，故部队皆不足言补充，这是抗战期中我不如敌人之处。由此可见，非征兵国家从事国防战争，困难极多。我国当时为了保卫国家之独立与民族之尊严，不得不奋起抗敌，是应战而不是求战，若以准备工作而言则差之远矣。

我国自二十五年起开始征兵，但不普及，何况所征兵源未及训练，便开赴前线，我在前线常看见未经训练而开赴战场之士兵，无论就作战技术或作战精神皆不能称之为战斗员，仅是备员而已。所以，抗日战争，我国依凭民心士气，与敌作战八年，实完全出乎日人意料之外。

2． 海军。我国海军有第一、二、三舰队，巡防舰队，练习舰队，测量队，直辖舰队等约五万九千吨，无论吨位、速度、火力、装甲均不如敌人。

3． 空军。我国空军有轰炸机三大队，驱逐机三大队，侦察机二大队，攻击机一大队，直辖机四中队，合计三百一十四架，与日本二千七百架之数目简直不能比较。我国不能自制飞机，全赖向外购买，所以种类复杂。空军作战因速战速决，伤亡率大，不但须有第一线飞机，停留机场应战之第二线飞机亦不能缺，工厂中还须随时制造供应，但我方除三百一十四架飞机外，一无所有。

二、淞 沪 会 战

淞沪会战之经过

（一）二十六年八月四日我奉委员长电召飞抵南京，委我任副参谋总长职。当时情形日日紧急，日本在河北，绥远、平津一带挑衅不已。我最高当局知日为贯彻其大陆政策，必不会停止侵华之行动，乃于南京召集全国将领开会，表示决心抗战。各将领归去后，秣马厉兵，动员调遣，待命抗敌。八月九日，敌武装官兵侵入上海虹桥机场警戒线内滋生事端，与我方保安队发生冲突，借此集中多数兵舰，并以陆战队登陆，要求我撤退驻沪保安队，我严词拒绝。八月十三日，敌遂集结驻沪陆军及海军陆战队，约万余人，

向我保安队进攻，淞沪战事即告发生，我为应付事变，令张治中部三个师向上海增援，初期我以优越之兵力一度进展至汇山码头，八月二十二日晚，敌军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团及第八师团之第四旅团，第一师团之第一旅团于川沙，狮子林，宝山等地同时登陆，向宝山、罗店、浏河之线南犯，我方续以陈诚部增援，二十四日起开始反攻。上海地狭而近海，敌人陆、海、空联合作战，极易发挥威力，我军反攻因而未能奏效。后以敌人之增援部队陆续增加，敌以主力进攻罗店。十九日罗店陷，我军退守闸北、江湾、庙行、五庙、双草墩一线。九月中旬，第三战区副司令官顾祝同将军（司令官原为冯玉祥，冯调任第六战区司令官后，由委员长兼任）指挥张发奎、朱绍良、薛岳、罗卓英、刘湘（本人未至前线）、廖磊（淞沪战事发生后月余始到达上海）等之集团军与敌对峙于北站、刘行、浏河之线，当时我军力若每一集团军以三军计算，共十八个军，若每军以三师计，共五十四个师。敌人之兵力至九月底共聚二十万人，并与强大之海、空军力量配合，故以优越之势，突破我庙行、江湾之防线，我军乃向蕴藻浜南岸、陈行、广福、施相公庙、浏河一线转移。

我军转至新防地续与敌相持，战事激烈。我军因缺乏现代化武器，全赖血肉之躯与之相抗，所以伤亡甚重。后因敌人火力猛烈，我军被迫向苏州河南岸、江桥镇、小南翔之线撤退。此时，我方兵力分中央、左、右翼三路兵团，中央兵团向小南翔撤退，因制空权操之敌手，敌机日夜侵扰，遂与左翼兵团续退至青浦、白鹤巷。当时因连络困难，下达命令较迟，各部准备不周，撤退秩序甚为混乱，是以青浦、白鹤港之线不守，乃向吴福线之既设阵地撤退。当

时以受敌机日夜跟踪之威胁，各部队撤退秩序更为紊乱，以致吴福线又告不守，而续退向锡澄线。十一月九日敌迫近锡澄，中央见部队伤亡重大，于敌人强大空军之威胁下又无法作战，乃下令撤退淞沪战场，部队主力向浙、皖、赣边境撤退，一部沿京沪大道向南京撤退，参加守城。上海抗战至此告一结束，历时两月又二十六日。上海抗战原计划本是节节抵抗，故有既设阵地如吴福线、锡澄线，后因敌人掌握制空权，行军不易，不能按照原定计划实施，复以命令下达仓促，部队准备不周，故原计划尚未实现便开始撤退。

以上是淞沪战役之大概，今列我双方之战斗序列如下：

1. 日本之战斗序列

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第三师团师团长藤田进；第六师团师团长稻叶四郎；第九师团师团长吉佐良辅；第十师团师团长不明；第十三师师团长获洲立兵；第十六师团师团长：藤江惠辅；第十八师团师团长：林茂清；第一〇一师团师团长：齐藤弥平太；第一一四师师团长：末松茂治；第一后备兵团，重藤支队，冈崎支队，伪清安军一旅，李春山旅，于芷山旅共二十万人以上，飞机二百余架与优势之海军。

2. 国军之战斗序列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后调第六战区，蒋委员长兼司令长官)；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前敌总指挥陈诚。作战部队：张发奎集团军，朱绍良集团军，廖磊集团军，薛岳集团军，罗卓英集团军，唐式遵集团军。

(二)淞沪战役之检讨

1. 对日军之检讨

（1）敌人利用淞沪沿海之形势，发挥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之威力，以装备之优良，训练之纯熟，发挥各兵种在战场上之战力，予我军创伤甚重。

（2）日军官兵在战场上均能奋斗牺牲前扑后继，有武士道与大和魂之精神，深值钦佩，彼虽为我之敌人，亦应取其所长而效法之。

（3）敌人之纪律太差，对民众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我军虽装备不如敌人，因日军之行为所激起同仇敌忾之心理，却为抗日战事中激发精神之利器。

2．对国军之检讨

（1）国军官兵深具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于淞沪战场虽制空、制海权操之于敌手，而我方之装备训练亦不如敌人，然我军悉能以血肉之躯与日军相抗，其视死如归之精神可歌可泣。

（2）我军以劣势之陆军装备，抵抗敌军海陆空联合作战之优势，所凭借的全是爱国精神。自八月十三日至十一月九日将及三个月，我军伤亡虽重，但敌人损失也不少，打破日军阀三月征服中国之迷梦。

（3）我军因无空军掩护，炮兵又少，攻坚非常困难。抗战期间，我军攻陷敌人坚固阵地之战役，不乏其例，如昆仑关与密支那两战场战役，但终属少数，考其原因乃在于武器不如敌人。

（4）日军炮火猛烈，又有空军掩护，我军进攻效果很差。

（5）我军训练远不如敌人，使用同一武器之命中率亦远逊于敌人，步兵对轻重武器因训练不精，不能使用自如，未发挥较大之威力。

3．国际对沪战之评论

我军在淞沪作战，装备虽属于绝对劣势，因为英勇抵抗，赢得国际间一致之赞誉，今列举数条如下：

（1）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伦敦通电云：此间各报对上海前线华军于猛烈抵抗后，能按照预定计划，作最有秩序之撤退至业经布置妥当之防线，一致表示钦佩。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论，特别提出华军之英勇抵抗，并称日军尚未获得其摧毁中国军队之主要目的，即此次两军作战，双方伤亡惨重，但十周之英勇抵抗，已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之荣誉，此前所未闻者，须知若干华军器械，犹未充分，但一般所认为不能保持一日之地，彼等竟守至十周之久。此种奇迹，自属难能可贵，上海一隅之抵抗，对于整个中国均有极大之影响。

（2）十一月二十八日伦敦路透社电云：《泰晤士报》同日社论，对淞沪战事之最近一幕有所评论，先论本报对于此次上海作战中国部队之英勇智谋表示最大敬意，继谓日军欲使华军有计划退却变为总溃散，殆将感力尽精疲之苦。日军之最大与唯一目的，在摧毁中国陆军，使之不复有坚强有效之战斗力，苟无以达此目的，则土地纵有所得，亦无多大关系。日军纵谓杀死华兵甚多，纵谓上海战事此后不必再延长，然实则未必如是，上海十周血战，将有一日证明中国已安置从来未有的兵力之基础矣。华军现已从滑稽故事之迷雾中，脱颖而出。……目前虽华军大部分犹训练未足，武装未齐备，并因无力量购置雨衣，犹携雨伞（指川军）与俱，虽如此犹能抵抗现代化之武器，作有秩序之撤退，此种精神将在各处发生影响。

（3）十一月二十八日路透社伦敦电云：《新闻纪事》报

同日社论稿，华军在沪抵抗日军攻击之战绩，实为历史中最英勇光荣的一页，沪地华军之忠勇抗战，当可感动参加九国公约会议之诸代表；为维护国际法起见，同取均势之坚决立场，各国有较中国所有更强之武器，方能发起对日之国际抵制，此举可使日本早日屈膝，而追令放弃侵略之狂暴行为。

以上是英国报纸对沪战之批评与推崇。这种国际间之同情，与国内人民抗日情绪得到安慰，全是三月来淞沪抗战牺牲三十万部队之悲惨结果。

上海战场撤退之后，蒋委员长对战地之转移，有下列之训示：

(1) 此次淞沪战争已给日人绝大之打击，充分表示我们军人为国家为主义决死抗敌的精神；

(2) 纪念光荣战死之官兵，就要继续他们牺牲的精神，完成他们的遗志；

(3) 高级将领应加倍勤劳，认真研究改进部队的缺点，讲求有效的战术，以减少官兵的伤亡，增大战斗的力量。

(4) 今后作战应注重之要点：此次上海阵地转移，我们已移至沪战最后一线，大家应抱定牺牲的决心，誓死固守，与上海共存亡。

(三)淞沪会战战场杂记

抗战时期因为制空权操于敌人，我方之陆、海军之活动完全受了限制。空军更不敢白日活动，只能在夜间出袭。陆军若是白日行动，因无空军之掩护，常受敌机轰炸骚扰而前进困难。战场指挥官也在白日行动甚为不便，因为敌机只见有车辆活动便盲目扫射。我印象最深刻之一次是我奉蒋委员长之命赴第三战区视察。汽车由南京出发，行至

昆山附近时天刚拂晓，为预防敌机袭击，我们取下吉普车车篷，我监视頂前上空，其他随从人员监视左、右、后上空。突然有敌机数架由云层中急降而下，幸而我们事先有准备，立即跳车，快步隐藏于公路两旁之稻田或树林中。刚一离车，车身便被敌机机枪扫射命中，损害不重，待敌机过去，我们才继续向上海前进。

淞沪抗战时，我以副总参谋长身份常奉命至前线视察战况。是时，冯玉祥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是副司令长官。我第一次抵达前线时，礼貌上先拜会战区长官，冯不在，我以为冯外出巡，并不在意，与顾副长官讨论战况敌情后，至前线视察。第二次奉命又到前线视察，我照例拜会冯玉祥，他还是不在。此次，我忍不住向顾副长官说："委员长要我前来慰劳他，并听取他的意见，何故二次不见？"顾说冯因为怕空袭，白天不在战区长官部，住在离上海约一百五十里路之宜兴张公洞，除偶尔夜间到战区长官部，白天从未来过，私章交给顾副长官，公事由顾处理。顾告知我如要见冯，非至宜兴不可。遂乘汽车专程至宜兴见冯，车行约二小时抵张公洞与冯相见。张公洞是石岩洞，面积甚大，可容纳一两千人。我转告委员长慰劳之意后，冯未有何表示，我当时心中忖度，是否第三战区之部队都是中央部队与西南部队，冯指挥不灵而不到战区？我回到南京与何总长(应钦)商量，我以为西北部队如宋哲元、石友三、石敬亭、孙连仲、刘汝明、冯治安等有爱国之热诚又是冯一手造成之部队，他们对程潜之指挥素来不大接受。不如在黄河以北、山东北部、河北等地开辟一新战区——第六战区，由冯负责，兵力若连同韩复榘部至少有十五万人以上。何总长同意我的说法，我们遂向蒋委员长建议，也蒙

采纳。我征求冯之意见，冯亦很高兴。讵料命令发表不久，冯刚乘津浦路北上，韩复榘即有电到中央反对此事，宁愿隶属第五战区(战区司令官李宗仁)。中央之命令已经发表，而韩复榘又表示反对，只好对韩之一部不纳入第六战区，给韩以山东省主席兼集团军总司令。冯就职不久，宋、石等西北军纷纷向中央密电反对，过去宋、石等在程潜之指挥下虽不太受命，然情况尚称良好，如今对冯甚畏惧而不信任，则事态更为严重。宋、石等为冯旧部所以反对他，有其道理，譬如冯畏敌机轰袭，指挥所每日换地点两三处，每换一次地点，全军的通讯网便须变更，所以各军常与指挥所失掉联络而无法报告军情。由此可见他怕飞机是事实，在第三战区时如此，到了第六战区还是如此。

各方反冯之密报皆直接上达委员长，委员长衡量如此发展下去，影响很大。一月召见我，告诉我各方之反应，委员长说："解铃还是系铃人"。要我打电报请冯回京。冯回到南京，委员长授意我向他转达他的部下不信任之意，希望他辞职。当我转告冯，幸而他无异议接受，可见冯在第六战区一定遭受困难，才肯辞战区司令官之职务，专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职。冯解职后，第六战区之部队分散至各战区中，当时各战区计有：第一战区(司令官程潜)；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第三战区(司令官委员长兼)；第四战区(司令官是何应钦将军，后改为张发奎)；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以后，第六战区改设在武汉。

冯玉祥所以失掉部队之信任，主要因他御将之术太坏。古人语御将以礼，冯则以暴。部下如有触犯，动辄罚跪。原先别人传说，我不相信，十六年西征完毕，我奉命北上援助阎锡山，路经河南新乡，下车拜访冯，冯以午餐招待。

饭后我要启程，冯叫刘汝明去看看火车准备妥当否，刘恭敬地答应"是"！当时，刘是军长，冯使用如勤务兵，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冯御将之术，若不出潼关，尚可维持，一旦与革命军接触，部属见革命军待人接物都是以礼，当然会生二心。

淞沪会战时，军队高度表现了大无畏精神，人民所表现的也是慷慨捐输。凡部队所需要的，无论食物或是防御用品如麻袋、沙包、铁丝网等，都是无条件贡献，这种爱国热诚无形中鼓舞士气不少，至今犹令我深为感动。

三、南京保卫战

(一)军事防守会议

淞沪会战转移阵地之前，对南京防守事宜，蒋委员长曾经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出席之高级将领有参谋总长何敬之将军，训练总监唐生智将军，第一部副部长王俊将军与我等等。委员长在会场曾宣称南京是我们之首都，国父陵寝之所在地，必须防守。会中询问谁愿担任防守责任，唐生智立起发言，慷慨陈词，自愿防守。他批评自抗战以来中下级士官牺牲甚多，但未见有高级军官牺牲者，他愿担任责任与城共存亡。委员长嘉奖其壮志，但与会人多为唐担心。因为参加南京保卫战的部队，多是由淞沪战场撤退，有的部队伤亡过半，至少也在三分之一以上，而沿途撤退，上有敌机，后有追兵，士气非常低落。以久战疲劳之师来保卫南京，这是我们为唐担心之最大原因。

(二)南京弃守

十一月二十六日，锡澄线失守后，在无锡线节节抵抗之既定计划，因退兵秩序太坏而无法进行。当时我军之主

力向浙、赣、皖边境撤退，一部向南京撤退，参加守城。此时，我空军得苏联之飞机援助，力量大增，彼此曾发生激烈空战。但空军并非万能，必须陆军与之配合才能发生大的威力，所以空军力量之增加，只能振奋国人之精神，不能挽回战局之颓势。十二月四日，敌人以主力沿京芜路，一部沿京杭路，出现于秣陵关及句容之南京外围二据点附近，是晚两地均相继失陷。十二月五日，敌人以主力攻淳化镇、汤山，激战数日，汤山、淳化、龙潭相继失守。十二日晚雨花台失守，中正遂下令放弃南京，十三日敌人入占南京城，城中之部队多被缴械或壮烈牺牲，能退出城外者不多。自十二月四日至十三日敌人入城，南京城共守九日。

敌人占据南京后，纵兵放火劫掠、屠杀、奸淫，将我无辜的民众及失去抵抗之徒手士兵，用绳索捆绑，每百人或数百人连结一团，用机枪扫射，或用汽油焚烧。日方军官率领士兵到处放火，并以搜索为名，挨户侵入民家及各机关内，将所有贵重物品及艺术品载运而去。妇女被奸淫无数，民众被残杀总在十万人以上。据当时在南京之外国传教士说，这种野蛮暴行是现代史上罕见的。

(三)蒋委员长之训示

南京陷落，我方野战军损失颇重，举国震惊，日本军阀以为我国之抗战已至土崩瓦解的阶段，但是，蒋委员长高瞻远瞩，认为目前之形势，无论如何艰难恶劣，唯有向前迈进，如果中途屈服，即是自趋灭亡。与其屈服而亡，永无复兴之望，毋宁抗战而败，终必有转败为胜之时。基此信念，十二月七日，发表《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要旨如下：

“此次抗战开始迄今，我前线将士伤亡总数已达三十

万以上，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更不可以数计，牺牲之重，实为中国有史以来抵御外侮所罕见……敌人之侵略中国，本有两途，一曰鲸吞，一曰蚕食，今者逞其暴力陷我南京，继此必益张凶焰，遂行其整个征服中国之野心，对于中国为鲸吞，而非蚕食，已由事实证明。……鲸吞之祸，显而易见，蚕食之祸，缓而难察。敌苟恃慢性之蚕食政策，浸润侵蚀以亡我于不知不觉之内，则难保不存因循苟且之心，懈其敌忾同仇之义。……今大祸当前，不容反顾，……若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制敌之死命。……”中国地大物博，非日本所能鲸吞，而抗日之胜负不决定在南京之失守，或任何一乡镇之失守，只有我们全民之心理为抗日，日本无力量，也不能枪杀我所有同胞，占据我所有领土。由此可见蒋委员长坚强之信心。“抗战到底”是一至理名言，因为我以劣势之装备对敌之优势装备，只有利用所长——广大之土地与坚强之心理。所以蒋委员长之训示不单为南京撤退而发，若要长期抗战亦非如此不可。

(四)检　讨

1. 防守南京之目的，就战略而言，或望以劣势装备，凭借险要之地形，增强抵抗，以求拖延时间，或以守待援，或待机反攻。

2. 南京不设防之建议。当委员长召集南京防守会议时，我因为常至前线视察，深知淞沪会战撤下之部队残缺不齐，疲劳万分，本有一建议：“南京是总理指定之首都，为总理陵寝之所在地，不忍为军事破坏，应宣布为不设防之城市，以主力退至城之西部，西南部一带，一部集结于

浦口，监视南京，掩护徐州，保留实力，以便机动打击敌人。”在会议席上，我见委员长首先宣布防守南京，唯恐扰乱最高统帅之决心，建议案便未提出。事后回忆，心犹未安，虽委员长已有决定也应提出，以供参考，才算尽了部属之责任。

(五)南京之形势

南京城内有天堡城、雨花台，居高临下，是全城之要点，城东、北两面环绕长江；西、南面有秣陵关与句容为屏障。汤山、龙潭、栖霞山、乌龙山、尧化门皆是军事要地，所以金陵古称为龙蟠虎踞之地，委员长有此认识，所以决定防守南京。所不幸者，守城部队多是淞沪战场退下的疲劳之师，未经整顿即参加守城，虽有十余师，而力量实未及一半。曹刿论战：“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参加淞沪作战之部队，已是衰竭不堪，所以调至南京防守仅八天，便丧失雨花台。此居高临下、威胁城内之据点一失，南京遂告陷落。

如果“八·一三”上海保卫战，我军为向国人交待，只作轻微抵抗，将主力撤至南京，深沟高垒，由沉着之将领指挥，敌人的海空军不能放肆，如此以守上海之精神守南京，虽南京终久必失，但抗敌效果一定较大，敌人之损失也更大。这虽是事后之明，也亦近纸上谈兵，不过以一得之愚，供后进兵学家之参考耳。

(六)南京保卫战敌我兵力比较

1．我军兵力

第七十二军步兵一师；第七十八军步兵二师(七十二、七十三军另配教导部队及宪兵)；第二军团步兵二师；第六十六军步兵二师；第七十一军步兵一师；第七十四军步兵

二师；第八十三军步兵二师；首都警备司令步兵一师，宪兵、教导团各一师。至二十六年十二月止，我方步兵约计十五个师。

2． 敌军兵力

第十军（军长柳川平助）第六师团、第八师团、第一一四师团、国琦支队；上海派遣军计四个师团（敌方空军及海军兵力在外）。

（七）战场杂记

1． 唐生智自告奋勇担任南京防守之重责，委员长令我协助唐侦察南京城内外之地形。时值冬令，白雪飘飞，唐率领参谋人员，我亦与唐同坐汽车先至城外汤山、栖霞、乌龙炮台、秣陵等地视察阵地；翌日继续巡视城内之蒋山、雨花台、天堡城等地。两天之视察，我发现唐之身体衰弱不堪，身着重裘，至平地犹可下车看看，爬高山，便托我代为侦察，寒风白雪之中，我见他虚弱之身体，不禁为南京之防守担心，为他自己担心。

2． 南京守城之部队共有十五个师以及炮兵、宪兵数团。粮、弹、金钱之准备可供守城三月之久，唯恐敌机轰炸，特安置于坚固山岩之中。不幸仅守八日，一切屯备物资悉归敌所有。

3． 二十六年，战区之划分以第五战区守备淮河流域，廖磊、李品仙两集团军固守津浦路，防止敌人南下。李系唐生智之旧属，所以当唐自告奋勇承担南京之防守责任后，曾有电报给李，要其派火车一列、士兵一连至浦口候命，以备南京不守时撤退之用，我为证实此事，后来曾问明李品仙，李告知确有其事。但南京失守后，唐并未乘火车而去，据李分析唐可能乘船离京而去，或乘汽车由长江上游

而去。

南京失守后，曾有人纷纷责难唐氏，平心而论，以残缺疲败之师是不能与优势战胜之敌相抗的。唐之错误在于事前未能知己知彼，谨慎考虑，详细计划，贸然承担守城重任，虽勇气可嘉，终不免受全国舆论之指责，则殊为不值矣。

四、徐州会战和台儿庄大捷

徐州居于津浦陇海两路会交之要点，战略之运用关系甚大，为敌我必争之地。敌人自从掠取淞沪，攻陷南京后，企图打通津浦全线及陇海线东段，但必先攻取徐州方能达此目的，故而形成徐州会战。

(一)敌我兵力之分析

敌人每一师团辖二旅团，每旅团辖二联队，战斗力约一万三千人，非战斗兵约六七千人。每一师团配有炮兵一团，每团有三营，每营有三连，每连计有炮四门，其他直属炮兵部队尚不计算在内。敌人用在徐州会战之兵力共有八个半师团，约二十万人，每师约以三十六门炮计，共有二百门以上大炮，此外尚有飞机、战车、直属炮兵。

我军参加徐州会战之兵力虽有六十个师，然而战斗单位(连)之火力远不如敌人。敌人每连配备轻机枪九挺，我军少数经过调整之师或连，尚有此数目，其他或六挺，或三挺甚至无有者。战术单位(营)火力也不如敌人，敌人每营有重机枪、追击炮等，我军于团单位始有重机枪。战略单位(师)更不如敌人。现代战争所凭借者有三：一为火力，二为装备，三为通讯。经此分析，可知我军番号虽多，火力实在不能与敌相比。

(二)敌我之战斗序列

1. 敌人之战斗序列

华北派遣军：津浦北段指挥官西尾寿造；第五师团板垣征四郎；第十师团矶谷廉介；第一一〇师团健川美次；第一一四师团末松茂治；第一一一师团之山本旅团；第一一三师团一〇五旅团本川省三；第一六师团之板田旅团；山下兵团主力；酒井兵团一部；第一二〇师团一部。以上共计七个师团，炮兵空军在外。

华中派遣军：

津浦路南段指挥官畑俊六；近卫师团板田贞固；第三师团一部；第十一师团一部；第九师团主力吉住良辅；第一一六师团之佐藤旅团；第一〇一师团之一部；第一〇六师团之柳汤旅团。以上共计五个师团。

2. 国军之战斗序列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副司令长官李品仙、韩复榘；参谋长徐祖诒；副参谋长黎行恕。第二集团军孙连仲，第三十军田镇南，第三十师池峰城，第四十二军冯安邦；第三集团军孙桐萱，第十二军孙桐萱(兼)，第五五军曹福林；第十一集团军李品仙(兼)，第三一军韦云淞；第二一集团军廖磊，第七军周祖晃；第二二集团军孙震，第四一军孙震(兼)，第一二二师王铭章，第四五军陈鼎勋；第二四集团军韩德勤，第五七军缪澂流，第八九军韩德勤(兼)；第二〇集团军徐源泉，第十军徐源泉(兼)；第二七集团军杨森；第三军团庞炳勋；第十五军团冯治安，第七七军冯治安(兼)；第二〇军团汤恩伯，第五三军关麟徵，第八五军王仲廉；第二七军团张自忠，第五四军张自忠(兼)，第二军李延年，第二二军谭道沅，第四六军樊崧甫，第五一军于学忠，第六十军卢汉，第六八军刘汝明，第六九军石友

三，第七五军周岩，第九二军李仙洲。此外，炮兵五团，飞机约四——五十架。

(三)会战经过概述

1. 津浦南段之战事

敌自攻陷南京，即向江北推进。企图打通津浦路，贯通南北战场。二十六年十二月中旬，敌第十一、十三师团各一部渡长江攻取扬州(江都)与浦口以北之滁县。第五战区司令部檄调驻防济南之第三集团军(韩复榘)，青岛之海军陆战队(沈鸿烈)与临邑之第三军(庞炳勋)，守备黄河沿岸与东海沿岸之要地，并自青岛调遣于学忠之第五一军防守蚌埠阻止敌人由滁县北上。二十七年一月下旬，敌军第十三师团自滁县以北向我三十一军之防地明光、池河等处推进，我军力量微薄，被迫放弃向西退守定远、凤阳。二月三月，敌人占领定远、凤阳、临淮关、蚌埠等地，五一军于学忠被迫自淮河南岸退守淮河北岸，于是敌乘势渡淮，五一军与敌搏斗后，退至浍河、涡河沿岸。第五战区司令部见战事不利，复调张自忠之五九军增援于学忠，另以新到之二十一集团军廖磊所部第七军，及韦云淞之三一军向定远一带侧击敌人，敌第十三师团之主力侧背受敌，退而增援淮南之战场。五九军乘势收复淮河北岸之阵地。旋以津浦北段战事吃紧，五九军奉命北调滕县，防地由五一军固守。津浦南段之战事，因敌被我廖磊集团军与李品仙集团军牵制，不能北上参加台儿庄战事，形成对峙之势。敌为指挥统一，合华中方面军与上海派遣军为华中派遣军。敌人原定沿津浦线北上，会合由津浦路南下军队，与胶济路西进之军，三面会攻徐州之计划，一时为之受阻。

2. 津浦路北段之战事

敌人因鉴于战事之全面性与持久性，于二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设立大本营，华北派遣军遵照大本营之计划攻略胶济路、济南以东之黄河沿岸地区。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敌第二军之第十师团矶谷廉介因济南城之黄河桥被炸断，为执行大本营之命令，遂在青城、济阳间渡黄河。二十七日敌下济南，三十一日陷泰安。二十七年一月七日，敌连下蒙阴、邹县、济南、大汶口等地。敌所以能长驱直入，与韩复榘之避战态度有直接关系。

韩复榘以第五战区副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山东省主席等职，为保全实力，令所部放弃济南，擅离作战地，退至鲁西单县、城武、曹县一带，仅留少数部队于黄河沿岸与敌相峙。军委会原有令给各战区云："各战区守土有责，不能退入其他战区。"待韩部退出泰安，军委会复有令给李宗仁与韩复榘，令韩重入泰安并以泰山为根据地指挥地方团队打游击战，韩接奉命令后，仍然将公私辎重物品由津浦、陇海路转平汉路停于漯河，李宗仁劝其重入泰安，且不可违背军委会命令擅入第一战区之防地。韩非但不理，竟复电云："南京失守，何有于泰安？"又云："全面抗战，何分彼此？"言下之意以为入第一战区防地为理所当然。李长官见其执迷不悟，将其态度转报军委会。蒋委员长接此报告甚为重视，召集军委会高级幕僚开会，出席者计有参谋总长何敬之将军，政治部长陈辞修将军与我（时任副参谋总长），众皆以为若让韩部自由进出而不加制裁，军纪荡然，民心丧失，如此不独参加抗战的一百八十余师及四十余旅丧失信心，全面战事亦无法指挥，故一致主张严办，以振纪纲。委员长亦有此决心，于是在开封召集军事会议，凡第一、第五战区之高级将领（军长以上）无

作战任务者一律参加，会前委员长乘各别召见将韩逮捕。当时韩部有四、五万人，恐其有变，特派陈调元前往宣慰，晓以大义，幸未发生变故。韩是冯玉祥旧部，时冯为军委会副委员长，冯平日带兵重视爱国教育，唯韩与之关系密切，恐其泄漏，故事前并未就捕韩一事与之商量，韩被捕后送往武汉，经军事审判明正典刑。军委会任命于学忠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为副总司令。于因故未到职，故以孙为总司令。

当韩未逮捕前，闻韩部集中于鲁西，欲退往汉中，与西北马部相连结。因他丧失信心以为抗战必败，欲效清末刘坤一，以东南自保。传说此计划出自秘书长之手。西北两马所部将领深明大义，绝不会附和韩之中立计划。

韩既正法，纲纪树立，各战区官兵为之振奋，全国舆论一致支持，韩之原部第三集团军在孙桐萱指挥下亦奋勇与敌作战。在此以前，黄河以北作战部队轻于进退，军委会之命令各部队阳奉阴违，经此整肃，无不遵守。惩办韩复榘是抗战期间整顿纪纲之一大事，幸赖委员长乾坤独断，杀一儆百，藉此树纲纪，因而士气振作，良心奋发，且树抗战胜利之先声，维护军中之命脉。

自从矶谷廉介攻下泰安，李长官檄调二十二集团军由孙震指挥，至徐州，转向临城，滕县拒敌南下。另以五一军于学忠部留少数于蚌埠监视敌人外，主力调至陇海路之黄口、砀山警戒并支援鲁西作战之第三集团军。军委会为巩固徐州，诱敌于津浦路作战，以便武汉有充裕之时间备战，以及疏散屯集之物资，命令江南之第二十一集团军（廖磊）及平汉线之第五十九集团军（张自忠部）统归第五战区指挥。另以汤恩伯之第二十军团控制归德、德州，巩固

第五战区之后方。此时，第五战区重新布置以二十六集团军、第十一集团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由合肥、老人仓、洛河一带侧击津浦南段之敌人，企图牵制敌于淮河以南，阻其北上妨碍徐州会战；第三军团，海军陆战队防守鲁西、鲁南，并使用地方团队发动游击战。山东百余县，地方武力颇大，至抗战胜利，犹有七十余县城或部分或全部为游击队力量所控制，胜利后，政府因遣裁游击队，竟致他们参加抗战八年不顾，一律裁撤，结果生活无着，铤而走险，投向共产党者甚多，抚今思昔，不胜感慨万千矣。

二十七年二月四日，军委会令第五战区向津浦北段之敌人反攻。司令部乃使用第三集团军于二月十二日夜袭济宁，汶上，一部曾攻入济宁，激战多时，待敌军援军至，始退至相里集、羊山集、巨野一线占领阵地，并以一部对于津浦线南下之敌施行侧击。

二月十四日第二十二集团军向邹县敌军进攻，未有奏效，成对峙之局面，二月二十六日，第三军团（庞炳勋）配合海军陆战队，向新泰、泗水、蒙阴等地袭击，曾收复蒙阴，我军缺少炮兵，又无空军掩护，制空权操之敌手，进攻往往鲜能奏效，盖炮兵为军中之骨干，我军只有五团，空军白日又不敢出动，以致陆空不能配合，否则将收获更大之战果。

3．胶济路之战况

敌人第五师团板垣征四郎于二十七年一月上旬沿胶济路东进，八日通过潍县，一部于一月中旬至青岛与海军会师。沈鸿烈率领海军陆战队及保安团队奉命退至诸城、沂水等处，扩大游击战，打击鲁东之敌人。二月初，敌人第五师团继续南进占领蒙阴、沂水、莒县、日照等地。我为

增强鲁南兵力，乃令庞炳勋之第三兵团迅速向临沂推进，协助沈鸿烈抗敌。二月下旬，庞军退守临沂占领阵地，与敌激战。临沂城墙高大而坚固，北伐时我曾于此地率部进攻张宗昌之鲁军方永昌，虽野炮亦不能穿城壁，庞军凭城与敌相峙，军委会恐城失陷，令五十九军张自忠由滕县增援临沂，三月十二日，张部开抵临沂北郊。庞原为国民三军孙岳之大将，能征惯战，体恤士卒，视下属如子弟，故深得部属拥戴，且练兵严肃，部队所至之处秋毫无犯。张原是国民二军冯玉祥之悍将，二人配合当如虎添翼。但庞张二人之身份皆为军团长，论兵力张部大，论守城庞有功，李长官为恐二人失调，特派参谋长徐祖诒随张至临沂，以李长官名义指挥两军。张部抵临沂不久，即与庞部内外夹攻，血战五昼夜，击溃板垣师团之一旅，敌死伤过半。三月十七日晚，敌向沂水退却，庞、张二部紧追不舍，沿途斩获不少，三月二十三日，敌配合援兵开始反攻，我军复退守临沂与敌对峙。敌欲沿胶济路向徐州推进之计划，经庞、张二部奋勇之抵抗大受挫折。

4. 敌图进攻徐州

自三月以来，敌人第十师团，配战车百余辆，向邹县集结与第五师团相互呼应，攻徐州之意图更为明显。军委会获悉此项敌情后，令第二十军团汤恩伯自归德向徐州增援，另自晋南调孙连仲部至徐州归第五战区指挥。三月十四日敌人第十师团进至界河，十五日进攻滕县，我守城之部队为第二十二集团军之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凭城固守，等待汤部援助。汤之主力王仲廉部因行程遥远，未能及时赶到，十七日敌配合猛烈炮火攻陷滕县，守城将领王师长铭章壮烈殉国，所部牺牲殆尽。旋官桥阵地亦告失

陷，我关麟征军先头师之一旅，在沙沟占领阵地拒敌前进。关军后续部队陆续到达，在韩庄沿运河南岸布防，并以王仲廉之八十五军向东转进，占领峄县之高地，另派一一〇师接防运河阵地。及五十二军向峄县东进，包围敌人左侧。三月十七日，敌人第十师团开始进攻峄县、关桥，十八日占领沙沟，一部分占领韩庄，主力攻陷峄县，王仲廉之二十三团团长某君壮烈殉国，全团官兵伤亡惨重。

（四）台儿庄大捷

敌人攻陷峄县后，濑谷旅团沿台（儿庄）、枣（庄）线向台儿庄突进。适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抵达台儿庄东西线占领阵地，奋勇拒敌，第二十军团汤恩伯部也在峄县枣线以东与敌激战对峙。二十四日，蒋委员长抵徐州、台儿庄一带视察，禧奉命随行，事后，委员长令我暂留台儿庄协助李长官宗仁指挥军事。

自三月二十四日至四月三日止，敌人主力逐次加入台儿庄阵地，敌人借飞机、重炮（野炮七十余门）、战车（五十余辆）之支援，向孙连仲部猛烈围攻，曾一度攻入台儿庄，我守军孙部之三十一师（池峰城师）有与台儿庄共存亡之决心，奋勇抵抗，反复肉搏，台儿庄虽被敌占去四分之三，守军屹然未动。敌我激战之间，禧常乘车直到前线代表委员长慰问，听取战情，鼓舞士气。

敌人矶谷师团主力被孙连仲部吸于台儿庄附近，峄县方面仅存一部，汤恩伯军团故能将敌包围。三月二十六日汤军团向峄枣之敌猛攻，歼敌大半，敌复由临城方面增援。军委会乃命令汤军团放弃峄枣之计划，而以主力向台儿庄北侧之敌猛攻，旨在减轻徐州之压力，巩固指挥基地。

三月三十一日，敌在台儿庄之部队已完全陷于包围内，是时临沂之板垣师团及一〇五师团所编之沂州支队，再攻临沂，经我庞（炳勋）张（自忠）两军浴血奋战未能得逞。敌以台儿庄正面万分危急之际，乃将临沂方面之板本旅团沂州支队放弃攻击临沂之计划，星夜转运至爱曲，攻我汤军团之侧背，企图解矾谷之围。汤军团乃迅速以关麟征部抵抗敌之攻击，复以周岩军加入战场，一鼓将该敌击破，仍回师解围攻台儿庄之敌。四月六日晚间，歼灭敌第十师团大部，第五师团及徐州支队一部，残敌万余人向北溃退，我军跟踪追击，获敌战车、重炮及装备甚多。敌退至向城、税郭、枣庄、峄县、九里山一带，负隅固守待援，我军屡攻无效。敌人以溃败之师，犹能立定阵地顽强抵抗，确实难能可贵。旋敌以华北军二师团来援，我军始停止攻击，五月十三日以前，敌军第十、第一〇三、一〇五、一一〇师团各一部及山下兵团、酒井兵团各一部与孙连仲、汤恩伯两军对峙于杨家集、艾山、台儿庄及其西之线。

四月下旬以来，晋、绥、苏、皖各战场之敌，陆续向津浦南北二段转移，援助与汤、孙二军相峙之敌，企图包围徐州。五月上旬，敌一部犯合肥牵制廖磊集团与李品仙集团，更以第二十九师团及井关机械化部队等沿涡河出蒙城；而阜宁、淮阴方面之敌人亦调动第三、第一〇一、一一六等师团各一部，于五月九日下蒙城，十日占永城，直趋归德，欲切断陇海路，更以一部犯徐州，此时蚌埠附近之敌人第一〇二师团、一〇七师团、一一九师团各一部迫近宿县，廖磊部遂向西移转。同时津浦北段，济宁之敌一一〇、一一一师团各部出济宁向南进犯。军委会接获上项敌情，综合全盘情况，知敌将由华北、华中调兵至津浦线

企图包围徐州，决心增强第五战区之战斗力，使之能持久作战，一面为消耗敌人之力量，一面为吸引敌人之主力于徐州，以便武汉有备战之余裕，所以使用于徐州会战之兵力有步兵六十三个师，骑兵一个师及一个旅，炮兵五个团，飞机近五十架。我军之力量比之淞沪战场犹为坚强。军委会更调李汉魂、黄杰、桂永清，俞济时、宋希濂等部至豫东归德、开封河南以东之陇海线上，巩固第五战区之后方，预期与敌作更大之消耗，争取更多之时间，以利整个战局。另派军令部次长林蔚率领参谋团至徐州，一本上述之意志，担任督导联络之责任，特别注意豫李、黄等之各兵团不得调至徐州以西地区，避免参加徐州会战，因为徐州会战是有限战争，李、黄等兵团乃固守后方之用，第五战区仅以现作战之六十三个师与敌周旋。

四月中旬敌对临沂采取攻势，我庞(炳勋)、张(自忠)虽奋勇抵抗，因所部每次激战之后牺牲太多而无法补充，所以战斗力远不如日军，且奉命自晋南调至临沂增援之李仙洲部路经向城时被敌切断，一时不能到达临沂，因此庞、张二部被迫放弃临沂退守郯城、马头镇、陇海一线与九十二军相呼应牵制敌人，阻其加入台儿庄战事，妨碍我主力作战。四月二十日军委会自武汉撤调卢汉之六十军，樊崧甫之四十六军参加台儿庄之役，敌人亦自津浦北段向台儿庄增援，努力反攻与我军相战激烈。

(五)徐州大撤退

四月二十四日，敌攻陷郯城，庞炳勋之第三军团因伤亡过多，调至邳县整补；另由河北调石友三之部队经郯城向临沂挺进，攻扰敌人后方，此外调六十八军刘汝明至徐州作预备队。四月上旬，当敌人第十师团于台儿庄惨败之

后，敌方大本营决定以华北、华中之兵力围攻徐州，欲消灭我第五战区之主力。敌一面阻留我军于徐州地区，一面自华北、华中两地区调集兵力向津浦南北段增援，敌人增加之兵力约有三个师团，向归德、永城一线进攻。敌之第十四师团由鲁西渡黄河向开封以东之陇海线集结，另由华中派遣两个师团向蚌埠、怀远进击，至此敌人夹击徐州之企图至为明显。五月九日蒙城失陷，十二日敌人占领永城，一部向砀山推进，主力攻萧县。津浦北段之敌人第一一〇师于五月十一日进占郓城，策应第一一四师团，由济宁渡运河，十四日占领金乡；同时，台儿庄之敌人亦转移攻势，第五战区司令部为避免与敌人在不利之情况下作战，奉准作战略上之撤退，放弃徐州，以一部兵力占领徐州之外围据点牵制敌军前进，主力向徐州西南撤退。五月下旬第五战区之各部队退结于皖西、豫南，撤退时秩序严整，远较淞沪战场之撤退为佳，考其原因有：

(1) 徐州会战未待败溃即择适合时机先行撤退，故部队相当完整。

(2) 军委会对徐州之撤退有完整的周密的部署，故部队能从容退兵，避免敌机之轰炸。

徐州会战我军与敌周旋数月，并屡传捷报，各地民心士气大为兴奋，武汉居民特举行大游行以示庆祝。

(六)徐州会战之检讨

1. 我军之检讨

(1) 军委会有滞阻敌军主力于徐州之计划。令第五战区采取攻势防御，以得时间之余裕，随即令汤恩伯、孙连仲、张自忠、廖磊、李品仙、庞炳勋等有战斗力量之部队赶运徐州准备会战。此是最高统帅明智之决策，为台儿庄

胜利之基础。

（2）徐州会战前，最高统帅借开封会议逮捕违抗命令、擅自退却之韩复榘，使战时纪律得以树立，士气为之振奋，中央命令因而贯彻于各战区之间，此为台儿庄胜利之基本条件。

（3）各战区调至徐州参战之部队，均能协同一致，在李宗仁长官指挥下奋勇杀敌，战斗精神极为旺盛。

（4）孙连仲部克尽职守，沉着应战，固守台儿庄，尤以池峰城师伤亡过半，仍能占据台儿庄三分之一阵地与敌浴血苦斗，吸引敌之主力，使汤恩伯攻击军团易于奏功。

（5）汤恩伯军团司令用兵适宜，当敌攻击台儿庄之际，迅速抽调进攻峄县而呈胶着状态之兵力，反包围台儿庄之敌人，与孙连仲部相呼应。同时并调关麟征、周岩二部，击破敌人由临沂派来解围台儿庄之沂州支队，于任务完成后，仍回师台儿庄，此可见他用兵灵活、合宜之处。

以上诸点均为台儿庄胜利之要件。

（6）国军因战车与大炮均太少，故每次攻坚难收预期效果。如峄县之敌人凭险固守，汤恩伯军团便久攻不下。

（7）徐州撤退恰合机宜，早则未能达成消耗敌兵力之目的，迟则将复困于敌。国军之完整撤退，未蒙任何重大损失，此为我亲在徐州所目睹之事实。

（8）国军缺少飞机，失却制空权，故每发动攻击时，不能将传统武器步、炮、空联合作战之效果，因而于有形无形间力量大逊于敌人。

（9）此次会战国军之攻、防两方主力计有：孙连仲指挥之三个半师，汤恩伯指挥之七个师与孙震指挥之四个师，共计十四个师强，敌人之兵力用于台儿庄战场者为第

五、第十师团之支队。我军番号虽十余倍于敌人，实力则差远矣。因我军于参加徐州会战之前，多数曾参加上海会战或北方战役，损失重大而未能及时整补，若我军于参加徐州会战时，每师尚有战斗兵三千人，十余师不过三万人左右而已，然而敌人一个师团即有战斗兵二万三千人，且其一师团之火力比我十个师之火力犹大，故我军番号虽多而火力不足，尤其于无制空权情况下，倍感作战艰困。我军虽居于劣势，然而庞炳勋与张自忠，能各以二师之力量(张另有一骑兵旅及一骑兵团)击破敌人进攻临沂之一旅团。孙(连仲)、汤(恩伯)二部亦于台儿庄溃败敌方一师团及一支队，此我军以精神力量胜敌也。

2. 敌军之检讨

(1) 自平汉沦陷、淞沪失守、南京陷落，国军损失重大，民心惶惑，士气消沉。敌人因军事着着胜利，因而骄狂至极。徐州为战略要点，乃敌我必争之地，而敌人仅以矶谷廉介之第十师团由津浦北段南下，华中派遣军以第十、十一、十三等师团各以一部北渡长江，攻滁县、江都指向徐州。另以第五师团攻临沂，此为敌人攻徐州原定计划。第五战区司令部洞悉敌人之阴谋，以于学忠部向蚌埠，廖磊、李品仙部在定远、合肥方面侧击敌人，牵制津浦南段之敌人使之不能北上参加徐州会战。另外，敌之第五师团在临沂被庞炳勋、张自忠击溃，故进攻台儿庄之敌，只剩矶谷廉介一师团。该师团在台儿庄遇孙连仲部之坚强抵抗，汤恩伯之勇敢包围，全师溃败，损失惨重，此敌以一师团对我十师乃轻敌之结果。我军自二十六年七月抗战军兴至二十七年一月，半年期间在华北、华东、华中等地区大小数十战，或败或溃，民心士气极颓丧，幸而台儿庄、临沂二

段大捷，军民之心为之一振，关系抗战前途甚大。检讨八年抗战战役，我军真胜利者不多，而抗战不及半年便有此二次大捷，考其原因，我出哀兵，敌出骄兵，兵法云："二兵相交哀其胜也。"故我能胜敌。是役若敌军待部队集中后方进攻，我军是否能取胜便未可逆料。

(2) 敌人第五师团被击溃后，稍事整理又反攻临沂，第十师团于台儿庄击溃后，退至峄、枣犹能稳定阵势，凭险待援，我军屡攻不下，待敌人援军至，我方更是无能为力。这是敌军实施征兵制度，战斗力坚强，训练有素之故。

(3) 敌人虽两次大败于台儿庄与临沂，伤亡过万，然而甚少被俘，可见其精神教育成功，战斗训练良好。其能征惯战之精神为世界各国陆军首屈一指，可惜为穷兵黩武之军阀所驱使，用于侵略，结果一败涂地。

(七)战场杂记

1. 徐州会战之前，最高统帅鉴于韩复榘自由进退，公然反抗政府命令，以致影响某些战区中央命令不能下达贯彻，为树立战时军纪，特在开封召集军事会议，出席者为第一、五两战区军长以上人员，会议期间乃将韩复榘拿办。

会议之前(二十七年一月间)，委员长由武汉飞开封，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与我等奉命随行。至武汉机场，委员长对我云："最好二人各乘一机。"我了解委员长恐遭遇敌机，故有此深谋远虑，我愿乘机先行。委员长之座机为美龄号，我则坐C46之运输机，当日下午约三、四时抵开封机场上空。

2. 豫省主席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闻委员长将至

开封主持军事会议，特坐镇开封指挥布置。他为了保护委员长，通知防空司令部发放警报，城内外居民闻警报纷纷躲避，路道自然清除。然而事前未通知机场高射炮部队，致闻警而又不知为戒严而发，紧急进入射击状况。待我座机飞临机场上空时，高射炮队以为是敌机临空，纷纷发炮射击，我在机中犹懵然不知，俟飞机徐徐降落，高炮部队见机身涂有我国国徽方停止射击，我下机后，刘峙趋前欢迎，道歉不已，惊惶万状，要求我勿报告委员长。我说："幸而高射炮兵训练不精，不然命中机身矣，若是命中，我不能向委员长报告，既未命中，我无报告之必要。"数十年来，我为遵守信诺，未轻对人言。刘峙为保护委员长，故有此措施，实际上保护之道颇多，为维护政府之信誉，实不可采取此种"举烽火以戏诸侯"之方式。

3．临沂大捷，庞炳勋军团长与张自忠军长功不可没。他们一出身国民三军，一出身国民一军，资望相匹，李宗仁长官因难于决定谁负指挥战场之责，张自忠奉命至临沂赴援时，特派第五战区参谋长徐祖诒(字燕谋，日本陆军大学毕业)随队前往，以李长官之名义指挥，故庞、张两部合作无间，是役之胜利，庞、张固然居大功，而徐参谋长指挥协调之功亦不可没。徐为人精干沉着，我曾见其拟定之作战计划，其战术修养优越，指挥军队迅速，为一不可多得之幕僚长。日后，曾任华中剿匪总司令部之参谋长及副总司令之职。

4．庞、张二部作战有功，均升为军团长，然实力并未扩充，此非政府不为也，实无能为力也。

5．徐州撤退因无空军掩护，为避免敌机之骚扰，战车、骑兵之追击，白日不敢活动，晚间开始行军，但是白

日还是要占领阵地，构筑工事，以防敌人来侵，所以每当晚间行军，部队疲惫不堪。某晚，我骑马与李长官、林蔚文等同行，因过分疲倦，盹睡中自马背坠入麦田中，幸无损伤。记幼时读庄子云："醉者之坠车而不伤者，其神全也。"我亲身为之印证，其言确富有哲理。

6. 台儿庄会战，我常至战地视察，与各军、各师之高级将领联络，并代表武汉大本营蒋委员长面致慰问。当我在台儿庄时，敌我战事非常激烈。敌人第十师团之主力配合战车四、五十辆，重炮十余门，野炮六、七十门，于步、炮、空协同下猛攻台儿庄，占领该地几达四分之三，守将池峰城有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努力支持，敌受创甚重，伤亡过半。某日我至孙连仲总司令部，该部设在台儿庄以南某一村庄中，孙正与池通电话，池报告部队（共三团）全已用罄，请求增兵支援，孙问池尚有直属部队你应当率领参战。孙意要池自己负责，非战至与阵地共存亡不可，池在电话中诺诺遵命。孙指挥部队坚决严肃毫不宽假，部下都有能死之精神，如池峰城受重敌所迫仍然挣扎抵抗，实属居首功。汤恩伯进攻机动，包围迅速，孙连仲部坚强防守，奋勇杀敌，亦皆有功者。

台儿庄大捷之消息传遍国内外，得到国内外舆论一致好评，国内民心士气大为振奋，各地举行祝捷会。武汉行都狂热庆祝，据报载游行人数超过十万以上，并用卡车载李宗仁长官与白崇禧之巨幅像片为先导。实际台儿庄胜利全赖最高统帅之贤明领导，将能战之兵迅速调至战场与敌消耗，以及李长官之能用兵与各军将士之能听命，尤以参谋长徐祖诒运筹帷幄，熟娴兵略，为一不可多得之幕僚长。我于战场中不过备员一名，实不敢贪天之功。

五、武汉会战

(一)武汉会战前之形势

1． 武汉之军事形势

武汉居长江中流为平汉，粤汉两铁路之交会点，乃军事、交通之中心。自京沪、徐州陷落，形势日显重要，据我方之判断，敌人必定进攻武汉，破坏我全国抗战之中心，使军事、运输、联系均感困难，以达成其军事侵略之计划。军委会以当时之情况判断，敌人进攻武汉使用之陆、海、空兵力据估计为陆军十个师团，海军一万吨以下之兵舰约一百艘(万吨以上之兵舰不能驶入武汉)并配有陆战队，空军飞机至少四百架。敌人进攻武汉之方略据判断，主力将循江而上，分进合击，另一部沿大别山北部经商城、罗山、信阳，威胁汉口以北之地，再以一部占领九江，向阳新、大冶进发，攻击武昌之侧背，企图包围武汉，消灭我野战军之主力。

2． 军委会之作战指导方针

以各军之主力分布于武汉外围，巩固武汉之核心。更利用大别山、九宫山、幕阜山、庐山等山脉配置重兵，预筑坚固阵地，及沿长江两岸、鄱阳、大冶等沼泽地带，及田家镇、马垱两岸构筑江防要塞与敌作战略上之持久战，并保持重点于外翼，争取机动。大本营为指导全国作战，命令其他战区亦应保持现有阵地，大规模发动游击战，牵制敌人，以达成消耗战之目的。

3． 军委会对武汉会战颁发之训令及任务

(1) 第五战区对敌人逐次抵抗后，淮北孙连仲兵团应集结在商城预备侧击向西前进之敌人。另淮南兵团集结至

桐城、霍山、六安等地阻止敌人西进，并固守安庆、无为、庐江等地，准备侧击由长江西进之敌人。无论状况如何变化，须固守大别山脉为根据地。韩德勤之第二十四集团军应确保苏北，向津浦路南段打游击战。

（2）武汉卫戍总司令部（当时第五战区尚未成立，武汉外围部队悉归陈诚卫戍总司令指挥）以主力在广济、平靖关一线占领阵地，置重点于武胜关、麻城、广济待机转移攻势，并派一部于信阳、罗田，宿松等要点协助第五战区制敌西进。薛岳部之刘兴军共六师担任江防，重点移至马垱。马垱是时已设有阻塞线，但在鄱阳湖以东尚布置有主力线以滞阻敌人。另万耀煌一军在南浔，夏威之师在阳新、大冶，叶肇一军在湘赣路待命，郭忏、李延年、周岩等共八师担任武汉城防，王陵基等四师在金沙集中，统归军委会直属管辖。

（3）第三战区（皖南）司令长官顾祝同准备江防，于东流、马垱间作充分备战并适当集结兵力阻止敌人登陆，并援助安庆作战。对杭甬、浙赣两铁路及杭徽，京赣二公路附近指挥地方团队、民夫构筑工事，同时于上述交通线集结适当兵力以备击敌。

（4）豫、鄂、皖三省边区总司令汤恩伯于随县、襄樊、南阳之间地带集结，预备侧击由平汉路南下之敌人，协助武汉卫戍司令部作战；为阻止敌人由陇海路南方向西南挺进，另以有力之一部协助第一战区作战，汤部所属第六十八军刘汝明，归第五战区。（以上诸点是军委会对陆军颁发之训令）

（5）海军：应极力准备在马当（自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马当港用水雷沉船完成阻塞线）、湖口、田家镇、葛店等

沿江要塞安放飘雷、定雷阻止敌舰西进。

(6) 空军：以全力集结汉口、南昌机场，昼夜轰炸敌舰及南京、芜湖、安庆一带敌人沿江之机场。

此时，我自德国购到飞机百余架，轻榴弹炮、野炮、高射炮、战车防御炮百余门，亟力训练。于庐山、幕阜山、大别山及武汉附近之山脉构筑阵地，并于沿江要塞积极备战。

(二)武汉会战之经过

1．长江北岸第五战区战事之经过

(1) 李宗仁司令长官因于民初护法之役在湖南作战(时为连长)牙床为流弹所伤，碎牙未曾取出，日后亦未彻底医治，时愈时发。徐州会战昼夜辛苦，以致宿疾复发，退至商城痛苦万分，不能支持，经送武汉南湖疗养院施用手术医治。二十七年七月中旬委员长以为前方不可一时无将，遂令禧代理战区司令长官职，禧于七月十七日在商城城北之岳家祠堂就职。

(2) 敌人第二军自民国二十七年六月上旬由陇海路南移，先后攻陷涡阳、凤台、寿县、正阳关向合肥集中，同时，长江下游敌舰掩护台儿庄旅团沿江向大通、安庆前进、并以强大部队随行。合肥方面之敌人以第六师团向安庆进攻。第五战区以第二十六集团军徐源泉部，第二十一集团军廖磊部及第十九集团军冯治安部与敌激战后退守霍山、六安等地阻敌西进。另以杨森之第二十集团军守安庆，敌以舰队掩护陆战队登陆进逼安庆。不久，敌第六师团陷大观亦指向安庆。杨森部因力量仅有一军与敌抵抗，后退守潜山，敌穷追不舍，经血战四昼夜复退守小池驿、太湖附近拒敌。徐源泉之第二十六集团军由霍山出太湖切敌之后，敌伤亡甚众，被迫向望江、潜山方面退却。第五战区

司令部部署防御工作以杨森部占领望江、太湖之线，徐源泉部占领潜山以西山地，王家牌楼天柱山之线，侧击潜太路西进之敌，并以韦云淞之第三十一军置于太湖附近策应徐源泉部，至此时，战时之重点移至长江南岸，潜山太湖之战况异常沉寂。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于七月十八日以各命令指示各部初步行动：

① 命徐源泉部占领合肥以西之地作持久之战，并戮力阻敌西进，若于紧迫之时向霍山转进与廖磊集团会合。

② 廖磊集团(二十一集团)守备大别山东侧各隘口，勿使敌人窜入并与徐源泉部保持联系，必要时收容徐集团。

③ 孙连仲之第二集团由鄂东之宋埠与豫南之商城转进。

④ 李品仙、于学忠、张自忠各以一部在大别山南麓备战，主力就地速加整训。

(3) 我于十九日在商城召集幕僚会议，拟定确保长江北岸，其要旨如下：

① 分大别山区及南、北麓三区作战。

② 大别山区之部队于山地险要之处，务防守隘口阻敌窜人。

③ 若敌人于山之南、北麓突进，应防守山麓要隘，诱敌于我之有利地形，全力消灭。

(4) 七月二十日起我分别视察右翼孙连仲部整训、士气、与补充之情形。二十八日长官部为易与长江南岸第九战区之友军联络，移至鄂东之宋埠。且宋埠地居大别山之中心，指挥方便。此时，敌情之变化有下列诸点：

① 太湖、潜山受敌攻击甚急，九江、湖口于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先后失守。敌图由长江南北岸攻击武汉

（此李品仙自阴山之报告）

② 合肥失守，徐源泉部退守纳[illegible]、霍山之地区。（此七月二十七日廖磊之报告）

③ 八月四日肖之楚军由江南调至江北归第五战区指挥；刘膺古、何知重向黄冈、蕲水、浠水调动。八月七日，我偕少数幕僚至右翼视察，召集各军将领于浠水开会，拟定本战区作战事宜，十六日发出作战命令。

（5） 作战命令

① 作战区分左、中、右三军团（军队区分）。右翼归李品仙指挥，下辖三十一军（韦云淞）、四十四军（廖磊）、八十四军（覃连芳）、八十六军（何知重）、二十六军（肖之楚）、八十七军（刘膺古缺一师）与五十五军（曹福林）。

中央区由廖磊指挥，下辖第七军（张淦）、八十四军（张义纯）、十军（徐源泉），豫、皖边区之游击队与皖省之团队，廖并兼任皖省主席，为预定留守大别山，故游击队与团队归其指挥。

左翼由孙连仲指挥，下辖三十军（池峰城）、四十二军（冯安邦）、五十一军（于学忠）、五十九军（张自忠）、六十八军（刘汝明）、七十一军（宋希濂）与十七军（冯治安）。

② 战区地点：右翼止于长江北岸（田家镇要塞归武汉卫戍总司令）。

左翼自长岭关之东淮河上游之流城属之，与第一战区衔接。

③ 作战任务：

a． 右翼以大别山南麓为根据地对长江北岸挺进之敌逐次侧击，预期消灭于右翼港湾错杂之地区。

b． 中央军团固守大别山东麓各要口阻敌之窜入，并

于大别山之游击根据地屯粮屯弹，组织民众，建筑工事，以期长期抵抗敌人。

c． 左翼逐渐诱敌西进，并结集兵力于叶家集，河口镇以东地区击破敌人，本战区直辖部队计有刘膺古军（欠一师）与一三八师，控制在浠水、宋埠附近。

（6） 后勤之设施

① 于商城、浠水分设机踏车，各部与长官以电讯联络。

② 右翼军团以长江为运粮主要补给线，沿江公路为补给线。

③ 左翼军团以汉口，信阳间之铁路，以及豫南之公路为主线，商城至汉口线为补给线。

④ 中央军团之补给，以及游击队之粮饷以麻城为基地，再由基地雇用民夫运往大别山区。

（7） 作战经过概要

宋希濂、曹福林二军调入本战区后，部队长曾至浠水长官部请示机宜。八月十八日黄梅，孔垅镇被敌攻陷，长江南岸之瑞昌告急频仍。军委命令本战区努力反攻牵制敌人之进展，本战区奉命，本拟配合炮兵进攻，无奈淫雨霏霏，道路泥泞而各地桥梁多被洪水冲毁，炮兵经八月三十日始能到达。我鉴于此种情况，不待炮兵之行动，遂先下达攻击命令。

① 曹福林、刘膺古两军归右翼军团指挥，该军除攻击孔垅之敌人，并以有力之部队向潜山、太湖进攻。

② 宋希濂部归左翼兵团指挥，孙连仲部极力阻止敌人西进，并集结兵力击退当前之敌至河口镇、叶家集线以东。

③ 中央兵团除警戒大别山东侧之隘口，集结有力之

部队于左右二翼协助进攻。

④ 自八月二十六日起各兵团以小部反击当前之敌，全面总攻击另以命令指示。

八月二十七日各部开始局部反击，潜山、太湖相继克服，该地区之敌人转移阵地，沿江之敌人亦放弃陆路之路线，以长江之小池口等处为基地。另据报敌人三千由合肥，安东前进，并有大部队相随，江南战事日益紧迫。大本营为应付战局，调曹福林重回江南，二十九日六安失守，于学忠部退至杨柳店，独山镇，三十日霍山沦陷，独山吃紧，潜山、太湖得而复失，敌进至黄梅，旋杨柳、独山不守。朱希濂部赶至叶家集布防，不久右翼之英山、苦竹山，突传陷落之消息。

九月一日，大本营指示本战区之右翼兵团固守广济，左翼兵团集有力部队破西进之敌人，并调冯治安部归左翼指挥，一三八师至立煌归廖磊集团。我为了解军情偕少数参谋人员至商城视察。八月三日指挥部曾传令孙连仲、张自忠、于学忠、冯治安等于商城指挥所商定下列策略：固守立煌、叶家集之侧面地，并于叶家集结聚兵力阻挡敌人之进军并机动打击之。是时，天雨不已，江淮水位急升，敌人冒雨攻击叶家集未曾停止。

右翼兵团失黄梅防地退守距广济四十里之既设阵地，当时敌之力量虽仅有一师团及一旅团，仍大胆深入，自八月五日以来敌猛攻广济正面，六日廖磊、张义纯二军向黄梅侧击敌之后方，占领大河镇、双城驿，不意守广济之何知重不待命令于是晚撤退，敌遂占领广济城。因战事告急，曹福林部于七日起，使停止南调，仍归本战区指挥，向曹河推进。曹部官兵因亦是北方子弟，不耐鄂东之湿热，复

以多日行军疲劳不堪，身体抵抗力锐减，染恶性疟疾者几达三分之一，虽勉强部署，每日死亡不少。八月六日午后，敌军向曾部攻击，左翼兵团以第三十军之一旅守固始，敌攻逼城郊，未半日而失守。固始失守影响后方预定工事甚大，各部队长因部队力量日减有积极意图者亦不多。八日广济战况激烈，我以肖之楚部、韦云淞部夹击敌之后方，敌受迫而退，我军正面之压力始为之减弱。

左翼兵团集结兵力急行至叶家集布防增援，以大别山中之富金山为据点与敌激战，杀敌五六千，敌未得逞，敌之攻势为之一挫。此时，八十四军切断广济以东之公路，敌之主力向东南山地撤退，广济尚有顽敌，左翼兵团乘敌受挫之际，全面出击，积极部署，指挥部限其三日内开始，攻击时间由孙连仲总司令自行决定。十日右翼解决广济之残敌，逐次向东扫荡。正当孙总司令准备反攻之际，不幸富金山失守，宋希濂部退至商城、潢川，与张自忠成犄角之势，防范敌人。固始之敌亦有蠢动之意图，而我左翼兵团之攻势因守部退却而不能按计划实行。是时，右翼之敌人增兵反攻，尽量压迫夹击之部队，我原收复之地得而复失，孙连仲指挥之战场沉寂一时。

待潢川告急，刘汝明部归孙连仲指挥。旋江南之马头镇，江北之武穴相继失守，敌逼近商城，商城指挥所被迫撤退。

2. 长江南岸第九战区之战事

(1) 此时期之国军大都集中于武昌，军委会为指挥便利，成立第九战区，由陈诚任司令长官，统辖鄱阳湖以西，江西、湖南全省及鄂南之地，以第一、第二兵团为基干，共计二十七个军担任长江南岸之作战。军委会为适应战事

并扩大第五战区之辖区至豫北，豫东，皖南、北及苏北等地，仍以李宗仁为战区司令长官，以第三第四两兵团为基干，共计二十三个军，担任江北之作战，但武汉与田家镇要塞之城防归第九战区。李于生病期间，战区司令长官仍由崇禧代理。

(2) 第九战区以第一兵团守备九江及鄱阳湖西岸地区，以第二兵团守九江以西地区并沿长江拒敌。自七月中旬敌机猛烈轰炸长江沿岸，扫荡鄱阳湖之布雷，二十三日拂晓，敌在江西湖口以西之姑塘登陆。第一兵团以第八军、六十四军、七十军之力量逐次增加与敌激战。七月二十四日，敌继续在马厂登陆，国军于滨湖、沿江之低地与敌相战三日。因敌以海、陆、空配合作战，形势于我极不利，二十六日，我军遂弃守九江，退至沙河之既设阵地。南浔路方面第九战区之第一兵团利用庐山山脉、南浔路以西之高地占领纵深阵地，利用火力与逆袭，逐次抵抗，由八月二十日起，敌于星子登陆及南浔路之正面敌一〇一、一〇六师团及沿瑞（昌）武（昌）公路进攻之敌二十七师团相战八十余日，予敌重伤。尤以万家岭一仗尸横遍野，破敌四联队，敌一〇一师团伤亡过半退守修江南岸相峙。第九战区之第一兵团与第二兵团利用瑞昌以西幕阜山山脉及沿江要塞占领纵深阵地，利用火力与逆袭与沿瑞（昌）阳（新）公路推进之第九师团及在瑞昌东北港口登陆之台湾旅团攻田家镇之第六师团激战两月，于乌石街、马头镇、田家镇，曾予敌重伤，并在田家镇要塞与敌相战二十余日，杀敌数千，沉敌舰数十艘，阻止敌人向武汉袭击。十月二十五日敌迫近武昌，我军为保存实力退守通城、岳阳。

长江北岸之战事，九月十五日军委会调整部署将田家

镇要塞自第九战区划入第五战区。在此以前(九月九日)敌攻陷广济、武穴，围攻田家镇要塞，我军以第二十六、四十八、八十六等军向敌侧背反攻，策应田家镇要塞之作战，激战旬余，我军局部胜利，颇有斩获。终因敌以陆、海、空配合攻击田家镇，我军于九月二十九日不支失守，本军分退至田家镇以北蕲春、浠水、花水等地逐次抵抗，十月二十四日，敌突破我黄陂阵地，我军主力向平汉路以西地带撤退，一部留大别山游击。

大别山北麓之战事，左翼兵团由九月二日起以第二集团军之第七十一军于富金山、固始、商城一带凭据点与敌血战二周，杀敌五、六千，终因敌人以绝对优势，我军不得不变更在商城与敌决战之计划。九月十六日我军放弃商城，退守商城以南之打船厂、沙涡一带及大别山各隘口，与敌第十三师团、十六师团一部激战月余，杀敌数千。敌于九月十九日陷潢川，越罗山西进，我以第一军布置于信阳以东之地予敌迎头痛击，敌复以第三师团增援鏖战两昼夜，我军退守信阳以东作持久抵抗。敌另以一部绕至信阳以南之柳林及其西侧地区，我遂放弃信阳，以三十一军及十三师守武胜关阻敌南进，第一军向信阳以北转移掩护西(陕西)京(南京)公路。十月下旬敌第三师团推向应山威胁第五战区之后路，此时武汉保卫战已近五月，大小战役数十，伤敌陆军五万以上，击沉敌舰过百，毁敌机百余架，聚集武汉之人员与物资亦得先期西运。军委会见消耗战之目的已达，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下令放弃武汉。我军向修水(赣)、新墙河、沙阳、随县撤退，武汉会战至此告一终结。当会战末期李司令长官病愈归来，崇禧遂解除代理职务重回中央供职。

(三)武汉会战之检讨

1. 二十七年五月下旬徐州失守后，各部突围转进至豫南、鄂北地区，为时仅月余，补充未毕，训练未精，即令参加武汉会战，故番号虽多，然实力不如敌。溯自欧战以来，武器之改进日新月异，国际战争非但要求多兵，而且讲究精兵，故非征兵国家不能从事现代战争。我国之征兵制度，由二十五年至三月方局部实行，因户口未调查清楚，未能普遍实行，大量之兵源全靠招募或摊派兵额补充，而新募之兵，犹未脱民间习气，战时生活、战斗技术、军队知识等皆需从头训练，入营时间既短，即命上战场，是无异驱市人而战。总之，各部队每当与敌激战之后，虽有补充若干未经训练之新兵，然实乏战斗力量可言。第五战区自安庆、合肥失守，继即徐州会战，我国军屡与敌人接触，流血成河，横尸盈野，虽有临沂、台儿庄两战之胜利，然缺乏补充，故每次战役之后，力量丧失过半，此不独本战区之艰苦情况，亦为我八年抗战中各战区几不能克服之苦难。是以八年抗战，若揣以作战常理，实不能与敌相抗，然而国军所恃者精神也，所凭者士气也，其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之奋勇杀敌精神实不能以常理忖之。八年抗战，赖我最高统帅之英明领导与全国军民同仇敌忾之心理，方能赢得最后胜利。

2. 长江秋季阴雨霏霏，沿江地区，湿气甚重，久战疲惫之部队体力衰弱，易受外感，因而疾病丛生，尤以鄂东地区之恶性疟疾为厉。凡被疟虫咬者，体温忽寒忽热，有高达摄氏四十余度者，盖疟虫于体内破坏红血球，致小便便血，轻者不能行动，重者即不支而死。各部中虽多有患此症者，然以曹福林部最为严重，患者几超过全军之三分之一，此类患者即失作战能力，其损耗之大，较与敌激战伤亡

为尤甚，是时军中医药设备缺乏，虽有奎宁丸亦不能大量供应，所以患者历数月不能痊愈。此种痛苦我亦曾亲身体验。

战区长官部自余以下，患此病者亦为数不少。武汉会战开始后之第三个月，我忽感体温无常，初时我尚不以为意，继而体温超过摄氏四十度，几近昏迷状态，虽大量服用奎宁丸，亦毫无效果，所幸平时身体强健，仍勉强指挥。委员长蒋公在汉口闻知，特派参谋次长熊哲民兄偕医师至浠水探视，经服用恶性疟疾之特效药阿司匹林，始日渐痊愈。我见病况好转，即未再服用此特效药，以致成为潜伏性之疟疾，犹毫不知悉。后由武汉撤退至重庆，觉体弱异常且时常咳嗽不止，尤以寒日为严重，经委员长侍从室之朱仰高医师抽血检验，始知为潜伏性之恶性疟疾，初我犹不知，待第二次抽血检验，该细菌已变形，很难察觉，我始知病情严重。经朱医师注射三针六〇六之后，始见断根，至今二十余年，未再罹染此类疾病。

3． 由于上述第一、二两次原因，经台儿庄大战后，伤亡重大之部队，战斗力因补充不及而普遍降低，因而影响各级指挥官积极之意图，右翼军李品仙于潜山、太湖（安徽）、黄梅（湖北）曾截断敌人归路，迫广济之敌军退却，迟滞敌人进攻武汉之行动。左翼军宋希濂以富金山为据点，攻守并用，使敌伤亡五、六千人之多，收局部之胜利。

4． 大会战后，检讨各部之战绩，以为赏罚之标准，其补充装备亦以为标准，藉寓奖惩之意。

5． 武汉保卫战之设施，似仅注意武汉核心，而于其外围之通信、交通颇为疏忽。例如连接豫南公路，仅有宋埠商城可通，聂口大桥亦须利用铁桥通车。路面皆为临时性者，雨后泥泞不堪。至于鄂省，除武汉三镇外，公路路

面永久性者太少，而后我曾亲经襄化公路，仍无路面。而沿江公路(鄂东会战时)港湾交错，多用船渡，因未设桥梁，或为临时性装置，殊欠坚固。且一般通信网既设线太少，常有拥挤之虞。

6. 战区间之兵力调动，因属于统帅部之权衡，但需有深远之谋划。以肖之楚军远在平汉路南端整训，调江南未及一旬，复调回江北。曹福林军由江南调江北(五战区)未及一旬又调江南，中途又折回江北。刘膺古军奉调至本战区，但兵力仅一师，未能参加有力之战斗，如此调动频繁，使部队徒劳往返，疲于奔命。

7. 于偏远地区划分作战地境，不应有互相交错之存在。例如：甲战区某地属乙战区指挥，不但使乙战区指导增援困难，即甲战区之作战指挥亦受极大影响，且使敌人有乘隙抵瑕之虞。以田家镇为例，本战区据当时敌情判断，敌人有转移兵力、进攻田家镇之企图，而田家镇与半壁山相对，原属南岸战区指挥，至九月中旬忽转属本战区。至奉命时，武穴已失守，田家镇北面各点亦多被敌人占领，虽本战区增兵力援田家镇，而因受四望山敌之牵制，迟延至二十六日始进占香山及2126高地，先一日敌已由武穴、松山口突入田家镇，另一部采反封锁，我军急攻不下，田家镇乃失守。查田家镇位于长江北岸，自与本战区休戚相关，倘最初即划归本战区，则本战区之作战计划必包括在内，而赋与右翼兵团保持右翼重要据点之任务，则形势或较有利也。

8. 长官部之位置关系战局颇大，如战区地域过于辽阔，可分设临时指挥所与情报搜集所，俾长官及少数幕僚易知作战情况。长官部位置不宜轻易移动，否则不仅损耗

人力、物力，而撤退时影响后方士气尤大。

(四)战场杂记

1. 湖北位于长江中部，有粤汉、平汉二路贯通其间，有长江、汉水汇聚其中，成为水陆交通之枢纽。武汉三镇更为全国交通之中心，商业汇萃之所在，故武汉三镇经济上之繁荣，自不待言。除三镇外，湖北其他各县市地方建设似少注意，以鄂东而论，公路不仅少，且无永久性之路面，天雨不仅车不能行，即徒步亦难。既有之通信网，未架长途电话线。至于卫生方面，恶性疟疾不只战时妨碍作战，破坏兵士之健康，即平时住在该地之民众，亦难免受其侵害。

2. 在余解除五战区司令长官职务回到武汉后，突患风湿症，腰部酸痛，行动困难，后经武汉疗养院院长米勒(世界四大名医之一)之诊治、打针，住院一周即告痊愈。以前在战场上此病未发生，殆为作战精神压倒病魔，故未感觉。之后回到武汉，精神稍一放松，此病即发作，可见精神力量之重要。

3. 武汉撤退时，我等到委员长乘飞机离武汉后，方乘汽车先到鄂北钟祥与李长官会晤，然后我即由鄂西经沙市、常德拟返长沙。当时我所乘者为德制吉普车，车至十里铺附近，机件突发生故障，我乃下车等待司机修理。不久，周恩来乘汽车随后赶至，他一见是我，随即下车当面相告说："敌人骑兵先头部队已离我等所在地不远！"并坚邀我同车至长沙。当时我考虑再三，机件何时修好，并无把握，乃上车与他同行。沿途时间漫长，周恩来与我相谈颇多，谈话内容从他早年在南开念书，及法国留学经过，以至国共合作、抗战诸问题，听其谈吐，知其常识丰富。是时周

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部长为陈诚，秘书长为贺衷寒)，我曾就共党问题笑对周恩来道："你们(共党)未到我们广西，我很感激!"他回答说："你们广西做法，象民众组织，苦干穷干之精神，都是我们同意的，所以我们用不着去。"

4. 长期抗战必须有稳定之政治军事中心，以便指挥作战，维系全国民心、军心。武汉放弃后，如何健全重庆外围，使重庆行都稳定，蒋委员长考虑再三，决定于桂林增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指挥第三、四、七、九这四个战区的军事，以维护重庆外围。当时委员长征询我出任行营主任，仍兼军训部长与副参谋总长。论才实不敢说，论义则不容辞，乃接受此任务。

六、华北战场与战役

华北战场包括冀、察、绥、晋四省及鲁北与豫北。

就时间上言，中国对日抗战先起于华北战场，而后为上海"八·一三"之役。因淞沪之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皆为余目睹或亲自指挥者，故先加叙述，今再回头补述华北战场诸战役。

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阀强占我东北四省(含热河)，二十一年三月九日并导演成立伪满组织，进占长城，要求华北特殊化，于冀察到处挑衅，更于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袭击芦沟桥，我驻军宋哲元部吉星文团，因守土有责，乃奋起抵抗，全面战争于是乎展开。"七·七"事变之前，我政府仍一再忍让委曲求全，后知敌人得寸进尺乃决心抵抗。战争初起，我政府因准备未臻完善，希望以有限度战争拖延战局，故当时以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主任，以之应付敌人，和缓战争。

（一）平津战斗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北宁路日驻屯军河边旅团（一旅团含步兵三连队、炮兵一连队、战车一队）分布平津路沿线，驻平津中段丰台一股，藉夜间演习为名，袭我芦沟桥驻军。我二十九军宋哲元部下之吉星文团奋勇抵抗，敌未得逞。冀察绥靖主任宋哲元据报敌由天津增援，即一面命所部固守阵地，一面企以外交方式消弭战祸，经派员交涉，双方约定停止射击，各回原驻地，然我军遵约履行，敌军却食言。敌于援队到达又发动攻势，但仍为我军击退。敌乃紧急动员一师团二旅团并航空兵一团，七月下旬，敌又继续动员三师团，合前共计五师团三旅团向平津挺进。敌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于援军未集中之前，对我宣布不扩大事态，并愿意派人调查以地方事件解决，此为其缓兵计。适七月二十五日敌援军到达，即向廊坊我驻军挑衅，并以飞机轰炸之，敌军另一部向北平广安门进袭，为我军阻止。敌提最后通牒要求我撤北平驻军于永定河以西，宋主任一面严词拒绝，并令所部应战，一面请求中央速派大军增援。敌继攻通县，其北平近郊驻军则以一师团三旅团之兵力向我总攻，主力集中南苑，一部分于北苑，更以敌机数十架轮流轰炸。我军奋勇抵抗，极为壮烈，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三十二师师长赵登禹皆于南苑悲壮殉职，北苑也牺牲惨重。宋主任因系匆促应战，且兵力分散，态势于我不利，乃率领所部退至永定河右岸，留天津市长张自忠于北平，代理冀察政务，并指挥刘汝珍之独立第二旅，以和缓敌人攻势。

七月二十九日敌第五师团与海军于拂晓分向天津、大沽攻击，我三十八师代师长李文天与保安队守天津，黄伟岗旅一营守大沽，均奋起抵抗。因敌众我寡，张自忠命向

马厂、杨柳青撤退，津沽乃陷。敌进天津，藉搜索我军残部为名，奸淫掳掠焚杀，纪律极坏。北平方面，冀察代主任张自忠亦不能行使职权，乃于八月四日撤北平退至永定河以西地方。

民国二十六年八月上旬，敌第十师团向独流镇进攻，第二十师团向坨里、良乡进攻，敌第五师团与独立十一旅团向南口进攻，此外关东军派遣三个旅团、另有步兵七连队，由察北向张家口策应，并以伪蒙九个骑兵师于尚义、商都一带阻我骑兵第一军东进。八月初旬，汤恩伯之十三军于居庸关南口，高桂滋之十七军在赤城、延庆、怀来一带，占领纵深阵地以阻止敌人。八月八日，敌开始进攻南口，十三军凭险固守，并以火力逆袭，反复搏斗，迭挫顽敌，双方伤亡惨重。军委会于八月十一日命卫立煌部将第十、八十三、八十五三个师编成第十四集团军，由石家庄附近铁运易县，经平绥山地向南口增援，限十天到达。卫部因永定河渡河迟滞，且通信器材不全，与汤部未取得联络，亦未能阻敌于中途。当时我方虽派孙连仲队伍向良乡、坨里作局部攻势，以牵制敌人，并以另一部出回龙观，以掩护卫部前进。但因渡河迟滞，救援不及。八月十一日，敌第十一旅团攻我南口附近之得胜口，被我军阻止，事后敌以飞机、战车协同步兵攻占我南口车站，继向居庸关突袭，我十三军向敌反击，将敌击退。敌以主力第五师团向我汤部右翼黄老院包围，我抽调石觉一旅，李仙洲一师及增援朱怀冰一师，陈长捷一师各部迎敌，激战猛烈。察北方面，骑兵第一军赵承绶攻占商都、尚义，一四三师且攻进崇礼，进迫张北城下。敌以二混成旅并一机械化旅由张北向张家口反攻，山西阎主任（太原绥靖主任）派傅作义一师

及三旅由大同铁运怀来增援南口之汤军。八月二十一日，永宁城与镇边城为敌突破，汤部奉命由桑干河右岸突围，弃守居庸关向附原转移，刘汝明则由洋河右岸向冀南撤退，傅作义部退至柴沟堡。八月三十日，敌大军支队经赤城向延庆进攻，我十七军高桂滋虽将敌击退，因汤部已退，也只得向桑干河右岸退却，平绥路南口之战役乃告终。

据报我军因突围匆促，为敌所俘之伤兵与落伍军人，除留少数审讯口供外，余均被残害。敌军此种野蛮手段，不仅违背人道主义，且不合国际公法，良可深叹！

(二)平津张家口战斗检讨

1. 我军之检讨

(1) 平津

① 平津战斗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主持，政府延共和缓日军，俾多争取时间为后方准备抗战之用。职斯之故，对敌之侵略挑衅，我方一再容忍对付，不料我愈退让，敌愈强横，终于七月七日爆发芦沟桥事变，引起全面之抗战。

② 敌以优势步炮空联合部队与兵力攻我平津宋哲元部，宋氏不得已令所部奋勇抵抗，故有南苑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之壮烈殉职。驻守芦沟桥之吉星文团长更挫敌攻势两次，表现至为忠勇。

③ 平津战斗我军全处于被动，此为兵家之大忌。宋哲元奉最高统帅之意志，与日方周旋，和缓敌军攻势，为拖延时间，故处处忍让，实有其不得已之苦衷，亦可见其应付之不易。

(2) 张家口

① 汤部凭险抗敌，以火力逆袭保持阵地，使南口战

役有声有色，卫部因渡河迟滞致救援不及，傅部虽赶至增援，但因汤部伤亡重大，要点多失，只得奉命放弃阵地而退。

② 现代战争通信为军中神经中枢，必须灵活应用，方能适合需要。卫部增援限十日到达，固因渡河迟滞，惟通信不灵，未能与友军取得联系，亦为莫大之缺憾。我军平时未注意通信之操作，且工兵器材缺乏，是为作战之两大致命伤。

2. 敌方之检讨

① 敌军训练有素，装备良好，无论战斗、战术、战略各单位皆很健全，是以投之所向，均能达成任务。吾人照实叙述敌我优劣，有时述敌人优点，并非长敌之志气，实欲供后世研究战史者之参考与改进。倘一味自夸，或贬敌，皆非吾人应取之态度。

② 敌军纪律太坏，对民间之奸淫掳掠，例不胜枚举。比如敌进天津，藉口搜索我残余部队，而大肆奸淫掳掠；又如敌于张家口，残杀我伤兵，实有违背人道主义与国际公法。

军委会为统一黄河以北各部之指挥以支援晋察两省之作战，遂于民国二十六年八月设立军委会委员长保定行营，令徐永昌为主任，指挥河北作战，以宋哲元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担任津浦路北段指挥作战，刘峙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担任平汉路北段指挥作战。当时行营曾派卫立煌驰援张家口，因永定河阻隔与通信不灵，致未获效果。平汉、津浦北段虽不断与敌接触，然未发生大战，复因军事需要，军委会令以平汉路北段改为第一战区，委员长自兼司令长官，而以程潜代理，又于九月上旬将津浦路北段划为第六

战区，以冯玉祥、鹿钟麟为正副司令长官。

敌于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十五日于其国内下达总动员令，命寺内寿一为华北方面司令官，指挥第一、二两军，企图对华北进行大规模之军事行动。八月二十一日，孙连仲集团军于良乡、房山、西北高地一带与敌激战数次，因我军缺少重兵器，火力不及敌人，乃不支而退。良乡、房山高地为敌所占后，我军转进至马头镇、琉璃河一线，时敌已下南口，再抽调第五、二十师团主力增援平汉线，企图攻取保定，进窥石家庄，其指挥官为坂垣征四郎，指挥三师团，攻占固安、涿州琉璃河。我第二集团军司令刘峙本拟于保定附近与敌决战，然仅有关麟征之三个师兵力，不愿将其消耗于河北，与敌一番激战后，保定乃陷。

敌占保定后，立即进击石家庄，以打开晋东门户。敌指挥官土肥原率第四、二十师团之一部与河边旅团，沿铁路南下，于九月底攻陷定县与新乐。是时，适晋北告急，除卫立煌部三师奉命驰援晋北外，另调孙连仲、郝梦龄、冯钦哉、刘茂恩等部转用山西，分守娘子关与忻口两要点。而宋哲元部亦调五战区津浦线作战，故平汉线只留商震师抵抗，经敌猛攻后，正定以西至灵寿县于十月上旬陷落。敌又以主力渡滹沱河，进迫石家庄正面，一部由灵寿县向正太路威胁石家庄左翼，另一部由藁城侧击石家庄右翼，使石家庄三面受敌。至十月十日，石家庄乃弃守。同时晋北之敌突破茹越口，陷雁门关，占太原高地，军委会令卫立煌之集团军于十月二日铁运至忻口增援，以巩固山西要地。

（三）津浦路北段战事

自民国二十六年八月以来，华北天气阴雨连绵，河北

诸河流皆泛滥，津浦路与平汉路之间为泛滥之河流所阻碍，通信与交通均感不便。九月下旬，军委会划津浦路北段为第六战区，以冯玉祥为战区司令长官，鹿钟麟副之。任务为于沧县至德县间持久抗敌，待第五战区（黄河以南）增援到达，即转移攻势。敌第十六师团、三十一师团于九月下旬向大城、姚官屯进攻，我军凭既设阵地与河水泛滥之障碍，坚强抵抗，杀敌甚多。后为敌凭藉优势装备与步炮空联合火力，不断轰炸攻击，我军因无制空权，伤亡甚大，于大城、沧县先后陷落后，乃分向沙河桥、南皮撤退。鹿副总司令曾至南皮，督率第五十九、四十九军、四十军与第二十三师于三十日夜半向敌左侧迂回攻击敌人，克复冯家口、代庄等地，颇有斩获，但因通信不良，加以铁路正面部队未能切实协同，且敌情不明，只得运用铁路以东向德县地区撤退。敌第十师团沿津浦路南进攻德县，军委会原命韩复榘派二个师增援德县，因其动作迟缓，救援不及，守德县仅八十一师之一个团，凭城固守，不久即陷。第一集团军宋哲元部沿津浦路以西向临清、大名方面转移，军委会遂裁撤第六战区。敌乘势向南进攻，十一月初旬，连接攻陷惠民、济阳。韩复榘部渐向黄河南岸撤退，并炸毁黄河铁桥，津浦路北段战事乃告终。

第六战区之撤销，主要因为冯玉祥所部不服冯氏之指挥。冯之部下，咸对冯之指挥有所畏惧与表示不信任，或以密电，或经口头，屡向军委会报告，不服冯氏之指挥。上海作战时，冯玉祥原任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副之，后因黄河北岸多冯氏之旧部，倘以冯出面统属，或更能发挥战力，是以何参谋总长与我皆向蒋委员长建议，盼于黄河北岸增辟一战区，以冯氏出任司令长官指挥之。而山东

韩复榘反对划归第六战区冯氏之指挥，故冯氏之指挥仅限津浦路北段。后军委会令韩复榘增援德县，韩动作迟钝，证明西北军对冯不表信任。如此下去，恐有不良后果，军委会乃将第六战区裁撤。冯氏仍回任军委会副委员长职务。

(四)各战斗检讨

1. 我　军

(1) 平汉路北段为我第一战区之作战地域，自平津陷落后，军委会即撤销保定行营，成立第一战区，以程潜代司令长官，集结相当兵力于平汉线。惟河北省地势平坦，无险可守，军委会乃将该战区之主力调赴晋东，以巩固山西，而敌人对此情况不明，尤将主力向冀南推进，企图打击我野战军。结果，敌军至冀南扑空，反使敌在娘子关之一旅团几被我消灭，敌不得已以空投补给，并调冀南部队救援，方始解围。此为敌情不明与用兵之错误。

(2) 津浦路之北段为我第六战区之作战地域，我六战区由沧州至德县沿途抵抗，未形成大规模会战。后六战区撤销，战斗经过亦乏善可陈。其间仅鹿副总司令曾一度夜袭敌军，有多少之收获。

2. 敌　人

平汉路作战，敌因情报不明，故进兵冀南扑空一场。而敌于津浦路亦未有大收获，仅占领平汉、津浦两路北段沿线若干空间，我军实力仍在，正符合我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持久战之最高战略。

七、太原会战

(一)太原会战之经过

山西雄踞华北，形势险要，表里山河，自古为有名之

天然堡垒，亦历代军事必争之地。自平津、张家口失陷后，敌即派兵南下，企图打击我河北野战军，敌另由关东军派遣察哈尔兵团，向晋北前进。我军委会以河北地势平坦，无险可守，预将冀境国军主力调往山西，以巩固此天然要塞。敌军至冀南扑空，乃折回晋东，遂构成太原会战。

敌进攻山西，企图夺取我天然要塞，消除陕甘根据地屏障，进而掠取我西安、汉中，威胁我抗战中心——陪都重庆。敌一度计划以十六师团兵力攻我四川，后因南进，遭受美国反攻之牵制而作罢。敌进攻山西，分由娘子关、平型关、雁门关三路进兵，对太原采取分进合击方略。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共四个混成旅与伪蒙九个骑兵师则由察境向平绥路西段进攻，约于九月上旬发动。我第二战区本拟于大同与之决战，后因大同形势不利，我军准备未周，乃放弃大同，退回内长城。当时军委会曾令十八集团军朱德出平型关，截断敌军联络线，使第二战区作战容易，但朱德未遵令执行此任务。*

我第十七军及七十三师于蔚县（察省）、广灵、灵丘（山西）一带阻止抵抗敌第五师团后，乃与第十三军、第十五军团会合，退守平型关，团城口既设阵地，敌第五师团贸然来攻，我军向其两翼反攻，将敌击退，且予敌打击甚大。后因敌察哈尔派遣兵团一部经阳原攻陷茹越口，我守军旅长梁鉴堂阵亡，敌占繁峙，我平型关守军后路受威胁，乃向五台山代县撤退。

---

*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东北关沟至东河南镇之间伏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日军，一举歼灭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千余人。当日黄昏即向东泡池一带日军展开攻击。由于国民党军未按预定作战计划出击，致使东泡池的日军由团城口突围。

敌第五师团与察哈尔派遣兵团主力于十月上旬向崞县、原平、宁武前进，十月十日卫立煌部集中于忻口附近，会合第二战区各部，区分为三个兵团，以刘茂恩指挥三十三军、十五军、十七军为右翼兵团；王靖国指挥十九军、三十五军、六十一军、第九军为中央兵团；李默庵指挥十四军、八十五军、六十六军、七十一师为左翼兵团，由卫立煌统一指挥，于十月十二日在忻口以北之龙王堂、界河铺、大白水、南岳一线占领阵地。敌第五师团与察哈尔派遣兵团主力于十月十日攻陷崞县、原平，向忻口阵地攻击。我军坚守阵地，迭行反攻，激战至十八日，杀敌近万，我军官兵伤亡甚多，第九军军长郝梦龄与五十四师长刘家麒均壮烈殉职，战况则成为对峙之局。

敌一、二两军于十月十一日攻陷石家庄后，其主力即长驱南进，并以第二十师团之一部向娘子关进攻，以策应第五师团作战。十一日敌攻井陉、砭驴岭，我第十七师奋勇迎击，双方伤亡均重，敌突进苇泽关，被我第二十六军、第三军包围，消灭过半，残敌固守若干据点顽强抵抗，时敌后已为我截断，四面包围，敌以空投补给。惜我军火力不够，持至二十二日牺牲惨重，仍未消灭残敌。平汉路南进之敌，乃抽调二十师团与一〇九师团之一部由冀南折回娘子关，前者加入娘子关正面战斗再与攻势，后者由横口车站向侧鱼镇南进。我第三军与增援之四十一军调动未毕，迎击失利，娘子关侧背暴露，我军退守平定，一〇九师团至昔阳附近又复西进，我军态势不利，各部分离，平定、阳泉相继失守，敌遂进迫太原。

我军第二战区令忻口我军向太原以北青龙桥既设阵地转移，与晋东我军协力掩护太原，并令傅作义部守备太原

城。晋北各部于十一月二日向太原开始移动，因敌机猛炸及机械化部队跟踪追击，八日攻势猛烈，午夜敌一部由北城进城。傅作义见大势已去，乃令守军向西山突围，太原遂陷于敌手。敌一部渡汾河占交城，其主力则沿同蒲路经榆次南进，至太谷、平遥、汾阳一线而止。我军退守子洪镇、韩岭等处，整顿补充，本会战告终。

（二）太原会战之检讨

1. 我 军

（1）山西东有太行山，西南有黄河，东北有长城，中有恒山、五台山、东条山、吕梁山等山脉，蔚为天然堡垒。以言进取，可北向平绥，东出平汉；以言保守，表里山河，四塞以为固，古来兵家在所必争也。我蒋委员长深知山西在抗战中整个战略地位之价值，故当华北战事发动时，即注意及此，故令二战区主力集结晋北，调一战区主力进入晋东，预先集中优势兵力，故能于娘子关、平型关、忻口诸战役，予敌以重创。

（2）太原沦陷时，军委会于武汉开会检讨全盘战略，以为山西乃陕西之屏障，陕西又为四川屏障，保山西所以保陕西，保陕西所以保四川。陪都重庆为抗战军事政治重心，必须确保，方足以号召天下，争取最后之胜利。自太原失守，二战区部队有少数渡黄河到河南者，当时我在武汉检讨二战区军事会议上正式提议，第二战区全体官兵不得因太原失守而退过黄河或其他战区，否则以军法从事。当时我并建议对日抗战我以劣势装备对优势装备之敌，应多采用"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均蒙采纳，并令各部于山西境内以游击战与正规战并用，保障山西根据地。直至抗战胜利为止，山西天然堡垒屹然

不动，此实为我抗战期中一大奇迹，亦即我抗战成败之莫大关键。

(3) 山西境内战役，我将士在阎长官领导下，均能奋勇杀敌，视死如归，故有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麒、旅长梁鉴堂在战场上忠勇殉职，其他为国牺牲之官兵亦为数极众。因有此牺牲精神，故能予敌以重创。此外，各战斗部队奉命留晋者，均能使用正规战与游击战配合，支持八年，直至抗战胜利为止，此实为抗日战争中光荣之一页。

(4) 阎长官利用共党薄一波，组织新编步兵团四十个团，薄暗中与朱德联系，从中煽动，其中三十四个团忽然叛变，*使共党势力为之大增。阎长官生前与我私谈及此，内心殊感痛恨。共党为有主义、有组织之团体，每一党员均受过严格训练，凡利用共党，没有不失败者，此不独二战区为然。

(5) 当太原失守后，于山西境内之国军，精神上深受威胁。军委会严令二战区官长不准退出境外，各部队均需演习打游击战。共党以打游击起家，而国军向未有此经验。自奉军委会命令后，大家即一律学习。当时敌曾向山西游击根据地扫荡多次，我军化整为零，避实就虚，实力依存，直至胜利为止，足见游击战非仅共党得而专美。本人于军训部曾编有《游击战纲要》一书，以为各战区训练游击战之

---

* 抗战爆发后，阎锡山的晋绥军在前线连吃败仗，雁北和绥远大部地区沦于敌手，我八路军开赴山西后，改变了局面。薄一波建议组建新军，阎表示同意，并委托薄负此工作。从1937年开始，在"牺牲同盟会"的基础上，组建青年抗敌决死纵队共约三十四个团四万余人。太原失陷后，阎锡山由对抗日前途悲观动摇到日益反动，极力限制扩大新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9年12月，阎集中军队进攻决死纵队。决死纵队除第三纵队的三个团被阎策动叛变外，余均在我党掌握之下。

教材。

(6) 民国二十六年九、十月间，敌第五师团及关东军察哈尔兵团，分向我平型关、茹越口进攻，军委会曾命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归二战区指挥，并令该部进至平型关外，切断敌后路使二战区作战容易，该集团军并未遵办。当太原战事吃紧时，该集团军不但未与国军一致杀敌，反分布于正太、同蒲两路之两侧地区，扩张地盘，收缴民枪，纯为扩大其实力着想。更有甚于此者，一二五师刘伯承开放东洋关，让敌军一〇八师团深入山西，直迫我后方军事要地——临汾，*使敌由太原沿同蒲路南进之三个师团完成分进合击之战略，我军受害最大。

2. 敌 方

(1) 敌对晋东晋北之用兵，其兵力数量较我为小，且地形险峻，但敌军每战皆取攻势，抗战以来敌在各战区亦均如此，由此足证敌攻击精神之旺盛。

(2) 敌至不得已采防御时，亦多能沉着应战，至死不屈。例如二战区敌以二十师团之一部约一个旅团进入娘子关地区，被我孙连仲集团以优势之兵力包围。虽其粮弹补给均赖空投，该敌尚能坚忍持久，等待援兵到达，而后转移攻势，足见敌战斗技术与精神有相当修养。

(3) 敌军以主力向冀南前进，其中以二十师团一个旅

---

* 太原于1937年11月8日被日军占领后，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1938年3月18日，由晋东进占临汾的日军一〇八师团为支援午城作战，出动步骑兵八百余人，炮兵一个中队由蒲县西援，于井沟、张庄公路两侧，被我115师全部歼灭。至4月，八路军完成了在山西的战略展开，创建了晋察冀边、晋西北、晋冀豫边、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粉碎了日军对各根据地的围攻。

进攻娘子关。敌以为我主力已退河北以南，故进娘子关之旅被我包围，损失很大，几至消灭。我军因炮兵火力不猛，未能将该敌全部解决。敌对我战区主力之调动，全然不知，显见其情报不灵。

（三）战场杂记

1．阎长官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与李烈钧、唐继尧均系同期。毕业后返山西原籍服务，辛亥革命爆发，赞襄共和，遂掌握山西军政大权，直至民国三十八年共军攻陷太原为止，前后达四十年之久，为各省执政最久之一位，故军政令均能统一。

2．太原会战时，防守平型关之五十一军军长李服膺，因作战不力为阎长官交军法议处，当时山西执法分监张培梅为阎之老友，铁面无私，将李置之重典。张氏以王靖国等同样作战不力，呈请阎绳之以法，阎不同意，分监遂自戕以谢国人。

3．阎氏于抗战中，为增强抗战力量，创立“牺牲同盟会”与“公道团”，前者以傅友承为总干事，后者由梁敦厚（化之）主持。共党薄一波也参加组织，当时阎有一老友马镇（号君图，留英，学矿冶，信回教）极力反对其重用薄，阎不从，马因而辞职回晋城。及晋城失守，遂为日军所俘。其后薄一波煽动部队叛变，足见马有先见之明。梁敦厚于三十八年太原为共军攻破后，守城将士以汽油自焚，与城共存亡，壮烈极矣。台北建有五百完人墓即为纪念他们。

4．阎长官为抵抗共、伪，加强内部组织，特成立“民族革命同志会”，又拟运用青红帮力量，组织“民众山”，以便于敌伪区发展力量。阎自任山主，以王靖国、谢濂副之。“民众山”入会严格，山主操生杀大权，此皆为旧式社会组织，

以之抵抗共党，尚嫌不足。

第十五章 第二期作战

一、当时之国际局势

自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武汉会战后，至三十四年八月湘西会战，继之以反攻桂柳，为我第二期抗日作战。其间所采取之战略以消耗战为主，配合以游击战，且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以牵制消耗敌人及策应我敌后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之控制，化敌后方为前方，扩大面之占领，使敌人只能困守点线，打破其全面统治及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政策。在第二期抗战中，并轮流抽调若干部队，切实整训，且派远征军至印度、缅甸，协同盟军作战。

本期内，国际局势诸多变化，其中有利于我者，有不利于我者，关系抗战前途至大，兹略述其梗概如下：

1．美 国

美国于二十七年七月一日公布对日战略物资之禁运。日本战时最缺乏者乃汽油、钢铁等战略物资。二十七年十一月六日，美国根据九国公约，抗议日本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揭发日本侵略东亚之野心。三十年三月，美国宣布使用“对华租借法案”，关系我抗战甚大。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美宣布废止“美日通商航海条约”，予日本经济打击甚大。

日本自实行南进政策后，安南、菲律宾、马来亚、泰国相继失陷。三十二年六月，敌于中途岛反攻，敌军屡次增援，消耗极大。十一月间，美军于瓜达康纳尔登陆，日军战败，太平洋局势为之改观，自此敌由攻势改为守势，

丧失抽调部队之自由，当时日本大本营有由南洋抽调十六个师团回中国本土，由山西、河南、湖北进攻四川之计划，后因其海战失败，此计划遂致搁浅。以上所述，为有利于我国之国际局势。

2．英　国

二十八年九月英国为集中兵力于欧战场，故讨好日本于远东，将滇缅路封锁，使我国交通断绝，军需与民用物资均感缺乏，此为于我抗战不利者。至二十九年十月，英重新开放滇缅路，使我国际交通仍旧恢复。三十年四月，英资助我五千万美元为稳定法币之基金，英国只讲利害，不顾道义，于此前后两种不同措施可见。

3．苏　联

二十七年七月间，苏联发动“张鼓峰事变”，与日军事冲突，日军一个师团战斗失利，乃放弃张鼓峰，被迫停战。苏联发动此次事件纯为试验日本战力，盖因日本之陆军主力以苏联为对象，其一流军队均布置东北之故。苏联于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与德国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协定瓜分波兰，德意日反共协定因而瓦解废弃。二十八年九月中旬，日苏两军在诺门坎发生局部冲突。九月十五日，双方成立诺门坎停战协定。苏联所以不进一步压迫日本，其用意在鼓动日本放胆侵华。三十年四月十三日，苏联侦悉德将攻苏，即与日本订立“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以全力对付德国，使日本安心南进及北进。苏联另一阴谋在使共军乘机发展。二十九年四月，德军席卷西欧，法军战败，日乘机占越北，断我海外交通（经由海防、河内、西贡等海口）。二十九年春季，日与德意缔结三国同盟，用以威胁英美，牵制苏联，陷我于孤立，妄想早结束中日战争。

由以上演变得悉英为讨好日本，封锁滇缅公路，断我国际交通于先，又因日军攻缅，为请我出兵应援，共同抗日，乃重开滇缅路于后，由此足见英国不顾道义，只讲利害。再看苏联，最初制造“张鼓峰事件”以探测日本战力，又逼使日本屈辱订立诺门坎协定，继而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鼓励日本侵华或南进。英苏两国忽与中日为友，忽与中日为敌，纯以本国利害为转移。盟国中真正始终一贯制裁日侵华者为美国，其国策初为经济制裁，禁运战略物资，废除通商条约。自珍珠港为日海军袭击后，美国即正式对日宣战。其后于中途岛激战中予日舰以重创，于苏门答腊、爪哇群岛逐次予日陆海空军以大打击，使太平洋日军由攻势改为守势，兵力损失极大，使日在太平洋丧失抽调军队之自由。美国后用越岛战略，将日本在太平洋之吕宋、琉球各岛先后攻占，最后又以原子弹轰炸长崎、广岛，使日本无条件投降屈服。由以上演变得知，美国在国际上比较有道义，讲是非。

二、敌我兵力之估计

敌方：敌侵华兵力，陆军二十四个师团，另有二十个独立旅团，约合计三十四个师团(二十个独立旅团约等于十个师团)，海空军在外。民国三十年七月下旬，敌军开始南进，占领安南南部，建立其南进基地。敌军中国战场抽调四个师团以为南进之用，故预计敌军在中国兵力仅剩三十个师团，配合陆军航空兵团，海军之第三舰队，总兵力超过百万以上。

我方：除第一至第十战区外，另于敌后组织苏鲁及冀察战区。以军为战略单位，废除军以上之军团、兵团名义，而

师以下之旅也同时废除，俾指挥灵活，以符合“减少大单位，充实小单位”之原则。陆军之步兵师约二一三个师，骑兵十五个师，炮、工、通等特种兵在外。我空军有飞机二百多架。

三、军委会对敌军之战略判断

甲案：实行局部攻势，削弱我反攻能力，储备其兵力，待机南进。敌之国策有北进、南进两种主张，陆军派主张北进，即侵略中国，海军派主张南进，以称霸太平洋。自“七七”抗战以来，主张北进之陆军军阀，占领我平津、京沪、徐州、武汉，著著得势；海军军阀急欲立功，民国三十年四月中旬，日苏订互不侵犯条约，更鼓励其放胆南进。

乙案：敌军增加兵力向四川大举进攻，以威胁我重庆根据地。据我谍报探悉，敌本有抽调十六个师团，由豫、晋、鄂分道入川，打击我抗战根据地之计划。此案若实行，战线绵亘深入四川，道路崎岖险要，需用兵力过多，且后方维持不易。鉴于我抗战以来，国军坚强不屈之意志，终非武力所能征服，敌若用兵于川过多，将妨碍其南进政策，故此案不易实现。敌鉴于我抗战以来军心民心之振奋，作战奋斗牺牲，虽抗战四年，主力仍在，于各战区与之对峙；又敌后游击队之风起云涌，扰袭敌军，化敌后为前方，积小胜为大胜，扩大面之占领，迫使敌人仅占领我重要城市之点及京沪、浙赣、津浦、京汉、陇海、平绥等铁路两旁十公里以内之狭长区域，加以国际形势之演变，于敌日渐不利，故判断敌只能采用甲案，不敢实行乙案。

四、对敌军战略对策

1. 战争指导要领——各战区固守战略要地，若华北

之洛阳、潼关、中条山，华南之长沙、衡阳、昆明，或为战区之心膂，或为战区之咽喉，或为国际交通之中心，必须增加兵力，加强攻势，以期巩固，免为敌所乘。

2． 加强游击兵力，增设冀察、苏鲁两敌后战区，以抗袭敌人，打击共军发展，化敌后为前方，扩大面之占领，粉碎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其他各战区亦应注重游击战术，配合消耗战略，使战力日趋强大，愈战愈强。

3． 加强宣传工作，提高民族意识，加强国家观念，提高士兵待遇，改进兵役法，整肃军政，在经济上谋自力更生。

4． 运用外交，冀获得英美更多援助。

5． 加强谍报工作，以期搜集有价值之军事政治情报。

五、陆军战役概要

1． 第二期作战之初，军事委员会先后于南岳、武功召集军事会议，检讨第一期作战之得失，征询各战区对今后作战之兴革、意见。在会议中，蒋委员长指出第二期作战之特质，应转守为攻，转败为胜；并剀切训示游击战、政治战、宣传战之重要。此外，蒋委员长手订“抗战纲领”四条：①提高士气；②收揽民心；③爱惜物力；④抚养伤病。并指示第二期抗战整军作战及战时教育之重点。

在会议中，宣布撤销重庆、广州、西安三行营，另设桂林、天水两行营，以统一督导南北两战场之作战；设战地政务委员会，直属于军委会，于敌后设分会，以发动民众全面抗战，消灭伪组织，阻止敌之政治文化经济侵略。

2. 二期作战指导——国军采取消耗战略，以持久作战为原则，陆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我敌后游击部队，扰袭敌人，发展总体战、全面战，扩大面之占领，使敌局促于点线。国军并抽调部队轮流整训，准备全面反攻。

六、南昌会战

（一）敌我部署

军委会以第九战区辖区内之南昌为浙赣路交通要点，应予守备。该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令前敌总司令兼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担任南昌方面守备，该集团军以第三十二、七十九、四十九、七十四军担任吴城镇、涂家埠及其以西修江南岸守备；以第三十集团军王陵基总司令所部担任武宁方面守备；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总司令所部担任鄂南、湘北方面守备；第一集团军卢汉所部及七十四军王耀武控制于礼陵、浏阳及长沙为机动部队；湘赣边区游击总指挥樊崧甫于武陵以北山区，向敌后游击。

敌军第十一军司令阿南惟畿以第一〇一、一〇六师团向德安以南地区集中，第六师团主力向箬溪附近集中，第一一六师团一部及海军舰艇数艘向湖口附近集中，企图攻取南昌，截断浙赣路交通。

（二）作战经过

敌陆、海、空军联合部队由水陆两路于三月十七日由鄱阳湖、永修县、张公渡分向吴城镇、涂家埠进攻，由张公渡强渡修江，占领涂家埠、牛行车站，进追南昌，我守军与敌激战，于三月二十七日南昌陷落，敌攻取南昌，战斗终止。

军委会于四月上旬，以各战区部队大体整训完成，即命各战区发动"四月攻势"扰袭敌人，并乘机反攻南昌。以第九战区有力部队进出南浔，切断敌后联络，再行攻取南昌，并令九战区前敌总司令罗卓英统一指挥。罗氏之攻击部署为：

1. 令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等七个师以主力进攻南昌，一部仍于赣江西、抚河以东原阵地保持机动。

2. 第十九集团军主力固守锦江右岸，一部北渡锦江游击，七十四军主力进攻高安，并向牛行、乐安车站挺进，断敌后方。

3. 第一集团军卢汉主力进攻奉新，一部监视安义、靖安。

4. 第三十集团军王陵基主力进攻武宁之敌，一路向修江以北挺进。此外，九战区鄂南湘北部队策应南昌方面之作战，向当面之敌进攻，牵制敌军转用。

四月二十一日，各集团军开始向所负任务行动，先后克复大城、生米、高安等处，且突入牛行车站，敌军主力退守高安东北高地、万寿宫、虬岭高地，我军因火力不足，迄未攻下。我第三十二集团军向南昌攻击前进，且以一部突入南昌城，颇有斩获，因兵力甚少，旋即退出。第二十九军陈安宝加入战斗，于五月五日克复机场、南昌车站，突击南昌城防工事，与敌格斗甚烈，敌凭步兵、炮、空联合火力支援向我反击，我军伤亡甚大，军长陈安宝阵亡，师长刘雨卿负伤。至五月九日，我军奉命停止进攻，反攻南昌战事乃告结束。

（三）南昌会战检讨

1. 敌 军

敌方有优势空军，制空权全操敌手；我军于攻击与防

御缺少空军支援，精神所受威胁尤大，此乃减低战力之原因。此次反攻南昌，炮兵太少，不能攻坚，此亦攻南昌受挫原因。敌陆海空军种与步、炮、工兵种联合作战，均训练有素，故于攻防两方均能表现极大威力。

2. 我 军

(1) 赣北之敌采取攻势作战，我军处于防御地位，处处不利，精神上受威胁更大。

(2) 反攻南昌之役，我缺乏炮、空协助，敌虽突击南昌城防工事而不能将之摧毁，而军长陈安宝阵亡，师长刘雨卿负伤，其余将士伤亡也重，彼均能勇于负责，不能以成败论之。

七、随 枣 会 战

(一)随枣会战概述

军委会于民国二十八年，令各战区发动"四月攻势"消耗敌人，以策应敌后游击部队。敌为巩固武汉外围计，乃于四月下旬，以第三师团、十三师团、十六师团分别集中于汉宜路南段地区。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奉行"四月国军攻势"命令，曾于平汉路南段，由东西两方进攻，四月下旬停止攻势，调整部署。以廖磊任豫、鄂、皖边区游击司令，以大别山之立煌为根据地，担任该三省边区之游击；以第一战区之第六十八军刘汝明监视信阳，江防军司令郭忏任沙市至宜昌一带守备，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任随枣守备；第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任钟祥以北襄河两岸守备；第十一集团军李品仙所部并指挥第二十二集团军孙震任大洪山、塔儿湾一带守备；第二集团军孙连仲任南阳方面守备，以大洪山、

大别山为根据地，配置纵深阵地，采取消耗战略，使敌深入随枣盆地，转移攻势，包围歼灭之。

敌第三师团于四月三十日向应山方面我八十四师攻击，激战终日，我退守塔儿湾。敌屡向塔儿湾进攻，激战数日，敌滥用毒气，我军伤亡重大，遂退守漂水西岸阵地。敌同时向高城、天河我十三军攻击，被我阻止，敌续攻厉山、江家河，形成对峙。

敌第十六、十三师团、骑兵第十旅团于五月一日由钟祥方面攻我守军张自忠部，敌突破我阵地，进犯枣阳、新野、唐河、南阳。同时信阳之敌攻陷桐柏山，三面包围枣阳以东我军，战区乃令守军向北撤退，留置第三十九军刘和鼎部于大洪山；第十三军张轸部于桐柏山；另命襄河两岸之步兵击敌后方；且令第二集团军于西兴集，保安岩向唐河南岸反攻，由各方面夹击敌人。敌被迫后退，伤亡甚多，我军先后克复新野、南阳、唐河、枣阳、桐柏、随县等地，恢复原状，战斗告终。

(二)随枣会战检讨

1. 我　军

(1) 战区在敌发动鄂北攻势之前，即采纵深配备，并以大洪山、桐柏山为根据地，使敌人深入随枣盆地，即由南阳、襄河各方面夹击深入之敌，敌势不支，乃向后退，战区恢复原态势。此在用兵上堪称机动。

(2) 敌向塔儿湾八十四军攻击，据战区报告，敌滥用毒气，当时我在军委会服务，对此深表怀疑，恐系敌使用烟幕弹以减少火力损害之措置。今在台湾，写该战役回忆录时，曾请问当时指挥八十四军，亲临其事之李品仙将军，到底真相如何？李云："当时系根据八十四军军长报告所转

报者，他也认为使用烟幕弹居多，因事后未有证实敌使用毒弹之资料”。抗战期间，有许多战区皆云敌使用毒气，但吾人今日写战事经过，需根据事实。

2. 敌 军

敌因我军追近武汉外围，破坏平汉路南段，乃发动随枣会战，以打击我军，坚固其外围。是役为有限度之攻击。敌占南阳、随、枣、桐柏、大洪后，侧击停止，返回原阵地，敌我双方皆有伤亡。

八、桂南会战

敌大本营决定南进政策后，于民国二十八年二月上旬，令第二十一军攻略海南岛，该军以台湾旅团于海军协力下，登陆海南岛之海口港，占领北部之琼山、文昌、定安等县，又续占该岛南部之榆林港，为南进之海军基地。当时海南岛我无正规部队，保安队司令王毅抵抗不住，乃撤退五指山打游击。同年九月欧战爆发，远东方面，英美无法兼顾，敌即将青岛之第五师团划归第二十一军指挥，与台湾旅团集中海口附近。敌第四舰队与加贺航空母舰亦停留海口水面，企图攻取南宁，以便断绝我越桂国际交通，并借此为海军航空队基地，对我西南空军基地攻击。

(一)双方作战序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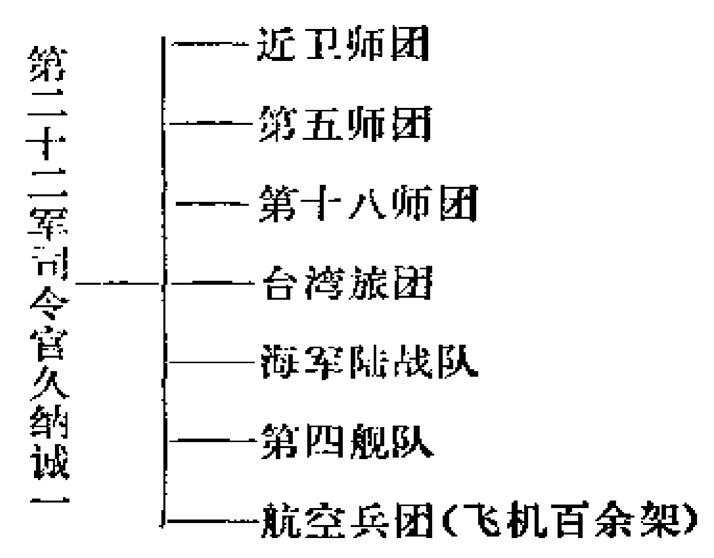
1. 敌军(二十九年一月下旬)

敌军兵力三个半师团，海空军在外共约十万人。

(注：二十八年十一月至二十九年一月，敌攻南宁、昆仑关)

(注：二十八年十一月至二十九年一月，敌攻南宁、昆仑关之指挥官为第五师团师团长今村津，指挥第五师团与

台湾旅团。迨我军反攻昆仑关、南宁之时，驻广东派遣军总司令由安藤利吉改派久纳诚一指挥，又调来第十八师团一旅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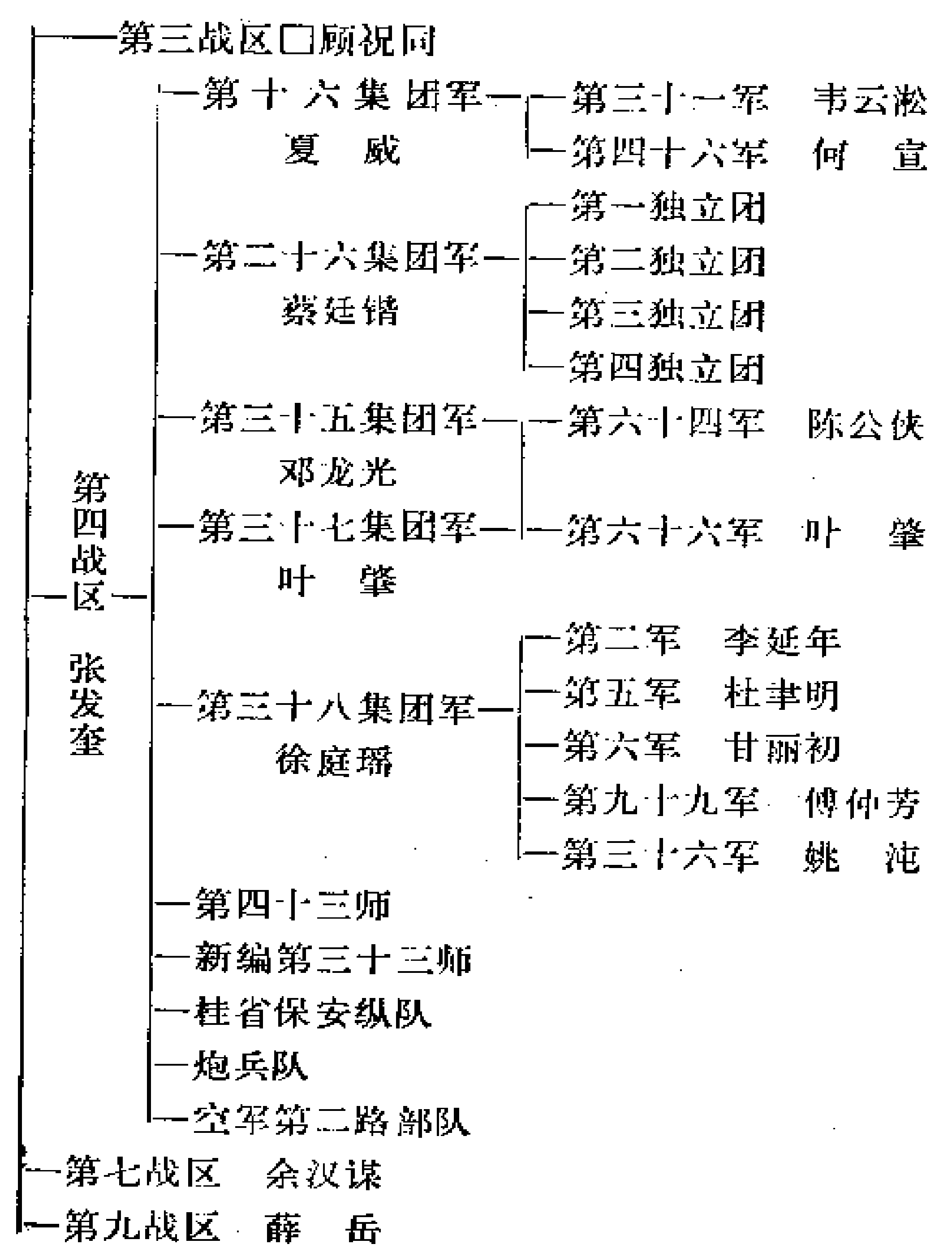


2．我军（二十八年十一月中旬——二十九年二月下旬）（见第177页）

（二）桂南会战之经过

1．敌攻南宁、昆仑关

广西全省与广东南部钦廉一带为第四战区辖区，敌企图攻取南宁以断我桂越国际交通线。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中旬，敌以第五师团与台湾旅团借海空军之掩护，由钦州湾之龙门港登陆，我守军新编第十九师竭力抵抗后，退守板城、上思，敌占领钦县。敌第五师团取道邕钦公路，台湾旅团取道小董、百济往北推进，进迫邕江南岸，我第十六集团军一部与敌隔江对峙，我一三五师、一七〇师、二〇〇师先后赶至南宁附近之老渡口与四塘附近增援。敌强渡邕江，攻占四塘，二十四日敌攻占南宁，我军主力沿邕宾路向八塘、昆仑关撤退，一部沿邕武路退守高峰隘，与敌继续战斗，至十二月一日，高峰隘失陷，四日昆仑关失



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
第三战区□顾祝同
第四战区 张发奎
第十六集团军 夏威
第三十一军 韦云淞
第四十六军 何宣
第二十六集团军 蔡廷锴
第一独立团
第二独立团
第三独立团
第四独立团
第三十五集团军 邓龙光
第六十四军 陈公侠
第三十七集团军 叶肇
第六十六军 叶肇
第三十八集团军 徐庭瑶
第二军 李延年
第五军 杜聿明
第六军 甘丽初
第九十九军 傅仲芳
第三十六军 姚沌
第四十三师
新编第三十三师
桂省保安纵队
炮兵队
空军第二路部队
第七战区 余汉谋
第九战区 薛岳

守，敌改取守势。

2. 国军反攻南宁、昆仑关

桂林行营以收复南宁为目的，令第四战区于昆仑关、高峰隘以北地区占领阵地，牵制当面之敌，掩护我军主力集中。时桂林行营奉军委会之命组织桂林行营指挥所于迁江，由行营主任亲自指挥。

(1) 敌情——敌占领昆仑关、高峰隘后，改取守势，积极加强工事，企图确保邕钦地区，并拟打通邕龙线，切断我国际交通。

(2) 我军攻昆仑关部署——将现有兵力分为：北路军，以第五军、第九军之一师属之；东路军指挥一三一师、一三八师；西路军辖第十六集团军，于十二月十八日开始分向昆仑关正面邕宾路、邕龙线之敌攻击。

(3) 战斗经过——北路军(第五军)因战车、炮兵协同密切，进展迅速，惟邕宁之敌北上增援昆仑关，守兵有死守之状。我以新二十二师、九十二师于邕宾路之五圹、八圹不断截击敌人，断其昆仑关、南宁间交通，但敌不顾牺牲，拼命钻隙向昆仑关增援，虽其后方为我切断，但敌以空运补充兵员、粮弹，负隅顽抗。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午后，我以一五九师加入昆仑关东北高地作战，因我步炮之密切协同，先后占领六〇〇、六五三、四一五及老毛岭、枯桃岭、六城等附近重要高地，得收瞰制之利。当时我亲至炮兵阵地观测，命令以重量较轻之法制卜式山炮与俄制战防炮各一连，搬至敌左侧为我占领之高地，向敌阵地侧射，破坏其铁丝网，再由新二十二师、一五九师向阵地正面冲锋，终将敌阵地占领。当时，我空军在五圹、八圹间上空支援地面部队作战，曾与敌发生空战，我机因性能较差，

遭受相当之损失。是役将敌第五师团之第十二旅团长中村正雄击毙，并伤毙敌军约五千人，造成我抗战以来攻坚之首次胜利。

同时西路军第一纵队一七〇师、一三五师攻高峰隘亦有斩获，第二纵队之第三十一军(欠一师)于邕江南岸将敌第五师团一加强联队堵截伏击，联队伤亡过半，残敌向南宁溃窜。二十九年一月四日，我下昆仑关后，续攻九圹，敌退八圹凭险固守，我军因伤亡过重，急待整补，只得暂停攻击。

3. 敌反攻昆仑关

(1) 敌华南派遣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以第五师团惨遭挫败，南宁危急，乃由广东方面抽调近卫师团与第十八师团一旅团，以海运由钦州湾登陆，增援南宁，合原有兵力共约三个师团，编为第二十二军，以久纳诚一任司令官，准备反攻昆仑关。

(2) 敌增援部队于邕江南岸与我邕钦路部队对战时，我即把握先机，重新调整部署，攻北岸之敌。

我军战斗序列：

邕江北岸：右翼军总指挥甘丽初，辖第六军(欠一团)、第二军；中央军总指挥徐庭瑶，副总指挥李延年，辖第三六军、第九十九军；左翼军总指挥叶肇，辖第六十六军、第一一八师；邕钦路守备部队韦布，辖地方部队、民团暨第六军一个团。

邕江南岸：西路军总司令夏威，副总指挥韦云淞，第一纵队指挥官周祖晃、第二纵队指挥官韦云淞(兼)；东路军总司令蔡廷锴，副总司令邓龙光，第三纵队指挥官邓龙光(兼)，第四纵队指挥官何宣；炮兵队指挥官邵百昌，副指

挥官黄正成，辖卜式山炮一连、野炮二营、重炮一营、俄式三七战防炮一营、高射炮一营。

(3) 恢复南宁目的，应迅速集结兵力，准备以后攻势。

兹将我军部署简述如下：

邕江北岸：

右翼军以主力集结武鸣县属之葛圩、林圩附近，一部位于阮凭岭、石灯向四圹方面警戒，中央军应巩固八圹以北及以西占领线。

左翼军确保占领阵地，主力集结富兴村、五礼村，对敌不断扰袭。第一纵队于邕武路接防后，由扶南渡江归还建制。

邕江南岸：

西路军以十万大山及左江上游为根据地，主力位置于吴村以南，大圹以北，协同东路军扰袭敌人、破坏交通、阻敌增援。东路军以灵山、陆屋为根据地，协同西路军以向大圹、大寺间敌人攻击，破坏交通，阻敌增援。

(4) 战斗经过：

敌第五师团一旅团与第十八师团一旅团，于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五日沿邕宾路向昆仑关阵地正面攻击；近卫师团沿邕永路向宾阳迂回攻击。我军虽奋勇抵抗，奈因装备较劣，未能阻敌前进。同时第三十八集团军在宾阳总部，为敌机炸中，因其为前方各部联络中心，一时通讯中断，无法指挥掌握，呈独立作战状态。至二月二日，宾阳、思陇为敌攻占，我军虽后路被断，而昆仑关以西之第九十九军仍与敌激战一周，伤亡甚大。此外因守昆仑关正面之第二军、三十六军也与敌苦战中，并不因后路断绝而退缩，后因联络中断，补给不上，迫不得已，乃分向隆山、都安、忻城

退却，敌占邹墟，隔清水河与新三十三师对峙。同时，敌进占上林、武鸣。

4．收复南宁

敌自反攻昆仑关得手，占领宾阳、武鸣后，遂将第十八师团调回广州，归还二十一军建制，只以二十一军占领南宁、钦县、防城及其外围据点，增设工事固守。我军以收复南宁为目的，将兵力区分邕江南北两岸布置。三月一日，我南岸西路军夏威所部使用主力于邕钦路以西，以一部分布邕钦路以东，向大圹、吴村方面袭击敌人，并发动民工破路。东路军蔡廷锴所部袭击小董、大寺之敌，并与民团合作，破坏交通，阻敌增援。我东、西二路军于邕钦路以东，不断与敌激战，敌我均有相当伤亡。我西路军、四十六军攻大圹、小董之敌，并切断邕钦路。

邕江北岸于三月十二日始向敌攻击。敌为解除左侧威胁，增派部队向我攻击，近卫师团一个旅团由良庆沿蒲津东进，占永淳、灵山；邕钦路有敌一个联队为基干，附炮骑兵，由牛岗经平吉向我进攻。六月十七日，邕南之敌沿邕龙路再向龙州进犯，当晚占绥渌城，继占明江、龙津。

民国二十九年十月，德国发动欧战，席卷西欧，法军战败。日军于九月间，以第五师团占领越南，近卫师团与台湾旅团仍固守邕宁、钦州，我第四战区以敌后方联络线延长，兵力较前减少，令各路军发动攻势，三十一军团攻龙津，四十六军扫荡明江之敌。龙州之敌于十月二十六日开始向越南撤退，我军收复龙州。第四战区又令第十六集团军扫荡邕钦路东段残敌，并协攻南宁；并令第三十五集团军分由邕宾、邕武两路向南宁之敌猛攻，另一部渡邕江，截断邕钦路，协同第十六集团军攻邕钦路北段之敌。

我各部均奋勇进攻，六十四军占高峰隘、宾阳之三塘，且向南宁挺进，一五五师由永淳渡邕江对敌攻击，时邕江北岸之敌向邕钦路撤退，我三十五集团军于三十日收复南宁。是时敌总兵力约三万多人，我各部继续追击，至十一月十七日，敌四面遭我侧击、尾击，乃沿邕钦路以海空掩护，由海道乘船退却。

（三）柳州会议

我军克复昆仑关，当敌退守南宁时，蒋委员长即于二十九年二月下旬，召集柳州军事会议，检讨此次桂南作战得失，训示今后作战要点：

1. 认识敌军精神，我将领应有深切反省与警惕。所谓敌军精神，当时委员长虽未明白解释，但不外“武士道”与“大和魂”。

2. 说明敌军战术之优点与劣点：

（1） 敌人战术优点：

① 快——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② 硬——固守阵地，坚强不拔。

③ 锐——锥形突进，勇往直前。

④ 密——保守秘密，令人莫测。

（2） 劣　点：

① 小——只能作小兵力之侵扰。

② 短——只能为短时间之战斗。

③ 浅——只能作浅距离之进攻。

④ 虚——无预备兵力，敌后空虚。

3. 指示我军克敌制胜之战术与对策：

（1） 利用敌人弱点制胜之战术——我应以大部队攻击敌之小部队；应以长时间之周旋，打击敌人短时间之攻击；

应以纵深配备，打击敌人浅距离之侵扰；更应以猛力突进，打破敌人空虚之后方。

(2) 攻破敌人优点之战术与对策：

① 应以"稳定"制敌之"快速"。

② 应以"坚韧"克敌之"强硬"。

③ 应以"伏兵"破敌之"锐利"。

④ 应以"严明"对敌之"秘密"。

4. 宣布现阶段之作战要旨——在求各级指挥官全力争取主动，积极进攻。(余从略)

在柳州军事会议后，蒋委员长深以各部队目前一般参谋业务缺点尚多，影响战力至巨，乃于二十九年三月初旬在重庆召集全国各战区参谋长会议，关于参谋长在部队所负之责任与所处之地位，以及个人应有之修养与努力，均有详细指示。而于革命战术之训示，更为明确，其要点如次：

① 在战略上需持久坚韧，在战术上要速战速决。

② 前进攻击应不顾前后左右，须一意挺进，坚决达到目的。各级指挥官应养成锥形突击之素养与胆识。

③ 退却时应不拘泥背进之惯例，而要退至敌人后方。

④ 各级指挥官要具备卓越之指挥能力，以发挥革命军以少胜多的威力，创造光荣的战史。

(四)桂南会战之检讨

1. 敌　军

(1) 敌占领海南岛后，复侵略我粤省及桂南，致我防线辽阔，兵力分散，敌乃乘机以陆海空联合部队于钦州湾之龙门港登陆，以锥形突击战术一往直前，突破我海岸及邕江南岸防线，占领南宁、昆仑关、高峰隘等处。

(2) 敌以第五师团中村正雄之一个旅团固守昆仑关，

我以第五军三个师附装甲兵一个团，与新九十二师，及重野炮各二营，卜式山炮一连，俄式战防炮一营，高射炮三连围攻之，并将敌人后路切断，而敌顽抗，且以空投补给兵员与粮弹，精神相当倔强。

(3) 敌一个旅团附特种部队，兵力共约万人，我军以双倍兵力围攻，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三十一日，历时十四天，残敌方告撤退，可谓顽强之极。

(4) 敌据守昆仑关最高要地，为全阵地所有点。敌除构筑坚强壕沟外，且加设游动铁丝网，使我军围攻敌人阵地时因受敌火压制，伤亡极大。当时每次冲锋正面不宽，少则一营，多则一团，而十几次进攻，每次死伤皆达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因敌火力正强，又设有反斜面阵地，布置铁丝网于阵地前，我军牺牲极大代价后，方将昆仑关攻下。

(5) 敌退出昆仑关后，曾于战地祭奠双方阵亡将士，并留有祭文，其大意为：钦佩两国军队作战之英勇，并祈祷双方阵亡将士之冥福。

(6) 敌再占昆仑关后，第十八师团一个旅团调回广州，第五师团则进兵越南，只留近卫师团与台湾旅团固守南宁外围据点。敌兵力减少一半，备多力分。又因邕钦铁路被我切断，补给困难，且广西民众不与敌合作(敌占领地百姓几乎迁徙一空)，不能就地购粮补给，故其势非退却不可。再者，第五师团既已进占越南，西南桂越国际交通自断，南宁已无占领价值。敌于占领海南岛为根据地后，若先占据越南，即不必多牺牲于南宁，此为其战略上之错误。

2. 我　军

(1) 昆仑关立于邕宾两地间之高岭，为邕宾公路必经

之要隘，地势险绝，为中国战史有名之关塞，故敌我在所必争。

(2) 抗战以来，国军曾于台儿庄、长沙二、三次会战，以攻势防御战略击败敌人。若论攻坚胜利，则以昆仑关之役为首次。

(3) 我以优势步兵附以特种部队围攻昆仑关，配合劣势空军之支援，故能将坚固之敌工事攻下，由此可证，攻坚必须有步炮空之联合方易奏效。

(4) 攻昆仑关战役中，我曾亲临炮兵阵地指挥，当时因敌利用反斜面阵地，及副防御，我军冲锋十次以上未能奏功。我于巡视地形后，见敌阵地左侧有高山，可做为炮兵侧射敌阵地之用，遂令炮兵指挥官邵百昌，将卜式山炮一连，俄式战防炮数门，于拆卸后搬上敌阵地左侧之老毛岭、枯桃林、标高四一五等高地，实行侧射敌之反斜面阵地，并压制敌机枪、山炮，毁其铁丝网，支援我冲锋部队，结果一举成功。

(5) 现代战争是以火力压倒火力，以速度压倒速度，以纵深突破纵深。此次昆仑关战役的胜利，是我重、山、野各炮威力压倒敌火力，毁其副防御，此乃步炮联合攻击阵地奏功之重要关键。

(6) 自抗战以来，敌骑所到省份，当地士绅间有为敌伪利用，组织伪组织，附和敌人者，或为中共威胁，产生共党政权组织者。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敌所占地区，皆有发现上述情况者。惟敌侵略广西以来，当其占领南宁城时，民众除老弱由教堂、医院负责外，其他商人等皆逃避一空。邕钦、邕武两路沿途二、三十华里内之民众皆率相走避，壮丁则纳入民团，有枪拿枪，无枪则提刀荷锄，或与军队

一致破路，或扰袭敌人，皆不愿做顺民受敌利用，此为抗战中最特殊之省份，故敌视桂省民众为最可恶。

(7) 收复南宁，固为四战区官兵奋勇牺牲之战果，而民众破路之功亦不可没。民众于邕钦、邕武两路，不断阻截交通，使敌后方不能补给，现地无法购买，故敌对南宁能战不能守，能守而不能久。其势非退却不可。

(8) 敌既决心南进，占安南南部为根据地，实已截断我国际交通，再占南宁，作用不大，故桂南之战实系多余。

(9) 桂省民众有民团组织，省民自十八岁至四十五岁皆纳入组织。民团分常备队与后备队两种，常备队有武装。以常备言，村街有常备中队，乡镇有大队，县有联队，村街长兼任中队长，乡镇长兼任大队长，联队长则由县民团司令委任。民团司令由县长兼任，有军人身份之副县长则兼任副司令，以辅助县长训练壮丁，指挥全县民团。凡编入民团之壮丁皆接受军事训练，各县有督练官（军人）若干人，专以训练民团，各县私有枪支登记后，转借民团使用，若有不足，则由省府或绥靖公署设法筹给之。桂省分为若干专员区，每一专员兼民团区指挥官，指挥该区各县民团司令。省主席兼任全省民团总指挥，另设有副总指挥，指挥全省民团。当时桂省有一口号为"寓兵于团"。

(10) 桂省民团受过政治、军事训练，致共党政权组织无从产生，故于此次会战中，空室清野，破路工作能彻底而迅速，民众确实与军队合作，对抗战发生相当大之效果。

(11) 昆仑关战斗时，由各处调来几支军队，粮食之补给，后方兵站一时供应不上，乃临时由桂林行营下令上林、宾阳、贵县、永淳等县，以手车、民伕于两天内运送一千担以上的米粮接济，方渡过难关，足证民力之伟大。

（五）战场杂记

（1）本会战中，敌空军仍占优势。当时本人奉命亲自指挥桂南战事，先派设营官将行营指挥所设于红水河北岸迁江附近之石岩内。攻昆仑关时，将指挥所推进至宾阳之白岩村。广西省内多山，几乎无山无洞，且洞大可容十至百、千人，若桂林之七星岩可纳万人以上。石岩内滴水，湿气甚大，我因指挥部队故早晚住于此，迨会战完毕后，风湿病大发，夜不能寝，手不能握拳，非常痛苦，后经医生打针电疗，始渐愈。

（2）敌占南宁、昆仑关初期，我军委会据谍报敌兵力甚多，因命将红水河以南迁宾路，及速破坏，且须毁倒电线杆，行营遂令四战区照办。当时宾阳、上林、迁江三县民众，星夜点起马灯赶工，而公路刚破坏完毕，军委会又来令：前谍报不确，敌仅有一旅团，我应及早修复道路，以攻取南宁。此来又要百姓点灯修路，因我第五军为进攻主力，附有装甲部队，故须先修复道路，以利进兵。

（3）柳州会议时，敌机群二、三十架曾向会议地点轰炸，当时与会人士皆在场，所幸警报灵活，又幸早备有岩洞可资躲避，虽炸弹投中岩洞前后，幸无损伤，由此可知敌人情报之灵敏。

（4）桂南会战参战部队之官兵皆能与民众确实合作，而当时民团部队所在地皆有电话，可资联络，谍报通讯均便，尤其防空情报之灵活，为全国各省之冠，此为当时防空司令黄镇球所推许者。

九、长沙会战

（一）第一次长沙会战

军事委员会设立委员长桂林行营，统一指挥长江以南之第三、四、七、九四个战区，重新部署第二期作战计划，扩大面之作战方略，以作长期消耗战。行营成立不久，即有长沙第一次会战。

1. 敌　情

敌鉴于我主力位于鄂北、湘北五、九、二战区内，逼近武汉，时感威胁，乃先发动随枣会战，以打击我五战区鄂北守备兵力，其次发动南昌会战，以打击九战区右翼兵力，再发动长沙会战，以打击九战区主力，企图消灭五、九战区我军主力。八月下旬，敌第十一军所辖第一〇一、一〇六师团主力、由南昌运输武宁一带，向奉新、靖安附近集中；第三十三师团由咸宁（鄂省）向通城附近集中，第六师团由通城向岳阳以南地区集中，奈良支队（以第十三师团步兵旅为主干）由京山、皂市经武昌铁运南移；上村支队（第三师团步兵旅为主干）由鄂北经汉口入岳阳集中；长江舰队也向岳阳湖面集中。

2. 桂林行营对第九战区之作战指导

第九战区以一部牵制赣北之敌，主力迎击湘北之敌，以新墙河、汨罗河、捞刀河、浏阳河为天然河川障碍，预设数线阵地；于幕阜山附近构筑侧面阵地，长沙构筑复廓阵地、岳麓山以优势炮兵支援长沙，以备逐渐消耗敌人；并力行空室清野，以困敌人，适时转移攻势，向敌包围而攻击歼灭之。

3. 作战经过

赣北方面，我第一集团军、第十九集团军、第三十集团军守备锦江南岸及祥符观、烟港街各附近阵地。九月中旬，敌第一〇一、一〇六师团由靖安、奉新开始向我阵地

攻击，我军采纵深阵地持久抵抗，与敌保持接触于修水、铜鼓以东地区，使敌不能窜入鄂南、湘北夹击我军，保障我主力军右侧安全。由副司令长官罗卓英统一指挥，赣北我军与敌在锦江之线，及高安、奉新、修水、铜鼓各区激战，牵制敌人。

湘北方面，我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指挥第二十军、第七十九军及湘、鄂、赣边区挺进军，在幕阜山附近占侧面阵地，以备侧击南下之敌。第十五集团军关麟徵及第七十九军守备新墙河阵地。第七十军及第九十五师守备汨罗江与湘阴以北沿江岸阵地，第四军主力推进浏阳河南岸之枨市，策应作战。以第五十九师潜伏长沙及东南地区，突击南犯之敌；第七十三军及一九五师于福临铺、桥头驿以北地区潜伏，第十一师占岳麓山。

二十八年九月下旬，鄂南敌第三十三师团及第十三师团之一部攻占麦市、平江；第六师团及第三师团之一部，海军陆战队舰艇百余艘及航空兵团，陆海空军联合由鄂南向新墙河口、汨罗江口至洞庭湖面，水陆进攻。敌渡新墙河，汨罗江续向南犯，进至金井、上杉市、青山市、桥头驿各地附近，战区乃下令反攻，杨森集团军沿汨罗江两岸向长寿街、平江之敌截击，其他预伏福临铺、青山市之各地，伏兵并起，袭击敌人。敌见我袋形阵地，知难而退，不敢深入。我军见敌退却，乃全线追击，于十月八日进到新墙河。敌由优势空军掩护，行有计划之退却，未受多大损失。本会战告终，考日军在中国作战之记录只承认有计划退却，不承认战败。这是事实，然我军精神上得到极大的鼓励。

4．长沙会战检讨

敌　军：

(1) 敌第十一军主力以长沙为目标，由新墙河南下，其重点置于粤汉路方面，以一部迂回湘东山岳地带，采分进合击战法。粤汉路两侧，一为洞庭湖沼地带，新龄、汨罗、浏阳三大河流流贯其间；为湘东山岳地带，与江西毗邻，有幕阜、九岭、万洋诸山横亘其间。敌由此深入我既设袋形阵地，进至距长沙二十里地带，遭我伏兵四出袭击，不敢恋战，乃知难而退。否则，敌愈深入愈陷泥潭，将遭受更大损失，足见战略之部署胜于战术多矣。

(2) 敌军作战指导，未能详审战场一般地形，统制各纵队行动，以致于左侧之迂回需经百公里以上之山岳地带，始能到达浏阳河附近，未能适时与主力配合，我军乘其弱点，四出袭击，迫使敌人撤退。

(3) 敌颇有勇往迈进，向目标进攻之冒险精神，恃其装备之优势向前突击，惟其主战场两侧之威胁，尤其左侧之威胁并未排除，而竟冒险深入，犯过于轻敌之病。幸其知难而退，可算机敏。

(4) 敌至长沙附近，知进入我袋形阵地之不利，毅然全师而退；其退却时，准备充分，部队掌握确实，迅速脱离战场，此为指挥官者所当重视。惟敌之退却得力于优势空军之掩护，收获最大。

我　军：

(1) 我战略指导能主动自由，正面之阻击与侧面之截击能配合适宜。捕捉敌方过失，能主动反攻，故得到胜利。

(2) 各方面指挥官均能把握战机，乘敌分离之际，予以各个攻击。

(3) 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适宜。当我正面部队节节抵抗，诱敌深入之际，伏击部队能乘机猛进，而留滞敌后之

挺进队亦能袭击敌后，以资策应，此足以困扰敌人，使敌人军心动摇，不战而退。

(4) 我军装备太差，未能于追击战时予敌包围歼灭及行使战场外之追击，使敌整然撤退，未免有美中不足之感。敌于攻击中忽然退却，暴露其战斗精神之弱点，在心理战上，我已获得一胜。

(5) 中国兵家有“坚壁清野”之军语，意即防者有铜墙铁壁之坚固，搬清野外之粮秣物品，免资敌用。桂林行营指挥长沙之战有“空室清野”之话，命将敌必经之路两旁二十华里左右之民间畜牲、粮食，以及一切食品搬运一空，即磨粉舂米之工具也一无遗留。“空室清野”经济意义多，“坚壁清野”则军事经济兼而有之。民国三十四年于桂北龙虎关截击共军西退，曾用此法取得了使敌损失七千之胜利。

(6) 第九战区在湘北之作战，凡敌军可利用之道路，破坏最为彻底，使敌军战车、汽车、炮车均不能通过，敌所使用者仅马拖山炮。当时我野炮、重炮置于衡阳，至会战结束时，法国军事顾问倍尔颜中将至前方视察，返回衡阳，见野炮、重炮弃置不用，甚表惊异，当面他问我理由，我说：“敌重炮、野炮多我十倍以上，我若不破坏道路，敌重兵器即可长驱南下，我若以一对十，损害殊大。今破坏铁路后，双方仅能使用山炮，我山炮虽不及敌多，但杀伤力少，损害即可减轻。”他听完，对破坏道路甚感兴趣，又告他：“法国为近代装备之国家，战车、汽车多，此非有良好道路不可。我以劣势之装备对优势装备之敌，不得已使用破路、清野方法，然于欧洲战场绝不适用此法。”他颇以为然，且记于日记中。

(7) 本会战结束，蒋委员长召集军事会议于南岳，会

中向长沙以南第三、四、七、九各战区司令长官及各省省主席训示，其大意为："以敌此次长沙会战士气之低落，战略攻势之顿挫，再加美国废除美日航海通商条约，予日本经济之打击，德苏订互不侵犯条约，肆意瓜分波兰，德日反共协定为之瓦解。其后德攻波兰，欧战随之爆发，凡此种种国际演变，均有利于我抗战。"续勉三军今后应改变战略方针，反守为攻，转败为胜，对于军政尤应密切配合，积极准备，迅速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与国军一致行动。敌进攻时，民众采"坚壁清野"以困扰敌人。敌向我深入，如何展开游击、牵制敌人，敌停止时，如何袭扰敌人。凡此种种，军民应密切配合，展开行动。

以后各战役均能依此训示实施，故奠定第二、三次长沙会战之胜利，维护重庆首都及西南广大政权之安全，直至抗战胜利为止。

5. 第一次长沙会战战场杂记

(1) 会战前，我曾至第九战区岳麓山附近视察驻军战斗演习，承薛长官伯陵招待住于岳麓山新建招待所。时为冬天，天气甚冷，住房内，以火盆盛木炭升火取暖。晚就寝时，我方回房休息，但见火盆面上尽是白灰掩盖着，门窗关闭，方上床睡觉。当天因演习之故，身体疲困而成酣睡。直至午夜二点左右，因小便下床，忽然头晕而跌倒地，半晌起身不得，此时心中明白因房中氧气被炭气吸收为氧化碳，因身体缺少氧气，故不能支持。此时急想将房门打开，但力不从心，试起几次皆告失败。只得奋力爬至房门口，以手勉强打开门栓，门开后，即将头倚靠门槛上呼吸外面空气，约过一、二十分钟，情况好转，即可站起。遂叫勤务兵将盆移出，又打开窗户，直睡至天亮。此次若非

小便起床，恐怕生命早休，由此得一教训，凡事不可疏忽。

我平生有一习惯，无论天气多冷，皆不烧火就寝。抗战期间，我到西北兰州，朱一民是战区司令长官，谷正伦（纪常）为甘肃省主席，招待我睡炕床，床下升火，我叫熄火才能入睡。有一次我与胡宗南由西安乘车到兰州，至半途华家岭地方，因天雨路坏不能继续前进，宿当地一地主家，因床下烧火，一夜皆不能成眠。

（2） 演习完毕，顺观赏岳麓山风景。岳麓山位于长沙对岸，不仅风景美丽，为古迹所在地，且形势险要，为军事之重地，是最好之炮兵阵地，可用以支援长沙。就军事上言，守长沙，必守岳麓山。山上又有革命历史古迹——黄兴（克强）、蔡锷（松坡）二位先生之墓。黄兴辅助国父推倒满清，创造共和，蔡松坡于方南揭护国之旗，推倒袁世凯帝制，再造共和。二位先生革命事业足可垂诸千秋万世，故其墓园皆有当代名人许多宝贵之题词与挽联，可谓美不胜收。其中最哀艳令人注目者当属名妓小凤仙挽蔡松坡联，联云：“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岂知忧患余生，萍水相逢若一梦；数年北地粉脂，自伤零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也千秋。”英雄美人不仅风传当代，且留芳百世。

（二）第二次长沙会战

1． 会战前国内外形势

民国三十年元月上旬，德于进攻波兰后，继攻苏联，德苏大战遂爆发。根据日人判断，德攻苏，战争必将延长，乃放弃其攻苏政策（日关东军原对付苏联），安心实行南进，以争夺太平洋霸权。七月下旬，日军进占越南南部，为其南进根据地，且对我各战区加强攻势，轰炸我后方都市、工厂，并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企图消灭国军实力，使我

不能反攻，以免妨碍其南进政策。

2. 敌军部署

民国三十年八月中旬以来，敌抽调鄂北之第三、四两师团与第十三师团一联队，独立第十旅团一部，及赣北之第三十三师团一部，独立第十四旅团一部，先后向临湘、岳阳集中，会同守备鄂北之第六师团，鄂南之第四十师团，及兵舰二十艘，汽艇二百余艘，配合航空兵团，总兵力约十二万多人，由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畿指挥向长沙作第二次进犯。

3. 我军部署

第九战区本第一次作战部署要领，以主力分布新墙河以南，至浏阳、捞刀河地区，凭既设阵地，阻止抵抗，诱敌深入，并适时由平江、浏阳、株洲等地区向敌转移攻势，包围而歼灭之

军委会令第三、五、六战区同时发动攻势，牵制当面之敌，使九战区作战容易。赣北方面，第十九集团军守备梁家渡；靖安方面，第三十集团军守备武宁、九宫山一带湘北方面，第二十七集团军守备杨苦林、通城等地；第九十九军守归义、营田、湘阴；第三十七军守长乐街、瓮江；第二十六军集结浏阳、金井一带；第十军集结衡山；第九军守长沙。

4. 作战经过

敌军十一军之第六师团，有一旅于三十年九月十七日为掩护其主力之集中与展开，由忠坊、西塘向大云山阵地攻击，其主力则分由港口、潼溪市向新墙河强渡，经我第四军、第二十军、第五十八军于杨林街、汨罗江北岸猛烈截击后，敌转至汨罗江岸。三十日，敌由黄棠、浯口、长

乐、新市、归义等处分路强渡，经我守军第三十七军及增援之第十军、二十六军奋力阻击，敌消耗甚大。后敌强渡汨罗河，且以一部经瓮江迂回我右翼向金井前进，同时正面之敌向福临铺、三姐桥主阵地猛攻，我诱敌深入，经过逐次抵抗后，敌向捞刀、浏阳河地区预设决战地带转移。至二十六日晨，敌右翼出长沙街迂回东南，另一部迂回长沙东面，主力向长沙猛攻。敌便衣队一部窜入长沙市，另一部快速部队则向株洲流窜，且以伞兵降落第一线后方扰乱，均经我军先后歼灭。同时我调集第四军、第二十军、第五十八军、第七十二军、第二十六军、第七十四军、第三十七军、第十军、新编第二军、第七十九军，共十个军，先后赶至指定地区，将敌四面包围，双方伤亡很重。敌在平江方面后路为第四军、五十八军截断，补给困难，势难持久，同时我第三、五、六各战区，各将当面之敌牵制，使其不能转用。敌于九月三十日开始向北突围退却，被我军于汨罗河以南、捞刀河以北分段截击、侧击、尾击，伤亡很大，我虏获敌步枪一千三百四十七支、机枪五十八挺、山炮六门、步炮九门、骡马八百七十一匹，击落敌机三架，毁汽艇七艘，其他军用品不计其数。敌退向鄂南原防，会战告终。

（三）第三次长沙会战

1． 会战前国内外形势

敌大本营实行南进政策后，于三十年六月上旬派兵占领海南岛、安南南部。十二月八日，日奇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抗日战争遂成为世界战事之一部分，国军单独抗战四年，至此遂进而与盟军并肩作战。当时我战略以争取盟军共同胜利为目的，故令第四战区向港九增援，

并派远征军增援缅甸，以打通滇缅公路、中印公路，争取美援。同时令各战区发动攻势，牵制当面之敌，声援盟军在太平洋之作战。敌军第十一军为牵制我军增援港九及缅甸，遂再度侵犯长沙，形成第三次长沙会战。

双方兵力：敌军兵力为陆军第三、六、三十四、四十等四个师团，与独立第九、十四旅团，加上炮工特种兵及海军，共五个半师团，总兵力与前次约略相等。我军兵力共约四十个师，十八万人（特种兵在外）。敌指挥官仍为阿南惟畿，我军为薛岳与罗卓英、杨森、王陵基三副司令长官。战斗序列与前大致相同。

2． 敌军作战部署

第六师团集中新墙，第四十师团集中簰口，第三师团集中龙湾，于十二月中旬开始活动。敌军一部于赣北发动攻势，以牵制我军，其主力则强渡新墙、汨罗诸河，沿平江通长沙大道，经金井、福临铺向捞刀河直迫长沙。敌第三师团由长沙东南，第六师团由长沙东北，围攻长沙。敌并以其优势空军支援陆军，猛攻长沙，且突进长沙左家塘、军储库、林子冲、长沙岭等处。敌因连日猛攻长沙，弹药消耗太大，至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三日，敌开始以空投补给弹药，后方补给线被我截断且尸横遍地，攻势顿挫，遂于一月四日决心退却。

敌此次退却部署，以第四十师团主力由金井向林华山接应退却之部队，独立第九旅向麻林市，外援支队由岳阳向界头市三部接应，第三、六两师团由长沙附近经麻林市始向新墙、汨罗逐段退却，至一月十五日，敌退至新墙河以北。

3． 我军作战部署

第九战区第三次会战与第二次大略相同，以第十九集团军、第三十集团军守备赣北，牵制敌人；湘北方面，以第二十七集团军分布于新墙、汨罗河上游紧要地区；以第三十七军守汨罗江沿河，长乐街；新市等处，第九十九军警戒归义、营田、湘阴一带；第二十六军控制浏阳附近；第十军守备长沙。

第九战区秉第二次长沙会战要领，于新墙河节节抵抗，逐次消耗敌人，诱敌深入捞刀、浏阳河既设阵地。敌第三、六师团围攻长沙，屯兵坚城，攻击不下，虽有少数部队攻进长沙若干据点，然均被消灭，仅于白沙岭有少数之敌仍存在。敌以航空兵团支援陆军攻城，步、炮、空联合进攻长沙，我以第十军、第七十三军之第七十七师死守长沙，七十三军主力及炮兵第一旅第四、五、六炮兵团固守岳麓山，支援长沙，尤其重炮发挥威力，压制敌炮兵，增强长沙守备士气。一月三日，敌仍猛攻，但见其使用空投，知其粮弹欠缺，后敌攻势顿挫，遂决心退却。敌退，我分途追击截击。此次追击部署，较上次周密，罗副长官卓英，由赣北调来任南方追击军总司令，指挥所部由南向北追击；杨森为北方堵击军总司令，指挥所部（二十军、五十八军）由北向南堵截；王陵基为东方截击军总司令，指挥三十七军、七十八军于枫林港以北、长乐街以南地区自东向西截击；傅仲芳（九十九军）为西方截击军总司令，指挥所部于石子铺以北、新市以南地区，自西向东截击。敌军经我各方追击、截击，伤亡很大，幸赖其优势装备与空军，否则伤亡将更重。据战史记载，此次会战伤毙敌军万人以上，联队长四员，俘敌三百六十名，步枪一千一百三十八支，机枪一百五十五挺，炮十一门，手枪二十六支，掷弹筒二十具，

及其他军品甚多。结果敌退原阵地，会战告终。

(四)第二、三次长沙会战检讨

第二、三次长沙会战，关于敌情、地形、敌我双方兵力、敌我攻守方略、相同者甚多，故将两次总合检讨。

1. 敌 方

(1) 二、三次长沙会战，敌方每次总兵力十二万人左右，装备相同。

(2) 用兵方略，以一部牵制赣北我军，以主力强渡新墙河、汨罗河，沿平江，长沙大道直迫长沙。第二次会战稍有不同，敌曾以伞兵降落第一线后方，企图扰乱，结果被我歼灭，未收实效。

(3) 二、三次长沙会战，敌军劳师远袭，屯兵坚城，进入我捞刀河、浏阳河地区之袋形阵地，被我反包围，平江方面后路为我完全截断，补给困难。第三次会战，敌攻城部队曾以空投补给，因兵力过大，无济于事。二、三次长沙会战，敌主力遭我包围，分段截击、侧击、追击、伤亡极大，两次均遭同样失败。

(4) 二、三次会战，敌军兵力均同为十二万人，我军皆在十八万人左右，数量上，我稍优于敌。敌因劳师远攻，兵力有限，不能排除其左侧伏兵之威胁。敌左翼为湘赣交界地，修水、铜鼓一带皆崎岖山地，且面积很大，其侧面要地皆有我伏兵，无法排除，又不能保护此纵长交通线，故敌二、三两次皆受我侧击，后方均为我截断，因而补给不上。敌攻坚不下，遭我反包围，其势非退却不可，中国古时兵法有云："倍则分之，五则攻之，十则围之。"今敌使用兵力较我为少，而距其鄂南基地又辽远，故"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敌违背此原则，故两次会战均告失败。

(5) 假令敌增加三个师团(合约九个师团)，于左侧位置，仍由平江朝长沙前进，一面前进，一面修路，而以野炮、重炮、战车跟进，稳扎稳打，不求速效，步、炮、空联合攻击长沙城，或较为有效。二、三次会战，敌战车、野炮因道路被破坏不能前来，攻城利器无用武之地，仅以山炮攻城，破坏力不大，故长沙仍屹然不动，敌攻城部队遭我内外夹击，故两次皆败北。

2. 我 军

(1) 二、三次长沙会战，其战场布置及作战要领，均依第一次长沙会战蓝本，并无多大修改。

(2) 作战部署：以一部于赣北牵制敌人，掩护主力右侧背，以主力位置于湘北之新墙河以南捞刀河以北；于新墙河、汨罗河、捞刀河、浏阳河布置数线阵地，以守军固守长沙为阵地核心，岳麓山居高临下，俯瞰长沙，为良好炮兵阵地，水陆洲为连接中心，于长沙城构筑复廓阵地，捞刀河、浏阳河一带地区构筑袋形阵地，以备与敌决战。

(3) 破路工作，两次会战均相当彻底，使敌战车、牵引车、野炮、重炮均不能通行，敌军只能以山炮攻城，破坏力不大，且被我岳麓山重炮压制，敌攻城不能奏效，其原因在此。

(4) "空室清野"使敌不能沿途取得粮秣，其人马均需携带粮秣，而携带工具仅有马匹与民伕，数量有限。查第一次长沙会战，由民国二十八年九月十八日，敌主力渡新墙河进攻起，至十月一日敌退却止，为期共十三天(敌未攻城，知难而退)。第二次长沙会战，敌主力于三十年九月十七日渡新墙河，至九月三十日退却，共计十四天。第三次长沙会战，由三十年十二月十九日敌主力渡新墙河起，至三十一年一月四日退却止，共十七天。总合三次长沙会战，敌

主力开战起至退却止，平均日数共约半个月，敌之携带粮弹已成缺乏，再加后路断绝，不能补给，更因“空室清野”就地无法取得补给，而空投有限，故其势非退却不可。我乘敌退却，军心慌乱之际，四面包围追击、截击。第一次长沙会战，敌由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第二、三次则改由阿南惟畿领兵，冈村知己知彼，知难而退，保全了实力；而阿南则损兵折将，比冈村稍逊一筹。

（5）二、三次长沙会战，守备长沙之官兵有坚定之决心。第三次会战，岳麓山以德制十五榴重炮支援，且压制敌山炮，此亦制胜原因之一。二、三次长沙会战，战果辉煌；第一次长沙会战，则精神致胜，此均为薛长官指挥若定，与罗、杨、王三副长官及其他官兵精诚团结，互助合作之功。

3． 战场杂记

1． 第一次长沙会战，冈村至距长沙二十华里左右，警觉而退，当时我军宣传长沙大捷，而敌方则解释为战略退却。平心而论，敌兵战场上虽未失败，而心战上则不可不承认失败。今在台与日本教官谈及此事，均赞成此说法。

2． 第二、三次长沙会战，虏获许多战利品，此固由第九战区全体官兵奋斗之结果，而破路“空室清野”，得力于湘省民众合作，故能彻底破路，使敌各种车辆、粮秣不能入湘继续补给，其势非退却不可。此为民众莫大之功劳。

十、抗战期间全面攻势中之冬季攻势

（一）冬季攻势之概要

抗战八年，国军发动之全面攻势有四次，即民国二十八年的四月、七月秋季与冬季攻势，目的在发挥消耗战略

作用，以消耗敌人力量。其中以冬季攻势最称规模，故特提出加以概述。

1．敌　情

敌军于本年度起改变编制，以前一师团为二旅团，一旅团为二联队，特种兵在外。自民国二十八年起，敌之陆军每一师团改为三联队制，旅团步兵二联队改为五大队制，总兵力约三十个师团，改编后增加八旅团，其训练与装备亦皆有变动。

2．我　军

二十八年冬季攻势之时，我国军业已整训完成，各战区战略较前增强，乃策定大规模冬季攻势，包括第一战区，至第十战区以及冀、察苏鲁两游击战区，总兵力约二百个师，特种兵在外。

3．我以第二、三、五、九四个战区为主攻战区，以第一、四、八、十、冀察，苏鲁为助（佯）攻战区，牵制当面之敌，分别赋予任务，向指定之有利目标进攻，第一战区攻击开封、博爱，牵制敌人；第二战区切断同蒲、正太二路，且扫荡晋南三角地带之敌；第三战区任务为切断长江交通，向由鄱阳湖口起沿马当东下，至荻港沿途要点攻击，以大炮水雷封锁长江；第四战区一面扫荡广九路，一面攻南宁之敌；第五战区扫荡平汉线南段（北自信阳南迄武汉）之敌，切断敌所占之襄花、汉宜公路；第六战区向岳阳、临湘佯攻，牵制敌人；第八战区以主力攻占归绥，以一部协同三战区之作战；第九战区向粤汉路北段之敌进攻，以蒲圻、咸宁为主要目标，同时攻击南浔路之敌；第十战区担任黄河防务，相机支援二战区进攻晋南三角地带；苏鲁战区攻津浦路南段两侧广正面之敌，向泰安、临城、铜山、

滁县等要点进攻；冀察战区切断保定至石家庄(平汉路北段)及沧州至德州间(津浦路北段)交通。

自二十八年十二月上旬，各战区展开对敌攻势，直至二十九年三月底攻势始停止，共历时三月有余。所获战果：计俘敌四百余人，伤毙敌三千七百余人，掳获步枪二千余支。此次冬季攻势我军已达消耗敌之目的。

(二)冬季攻势之检讨

1. 敌 方

(1) 此次冬季攻势，敌自改变编制作战以来，其火力与部队活动力似较前减低。

(2) 敌虽处于内线作战(守势)，但仍控据我全国水陆交通便利地区，故兵力转用尚很灵活。

(3) 敌因装备优势，复掌握制空权，加以内线作战运动较便利，故能应付我冬季攻势，其重要战略要点，我未攻下一处。

2. 我 军

(1) 我军在冬季攻势之发动，精神上为主动。军队作战，贵能主动，能主动始能充分选择攻击点，此为攻势优势之处。

(2) 冬季攻势规模较前增大，可谓各战区皆已发动。我方鉴于敌军第一次进犯长沙中途退却，不敢攻城，是其精神沮丧，故此次发动攻势，在消耗敌军实力，及打击敌人精神。

第十六章 后期作战

一、枣宜会战

(民国二十九年五月上旬至六月下旬)

(一)会战前形势

于民国二十八年以前，我国军游击部队已遍布于敌占领区，嗣复于敌后成立冀察、苏鲁两游击战区，不断扰袭敌人。在冬季攻势后，我各战区更加强游击活动，随时破坏敌铁路交通，袭击敌补给路线，敌因遭受重大威胁，为欲扫荡游击部队与打击我五战区野战实力，敌发动枣宜会战。

敌方由第十一军司令官圆部和一郎，指挥第三、四、十三、三十等四个完整师团，与第四十师团一部及独立十三、十八两旅团，合共六个师团，兵力约十四万人左右，另有航空兵团。

我军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第二集团军孙连仲(辖二军)，第十一集团军黄琪翔(辖二军)，第二十二集团军孙震(辖二军一师)，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辖二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辖二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辖三军)。归战区直辖者有两个军及郭忏之江防军(原辖二军一师，另指挥三个军)，另有王赞斌之第七军与游击师'合共二十一军五十一师，兵力约二十六万人。

(二)战斗经过概述

敌以六个师团与两个独立旅团之兵力，于二十九年四月在湖北之钟祥、随县，河南之信阳集中，向我襄河西岸

之枣阳进攻，拟再进兵宜昌。敌采分进合击战略，中路由随县取道襄化公路前进，右翼由信阳西进，左翼由钟祥北上，企以左右两翼形成包围枣阳态势，拟于枣阳附近我部决战，我军本持久消耗战目的，以一部发动游击战，扰袭敌人，并以主力(二十一个军五十一个师)分防各地。其布置为：以中央地区第十一集团军担任随县以北、高城以南地区守备；第二十二集团军担任桐柏以东、明港一带守备；右翼地区以三十三集团军担任襄河守备；江防军担任宜昌、荆河一带守备；第二十九集团军控制于大洪山；第三十一集团军控制于确山、叶县间为机动兵团。

民国二十九年五月上旬，敌军分路由信阳、随县、钟祥向我军进攻，沿途各路与我守备军发生激战。我第十一集团军一七三师师长钟毅奉命于枣阳持久抗敌，掩护第十一集团军脱离枣阳包围圈。敌攻陷枣阳后，一七三师师长钟毅奉命于枣阳持久抗敌，掩护第十一集团军脱离枣阳包围圈。敌攻陷枣阳后，一七三师于奋勇突围中，牺牲惨重，钟师长亦壮烈殉国。敌本拟将第十一集团军包围于枣阳，因一七三师之坚强抵抗，使我主力得先脱离，此时我外翼部队反将敌左右两翼压迫于中央地区，将敌大部反包围于襄东平原地区。此时我第五战区转移攻势，令第二、三十一集团军与九十二师由此向南，第三十三、二十九集团军由南向北，第三十九、七十五军由西向东进攻，且以第九十四军进出汉宜路，深入京山、皂市、应城、云梦攻击敌后方联络线，同时我鄂东游击部队第七军占领平汉路上之鸡公山、李家寨与柳林车站各据点。至五月十六日第三十一集团军克复枣阳。此时战果，计伤毙敌军二万五千人以上，掳获炮六十余门，马二千余匹，战车七十余辆，汽车四百

余辆，及其他战利品不计其数。

我襄河方面第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将军，为歼灭退却之敌，亲率总司令部特务营与七十四师主力，赶至南瓜店堵截，适敌大股转回，反攻枣阳并反击张之截击部队，张军因兵力薄弱，为敌反噬。五月十六日，张将军于南瓜店英勇阵亡。翌日，敌再占枣阳，我五战区部队撤向塘白河西岸，于新野、唐河地区集结。

敌重占枣阳后，于襄河东岸集中，拟进攻宜昌。此时由东北抽调第四师团，由赣北抽调第十八旅，增援鄂北，乃以第四师团接替襄河以东之防务，以第三、三十九师团由襄阳、宜城分别渡岸，于六月上旬陷襄阳，继占南漳。敌第六、十三师团则在汉宜路由泪口，沙岸分渡襄河，与南下之敌会合，向我进攻，连陷荆门、江陵进迫宜昌。我军退守宜昌外围，敌以步炮空联合猛烈进攻，我军伤亡重大，乃主动放弃宜昌，改取外线态势，于宜昌、当阳、随县、枣阳以北地区布防，监视敌人，本会战告终。

(三)枣宜会战之检讨

1. 敌　方

(1) 敌第一次进攻枣阳，采分路合击战略，虽分五路进兵，因通信灵活，其动作皆能联络确实。

(2) 敌占领枣阳后，我军处于外线，被我反攻包围，敌当时曾遭挫折，伤亡很大。事后敌反攻又重占枣阳，将我军压迫于唐河，新野以北地区，且扫荡襄河东岸各据点。敌不仅装备优于我，训练也较我精练，且有优势空军掌握制空权，故无论敌处于外线内线，我攻守二次，均皆失利。

(3) 敌进攻宜昌时，以锥形突击方法一往前进，其前后左右虽遭我堵击、侧击、追击，皆悍然不顾，终将宜昌

夺取。敌战力较我为优，由此可得充分证明。

我在印远征军，因得美式优良装备和训练，且掌握到制空权，故于缅北战役，连战皆捷，新一军与新六军之战力显然高敌一筹。以驻印军在缅北之作战与枣宜会战之绩之比较，同属一国之军队，而有此优劣之差别，可知现代战争对装备、训练，制空权皆很重要。特于此提出以供参考。

2. 我 军

(1) 我军于襄河以东会战开始，采内线作战，敌分五路进攻，因我不能将敌之一路或数路击溃，使敌合围枣阳而占领之，致钟师长阵亡，一七三师官兵也伤亡很重。

(2) 敌占枣阳，我由内线转为外线作战，形成于我有利之态势，故将敌主力反包围于随枣平原，颇有斩获，且将枣阳克复。迨敌反攻，我战力不能抵抗敌军攻势，故退回唐河、新野。枣阳之役一得一失，从敌我之一进一退，充分可衡量出敌我战力之强弱。

(3) 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于襄河东岸南瓜店附近，因奋勇截击退却之敌，被敌反噬，忠勇殉国，甚为可惜。中央为纪念张自忠将军之忠烈，特将宜城改名自忠县。张将军在徐州会战之临沂战役，与庞炳勋将军将敌精锐第五师团（坂垣师团）击溃，减轻徐州战之压力，使台儿庄获得抗战以来第一次胜利，于战史上占有辉煌的一页。

张系国民军冯玉祥部下，治军严明，作战忠勇。日本为使华北特殊化，乃发动卢沟桥事变，继在平津一带挑衅。当时中央决策有“和平未至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故对日本在华之挑衅，尽量容忍，为使后方有更充裕之时间准备抗战，故令宋哲元将军为冀察政务委员会主任，与日本军阀周旋。当时张任

天津市长兼警备总司令，旋宋为敌逼迫，退出北平，改由张应付，当时张对敌遇事迁就，因此谣说他勾结日本，俗言“三人市虎”，“曾参杀人”，使张几无地自容，幸我蒋委员长明察秋毫，辨别是非，不信谣言。

迨第五战区成立后，李长官宗仁请调张之第五十九军至该战区服务，且对之开诚相见，张由是感激，故在临沂奋战图功，于襄河奋战殉国。其中因有此段渊源，故在此特表而出之，以慰忠魂，而励来兹。

张与前国民军高级将领数人，皆有抽大烟之不良习惯，当时我兼军训部长，出巡自第五战区，李长官与我说及此，表示曾告诉无效。我得李之同意，遂自告奋勇，分别与张等之人私谈。“劝人为善”古有名训，尤其回教戒条有云：“劝人为善，止人为恶。”兼有消极积极两种意义，故我奉诸良心，与之相谈，希望彼等在半年内戒绝，否则半年后中央将轮番调训，届时恐有不便之处。不料半年未到，彼等皆以戒绝，并感谢我劝告之感，五战区袍泽皆以此传为美谈。当时五战区有一中将黄建平，身任执法分监总监，亦抽大烟，故我建议李长官将他另调别职，之后，他本人也戒绝鸦片。

张自忠将军，山东馆陶人。为前清第二十镇学兵，时冯玉祥任营长，以后冯官阶越高，张也随之腾达。至抗战期间，因功擢升为集团军总司令，治军极严，从冯处衣钵相传，对不法官兵行打军棍之处罚，张常亲自执行体罚，打得皮破血流，故部下称为“张剥皮”。

（4）枣宜会战第十一集团军第一七三师之师长钟毅忠烈殉国之简单经过：钟毅，字天任，广西扶南人，民国前十二年生。广西省第三师范肄业。民国九年毕业于韶关讲

武堂，校长为李根源。后于陆大特训班第二期毕业。民国十五年随军北伐，以战功升上校团长。民国二十三年，调充广南第四高中上校军训主任，后改调广西大学军训主任。民国二十六年抗日军兴，调充一三八师四一四旅之长，至徐州第五战区成立时，率部参加抗日战争。二十七年升一七三师中将师长。二十八年奉令御守襄阳，于鄂北襄化公路随枣一带与敌搏斗。二十九年，四十八军于鄂北豫南遭敌猛攻，逐次转进，而一七三师奉令掩护全军退却，于唐河苍河镇遭敌几万包围，因众寡悬殊，所部伤亡殆尽，钟师长见无法突出重围，遂于二十九年五月九日下午三时举枪自戕，壮烈殉国，享年四十一岁。忠骸由当地乡保长代为棺殓埋葬。唐河县杨虎镇设有钟毅纪念中学，西点湾有其衣冠冢，上竖纪念碑，由李长官宗仁题词："钟毅将军殉国处"。当时政府曾明令褒扬，一次恤金五万元，年恤一次，为期二十年。子女教育费则由广西省府供给，至每人大学毕业为止。

(5) 五战区所指挥部队多为国民军(冯部)，如第二集团军孙连仲，第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及徐州会战时孙集团相莹，皆冯玉祥部下，官兵纪律良好，尤能刻苦耐劳，其构筑野战工事，全国闻名，尤以第二集团军为擅长。故台儿庄之役，孙连仲部能久守，殆与此有关。国民军之战斗力亦强，临沂、台儿庄两役之胜利，孙连仲与张自忠两人奋战之功不可没，足可与其他友军媲美。一次，我于重庆遇李宗仁、冯玉祥二将军时说："冯先生善于练兵，李先生善于用兵。"两人听罢皆欢笑不止。当一良好指挥官，必须要能带兵、练兵，而后方能用兵。带兵要能"亲爱精诚，赏罚严明"，练兵要能"技艺纯熟，指臂相助"，用兵之妙，在能

"出敌意表"。具此三种能力，则可当良将。古人有云："千兵易得，一将难求。"将材之难，古今相同。

二、常德会战

（民国三十二年十月上旬——十二月下旬）

（一）战前形势

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冬季，盟军为反攻缅甸，打通中印公路，共推蒋委员长为中印缅军统帅。蒋委员长于民国三十二年就职，即抽调国军精锐七个军转用于滇缅，敌知我此意图，为牵制国军入缅与打击我野战军实力，遂发动常德会战。

（二）战斗概要

敌军兵力约六个师团及四个伪军师，共约十六万人，配属航空兵团，由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指挥。我军以第六战区司令官孙连仲指挥十二个军三十一个师，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四个军十一个师，总兵力共约二十一万人，并飞机百余架。

敌军自三十二年十月下旬开始集中于华容、石首、弥陀市、荆州、监利等处附近，于十一月初旬开始分路进攻，以常德为主攻目标，曾一度攻占常德。我军联合六、九两战区兵力与敌作战，以第七十四军之五十七师固守常德，以第四十四军固守太阳山、盘龙桥，其余主力向占常德之敌反攻。时我空军集中驱逐机、轰炸机共百余架，以芷江、衡阳、白市驿、梁山为基地，协同陆军作战。此后我先后出动轰炸机二八〇架次，驱逐机一四六七架次，对敌轰炸扫射，使其人马、物资、船舶及其他军事设施，均受相当损害。并在空战中击落和毁伤敌机数架，可能击落十四架，

击伤十九架，击毁地面之飞机十二架（此为中美空军之联合作战）。

我陆军部队为争夺常德外围据点，激战甚烈，我五十八军新十一师先攻入常德，敌仓皇退却，我先后克服南县、安乡、监利、公安等处，十二月三十日，战争遂告结束。

常德会战，无论空战地仗，皆相当激烈，敌军官兵伤亡总数在万人以上，我守城军五十七师官兵大部牺牲，师长许国璋、彭士真、孙明瑾等三员皆忠烈殉职。

（三）常德会战检讨

1. 敌　方

敌为牵制我军调入滇缅，并打击我野战军，故发动此次会战，但其占领常德不久，因见我军兵力优于彼，集中奋勇反攻，为恐遭受更大打击，故自动退出，不敢长久盘踞。由此证明敌士气渐往下坡，不似前强硬。

2. 我　军

此次会战，我六、九两战区官兵均极奋勇，再加中美空军健儿之支援作战，故能予敌重创。师长许国璋等三员力战殉职，典范永存，其他官兵亦均极忠勇，令人感佩。

三、豫 中 会 战

（一）战前形势

敌为打通平汉路南段（黄河以南）并打击我豫境国军，特占领邙山头为据点，以掩护抢修黄河铁桥，同时将平汉路北段通车至黄河北岸。由三十三年一月起至四月止，敌抽调陆军约五个师团，与两个独立步兵旅，一个骑兵旅，一个战车师，炮兵四联队，工兵六联队，并配属第五航空兵团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总兵力约十六万

人。以主力集中于开封、新乡地区，一部于黄河北岸之晋南，另一部于豫南、信阳与皖西正阳点，分路向豫中进攻。企图打通平汉路南段，以利军运，此次敌兵力专对平原作战，故使用战车、炮、骑等快速部队，配以修路之工兵部队。

我军委会于豫中会战时，曾抽调第一战区步兵三十八个师，骑兵三个师，由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分别指挥。另调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指挥九师、第五战区的六师参战，总兵力为步兵五十三个师，骑兵三个师，共约二十八万人左右，并有一部空军支援。

(二)国军作战指导方针

我军拟于河南嵩山附近与敌决战，以扶沟、汜水及其以西为河防，极力阻敌渡河，于许昌、长葛、洧川、新郑、郑州、荥阳一带构筑工事消耗敌人，并于密县至汜水间山地构筑守势地带，于襄城、禹县、密县、登封、临汝等纵深地区构筑防御地带，统由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指挥。

(三)会战概要

会战时，敌恃其武器装备之优良，与装甲骑兵之快速，及空军之支援，由河南北、东、南三面向豫中分进合击，于民国三十六年四月上旬由中牟附近强渡黄河，击破我河防部队。豫北之敌于四月中旬占领邙山头阵地，皖西之敌为策应豫中会战，同时占领颍上，各方之敌分头向我进攻，因豫中地势平坦居多，敌充份发挥快迅部队之威力，装甲部队与骑兵驰骋于豫中平原，且以优势空军为支援。我军在守势地带既不能阻止敌军，于攻势地带又无空军支援，故平坦地区遭敌战车与骑兵袭击，各部联络中断，不能协同，敌快速部队曾向函谷关猛扑，并攻占灵宝。

平汉线正面及信阳之敌，至五月上旬曾打通平汉线，嗣为占领铁路两侧广正面之我军，于克复漯河、西平、遂平、确山后，将其截断，后敌复调增援部队二次进攻，再度打通。敌打通平汉线，在使华北、华中交通联成一气，然因我主力仍在，于豫西皖北各重点继续袭击敌人，使敌始终不能顺利利用，其贯通华中、华北之目的，亦未能完满达成。

(四)豫中会战检讨

1. 敌　方

(1) 敌以十六万以上兵力，且有多数战车，骑兵与优势空军支援，企图打通华中、华北，使之紧密联系。但因敌只占点线，铁路两侧之面随时遭我袭击妨碍，无法克复，故始终未能有效利用。豫中会战，敌以装甲、骑兵为前锋，且有优势空军支援。故作战于无险可守之平原，所向披靡。

(2) 此次会战，为冈村宁次指挥，视其部队编组，完全针对平原作战，古时兵法有云："不知天时地利，不可为将。"论日军在华北指挥官中，冈村是此中佼佼者。当日本投降时，冈村能贯彻命令，约束部队，听命缴械。

胜利后我到南京，一日，于军训部五次长家下围棋，适冈村亦在座，因此相识。此位叱咤风云、驰骋沙场的名将，却原是一位温文儒雅的人。以后遣俘时，冈村正有病，身为最高统帅的他，我们未依战犯处理，极力宽赦，将他随二百万战俘遣送回国治病。冈村感激之余，自思无以为极，曾亲告我，他日若到日本，将亲迎于机场，随侍身边代提皮包。

2. 我　军

(1) 就数量言，我军兵力较敌为优，而于质量上，则不若敌精练，装备方面更逊敌一筹。

(2) 制空权操于敌手，且缺乏平原作战之利器，故于平原地形之作战，遭遇困难。

四、长衡会战

（民国三十二年）

(一)战前形势

敌因太平洋制空权为美军掌握，致海空军损失很大，当时盟军有越岛攻击战略，将敌海上补给截断，因此驻守各岛之日军也渐失利。敌舰于海洋交通日渐危迫，遂想打开粤汉路北段，湘桂路、桂越路，冀强由平汉、粤汉、湘桂、桂越以通安南，补海上补给之不足，故于豫中会战后，继续发动长衡会战。

此次会战，敌军兵力由各方抽调九个师团，四个独立旅团，一个联队，二个野战补充队，共约七十万人，于民国三十三年开始发动，以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担任指挥。

我军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调集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兵力共约二十四万人。以第四军张德能守长沙，第十九军方先觉守衡阳，以第三十七集团军、第二十四集团军各一部利用既设阵地抵抗敌人，其主力则分别集结于有利地区，采取攻势以击破敌人，阻敌打通粤汉路。

(二)战斗概述

敌于民国三十三年二月以来开始调动兵力，以五个师团于华容、崇阳、岳阳之线集中，以一个师团集结于湘江西岸，四师团展开于湘江东岸，为敌第一线兵团。第二线之三个师团分别于监利、崇阳、蒲圻附近集结，每处为一师

团。五月下旬，敌开始分三路进犯，左路二师团攻占通城，迫趋沅江、益阳，行广正面之攻击。

我军采取攻势防御，分别阻止敌人，相机转移攻势。自六月上旬至中旬，敌左中两路越汨罗江南岸进迫长沙，第四军团伤亡很大，且岳麓山及长沙外围据点黄土岭、红山头为敌所占，受敌火胁制，遂放弃长沙突围永丰。敌占长沙后，续沿湘江东西两岸向衡阳进攻，先将外围部队击破，进围衡阳。我第十九军方先觉在此固守，曾多次将进攻之敌击退，苦战四十八天，伤亡很大，阵地工事为敌炮兵、空军轰毁，乃于八月八日突围，衡阳陷敌手，长衡会战告终。

（三）长衡会战检讨

1. 敌　军

（1）敌鉴于第一次长沙会战，不战而退，精神失利，第二、三次长沙会战则又损兵折将，铩羽而归。故于此长衡会战前，先行发动常德会战，以打击我六、九二战区野战军，消耗我军实力，为发动长衡会战之能本。

（2）敌鉴于第二次长沙会战，所用兵力不够充份，故此使用九个师团、四个独立旅团、一个联队、二个野战补充队，且区别为第一、二线兵团，保持联络，故能稳扎稳打，按步前进。

（3）敌攻长沙、衡阳两据点时，皆先击破我外围野战军，使两城陷于孤立，后再以炮兵空军火力攻陷我城防工事，再占核心，故能立于不败之地。

2. 我　军

（1）以人数言，我军兵力约四十八个师，共二十四万人，数量上稍较为优。

(2) 我军处于防守，备多力分，精神上已输敌一着。

(3) 我空军、炮兵处于劣势，步兵装备训练亦不及敌人。

(4) 第二、三次长沙会战之胜，皆断敌后路，使敌补给困难，故敌不得不退，此次因敌有二线兵团，无法断其后路，只得与之打硬仗，故难于取胜。

五、桂 柳 会 战

（三十三年九月上旬——十二月下旬）

(一)战前形势与双方兵力部署

敌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先占平汉路继占长衡路，控制粤汉路北段后，继续发动桂柳会战，企图打通湘桂、桂越二线。敌以冈村宁次为第六方面军司令官，指挥第十一军横山勇（辖第四十、五十八、三十、十三、三十七、一六一等共六师团）及第二十三军田中久一（辖第一〇四、三十二两师团），另两个独立旅（十二、二十三），与第五航空军，兵力共约十八万。敌于九月上旬，以第十一军主力集中于湘桂路沿线，一部于湖南道州，第二十三军主力沿西江向肇庆、都城集结，以二十三旅团集中于雷州半岛，对我第四战区桂柳、邕方面分进合击。

我第四战区先后调集第十六集团军夏威，第三十五集团军邓龙光，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与副司令官汤恩伯，兵力共十六个军，四十个师，约十六万人。四战区因兵力之劣势，装备训练较敌为差，（有若干部队经长衡会战后）未得补充即抽调入桂参战，战力甚低。）故乘取内线作战方案。

军委会以敌主力集结湘桂方面，一部于西江与雷州半

岛，遂饬令四战区先击破湘桂之敌，确保桂柳。张发奎长官乃命第十六集团军之第三十一、四十六军集中桂柳，构筑城防工事。

（二）战斗概述

湘桂路方面之敌第十一军，拟向广西全县进攻，我第九十三军原奉命于全州要隘屯粮储弹，阻止敌人，不意九十三军与敌一接触后，未能激战，即放弃黄沙河，粮弹亦全部丢弃。敌占全州后，即沿桂黔路进迫桂林，另一部由龙虎关经灌阳直趋桂林，时我一三一师、一七〇师担任守城，敌以五个师团兵力，先将桂林外围阵地击破。于三十三年十一月四日占领桂林城南外围阵地，遂即以炮轰城，并使用燃烧弹将城内房屋大部焚烧，因桂林木屋居多，致到处酿成大火。至十一月七日，敌由定桂门，中正桥，马龙洲强渡漓江，攻入桂林城，发生激烈巷战。至十一月十一日，守城军奉命突围，桂林城遂陷敌手。此役一三一师师长关维雍于风洞山指挥所为敌包围，因恐被俘受辱，遂以枪自戕，壮烈殉国。防守司令部参谋长陈济垣因负伤不能行动，也举枪自戕，另三十一军参谋长吕旃蒙，一七〇师副师长胡厚基亦皆阵亡，其余守城官兵亦伤亡大半。

敌攻占桂林后，张永福、中渡、黄冕、雒容进攻柳州，并占领之。后经宜山、河池，进占贵州之独山，旋自动撤退，仍回桂境。雷州之敌强于十一月下旬攻占南宁，西击龙州，北攻迁江，企图打通桂越路交通，敌我伤亡很重，呈对峙状态，会战告终。

（三）桂柳会战之检讨

1. 敌　方

（1）敌为打通湘桂、越桂二路，第六方面军使用二军

九师团二独立旅团，一航空兵团，较我四战区为优之兵力，故将桂、柳、邕、龙占领，于短时间内将湘桂，桂越二路占领。惟敌仅控点线，铁路沿线两旁仍由我有组织之民众所占据，经常破坏其路线或轰炸其铁桥，使其不能顺利使用。

(2) 敌于太平洋战场，首先是空战之失败，空战之失败影响海战之失利，海空之失利则又影响岛屿陆军之孤立，致兵源物资补给困难，故而拟打通平汉、粤汉、湘桂、桂越四路，直通安南，由陆路之补给以减少海上之威胁。但此路线太长，不易控制，两旁又有我游击队与民兵随时袭击其点线，致敌无法利用。

2. 我　军

(1) 豫中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几乎纷至沓来、敌为打通此回路，不惜调集重兵，以打击我野战军。我军实力经此几次会战后，损坏不少，每师兵力损失有达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者。

(2) 我军名为征兵制，实际户口未清，几无一省能完全合乎征兵之要求。不过彼善于此而已，中央当时在军政部兵役署策划征兵，于各省设有军管区，各省主席兼军管区司令。军管区下分设若干师管区，师管区下分设若干团管区，各设有师、团管区司令。这些机构，专司征调之责，但因户口未清，不能完全实施兵役法，有若干半征、半募。例如：军政部分配兵额于各省，尚规定某一省应征十万人以上，若此省有一百县，一军管区，四师管区，则每一师管区（二十五县）应分配二万五千人。若一师管区辖五团管区，则每一团管区由五县分摊五千人，即平均每县一千人。县再分各乡镇村街，若一县为二十乡镇，则每乡镇应摊五十人。设一乡镇有五村街，则每一村街分配五名，设

一村街有五十户人家，则每十户抽出一人，何人中签即由何人应征。若不抽签，或用轮流办法。而有钱人家皆不愿让自家子弟当兵，凡中签后，常以金钱雇人代替，因此兵贩子应时而起，当时得钱，报到之后，随即逃之夭夭，准备下回“卷土重来”。当时征兵机构只要凑足数目，即算了事，不管兵源之年龄，体格如何，致兵质不佳，加以入营后待遇差，有不堪其苦者，或半路而逃，或入营而逃，逃风很盛，无法阻止。故部队常有缺额，战斗兵不仅质量差且数量亦经常欠缺，此亦战斗力削弱之一大原因也。

国军每经营一次会战，损失很大，补充极其困难，虽勉强有征兵机关输送壮丁，则未经训练，遇有战事即持枪而战，武器使用未曾熟练，无法发挥战斗效力。是即“不教而战”，亦无异驱市人而战，故战力之低可以想见。

(3) 近代战争因武器进步，伤亡重多，不仅求精兵，且要多兵，故需全国总动员。为达全国总动员之目的，需要实行完全之征兵制度，为实行征兵制，除严密之户籍外，又必须有普及之政治教育，使人人皆知服兵役乃国民应尽之义务，如此征召而来之兵始有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始能发挥战斗力，为国牺牲。

(4) 按兵役法，兵役有现役、预备役、国民兵役之分。国家征兵机关依法征调所需要之壮丁，平时，适龄壮丁之征调，入预备师受新兵训练相当时间后，令其退役。凡中签之壮丁，更番入营，以储备受训壮丁，于乡镇为预备役，遇国家有事，征调入营补充一线战斗，或充二线补充兵。每一会战后，缺少之兵源，皆以受过训之壮丁补充，如此可维持原编制人数，保持原战斗力，抗战时，日本全按此法办理，故战力得永久保持。

(5) 桂柳会战前，第四战区原有兵力仅第十六集团军与桂省团队一些特种兵。迨战事起，始由湘粤七、九二战区调来增援部队，即多半参加长衡会战损失很大，而未强补充之部队，故战力很低。以质量差，我兵力不如敌，就数量而言，也不较敌为多，故难望有多表现。

六、湘粤桂边区作战

(一)战斗概述

敌为打通粤汉路南段，故于桂柳、长衡会战后，继续发动湘桂粤边区战事，以将沿线国军部队排除。敌第二十军司令官坂西一郎指挥第二十七、六十八、四十、一〇四等四个师团与独立第八、十四、十九三个旅团，以主力由耒阳、茶陵、与粤海地区分向湘、粤、桂边区进攻，以打通粤汉路。此边区属我三、七、九三个战区作战境地，当时已使用兵力有十个军，三十一个师，以第九战区为主力，由司令长官薛岳指挥，及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派第二十五军黄伯韬、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指挥六十三、六十五两军共同作战。

自湘桂为敌攻占后，我抗战根据地——重庆与三、七、九三战区之联络，乃告中断，补给、通信、交通均感不便，只得由各战区自己设法整补。军委会训令七、九两战区采持久战方案，阻敌打通粤汉路。

沿湖南境内铁路方面之敌，于一月十一日开始向粤汉路沿途重点进攻，至一月二十六日，乐昌、坪石、临武、柳州相继沦陷。广东省内之敌，于一月下旬沿北江进攻，英德、九峰、乐昌同时失守。过去我所控制之四五〇公里铁路至此完全放弃，我部转进于粤汉路两侧山地，使敌不能安全利用。粤沿海岸，敌陆战队于一月下旬由新城登陆，

攻陷海陆丰，于惠术沿岸着手海防设备，本会战告终。

(二)湘粤边区作战检讨

1. 敌 方

敌本打通粤汉路计划，虽将四五〇公里铁路线占领，而该路两侧山地与面为我军所占，使敌海防布置与太平洋南进部队相联系之願，未能达成。

(2) 我 军

我军以三、六、九三个战区联合作战，以九战区为主力，奈国长衡会战，九战区损失过大，由湘桂路被占后，补给困难，战力未复，故此次边区战绩平常。

民国三十三年冬季我军之战斗序列：

陆海空军大元帅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总参谋长何应钦。

①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代)，兵力：六个集团军，十八个军，四十一个师(特种兵在外)。

② 第二战区司令团官阎锡山，兵力：四个集团军，八个军，二十四个师(含二骑兵师)、另第十八集团军朱德辖三个师。

③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兵力：三个集团军，七个军，十九个师。

④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兵力：二个集团军，五个军，十二个师。

⑤ 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兵力：四个集团军，九个军，二十二个师。

⑥ 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兵力：一个集团军，二个军，七个师。

⑦ 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兵力：五个集团军，

十三个军，三十个师(骑十二师)。

⑧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兵力：二个集团军，七个军，二十个师。

⑨ 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兵力：三个集团军，八个军，十八个师(骑二师)。

⑩ 冀察战区总司令高树勋，兵力：一个军，二个师。

⑪ 驻印军总指挥索尔登，副总指挥郑洞国，兵力：新一军孙立人，辖新三十、三十八师。直属部队：第五十师，炮兵四个团，工兵两个团，战车二个营。(新六军此刻调归陆总直辖)

⑫ 为联系盟军，对敌转移攻势，国军乃于三十三年冬设立陆军总司令部于昆明，负西南各战区指挥及整训之责，总司令由现任参谋总长何应钦兼，辖二十八个军，八十六个师，其他特种部队在外。此时中印公路业已通车，美方之武器及物质，大量输入，预计有三十六个步兵师，可得美械装备及充分之炮兵，火力加强，同时后勤之设备亦大加改善。为适应将来攻势作战，特将所辖兵力改编为四个方面军，其序列如下：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兵力：三个军，九个师(炮工特种兵在外，以下同)。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兵力：三个军十个师。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兵力：五军十四师。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兵力：四个军，十一个师。昆明防守司令部司令杜聿明，兵力：二军八师。陆军直辖部队，兵力：四个军，十四个师、炮兵四个团，尚有通信、工、宪等特种部队。

⑬ 地方绥靖部队，兵力：四个军，十三个师。

⑭ 军委会直辖部队，兵力：三军十师。

甲、由第一战区至冀察战区，兵力共七十八个军，一

九三个师，每师以千人计，共约一百一十五万八千人。

乙、陆总直辖兵力共二十八个军，八十九个师，每师多半经过整补，战斗兵以每一师八千人计，共约七十一万二千人。

丙、三十三年冬我军之战斗序列，总兵力共二八二个师，约一百六十九万二千人。

七、湘西会战

（三十四年四月上旬至六月上旬）

（一）战斗概述

敌为保护粤汉、湘桂二路之安全，并破坏我反攻准备，拟占领湘西芷江我空军基地，遂发动湘西会战。

敌军兵力为第二十军司令官坂西一郎，指挥四个师团（第三十四、四十七、一一六等三整师团，及六十八、六十四师团各一部，共合一师团）、一独立团（八十六），共约八万余人。

敌以邵阳为进攻基地，自三十四年四月下旬以来，即作战略布置，采分进合击战略，以第三十四师团集中于邵阳附近；第四十七师团集中衡山、衡阳间；第六十八师团一部集结于邵阳、永丰间；第六十四师团及伪和平军集中于宁乡、益阳间。

我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指挥第三方面军汤恩伯之第二七集团军李玉堂的三个军，及第四方面军王耀武的四个军，另第十集团军王敬久的二个军，共八个军十九个师，战斗兵约十一万人，采取攻势防御战略，以主力位于新化、装岗间，拟与敌决战。以一部守新宁、益阳，以二十七集团军一部守龙胜、城步，阻止桂穗路之敌，使我主力作战容易。新

编第六军廖耀湘部则空运芷江为总预备队，预期在武岗——新化间将敌歼灭。

四月上旬，全县、东安之敌分三路进攻，至四月中旬，攻陷新宁，继续进犯。邵阳方面之敌，分四路向湘西进攻，益阳、宁乡二方面之敌各一部进攻该两县城。敌自四月中旬发动攻势，分进合击，经我各方面军分别阻击，逐次消耗敌人，诱敌于有利地带，以待全力反攻。此时我陆军经美械补充调整后，火力加强，复有中美联合空军支援，故将各路进攻之敌各个击破，予敌相当损失，芷江基地亦已确保，可说有相当胜利之收获。计伤毙敌人二万八千一百七十四人，俘敌官十七员，士兵二百三十名，马三百四十七匹，大小火炮二十四门，其他战利品二十吨。

(二)湘西会战之检讨

1. 敌　方

(1) 湘西地形险阻，易守难攻，在地理上，于敌方不利。

(2) 敌采分进合击，因分路太多，兵力不足，故遭我各个击破。

2. 我　军

(1) 我陆总所辖四个方面军，得美械补充居多，故战力可与敌相等。

(2) 我有中美联合空军支援，空军战力较为优，故采攻势，易于奏效。

八、桂柳反攻作战

(民国三十四年四月下旬)

(一)战前形势

敌自湘西会战后，自知战力日减，战志消沉，无力控

制所占之广大地面，曾缩短防线，其中兵力，以防我反攻。我军委会乘敌战志衰退之际，乃令陆军总部转饬所部二、三方面军迅速反攻桂柳，收复广西，以为反攻广州之张本，进而实行总反攻计划(按此时我美械装备三十余师)已整编完毕，且有中美联合空军可掌握制空权，是总反攻条件已具备，故由广西开始，先打通海口，以接受美国海上军援。同时可藉此壮盟军攻打日本之声势)。

(二)双方兵力

敌于桂境兵力为第十一军司笠原幸雄，指挥第三、第十三、第二十七(一部)等五师团及独立第八、第十八两旅，共约十万人。分布于桂林、柳州、南宁、龙州等要点。我陆军总部使用于桂柳反攻作战之兵力，为第二方面军张发奎指挥之第四十六军与第六十四军及第三方面军汤恩伯指挥之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九十四、第七十一等四个军。

(三)战斗概述

第二方面军于三十四年四月下旬攻占桂境都安后，即向都阳山脉进出，进迫南宁。是时，桂境民团及绥靖部队(属绥靖公署，以独立团为单位)纷起响应，凡我军所至之处，敌莫不望风披靡。五月二十七日，我第六十四军攻占南宁，敌主力向柳州退却，我军主力同时跟进，一部向龙州追击。我派遣一师与地方团队协同于七月三日克服龙州、凭祥，驱敌于国境之外。我第三方面军汤部于五月上旬向河池，黎明关攻击，迭将河池、宜山攻克。是时，各部均向柳州反击，至六月二十九日，四十六军克复柳州，敌向桂林溃退，我部沿桂柳公路向桂林攻击前进。第三方面军主力进出越城岭山脉后，分向全县、兴安进攻，并先后占领之，向桂林近郊推进，协同友军围攻桂林。于七月

二十八日进占桂林，敌向湘境逃窜，伤亡甚多，战事结束。

（四）作战检讨

1. 敌　方

（1）敌总兵力不过十万人，采取守势，分布于广西全省桂、柳、邕、龙各要点。备多力分，自湘西会战失败后，敌士气颓丧，加以太平洋战事节节失利，更足以动摇敌人军心，故于精神上已注定失败地位。

（2）敌空军在此战役中，其质量与数量至多与中美空军相等或较劣，因未能掌握制空权，故影响陆军战力之减低。

2. 我　军

（1）此次反攻桂柳作战，我采攻势，精神上已胜敌一筹。自湘西会战胜利，我士气更增加百倍。

（2）我陆军多数得美械装备，火力增加，后勤改善，补给充实，诚所谓“士饱马腾”。

（3）中美联合空军在战役中，支援陆军攻势，此亦制胜之一大原因。

（4）广西全省民众，凡适龄壮丁均加强军事训练，故国军发动攻势后，各地民团与绥署部队，均能密切与国军共同作战，发挥全面战之威力，增加声势与势力不少。

九、反攻广东作战计划

（民国三十四年春拟定，此计划未及实施，敌已投降。若敌不降，此计划与反攻桂柳作战一样，当可克敌制胜。）

（一）反攻计划的制定

民国三十四年，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为适应军事形势之发展，与我邻接战区协同作战，故策定总反攻计划，其中

之一即为反攻广东作战计划，此计划代名为冰人及白塔，预定于三十四年秋，对在华日军断然实行总反攻。在实行总反攻之前，先夺取西南海岸港口，以增加陆空军物资之供应，并谋对日最后决战发生更大之贡献。

民国三十四年六月，轴心国之意、德两国于欧战场先后战败，意国早已投降，而德国有组织之抵抗亦已停止。同时，日本南进至太平洋各岛屿之部队，由于海空军日渐削弱，陆军也渐失利。是时，史迪威公路敷设油管已达昆明，每月运输之物资达六万吨以上，而中国陆军总部半年来所编之阿尔发部队有三十六个步兵师，已大部分完成，兵源火力较为强。中国陆军总部为达成最高统帅所赋予之重大任务，遂依据总反攻计划策定反攻广东计划，并立即完成一切部署。兹将敌我兵力概述如下：

1. 敌兵力

以长江以南及珠江流域，越南等地区之敌军而判断之。敌兵分布于越南、雷州半岛、海南岛、长沙、汉口及其外围地区，共为十二个师团、十七个独立旅团、约三十三万二千人，另一航空兵团，海军在外。

2. 我军兵力

陆军总部所指挥反攻广州作战兵力为第一、二、三、四方面军以及直辖部队，共十九个军、五十八个师，约三十四万八千人，特种兵在外。此为主攻兵力。其他邻接战区助攻部队不计。

(二)作战方针

以打通广东之海口为目的，先须夺取雷州半岛，再分别进攻衡阳、曲江，我滇南部队则牵制越北兵力，主力则沿西江流域东下，攻取广州。

（三）作战指导

1. 第一方面军固守滇南原阵地，阻止越北敌人出击，保障我向东作战之安全。

2. 第二方面军先以一部夺取雷州半岛，以为我补给基地，主力沿西江东下，进攻广州西正面。

3. 越北之敌若以主力北向云南，或西向广西进攻，破坏我向东作战时，我第一、二两方面军应挥军入越，攻敌侧背，将河内、海防占领。

4. 第三方面军以一部进攻衡阳，以主力由广西贺县攻取广东之曲江，再会攻广州。

5. 第四方面军攻取衡阳、宝庆后，继攻长沙，进出汨罗江，使我进攻广州、香港之友军不受敌威胁。

6. 第三、七、九各战区各以有力部队会攻衡阳、曲江、郴州、翁源之敌，各抽一军集结于长沙，以空运补给后，向东江推进，以加重广州敌人在东方之压力。且选择一通内陆港口占领之，俾接受美援潜艇装备，增强战力。

7. 其他第一、二、五、六各战区应进攻当面之敌，阻敌兵力之转用。

8. 中美空军应协助地面作战，夺取战场上之制空权，以一部轰炸敌在海面活动。

9. 在进攻雷州半岛、广州及香港时，希望美国海军协同作战，阻止敌人增援，使作战容易。

此计划拟定后，正准备攻击部署，何应钦上将除将总部推至柳州外，并设一指挥所于海宁，一时士气大振，大有“灭此朝食”之气概。适日本于八月十五日宣布投降，否则我军必能依此计划将敌摧毁，圆满达成此任务。

第十七章　远征军作战

一、战前形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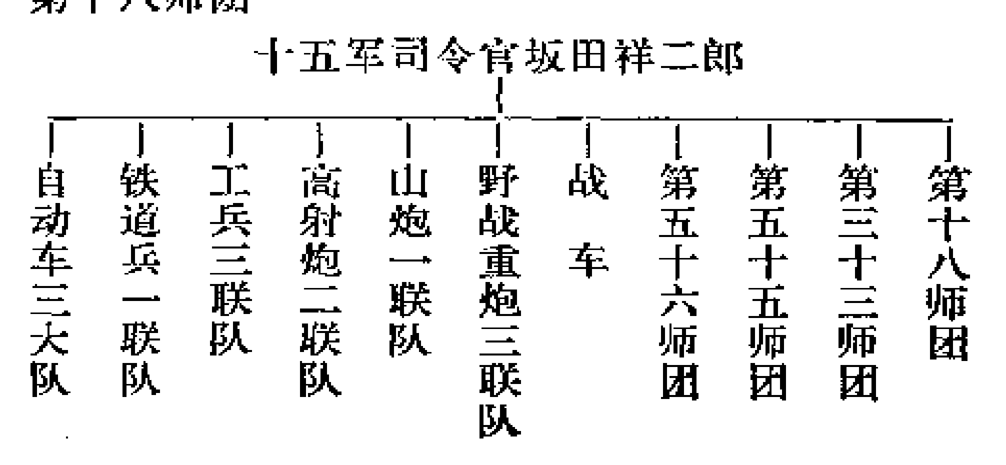
敌自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且预先占领安南、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以为南进之军事基地。敌又续占缅甸，切断我滇缅路交通。此外，敌更企图策动印度叛英，以坂田祥二郎为第十五军司令官，指挥第十八、三十三、五十五、五十六四个师团及特种部队于仰光登陆，向我滇西边境前进。我为争取盟军胜利与打通滇缅路国际交通起见，遂应盟军英国之请，编组远征军入缅作战。第一路司令官罗卓英，指挥第五军、六军、六十六军，于三十一年二月下旬由云南进缅境，协助英军作战。

远征军战役，分滇缅路、滇北、滇西三方面作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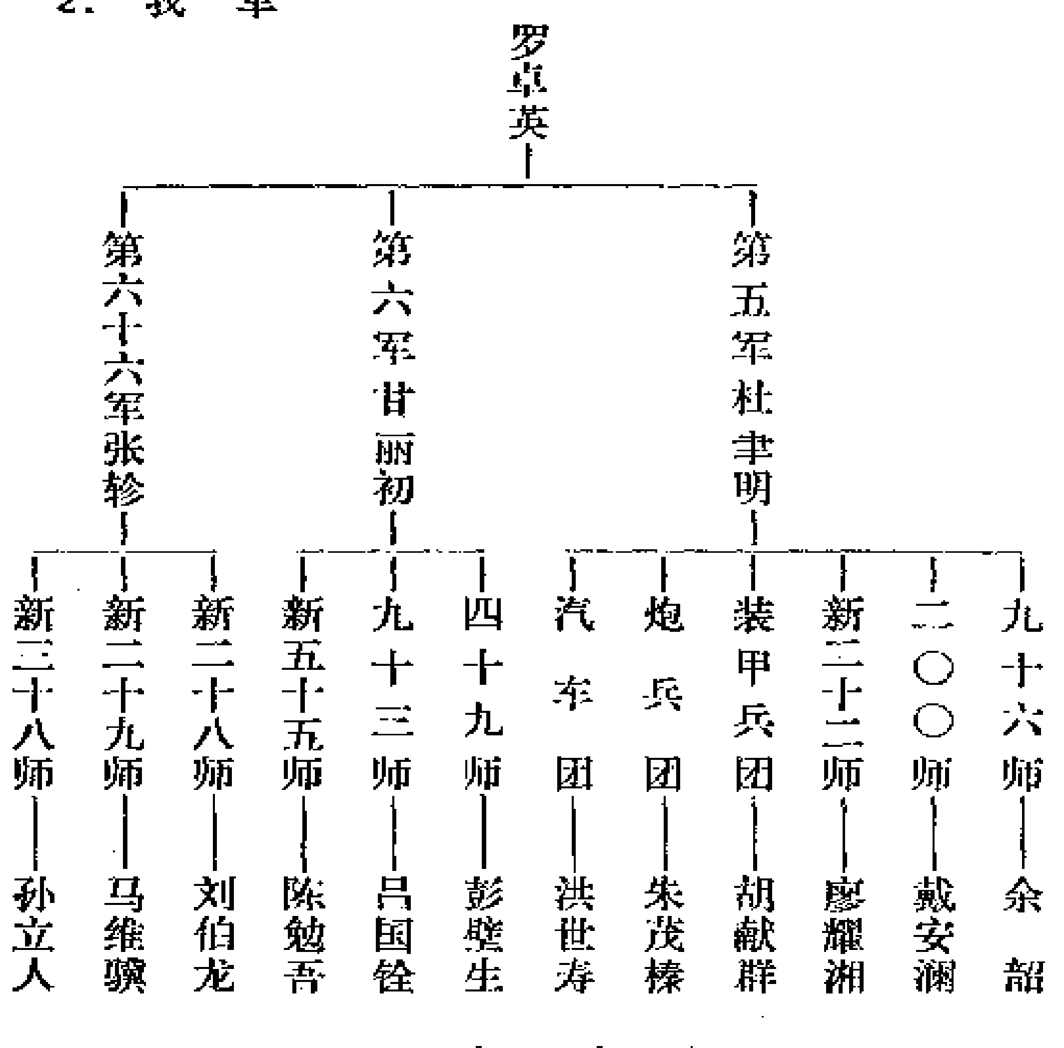
双方战斗序列：

1. 敌　军

第十八师团



2. 我 军



二、我军部署

以第五军由正面进攻缅甸之同古及其以南地区，第六军由昆明经保山沿缅泰边境前进，三月中旬到达毛奇、孟畔地区，六十六军进驻腊戍、曼德勒。而在此之前，敌已攻占仰光，正北进中。

英国有第一军团于缅境普罗美布防，第五军担任仰曼路（仰光——曼德勒）正面守备，六十六军控制腊曼路（腊戍——曼德勒）机动使用。三月十八日，第五十五师团、五十六师团、十八师团先后向我鄂克春、同古、平满纳等阵地攻

击，激战甚烈，双方均有相当伤亡。此时右翼英军忽撤，阵地凸出，我军乃放弃平满纳，转进至梅茵纳河继续作战。敌三十五师团突破英军阵地，进占普罗美，续向北攻，再占仁安羌，将英军第一师及战车包围于以北地区，我守曼德勒之六十六军派出新三十八师一部援美，与敌激战二昼夜，将敌三十三师团击溃，克复仁安羌；敌向南溃退，遗尸一千二百具，解英军七千多人之危，救出驮马一千多匹，美国教士与新闻记者五百人。国军扬威异域，以此次首开新纪录，英朝野上下均感谢异常。英皇并赠勋章给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将军。

敌第十八师团主力与第五十六师团之一部，自占同古后，续分路进占毛奇、雅多、罗衣考、棠吉、雷列姆，继占腊戍，乘势北进，五月三日占畹町，继陷龙陵，主力经八莫进占密支那，敌由卡萨上游渡河，与守军发生激战，我军以迅速脱离敌军为目的，向猛缓、太洛转进。当时人马通行困难，二〇〇师戴安澜过西保向缅北转进时，遭敌阻击，发生激战，戴师长阵亡。此后二〇〇师与九十六师经威西向怒江东岸转进，其他部队陆续经加林、太洛、新平洋，向印度之列多转进，于八月三日始抵达。沿途给养不继，饥寒交迫，死亡颇多，然官兵誓死不屈，直至印度未有投降者，由此足证，革命军人精神之伟大。

在五月初，敌陷腊戍、畹町，长驱北上进犯我滇西。我为阻敌深入计，乃将滇缅路交通要津之怒江惠通桥破坏，以暂时阻止敌人。我滇西军三十六师于五月四日由保山推进至惠通桥，与敌隔江对峙。敌一部强渡怒江，为我击退；我预二十一师与八十八团由惠通桥上下游渡怒江袭击敌人，阻攻腾冲之敌，且截敌之增援，其后腾冲、龙陵亦陷，我军

仍退怒江西岸既设阵地与敌隔河对峙。

三、滇北缅西和滇西缅北之作战

(1) 滇北缅西之作战(三十二年九月——十月)

盟军自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一月至十一月间，曾先后于卡萨布兰加、华盛顿、魁北克、开罗等处召开几次军事会议，协商盟军作战战略，曾讨论滇缅方面之战争，决定盟军由印度方面反攻缅北，我远征军由滇西方面会攻缅北，打击滇北、缅西之敌，并扫除之，以打通中印公路交通。

1. 驻印远征军第一期缅北作战

敌在缅甸方面军为切断我中印通路，策动印度叛英，乃于三十二年九月，以第十五军主力向缅西推进，拟进攻印度之伊姆法尔，此为敌以攻为守战略。第十八师团主力集中密支那、孟关地区，在此地区以北对我驻印军行持久战。第五十六师团与第十八师团之一部进攻怒江西岸，企图夺取该岸反攻据点，阻止我远征军之反攻。三十二年十月下旬，我驻印军新三十八师与新二十二师，由列多向缅北之敌反攻，拟将敌歼灭，收复密支那，俾便我滇西远征军与美印缅军会师，以打通中印国际交通线。我新三十八师与新二十二师于民国三十二年十月下旬，协同向盘踞缅西之敌第十八师团作战，曾攻占新平阳、于邦、太洛等地，后会攻孟关而占领之，将敌第十八师团主力击破，敌损失约一联队，造成反攻缅北序战之胜利。

我军自占孟关后，敌拟在瓦拉本集结主力向我反攻，敌此次反攻计划为我掳获，我乃迅速向敌穷追。此刻美军一部于三月四日进抵瓦拉本东北地区，向敌攻击，因敌反攻

甚猛，美军退后八公里，我新三十八师一部支援友军，且将敌击溃，占领瓦拉本，新二十二师附战车营向敌追击，将胡康河谷之敌肃清。三月二十八日，攻占沙杜渣（缅北天险）继向孟拱河谷攻击，敌第十八师团得第五十六师团与第二师团各一部之增援，于约七十五里之河谷继续抵抗。我新二十二师与新三十八师附战车营，在盟军飞机掩护下，扫荡沿途之敌，向加迈进攻并占领之。敌第十八师团向南逃窜，我军继向孟拱攻击，当地之敌为第二、十八、五十三师团各一部，固守阵地以抗，唯对于达孟拱南约二哩英军五百人攻击甚猛。我军为占领孟拱并解英军之围，乃渡南高江包围孟拱，经三昼夜之血战及二昼夜之巷战，遂于六月中旬占领孟拱，歼敌殆尽。

我军为打通中印公路，必须攻占密支那，乃编成突击队，以新三十八师一团、五十师一团及美军两营，另重炮一连为基干，于四月初由胡康河谷出发，经原始森林，崎岖山路，历月余之艰苦，孤军挺进，开辟道路，深入敌后百余里，于五月十五日进至密支那城附近。敌惊为天降神兵，匆促应战，我军出其不意先占领密支那机场，以掩护空军部队之着陆。当日史迪威将军率新三十师主力，十四师与新二十二师各一部，立即空运至密支那机场增援，英军一部也同时由孙布拉板南下协同作战。敌守城军为第十八师团一联队、工兵队与宪兵队，及第五十六师团一大队，共约三千多人，凭险固守。五月十七日，我军始攻城，敌军死守两个月余，始终不退，至八月三日，我尽歼敌军并将密支那攻占。

2．驻印远征军第二期缅北作战

我军为早日打通中印公路，乃乘缅北雨季时期，将驻

印远征军整顿补充，并改编为新一军，辖新三十师、新三十八师，新六军辖十四师、新二十二师。当时马队区分以新一军为东路军，新六军为西路军，由密支那、加迈分向八莫、瑞古前进。敌第二师团一部由缅南增援南坎，以搜索队为基干，另附第二、第十八师团各一部编为一支队，由搜索队长源好三大佐指挥，守备八莫。三十三年八月中旬，敌军到达防地构筑工事，并以一大队以上兵力任庙堤外围守备，企图固守八莫，阻止我军，以待十八师团到达时转移攻势，第二师团主力则于八月二十日向芒市推进增援五十六师团。敌军司令部误判盟军将由芒市、密支那进攻曼德勒，乃令第十八师团向芒市转进，第二师团也逐渐向曼德勒转进。我新一军由密支那附近沿密八公路向八莫前进，连续攻克庙堤、莫马克、曼西等要点，进围八莫，激战至二月十五日将八莫占领，守城指挥官源好三被击毙，敌除六、七十人乘黑夜泅水逃脱外，余皆被歼。新六军由加迈经和平向瑞古前进，新二十二师于十月一日到达伊略瓦底江北岸，将敌据点叫支·摩首、丁八佛因等处占领。新六军得美军渡河材料，渡过伊洛瓦底江南岸，击溃敌第二师团及伪缅军各一，随即占领瑞古。新二十二师于十一月十四日将防务交由五十师接替后，以一部控制于曼大，主力沿曼大、当瓜线前进，攻占当瓜。新六军有切断腊戍、畹町之任务，当令所部向河西敌后迂回，以阻止滇西及南坎敌之退却，并截击腊戍方面来援之敌。十二月一日，新六军奉命集结待命，当瓜防务由美军担任，当时新二十二师、十四师奉令空运回国入滇，归陆总部直辖。

新一军为争取战略主动，乃不待八莫攻占，即以新三十师主力绕道对南坎进攻，于十一月底区分三纵队，沿密

八公路两侧山地挺进，沿途将南于、劳支及其附近机场、茅蛸等处先后占领。我迂回部队星夜突进，至三十四年一月十五日，袭占南坎，敌几全部被歼。当我占南坎后，为使中印公路早日通车计，乃乘胜对敌继续猛攻，至一月十六日，新二十二师主力沿芒友公路前进。新三十师团歼老龙山之敌。一月十七日，新三十八师主力将盘踞南坎东北河套之敌肃清后，沿公路进击，攻占色南、般鹤。敌退老龙山核心阵地继续抵抗。一月二十一日、新二十二师主力将間阳、苗西占领，与滇西我远征军取得联络，继续进攻，占领摩塘。二十七日占芒友，与我滇西军会师，中印公路完全打通。

此时据守老龙山之敌，经三十师五天继续围攻，终于伏首歼灭。我军以占领腊戍为目的，继续推进至新维市之部，二十日将敌歼灭，占领新维。惟新维至腊戍一带，为道路险阻之绵延山地，易守难攻，敌以第五十六师团一联队及炮兵大队，战车队凭险固守，我仍以新三十八师作正面反攻，新三十师与三十八师一部沿公路两侧前进，先后将拉秀、芒利、明朗、温塔等要点占领，再渡南育河围攻腊戍，先占火车站，八日再占腊戍城，敌守备部队完全就歼。我军继占西保、孟岩，五十师攻占南图，于三月三十日与英军会师乔梅，第二期缅北作战终止，驻印军在腊戍集结整顿补充。

（二）滇西远征军在滇西缅北之作战（三十三年五月——三十四年一月）

敌第三十三军司令部以本多政财为司令官，指挥第十八、五十三、五十六等三个师团，及独立第三、三十四混成旅等部，对缅北盟军，滇西之远征军作战，企图阻止国军援缅，及截断中印联络。三十三年（1944年）四月，敌以

五十六师团主力及五十三师团之一部，占领腾冲、松山、平戛、龙陵、芒市等要点，加强工事，阻止我远征军西进入缅。

我滇西远征军为协同盟军反攻缅甸，并肩作战，并打通中印公路，接受军援，拟先肃清滇西敌人，遂于三十三年五月十日拂晓，以五十三军、五十四军及炮、工特种部队为攻击兵团，先后攻克马面关，桥头、片马、固东街、江苴街、象达等处。此时远征军为扩大战果，乃于五月二十二日全部渡江，增援前线，并区分为第二十集团军，指挥第五十三军，第五十四军及预备第二师为右翼军，其攻击目标为腾冲；第十一集团为左翼军，指挥第二、六、七十一军，以龙陵、芒市为攻击目标，并陆续占领腊孟街、镇安街，曾一度攻占龙陵城。此时值滇西雨季，人马运动困难，后方补给不继。至六月中旬后，敌集结残部企图反攻，与我鏖战于龙陵、松山、象达、平戛等处达三月余之久，敌人于腾冲、龙陵、畹町、松山皆筑有强固工事，尤以松山工事为最强，我军每攻下一处，皆牺牲很大。我第七十一军及新二十八师围攻松山时，经五次进攻，后由第八军再以九次之连续攻击，使用兵力达三个师，历时三月，始将敌核心堡垒占领，敌守兵一大队歼灭，而我牺牲很大。

右翼军以七十一军荣誉第一师、新三十九师于八月中旬围攻龙陵城，将外围据点占领，后敌增援反攻，所占外围尽失。迨我援军第九师、二〇〇师到达，再兴攻势，经五昼夜之激战，始将敌军包围，敌军避免全军复灭，向南坎溃退。我于十一月三日占领龙陵城，继续攻击。十一月二十日，占领芒市，敌退出畹町，拟在滇缅国境交界处与我决战，我左翼第十一集团军全部及五十三军继续向敌攻

击，经二十五昼夜之激战，双方仍在搏斗中，后因我驻印军于三十四年一月十五日占领南坎，继续南下，敌为避免全军覆没计，乃突围向西南溃退。我于三十四年一月十九日占领畹町，并追过国境，我五十三军一部与驻印军、盟军于芒市会师。中印公路完全打通。

远征军全部战果统计：伤毙敌四千八百八十五人，俘敌六百四十七人，掳获步枪二千六百四十四枝，轻机枪六百〇一挺，炮一百五十门，战车十二辆，飞机三架，汽车六百〇六辆，马一千四百三十四，其他零星军用品甚多。

（三）驻印远征军与敌作战之总检讨

1. 敌 方

（1） 敌军切断我滇缅路唯一国际路线与阻止我军援缅及策动印度独立，始用四个师团，其后增至八个师团，配属海空军，将滇西、缅北占领，且一度攻击印度之伊姆法尔。在初期，因盟军准备未周，协调不良，故遭挫折。

迨国军在滇西得美械补充，于印度兰木伽基地得美陆、空军械器配备，并加紧训练。反攻滇西缅北时，敌在缅防线太长，备多力分，处处防御，陷于被动，故滇西、缅北二战场皆为盟军击破，敌损兵折将总数在五万人以上，元气大伤，我打通中印公路以代滇缅路，使敌断我国际交通之目的未能达成。

（2） 敌占安南、马来西亚时，泰国即倒向敌方，且出兵缅甸助日。此时，敌若想断我滇缅路国际交通，可由新加坡海军基地，宣布以海军舰艇封锁仰光，阻截船舶来往，相信可达成此一目的。因当时英在远东主力舰如“威尔斯亲王”号、“却敌”号已在新马海面遭敌机炸沉，而美国在太平洋舰队于珍珠港偷袭后多数毁坏，英、美其余海军主

力皆在大西洋以对付德意，实无力东顾印度洋。故日只用新加坡基地以相当舰艇即可封锁仰光，断我滇缅国际交通，不必兴师动众。敌占领滇西缅北广大地区，失制空权于盟军，故我反攻时，敌军损失过半，证明其战略错误。

(3) 敌人若仅以水军封锁仰光，不用陆军登陆，则英国不会向我求援，美国也不会参加滇缅之战。如此显于日本有利，此为其战略错误。以上三项为我本人当时之感想，今写回忆录，顺便提出。

(4) 敌自仰光登陆，于滇缅作战之初，仅以四个师团配属优势空军，向滇北缅西攻击，即占领滇缅各要点，所向无敌，此为敌武器，装备、训练皆优于我，并有优势空军支援之故。即按兵力数量而论，敌四师团共约九万人，并不比我远征军三个军为少。而敌军之武器装备皆我优势多矣！

(5) 远征军反攻滇西缅北之役，敌第五十六师团有一联队守腾冲，我以四个师之兵力围攻，历时两月，始将敌消灭。敌步炮各一大队守松山，我以三个师之兵力，历时三个月，始将敌歼灭，占领松山。敌虽消灭，我军亦伤亡枕藉，付出代价甚大。足见敌军有与阵地共存亡，死守不退之决心。

(6) 缅北滇西之作战，敌在缅主力向缅西推进，以试探性攻击向印度之伊姆法尔进攻。当时印境空虚，故甚感恐慌。其实敌以攻为守，并无占领印度之力，以后敌因攻人印度未有如何之反应(叛英)，乃自动撤出印境。

(7) 敌步炮联合约三千余人，死守密支那城，经我军二个多月之围攻，全部被歼，此证敌有与城共存亡之决心。

(8) 我滇西远征军及驻印远征军反攻滇西缅北以来，

已有美国补充武器装备，火力优于敌人，再加美空军大量增援，故盟军掌握全部制空权。而敌人战线太长，备多力分，处处陷于被动，此为其失败最大原因。当时日本东条式飞机已为美国P-51驱逐机所制服，美国并有B-25、B-29轰炸机等攻击利器，在缅甸崎岖山地轰炸敌人代替炮兵火力，敌空军处于劣势，此亦敌失败之主因。

2. 我 方

(1) 我应英之请求，派遣远征军入缅作战。

① 我军入缅初期，因与英军协调不良，当敌自仰光登陆向北挺进时，英军避开正面，退守铁路以西，使我军首当其冲。因我准备未周，又系远行军，故处处被动，受敌攻击，其后敌以战车隔断我联络与退路，我军在曼德勒以南失败后，本拟撤退回滇，因后路断绝，仅小部撤回滇西，多数向印度列多转进，沿途山路崎岖，人烟稀少，我军饥寒交迫而死者甚多，但无一投降者，此乃革命精神之最高表现。

② 第五军军长杜聿明，练兵作战均有成绩，此次作战入缅，因与友军协调不良，故遭挫败，其所属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将军于退却时，与敌搏斗阵亡，甚属可惜。当时以罗卓英将军为指挥官，我军因无制空权，战车为敌优势装甲车所捣毁，阵线不稳，故伤亡很大。

(2) 远征军协同驻印军反攻滇西缅北

① 远征军此刻已全部换用美械装备，火力加强，战斗力也随之大增，惟训练方面比不上驻印军，故战役之表现不及驻印军出色。

② 由陈纳德将军所率之空军飞虎队，其司令部在昆明，此系美国罗斯福总统有意援助中国，故采纳民间建议，组织志愿空军而来援助中国者。飞机之作战，性能第一，

当日本东条式飞机一出，我俄式E-五，E-六驱逐机简直望尘莫及，迨飞虎队到来，拥有P51驱逐机及驰名国际之B-25、B-29轻重轰炸机，性能皆远超日本，我空军之劣势顿时改观，远征军因得飞虎队之支援，掌握制空权，故于地面作战大为有利。

③ 当我远征军攻击盘踞缅西之敌时，在敌缅侧面之驻印盟军，为数虽不多，由西向东攻击缅北，使敌腹背受威胁，精神打击甚大，敌恐后路被截，心理因而动摇，故我得占便宜。

④ 远征军反攻滇缅时，有几个据地，遭敌顽抗，一为腾冲，敌以一联队防御，我动用三师以上部队，历时两月始攻克之；一为松山，我以三师人马，费时三月，始将敌守军步炮各一大队完全消灭。敌此种与阵地共存亡之精神，使我牺牲很大代价。腾冲松山两据点之攻克，与畹町城之驱敌，得力于美械装备甚大，最重要者为飞虎队制空权之掌握。使我安心在地面作战，故能将滇缅境内之敌完全扫荡驱逐，远征军且与驻印军在芒友会师，使中印公路打通，以接受美国军援，增强我整个抗日军事力量。

⑤ 中印公路由缅西远征军与驻印盟军双方之协同努力，以军事力量扫除滇西缅北之敌，以机械化工兵使用开路机器，将延绵崎岖之山路辟成公路，并铺设油管，由印境通过缅北，滇西直达昆明。供输汽油，供我空军、陆军战车、汽车以及民间之使用。盖汽油与军事，若血液与人身，至为紧要。

⑥ 我国产汽油甚少，据我所知，已发现者有玉门油矿，但产量有限，距前方所需相差太远。因炼油机器、技术落后，炼出之油，杂质多，发挥力少，不适飞机之用。

当敌将我国际交通线封锁，汽油供应困难时，我曾以酒精、木炭为代用品，充燃料以供汽车之用。在中印公路未开通前，曾以飞机由印度越喜马拉雅山驼峰空运，惟数目有限，情形极为艰苦，后中印公路通车，又有油管供输，效力之大与前相较，有如天渊之别。

（3）我驻印军编组训练与补给

① 我驻印军原由第一次远征军司令官罗卓英指挥，共辖三军，因在缅北作战失利，归路为敌截断，除二〇〇师、九十六师退回滇西外，其余各部沿途饥寒交迫，死亡甚多，遂退入印度之列多，编成新编第一军，辖新二十二师及新三十八师。三十三年四月，由国内空运第十四师、三十师、五十师到印，统归史迪威将军指挥，以后此五师编为两个军，新一军以孙立人为军长，辖三十师，附战车一营，新第六军以廖耀湘为军长，辖十四师、新二十二师、及炮兵；重迫击炮各一连。

② 我驻印军训练基地，在印度东南之兰木伽，由史迪威将军商调来美军教育干部担任训练。美国陆军训练方法，多半采自德国，盖世界陆军之强莫过于德国，若干美国高级将领如魏德迈等皆留学德国者。美军官兵平时生活虽似自由，但基本训练或战斗训练之要求皆很认真，对命令必须绝对服从。

③ 美国担任训练，所用武器、装备、弹药全由美军供给，极为丰富，实弹射击，其使用弹药绝无限制，以炮兵而言，每年有二十八次之练习射击，驻印军在三年期间，一团炮兵所射击之练习弹共有四万发之多，数目相当可观（据说德国军官，以每人亲眼看过一万发炮弹之爆炸为标准）。而步枪之射击，更是漫无限制。

此虽看似消耗浪费实有其代价，盖平时多练习，战时命中率自高，杀伤效力亦大。美国炮兵射击，以营为单位，行面的射击，若欲毁坏敌人某一据点工事，视多少炮弹能将此一据点面积填满而破坏之，方为满足。有一次美国炮兵顾问至贵州之都匀炮兵学校视察，见该校训练单炮射击，回来笑对我说："现在单炮射击已不用了"。其意此法已落伍，且效力甚微。我说："我们的炮与弹有限，不得不如此，但单炮射击有时也有用。以昆仑关作战来说，我军以单炮在侧面阵地射击敌之反斜面阵地而收战果。"

④ 当时驻印军编成一〇五榴弹炮两团，一五六榴弹炮一个团，共三个独立炮兵团。每师有炮兵一个营（规定为山炮，但新三十八师为一〇五榴弹炮是例外），步兵三个团、工兵一个营、通信兵一个连。每营除步兵三连外，加一重武器连（有追击炮排、重机枪排、无后座力炮排）。每连除轻机枪九挺外，尚配备有六〇追击炮、火焰喷射器，火力之强，至少与敌相等或有过之，再加战车与空军之支援，故火力能够压倒敌人。

⑤ 当时空军有性能优越、火力高强之P51驱逐机可制压敌东条式飞机，有携带五百磅或一千磅炸弹，破坏力极大，可代替炮兵之B-25轻轰炸机；另有速度快、双腰身的P-38侦察机，为侦察利器。

⑥ 驻印军训练时，有充分弹药供应。作战时除优势之装备外，有充分之弹药补充，故可以火力压倒敌火力；此外又有优势空军及优良战车之支援，故能以速度压倒敌速度。前曾述及现代战争，是以火力压倒火力，以速度压倒速度，以纵深压破纵深，现在我驻印军已具备两种优势，至于纵深之突破，只有待于作战时之运用而已。

⑦ 驻印军曾先后将顽敌所占之孟关、孟拱、密支那、八莫、腊戌等要地攻陷，或歼敌全部或歼其大部，或使敌溃不成军，所向皆捷，将敌使用在缅之多师团击破。我驻印军反攻缅北之役先后两次，若敌我兵力相等，则我军之战力与敌相等或有过之，此种战例，在国内几乎绝无仅有。

⑧ 驻印军每一官兵每日至少有半斤肉类，尚有蔬菜、巧克力、香烟等物，因此反攻缅北之役，官兵皆人强马壮，此亦增加战力之一种。在远征军未出发前，英国为求我出兵，由印度总督魏菲尔派来一代表到重庆，与我国商谈，对我入缅之远征军给养由英国代办，物品由美国出钱作为美国军援。当时我奉命接待，与他洽谈，他曾问我："每天每人六两肉够否?"我想到国内官兵每天那有六两肉吃，因此不觉莞尔一笑，这一笑，对方以为我还嫌少，可见他们营养之丰富。

四 战场杂记

1. 史迪威将军担任中印缅盟军总指挥，指挥队伍以国军为主力，英、印、美军次之。至攻下密支那后，史迪威曾回重庆一次，当时他请我吃茶聊天，我问道："你指挥的几国军队中，以哪国战斗力最强？请你客观的说之。"他回答说："美军第一，中国第二、印度第三"。

2. 史迪威曾派美国军事政治人员驻扎延安，其中有因共产党之宣传而左倾者，误认中共为土地改良派，而非国际共产党，当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出使中国时，罗斯福总统曾要他取道莫斯科，探询斯大林对中共之态度，斯对赫说："中共是土地改良派，非国际共产党"。由此二方面来看，证明苏联与中共为避免美国之猜忌，故意将国际共产党变为土地改良派。马歇尔将军奉命来华调解国共纷争，因有

此先入为主之见，也误认中共为土地改良派，故竭力劝国共合作。他纯以美国政党政治（在朝在野）的眼光来处理国共合作问题，殊不知中共是主张世界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打倒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真正国际共产党。美国人此种误解，由于史迪威所派至延安人员之宣传最大。史并主张分一部分美械以武装中共，此完全违背我国策。委员长为全国安危所系，见情形不对，乃建议罗斯福改派魏德迈，并以索尔登指挥印缅作战。

3． 史迪威在反攻缅北战役中，常以团为单位，直接指挥中国军队，置团以上指挥官及其机构于不顾，不仅破坏建制，且对我高级将领有轻视心理。

4． 印缅两地原始森林甚多，有恶性疟疾蚊虫，被咬者发高烧，破坏红血球，重者致死。军中特备头罩(两眼可望见外面)，以供夜晚宿营与守卫戴用，并擦有避蚊油。再者森林内多蚂蝗，常咬伤行人，又据说猿猴千百成群，常围劫人马单少的送食者，此乃有趣之闻。

5． 当欧洲战场意军求和德军将要崩溃时，印度总督魏菲尔派来一断臂将军到重庆，据称美国原预备可供四十万游击队用的轻武器，拟投给欧洲反纳粹的国家，因欧战快要胜利，德国即将崩溃，如此一来已不需要，拟转送我国以供抗日之用。该代表先与外交部长宋子文谈及，宋再与魏德迈说，而魏不肯，他说："这是英国人慷他人之慨，英国的武器取之我们美国，你们若要，直接向我们讲。"英代表事后反驳说：这批武器是英国制造的，希望经由飞机或公路送给中国，而魏德迈始终反对。

又当时，我国送海军人员赴美受训，美国补充我战艇，英国邱吉尔也补充我一艘七千吨重之巡洋舰、两艘驱逐舰、

四艘潜水艇，而美国却责难英国谓："太平洋海军由美国负责，中国不需要潜艇。"游击队也不愿我们接受，舰队也不许我们补充，美国人不许我交结第二个朋友，这真是奇怪的了。

第十八章　抗战中的海军

一、　民国前后之中国海军

近代军事家有言："十八世纪为陆权时代，十九世纪为海权时代，二十世纪为空权时代。凡有海岸线之国家，必须建设此三种国防，以保障其主权。"我国海岸线北起渤海，南迄南海，合共六千六百英里，故海军之建设极关重要。有海军始能巩固海防，宣扬国威，保护侨民，发展商务。

兹将中国海军历史分为民国前、民国时二时代，概略说明如下：

(一)民国前之中国海军

据国史所载，吴楚争霸，吴用水师，水陆并进，溯江而上，直捣楚国之郢都。秦汉以后，水师之效用益大，汉武帝北征朝鲜，南平南粤，均用水师。三国时代，孙权、刘备联军大败曹操于赤壁。晋武帝伐吴，水陆并进，最先攻取金陵者，王濬之楼船水师也。隋统一长期纷乱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最后用兵江南，讨伐陈国，以杨素统率黄龙巨舰数千艘，沿江而下，舟船渡江，旌甲耀目，攻占陈都建业扫平江南，完成大一统帝业，对外四征高丽，并征服琉球。唐代征服高丽，击溃来侵之日本水师于白江

口，焚毁舟师四百余艘，扬威异域。宋代自宋太祖起，即训练水师，并用罗盘针于战船上指示方位，其后平定江南，也以水师之力居多。（罗盘针用于航海，由阿拉伯西传至欧洲）。

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中国始用罗盘针于航海，而欧人制造磁钉航海则为公元1302年，约迟二百年，元代武功，威震欧亚，版图之广，史无匹。当用兵南宋时，铁骑至长江，非用水师，难以飞渡，遂改弦更张，从事训练水师，复征南宋，远越重洋，扬威异域。如日本、琉球、爪哇、安南、占城、缅甸等处，均为元代之海军所威服。

明代为中国海权最盛时代，海疆之开拓，远迈前代。西渡金沙江，征服缅甸、暹逻、越南，置十宣慰司；东沿松花江，征服奴儿干（即赫哲，为隋唐时代黑水靺鞨之后裔）、库页岛。郑和曾七度远涉南洋与印度洋，远至非洲东海岸，经历三十余国，声威远播。郑和本姓马为元朝赛典赤赡思丁之后裔，所谓“三保太监”是也。明成祖疑建之流亡海外，欲追踪擒拿，且藉此扬威异域，示中国之富强。自明英宗六年（1441年）迁都北京（明初建都金陵以北京为行都）后，遂放弃海口之经营，由开放海禁时代，渐恢复为海禁时代。中国衰弱原因固多，禁海实为积弱之最大关键，是为研究海防者最痛心之事。

清代海防，初期沿明末旧制，闭关自守，沿海只设城营、风堡、炮台、烟墩。仅固步自封，不作远洋雄图。至公元1486年，葡人地亚士航行非洲南端之好望角，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世界海洋中心遂由地中海西至大西洋，东达太平洋。是时，西方海上势力一直逼破中国门户，葡萄牙占我澳门，荷兰袭取台澎，英、法、普、丹等国亦

相继泛海东来，至1843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遂洞开。满清见西人之船坚炮利，乃急于修海防、造轮船、练海军。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立海衙门，奈建设海军之经费为西太后移修颐和园，致海军力量薄弱。民国前二十年(1894年)甲午之役，我海军舰队为日本全歼于渤海；国人对海防信心遂生动摇，认为海岸线长不能防守。因此之故，库页岛为俄占领，鄂霍次克海领海权亦随之丧失。吉林沿海地方，清时已割给帝俄，如今朝鲜又为日本吞并，因此日本海领海权亦失。自旅顺、大连先租于俄，继租于日，刘公岛租于英，渤海海权因而不完整。自胶州湾租于德，黄海亦欠完整。自各国不平等条约取得我内河航行权，商船可自由出入长江口后，东海又欠完整。自台澎被日本强占，澳门隶于葡，香港九龙属于英，广州湾租于法，南海亦欠完整。

依据不平等条约，外国兵舰船只得行驶于中国内海及各口岸，不仅门户开放，且堂粤洞开，情势危不可终日。自乙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相继败后，国父孙中山先生遂决心领导国民革命，推翻满清，中国国运乃渐有生机。惟海防建设工作艰巨，仍需国人努力，始能迎头赶上也。

(二)民国时代之中国海军

国父领导国民革命，于辛亥年(1911年)十月十日，同盟会员策动武昌军队在南湖起义，全国响应。停泊武汉江面之满清海军，有建威、江元、楚泰、楚豫、湖鹗五艘及辰宿二艘响应。其后又有海琛、海容、海等各舰奉命进攻革命军，反参加革命行列，增大革命力量。

武汉起义，各省响应，促成革命成功之最重要一着，殆为上海之响应。而上海起义，首为沪江船队之响应，且协同陆军，光复南京。未几，十五省均举义旗，全国光复

矣。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举国父为临时大总统，黄钟英为海军总长，汤芗铭为次长，以青天白日旗为海军军旗。民国十七年，青天白日旗改定为国旗，并经国会通过，宣告中外友邦。

以地域言之，分为东北舰队、渤海舰队、粤海舰队、江阴电雷队；以学系分之，有青岛、福建马尾、广东黄埔、江阴电雷等海军学校。中国由于内战，故海军派系复杂，意见分歧。至抗战中期，中央为统一海军，消除地域、学系观念，使意志统一，力量集中，遂于重庆成立中国海军整建委员会，直属军委会，从事整建工作。当时，美英允赠我舰艇，并选送海军官兵，至友邦学习新战术与技术，俾于学成后就地接收舰艇。海军整建会初成立，开会讨论海军整建方案，其中最重要者为考选留学生之考选办法，当时决定公开考选。为求普遍，由中国各海军学校毕业生、海军军官，以及青年军中考选，学成后顺便接收友邦所赠之舰艇。

整建委员会主任委员按理由参谋总长何将军敬公兼任最为合适，敬公因事务繁忙，遂改荐我担任，而以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为副主任委员。当时，陈氏仍想保持马尾学系，以福建为中心。福州又以陈姓为中心，如陈季良、陈泳训等海军重要将领皆为福州陈家。故整建委会之成立，陈氏甚表消极。

当第一次开会，我探听陈绍宽不愿出席时，即秉公义私交拜访陈总司令，晓以大义，动以利害，劝其出席。我开诚布公说："中央为欲统一海军，增加实力，现得英美帮助，故有此举。故于此千载难逢之机会，为海军前途着想，应毅然出席，以贯彻整建海军之主张。"同时我表

示，我在会中仅挂一名义，一切主张与实权，悉尊重其意见。陈氏见我态度诚恳，以及中央决策之决心，故出席第一次会议，唯于会中一言不发。以后屡次开会，陈氏即很少参加，而以代表出席。至招考海军军官赴美留学时，海军学校如青岛、黄埔、电雷等学校学生服现役军官皆踊跃报名，唯海总所统属之马尾海军学校军官，陈氏则禁其来考，且以撤职威胁之。我得知此消息后，向陈氏表示，各现役海军军官，均希望踊跃来投考，中央并保证其职位，任何人不应阻挠。陈氏无奈，乃听其干部来考。当时考学委员会秉公录取官兵共二千余名，一并送往美英友邦留学。陈氏见中央决心整建海军，打破地域学系，因而消极，请辞海军总司令。其实海军舰艇绝大多数为日本优势海空军消灭，到重庆时，仅余少数小型内河舰艇，海军已名存实亡。中央为改组海军，乃任陈诚将军以参谋总长名义兼海军总司令，而以桂永清为副总司令，将海军彻底整建。当时，美国送我驱逐舰、炮舰共一百三十八艘，英国也赠借十三艘。内有七千六百吨之巡洋舰"重庆号"一艘，在二次大战时，英王曾以此巡洋舰为旗舰，至马耳他岛巡视，舰内设备新颖，战斗力强。另驱逐舰二艘，与潜艇四艘及其他船只共计十三艘。其后"重庆号"因见局势不佳而投共军，二艘驱逐舰，一撞沉，一退英。

谈至此，我记起一事，当英国赠我巡洋舰与潜水艇时，美国曾表示抗议，大意谓：太平洋防务由美国负责，英国不应有此一举。再者，抗战期间，当德意即将失败时，英国拟将接济欧洲地下游击队之五十万件武器转赠中国，当时由英国驻印总督魏菲尔遣代表至重庆作此表示，而遭魏德迈反对。魏氏说："中国若需要武器，由美国负责，不

需英国慷他人之慨。”坚不许此项武器经由中印公路或空运来中国。当时我亲自参与此事，曾面陈委员长蒋公：“中国是独立国家，外交上应有自由取决权，英国为我盟邦，其赠与亦有自由。英国赠我陆海军武器，美国竟从中阻挠抗议，不知是何居心？”蒋公只说：“魏德迈很坚决！”此事遂作罢论。

再者，到台湾之后，梁序昭将军为海军总司令时，美国赠我二艘驱逐舰“汉阳号”与“南阳号”，吨位有三千吨比一般为大。当泊于基隆码头时，我们曾上船参观，据海军人员传说，美方有二件附件并未移交，一为海军作战攻击利器之鱼雷发射管，一为对空识别器，此事亦不可解。

二、海军抗战概况

（一）敌我海军实力

1. 敌人海军

日本海军有一百九十余万吨，有主力舰、驱逐舰等各种舰艇（主力舰有达二——四万吨者），亦有航空母舰五艘及海军航空队（比陆军航空队为优）。以掩护及袭击敌人舰艇，此为日本国内所有者。

至于日本侵华之海军兵力，以泊上海之第三舰队为主，其编组兵力如下：

本队：出云（旗舰）、能登吕及海上特别陆战队。

第一外舰队：安宅（旗舰）、天龙、平户、常磐、对马及河用炮舰十艘，驱逐舰五艘。

第三舰队：那珂（旗舰）、阿武隈、由良。

第一水雷队：夕张（旗舰）及驱逐舰十二艘。

第一航空队：加贺（旗舰）、凤翔及驱逐舰四艘。

2. 我国海军

中国海军因内战频繁，派系分歧，在抗战时表面为统一，内容殊不一致，且重工业基础薄弱，仅能制造小型舰艇。所有兵舰吨位，最大不过四千，小者仅三百，鱼雷艇十二艘。总共五万九千零二十四吨。唯舰艇大多陈旧，缺乏战力。

(二)海军在抗战中战役经过

1. 淞沪战役

我海军因战力微弱，在淞沪战役中，即为敌优势海空军攻击，大小舰多被击沉，制海权为敌所控制。我舰艇所剩不多，以战况演变退入内地各江河，担任对敌之袭击、阻塞，封锁或布雷等任务。当时创立海军突击战法，潜入敌后袭击，或施放漂雷、定雷，以袭击敌船之运输，或于上游施放漂雷，妨碍敌船活动。海陆军协同之突击作战，予敌船只相当损害。

2. 内河作战

在江阴战役，为阻止敌舰潜入长江，于二十六年八月中旬，将江阴下游直至吴淞口之航路标志，如灯塔、灯标、灯桩、测量标杆等，一路扫除。且将江阴水道构成多数阻塞，以舰艇保卫之。时隔余月，敌舰不敢侵犯，仅以飞机轰炸。至九月下旬，敌机大编队向我轰炸，我在江阴舰艇沉着应战，击落敌机五架，我应瑞舰受伤，逸仙、楚有、海宁、建康等为敌炸沉，伤官兵六十三名。海军乃将舰炮卸下置江面当陆炮用，以加强江阴要塞火力，开设二道防线于镇江，敌机仍继续袭击，应瑞等大小舰艇一起被击沉。我江阴要塞海军炮击击沉敌舰二艘，伤一艘。其后，上海国军转进时，奉命将炮炸毁西撤。

3. 武汉会战

(1) 马当要塞战役——二十六年底，海军编成马当要塞，将荻港至九江间航标扫除，于东流、马当间分布水雷，并派海军陆战队与要塞炮队防守。二十七年四月，敌舰派大通、桂池活动，我海军游击队于羊山矶施放漂雷，将敌舰两艘炸沉。后敌以巡洋舰与多数驱逐舰攻要塞，我将巡洋舰击伤，敌使用陆战队登陆，绕道围攻要塞，我乃撤退。

(2) 湖口战役——湖口为二道阻塞线布置水雷区，以陆战队炮队协防。敌陆海军进攻湖口，我炮位遭敌机轰炸，故湖口无法与战。后于夜间将炮枪卸下，免落敌手，只以水雷阻塞湖口。当时我曾派炮舰三艘深入鄱阳湖内，事后敌舰潜入，三艘悉被击沉。

(3) 田家镇葛店战役——田家镇为武汉前卫，葛店为主要防线，各布水雷，以炮舰构成要塞，扫除九江至汉口之航标，并编组漂雷队，于二十九年九月上旬，曾越布雷区于武穴击沉敌舰两艘。敌以舰队二十艘向我进攻，被我击沉十六艘以上，其后敌再以优势海空军向我猛攻，我阵地全毁。十月下旬，葛店为登陆之陆战队包围，我再击沉敌舰四艘，遂奉命撤退。

自武汉会战后，国军进入第二期作战，我陆军进入山岳地带，采正规战与持久战配合，作持久战计划，我海军为配合游击战，封锁长江各要隘，以巩固重庆陪都，同时发展敌后游击。兹将我海军游击战与布雷状况略述如下：

(1) 武汉上游区——国军自武汉撤退后，海军为阻敌进攻计，乃由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曾以鼎指挥七个中队，分布内河各要点，以阻敌进攻，并袭击敌舰。

① 川江区——我为阻止敌军，巩固陪都，于宜昌万县

间构筑总炮台四座，配属舰炮、野炮、山炮及固定雷区漂雷队，阻塞敌舰活动。

② 武汉上游区——保卫武汉战役时，海军炮队构成城陵矶要塞，另派舰艇拒守金口、新堤、岳阳、长沙等处。后敌机以大编队轰炸我各守备要塞，我中山、楚谦、楚同等舰、于三十一年十月下旬均被炸沉，官兵伤亡一百余名，城陵矶要塞失守。

③ 荆河洞庭区——国军自武汉撤退后，建阻塞线于石首，以固定水雷及漂雷并用，虽宜昌失守，荆河仍为我水雷控制，致敌陆海军不能取得联络。自岳阳失守后，为巩固湖防乃布雷于湘资沅澧各水道，以控制洞庭湖。故于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均能阻止敌舰进入湘江以侵我长沙，使长沙据点巩固，获得长沙三次大捷。

(2) 武汉下游区布雷队游击战

国军自弃守武汉后，由汉口至吴淞口之长江水道，为敌运输兵员粮弹之主要航线。海军为达妨碍敌军运输之目的，乃将武汉下游划为若干布雷区，协同沿江战区游击队以钻隙突入长江沿岸，实施水上布雷，以阻击敌军交通。嗣海军布雷纵队下辖五中队，协助长江南岸第三战区新派出之游击队，突入长江南岸实施布雷战，划分为第一布雷区，由新堤、湮仁口起至龚家台止。各布雷区自二十九年一月起至抗战胜利为止，于长江流域上自监利，下至江阴，共炸沉敌舰十六艘、商船二艘、汽艇六十六艘，官兵伤亡与物质为数不计。

(3) 闽海浙东，珠江、东江、西江、邕江各水道，海军均派有布雷队，协助当地陆军布雷作战，收相当战果。

4. 海军陆战队(只一个旅)

我海军军舰为敌歼灭后，我陆战队遂改成陆上之用。自平汉线失守，粤汉路乃成为主要交通干线，陆战队主要工作除担任此护路外，另用于维持后方治安，保护后方要道。当时福建土匪多，曾派陆战队前往清剿。

第十九章　抗战中的空军

一、空军作战概要

空军为近代科学之产物，自有空军后，即将过去陈旧之兵学原则推翻，创造新时代之兵学定律，此新军种成为战争新利器，可支配战场命运。

飞机之发明，一般人皆归之于欧美科学家，唯在春秋战国时代（纪元前六百年），中国之墨子，曾费三年之时间，制造能飞之木鸢，已胎育有空中飞行思想。至十九世纪末期，美国兰格莱团体，英国马克兴根据物理学研究，发明飞机制造。当时，以蒸汽机为原动力，因飞机本身过重，且蒸汽动力不大，故飞行速度很低。赖特兄弟又继续试验几次，其中最高纪录，飞行时间只达五十九秒，距离仅八百二十五公尺，但两兄弟因此获很殊荣，此为发明飞机简史。

当时科学家研究发明飞机之动机，纯希望人类翱翔于广阔之天空，不料以后为兵学家所利用，作为战争杀人之利器。

第一次大战（1914—1918）时代之空军，虽只能协助陆海军作战，而不能担当独立作战任务，然予敌精神威胁甚大。德国之败，原因固多，但彼承认飞机与英国发明之坦

克，为协约国致胜之利器。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军事家一致注意空军之发展，由平面而进入主体之战争，空军居于显要地位，与陆海军鼎足而三。在战场上，若不能掌握制空权，陆海军活动很受限制，甚至遭遇惨败命运，于国防上，若无制空权，国防很难确保。当时，意大利之杜黑将军是"唯空论"之倡导者，为现代空军理论权威。在二次大战之前，他曾以书面向意政府陈述意国陆军弱点。盖意境多山，大军团活动困难，且意大利为半岛，海岸线长，不易防守，故建议建造空军，由空军解决战役。当局认其有侮辱陆军之嫌，遂捕之入狱。至欧战发生，意国陆军果遭惨败，军事当局检讨失败原因，始觉悟所有弱点；杜黑已曾言及，至此方将其释放且加以重用，以之任空军司令。

杜黑以新兵学思想，发扬创造理论，其书中有云："空军在未来战争地位，有主宰战场权威，将压倒一切作用。空军之胜败，可决定交战国之命运。"杜黑为近代空军理论之泰斗，其最有名之著作有"空军论"、"奇袭论"、"制空权"、"制空权之争夺"、"制空论"、"飞机辅助战术论"等学说，皆在说明空军之威力，提醒意国朝野当局注意。杜黑之"空军至上主义"，在求先掌握制空权，在其"未来战争之型态"一书中，曾评论制空权之重要，其中有几项原则，摘录如下：

(1) 敌人失去制空权后，完全不能对我陆海空军实行空中袭击。

(2) 夺取制空权之一方，可向敌整个陆海领域内，实行空中袭击。

(3) 本国陆海军交通联络点，有制空权始有完全之警戒。

(4) 有制空权之一方，陆海军随时有空军之掩护。

(5) 因此优势之一方，使敌人不能再建空军。

杜黑之空军至上主义，于战略上，主张奇袭。以为交战国对敌人早下决心，以快速大队空军，不待空战，出敌意外，大规模奇袭，攻击敌人国土；或以空军投下毒气攻击，使敌政治中心、大城市、航空战，于晴天一刹那间遭受毁灭，有若大地震之突然来临，使敌无所措手足，此为以空军闪袭战结束战争。

以上所述为杜黑之空军理论与战略之运用，在当时虽很新奇而正确，然不能为意采纳，反为德国所拾用。德国格鲁诺将军任国防部长，注意研究杜黑理论，建立大规模空军，一九三三年适遇希特勒上台，又任崇拜杜黑之戈林将军编练世界最强大空军，以凯塞林专任训练，米尔奇担任组织。有此四大崇拜杜黑理论之将军，故德国得以建立大规模空军。不仅此也，德国且采用英符勒将军之机械化理论(符勒于英国并主张队伍机械化，邱吉尔任首相时，利用其理论，初以耕田机改造成战车，故于第一次欧战中首先使用，使德军措手不及)。建立大规模机械化部队，以大规模空军配合，创立"闪电战术"，故能于战争爆发之短期内，席卷全欧。

德国因接受杜黑之空军至上主义，与符勒将军之机械化主张，建立强大之空军与机械化部队，创立二十世纪新型闪电战术，组织闪电战全能部队，故初期战无不胜。现今进入太空时代，情况复有不同，有长射程之火箭，破坏力极大之核子武器，不容讳言，将来之战争当与二次大战情况有异，唯传统武器之战争，空军与战车仍不失为战场利器。一般兵学家谈论历来战役，咸认武器为战场决胜负之要素，

例如：第一次大战，英美以空军与战车击败德国，至第二次大战发生，最先即使用此两项第一次大战末期所发明之物。迨第二次大战，英美仍以战车于欧战场压倒德国，而于远东，决胜负者仍为美国之原子弹。据此推断，若第三次大战一起，定首先使用原子弹，此为战争武器演进之定律。

二．抗战中空战战役述要

（一）日本空军兵力之判断

1．日本平时空军分隶于陆、海两军，陆军航空队第一、二线飞机共约八百架，海军航空队飞机约七五〇架。编组上，陆军航空队下有航空兵团，辖有飞行团及直属飞行联队。每一飞行团辖二至三联队，每一联队辖有大队一级，大队辖有三至五个中队。

海军航空队分陆上与舰上两种，陆上航空队以驻在地为番号，分隶于横须贺、佐世保、吴港三个镇守府，舰上航空队分隶于各航空母舰及水上机母舰。

2．日本战时空军兵力——自中日战争开始，日本陆军航空队立即改为战时编制，计有陆军航空队之第一线飞机七百架，为对华作战之主力。其编组系于航空兵团下，辖二个飞行团及直属部队与独立中队，配属若干地上防空部队，另有野战航空厂，则直属于兵团司令部。

战争初期，日陆军来华作战飞机约有二百架，大部在华北作战，日对我作战之海军航空队直隶于“中国方面舰队”之下，兵力系抽调大村、木更津，鹿屋三个陆上航空队，编成轰炸、驱逐、侦察等飞行队，舰上航空队系抽调加贺、龙骧、凤翔、神威、香九丸、神州、能登吕等母舰，编成四个航空队，兵力共有飞机二百五十架，专负淞沪区协

助陆海军作战，或战略轰炸任务。嗣后，日军侵华地域逐渐扩大，空军兵力亦随之增加。为指挥便利计，增设飞行集团司令部一级，并将作战部队改为飞行战队，废除联队、大中队番号。每飞行战队辖二至三个中队，机种有轻重轰炸机、侦察机、驱逐机合共二百八十二架。海军航空队有航空母舰、水上机母舰、各型飞机二七三架，总共五百五十五架。

(二)我空军兵力

自芦沟桥战争发生，我空军为指挥便利计，设立空军前敌指挥部，以周至柔为总指挥，毛邦初副之。至二十六年八月，又改设第一军区司令部，以沈德燮为司令官，石邦藩为参谋长，作战部队共十个大队，兹简介如下：曹文炳为第一大队大队长，张廷孟为第二大队大队长，蒋其炎为第三大队大队长，高志航为第四大队大队长，丁纪徐为第五大队大队长，陈栖霞为第六大队大队长，陶佐德为第七大队大队长，晏玉琮为第八大队大队长，刘超然为第九大队大队长，另编一学生大队。其后又成立特务大队(空运)，以杨光宇为大队长，合计三十五个队，总共有各型飞机三百〇五架。至二十七年三月，撤销空军前敌指挥部，设立空军路司令部三处，以张廷孟为第一路司令，刘牧群为第二路司令，田曦为第三路司令。作战部队之编组，计有轰炸大队三个(含俄志愿队一个)驱逐大队五个(内有俄志愿队二)侦察中队一个，其后因作战关系，人机皆有相当损耗，仅剩五个大队，作战飞机仅余一百二十六架，以后陆续补一百〇四架，合共二百三十架。

(三)空战述要

自"七·七事变"后，我空军即以主力集中华北，对敌

作战，至"八·一三"淞沪战起，遂调赴淞沪地区。当时我轰炸大队，以敌人据点与海军泊吴淞口舰队为目标，驱逐大队保护杭州、南昌等空军机场。兹将空战中战役择要叙如下：述

1. "八·一四"空战

"八·一三"沪战爆发，我空军即于十四日分批在沪轰炸敌军事据点与舰艇，同日，敌机亦分批袭我杭州与广德机场。我第四大队各机，甫自周家口抵达笕桥机场，即紧急升空作战，由高志航率领队长郑少愚、李桂丹两机群共二十七架，分途拦截敌机，奋战结果，当场击落敌九六式轰炸机三架，首创空战之光荣纪录。后中央定此日为空军节，借以表扬战功而资纪念。

2. "八·一五"空战

八月十五日，敌机六十余架分批轰炸我南京、杭州、嘉兴、曹娥等机场。敌军除使用舰上轰炸机外，并调其最精锐之鹿屋及木更津等海军航空队，进驻台湾与青州岛，超重俘攻我首都及主要机场，期一举摧毁我空军。我空军第九大队于曹娥上空击落敌九四式轰炸机四架；第四大队于杭州上空，击落九四式轰炸机十六架，并协同第三、五大队及航校暂编部队于南京上空，共同击落敌机十四架。八月十六日，敌又以轰炸机分袭各地，复被我第四、五、三各大队，分别于杭州、句容、嘉兴、南京、扬州上空截击，共击落八架。经三日之剧战，总计击落敌机四十六架之多。木更津与鹿屋二联队，经此一役，为我消灭殆尽，实为敌始料所不及也。而我劣势之空军有此辉煌之战果，中外报纸皆一致赞扬。

3. 轰炸白龙港敌舰之役

八月十九日，我第二大队龚颖澄、谢郁青各率诺机（轰炸机）七架，并由第四大队李桂丹率霍机（驱逐机）六架为掩护，往白龙港岛一带袭击集结该处之航空母舰，结果炸沉巡洋舰一艘。是役，队员沈崇海驾机因故障乃加足油门，向关舰俯冲，结果与敌舰同归于尽，壮烈牺牲。

4．轰炸上海敌军司令部

自上海战起，敌我陆军对峙于上海虹口附近，我空军为摧毁该地区之敌军司令部与兵营，以协助陆军之进攻，乃于八月十七日以空军第四、二、五、七等大队之霍机十七架，诺机十二架，可机十五架，由副大队长孙相岗及队长董明德、杨鸿鼎，刘粹岗、李桂丹分批率领，前往轰炸敌虹桥阵地与司令部，敌损害甚大，并曾击落敌驱逐机、轰炸机各一架。是役，因敌高射炮火力猛烈，我队员阎海文驾机被击中，跳伞降落敌方，为敌包围，该员不愿被俘，拔枪击毙敌人而以最后一弹自杀。敌人为敬仰阎氏之壮烈殉国，特厚加葬殓，并为之立碑（"支那空军勇士之墓"）纪念，即敌国之报纸，对其壮烈殉职事迹，亦加赞扬。

5．南京空战

敌以陆海空联合兵力于上海沿海登陆，占领据点后，于上海，崇明岛开辟临时机场，同时，敌新式飞机亦逐渐改良，数量亦日有增加。反观我航空工具落后，虽有由友邦购买或赠送，惟为数有限。空军作战必定有一线作战机、二线预备机，以及工厂制造机，源源补充，始可持久。

上海、扬州、广德等处空战，敌我双方均有损失，但因我补充困难，以致几次空战后，制空权不能确保，当时我空军不敢白天出去，改行夜间袭击，惟夜间设备简陋，动作困

难。九月十八晚，我出动飞机二十四架，使敌遭受重大损害。敌于翌日向我报复，以舰上驱逐机、轰炸机三十余架，空袭南京，我以驻南京、句容各队驱逐机二十一架，由队长毛瀛初、萌壮如、黄新瑞，分率霍机及波音机迎击，展开空前剧战，格斗拚冲，结果击落敌机一架，创机四架。是役我队员刘兰清、戴广进阵亡，刘依均、刘宗武、杨吉恩、吴鼎臣均负伤。

6. 太原、南昌及武汉空战

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太原空战，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南昌空战，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汉口空战，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日武汉保卫战，共击落敌机一百一十五架，俘敌"驱逐之王"三轮宽少佐一员，旋因伤重致死。武汉保卫战，炸伤敌舰六十七艘，沉二十三艘。以上各次空战，我击落敌机十八架，伤四架，阵亡大队长李桂丹一员、队长吕基淳、队员梁定苑、巴清正、王怡、李鹏翔等五员。

7. 远征日本之役

民国二十七年春，我空军为宣扬国威，唤起日本军阀与民众之觉悟，策定以纸弹作宣传工具，远征日本计划。惟我空军向缺乏海洋航行训练，对空通讯设备又简陋，故对远征航行之指挥、气象及场站之通信问题，均临时着手准备，如加设飞机定向仪、短波通报机，及地面对空电台之呼声等。经苦心研究，准备妥善后，于二十七年五月十九日，由第十四队队长徐焕升率第八大队第十九队副队长佟彦博，分驾马丁机二架，携带小册传单，由汉口起飞，经南昌、衢州至宁波前进基地降落加油。于十九日二十三时，再由宁波起飞赴日本，在长崎、福冈、久留米、佐贺及九州各城市散发传单，并侦察日本机场及军港情况。二

十日，各机曾分落于玉山、南昌，十一时三十分回汉口集合，完满达成远征日本之任务。

三、第二期作战敌我空军概况

(一)敌空军兵力

自武汉会战后，敌占地渐广，兵日亦增加，至二十八年十月间，计有陆军航空队十个，战斗队四个，独立战斗中队二十九个，各型飞机三百余架。海洋航空队及加贺、龙骧、苍龙三个航空母舰，能登吕、神威、香九丸，神州丸、千岁五个水上机母舰，计各型飞机三百余架。

第二期敌空军战略，以政略轰炸为主，战略袭击为辅，对我重庆行都以及后方重要城市、文化商业中心，采取普遍轰炸政策，以打击我国民抗战意志。至二十九年秋，敌机更突增至八百架以上，以其精锐猛炸四川我抗战基地与国内运输线，以打击国民战志与物资补给。迨三十年秋，敌为准备南进，将在华空军一部抽调越南。至三十一年太平洋战事爆发，敌在华精锐皆抽调一空，迄抗战末期，敌在华空军兵力仅有飞机三百余架，除对重庆施行疲劳轰炸外，其余均用于前线地区之防卫，未有积极之意图。

(二)我空军兵力

自淞沪会战起，至武汉会战止，我空军以劣势兵力屡对敌优势空军作战，虽建立许多功绩，惟损伤太大，实力锐减。至第二期作战初期，除以一部在赣南、川东任防空警戒外，主力均调后方整训。经二十八年整训后，作战部队又编有七个大队，一个独立中队，及四个苏俄志愿大队。有飞机二百一十五架，军区司令部仍为一个，路司令部仍为三个。至二十九年，除将第一军区司令部改为第四路司

令部，其它原有七个大队及第一、二、三路司令部仍旧外，俄志愿队均予撤消。是时计有飞机一百六十架，用以保卫行都与重要交通线，并支援前线作战。其后再经消耗，至二十九年底，仅剩飞机六十五架。三十年初，又自苏联补充轰炸机一百架，驱逐机一百四十八架，惟性能远较日本为劣。三十年四月成立空军总指挥部。专负作战训练之责，五月又成立第五路司令部于昆明。六月，由美国购到P—40驱逐机一百架，适美国陈纳德将军组织志愿队，此飞机即拨交其使用，我作战部队仍为七个大队。至三十一年三月，美国补充新机渐次到达，各队分派人员赴美及印度卡拉蚩受训，七月以后，训练完成，接收新机，迄年底共接收B—29轰炸机十九架，P—40驱逐机二十七架，P—43驱逐机四十一架，P—66驱逐机八十二架，总共三百三十七架。三十二年，仍保留五个路司令部，作战部队仍为七个大队，另有一个混合大队，嗣复将第一、三、五三个大队编隶中美空军混合团，本年空军大部时间用于训练新机，对于作战，采机动集中原则，以打击敌人，三十三年，我空军作战部队仅有第一、二、三、四、五、十一等六个大队（四驱逐二轰炸队）。至三十四年抗战结束前，第二路司令部取消，由张廷孟、徐康良、刘国运、晏玉琮分任第一、三、四、五路司令官，作战部队计有第一、二、三、四、五、八、十一等七个大队及第十二直属中队。年末我空军陆续接收美B—25、P—40、P—51等新式飞机，实力增强，装备、速度、性能均较敌为优。同时，敌精锐调往太平洋，故制空权渐操我手。

四、第二期抗战中空军作战概略

本期自二十八年冬季武汉会战起，至三十四年夏季胜

利为止，在本期空军作战中苏俄飞行员曾与我空军并肩作战。民国二十八年有苏俄四个志愿大队来华，机种有驱逐机E—15，E—16，轰炸机S—B，D—B，唯驱逐机性能不佳，较敌为差，轰炸机因曾参加西班牙内战，屡经改良，故相当优秀。至三十年六月，我由美国购来P—40驱逐机百架，当时美政府准许美志愿飞行员驾驶美国军用飞机，遂将此百架飞机拨交陈纳德所主持之飞虎队使用。是时日苏中立条约签订，苏撤回志愿队。旋由美国志愿队接替。自飞虎队组织后，增加西南防空力量，支援陆军作战（当时陈纳德采取两机作战之新队型）。由陈纳德之飞机（驱逐机为主）我组织中美空军混合团，机种有P—38等优秀飞机，美国之飞行员技术、飞机性能，均较日本为优（美国教育程度高者，多任空军），予中国飞行员增加无限信心，至三十四年中美空军夺回制空权。

（一）轰炸运城之役

二十八年二月，我派第十队队长刘福洪率伏尔梯轰炸机四架，每架携带十四公斤炸弹二十枚，轰炸运城机场，炸毁敌机十余架，第二次以俄式S—B机十二架再炸该基地。

（二）兰州空战之役

二十八年二月，敌机三十架，分三批袭击兰州，我第十五、十七队起飞E—15、E—16机十五架，俄志愿队起飞十四架，与敌空战，敌机性能平平，被我击落九架，之后敌机再以二十架来袭，复被我击落六架，战果辉煌。

（三）轰炸南昌之役

二十八年五月我第一大队大队长龚颖澄，率俄式S—B五架轰炸南昌近郊敌阵地与机场，予敌以重创。

（四）轰炸汉口之役

敌于二十八年九月上旬，集结十万以上陆军一犯长沙，我于十月三日以俄自愿队DBS飞机九架，轰炸汉口，毁敌机二十四架及修理中之飞机十余架，第二次复以DBS机二十架轰炸汉口，击落敌机三架，毁敌机五十余架，减少其支援长沙作战之威力。

（五）桂南会战之役

二十八年冬敌攻占南宁后，并集结各种飞机二百五十余架、谋截断我西南国际交通，妨碍我战略物资输入，我空军集结飞机一百一十五架，以第一路司令官张廷孟驻柳州，第二路司令官邢铲非驻桂林指挥作战，炸毁敌机十五架，击落敌机十一架。

（六）敌机袭击重庆

二十九年夏秋之交，敌机九十架，袭击重庆，我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郑少愚，率各式驱逐机二十九架，分批拦截敌机，先以六架待于上空，炸散其队形，再分别施以攻击，是役击落敌机二架，击伤多架。

（七）璧山空战之役

二十九年九月中旬，敌九七式轰炸机三十六架，以零式驱逐机三十架为掩护，袭击重庆，我仍以郑少愚为总领队，率E—15，E—16机共三十四架，分为四编队群迎击，与敌遭遇发生激烈空战，我总领队负伤仍奋勇与敌搏斗，各队员亦奋勇迎击，惟因我机性能较差，被毁十三架，伤十一架，阵亡八员，负伤十名。

（八）成都空战之役

敌零式驱逐机十二架，于三十年三月中旬，袭击成都，我第五大队大队长黄耕瑞，率机三十五架，采重层配

置战术，于双流附近与敌机遭遇，激战三十分钟，击落敌机六架，我黄大队长，副大队长等四员阵亡。

（九）第二、三次长沙会战

三十年九月间，敌集结飞机百余架，舰艇二百余艘，陆军十余万人二次进攻长沙，我空军为协助陆军作战，出动俄式S—B机二十二架，分批袭击洞庭湖敌舰艇，与长沙以北之敌，予敌相当损害。三十年十二月下旬，敌再发动第三次长沙会战，我空军原拟协助陆军，攻击进犯之敌，因气候不佳，不能按予定实施。嗣后由第二大队长率队与敌驱逐机八架遭遇，结果击落敌机一架，伤二架，我机亦被击落二架，阵亡三人。

（十）远征越南之役

敌因实行南进政策，在越南及西贡基地集结陆海军航空队，共有各型机四百五十架，其主要基地为嘉林机场，我空军为协助陆军作战，乃于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二日以S—B机十八架，由第一大队副大队长杨仲安率领，并以美国P—40驱逐机九架担任掩护，是役因天气不佳，目标为云层遮盖，投弹后结果不明。至二十四日，仍由杨仲安率领原机前往轰炸，又因天气不佳，目标仍为云层遮蔽，乃用计时轰炸法，成果无法判明。两次轰炸均未遭敌机抵抗，惟高射炮火力甚猛，此次以计时轰炸，为我空军创举，是役除邵瑞麟机迫降越南汶河，被法方俘虏，后1763号机发生故障，何健生跳伞落入敌境，为敌俘获外，余均安返基地。

（十一）鄂西会战

三十二年四月下旬，敌各型飞机二百四十八架，协助陆军十万侵犯鄂西，我机一百六十五架协助陆军作战，自

五月十九日起，分批轰炸汉口、宜昌、沙市各机场，计击落敌击四十一架。炸毁敌机六架，伤敌舰二十三艘，及车辆人马甚多。

（十二）梁山空战之役

三十二年六月六日，我第四大队长李向阳，率领P—(40)机十三架，向聂家河攻击，协助我军作战。返航途中，于奉节上空，发现不明机十余架，当我机照予定计划降落梁山加油之际，驻梁山指挥官杨鹤宵以敌机追近，即命该机群起飞迎击。是时敌机八架已追踪至机场上空投弹，因时间匆促，我第四大队中队长周志开，未携带保险伞即奋不顾身冒险起飞，单机向敌机群攻击数次，敌乃向东逃逸，周仍紧追不舍，至云阳、巴东上空，先后击落敌轰炸机三架，击伤数架，造成抗战以来最勇敢、最辉煌之战绩。

（十三）常德、豫中、长衡、桂柳会战

各次会战均为中美空军并肩作战，兹分别简述如下：

1. 常德会战——敌为牵制东南亚盟军攻势准备，集结陆军十万，飞机二百五十三架，向我第六战区发动攻势。我空军中美混合团，及第十四航空队，共有飞机二百架，协助陆军作战，对常德藕池口石首、华容等处之敌攻击。自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十六日止，计出动轰炸机二百八十架次，驱逐机一千四百六十七架次。击落敌机二十五架，可能击落十四架，击伤十九架，击毁地面机十二架，并炸毁敌兵舰船只人马甚多。

2. 豫西会战——三十三年四月，敌使用各型机一百五十六架，另于北战场集结飞机一百一十四架以为牵制，我中美空军为夺取豫中制空权，共使用各型机一百五十六

架，由航空委员会及第一路司令张廷孟，第三路司令王叔铭，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分别指挥，在空中击落敌机八十七架，炸毁地面敌机七十九架。

3．长衡会战——三十三年，敌在东南亚之战场补给，因受盟军海空之威胁，乃妄想开拓大陆交通以与南洋联络，于武汉地区集结优势空军计飞机一百六十八架配合陆军，在湘北发动大规模攻势，企图打通粤汉路。我中美空军集结飞机一百八十一架，支援陆军作战，夺取制空权，自五月二十七日至九月六日三个多月时间共击落敌机七十架，可能击落二十九架，击伤十七架，毁地面机五十二架，可能炸毁十余架。

4．桂柳会战——敌占长衡后，继续发动桂柳会战，以打通湘桂越二路，与东南亚之敌联络。我空军以原有兵力协助陆军作战，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至十一月九日会战期间，计击落敌机三十四架，可能击落十四架，击伤十架，毁地面机六架，毁敌军车四百余辆，大小船只共五百七十八艘。

（十四）洞庭湖空战之役

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中美空军混合团P—W机二十一架，掩护B—25机六架，轰炸羊楼司车站及敌仓库，于完成任务返经洞庭湖上空与敌遭遇，先后与敌零式二、三型机四十架发生空战，结果击落敌机十架，我机无损失，安返基地。

（十五）豫西、鄂北会战

三十四年三月，敌为确保平汉路南段交通，集结四个师团以上兵力与各式机一百〇六架向西进犯，我空军于三月十二日起，即以第一、三、四、十一各大队及中美混合

团支援陆军作战，予以甚大助力。

（十六）湘西会战

敌为迟滞我反攻准备，破坏我芷江机场，保障其粤汉路南段及湘桂路安全，遂发动此战。敌以四个师团兵力及各型机一百三十五架，于四月初旬向湘西进犯。我空军无论数量或质量均较敌为优，自始即夺得制空权，协助陆军作战。而陆军以美械设备居多，陆空联合歼敌一联队以上兵力，及其炮兵甚众，敌陆军避开公路由崎岖山路及浓密森林中进犯，不使目标暴露，不料为我侦出，以汽油弹投掷林中使其燃烧，敌损失重大，敌取攻势，至此完全失败。

检讨制胜原因如下：

1. 我空军于作战期间，派遣飞行军官至前线距敌约一千码处，设置流动对空电台，指示我机攻击目标及弹着偏差之修正。

2. 前线陆军铺设白布板，俾飞机易于识别。

3. 对隐蔽森林内敌军投掷汽油弹，收效最大。

4. 我空军能确实保持战场之制空权。

以上几项，为陆空联合作战最有效之办法，必须谨记。

五、敌我空军之检讨

空军为最近成立之军种，科学之产物，其战斗特性完全，以速度压倒速度，以火力压倒火力，决战最速，消耗最大。

若敌机航速快，升高亦快，火力亦强，空战时即占便宜。与敌空战必须有性能优越之飞机与技术高超之驾驶员。同时，不仅质量要优，数量亦不可少，且须有充足之

二线补充机与高度制造能力，始能永保制空权，掩护陆海军作战，争取最后胜利。

(一)日本空军

二十六年"八·一四"敌我空军在京沪杭上空正式空战时，敌仅有九三式轰炸机，九四式侦察机与九五式驱逐机，嗣后敌机逐渐改进，以零式驱逐机最具威力。在第一期空军作战，敌机质量数量均较我为优，故对我轻视，致有鹿屋木更津两轰炸大队袭击我京沪杭，而无驱逐机掩护，遭我拦截消灭大半之失算。

(二)中国空军

我国因轻重工业落后，不能自造修配飞机。北伐时，我政府曾购买少数飞机，惟无定向器，不能作远道航行，仅能凭肉眼所视，投掷小炸弹。当时苏俄红军曾派有飞机十余架来华，由广州起飞却无法飞越大庾岭。攻武昌时，曾以飞机轰炸蛇山炮兵阵地，并未产生多大效果。至抗战时，成立航空委员会，设航空学校于笕桥，并组织九个大队，其中有学生大队，有运输大队，陆续购买友邦飞机杂凑，机型有道格拉斯、马丁(美)霍克(驱)可塞、波因伏尔梯(轰炸)等共三百〇五架。"八·一四""八·一五"空战时，我空军纯凭士气以主力将敌二联队飞机击毁四十余架，奈因我军人机消耗很大，故由苏联以E—15、E—16、S—B人机支援会战。惟苏俄驱逐机性能不佳，未能挽回空中劣势。至日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撤回顾问与飞行员，无异鼓励日本南进。待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先以志愿队来华，继组织中美空军混合团，对我大量援助，其中计有B—24、B—25轻轰炸机，B—29远程轰炸机及P—40、P—43、P—66、P—51等各型驱逐机与P—38侦察机，凡此均较日机为优，

故制空权转移我手。在中英缅战场上，日本空军居于劣势，故海军亦遭挫败。其后，美国以原子弹投掷广岛、长崎，结束战争，否则，日本仍难逃一败。

六、我对空军建设的三个建议

民国二十八年，我以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副参谋总长与军训部长，并担任校阅委员会主任委员，于校阅成都空军回来后，因有所感，即向军事委员会提出下列三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设立空军幼年学校。

自二次世界大战开始，飞机使用于战争，精神上予敌以最大之威胁，破坏力亦最可观。始者，空军附属海陆军，居附属地位，其损害率较陆海军为大。自第一次大战后，各国之竞争增强空军力量，后逐渐独立，与陆海军鼎足而三，成为独立军种，其重要性较之陆海军有过之而无不及。必定有制空权，陆海军始能活动。在国防上无防空即无国防，殆为近代兵学定论。世界各国均培养优秀空军人才，如德、苏、日成立幼年空军学校，自小养成牺牲精神，锻炼强健体格，使其担任冒险犯难之艰险任务。就中国一般青年而论，体格不健，体力不强，在学力上亦优劣不等，故当时我建设成立幼年空军学校，招考高小毕业生，受训六年（初高中各三年）。在受训期间，除课程照普通中学外，并加强粗浅军事学识，如跳伞、滑翔及各种体育活动等。幼年学校旨在养成冒险犯难之精神，此议经中央采纳，即于四川灌县设立，以陈嘉尚担任校长。在台湾目前担任巡逻及屡次击落敌机号称“空军英雄”的飞行员皆系当年幼校出身，现已成为空军之中坚分子。惜到台后，周至柔将军

任空军总司令，为节省经费与时间，故停办幼校。当时我闻此消息，与他晤谈，要他从长考虑，尤其在台湾空军官校招生，每年不足之情形下，更不应当停办，此一为空军储备人才之幼校，结果仍然停办。至陈嘉尚任总司令时，知招生困难，始复校于东港，因台湾教育普及故招初中毕业生，再修业三年，如此可节省三年之时间与经费。

第二个建议：设立空军军士学校。

按德、日、俄等国空军编制，分军官与军士两种，美国因教育普及故不分官兵只分队长、队员，我国教育不若美国普及，如以大学毕业生为队员牺牲，实补充不及，故我建议成立空军军士学校。当时以刘炯光为校长，招考军士，而中学毕业生亦来考，后以军士作战立功，若仍当军士，实嫌委屈，故现在中国空军亦采美制，分队长与队员。

第三个建议：成立空军通信兵学校。

通信有空中通信、空地通信二种，以无线行之，至于陆地与陆地通信均用有线电，通信为空军之要素，空军成立以来，均无通信兵科，仅有通信兵训练班，只为技术人员，不是兵科，故我建议成立空军通信兵科，当时有空军人员对我说："通信兵岂可单独成立兵科。"我说："陆军既可，空军有何不可，且必要时，空军通信兵亦可以武器射敌。"此议终被采纳。

第二十章　防空作战

防空有空中防空与地面防空两种，空防由空军担任，地面防空则由高射炮队任之。本篇专述地面防空。

一、战前我国防空部队之创立

我政府鉴于防空之重要，于民国二十二年在杭州成立高射炮训练班及人民防空研究班，继即设立防空学校，以训练防空干部，并购置防空武器器材为防空部队编练之基础，二十五年成立高射炮兵营、团，使用三·七公分机关炮，附以二公分小炮及一·三二公分高射机关枪，另成立照测队，此为中国地面防空武力之建立。当时由黄镇球将军主持筹划。

二、防空作战指导与部署

(一)防空队以主力机动使用、分散配置为原则，于军事政治经济中心、交通要道、桥梁、工厂等处派高射炮队防守，以一部协助陆海空军作战。

(二)防空要领

1. 地面防空应分散配置，重点使用，以有限之兵力作经济有效之使用。

2. 为巩固首都，在南京上空构成浓密火网，以保障首都之安全。

3. 各处防空部队以统一指挥为原则。

4. 严密防空监视哨之组织，监视敌机，迅速确实报告敌情。

三、防空作战之经过概要

自二十六年"八·一三"淞沪战起，敌恃其陆海空军兵力强大，企图一举消灭我战斗力量，敌先以优势空军摧毁我空军，取得制空权，以协助陆海军作战，妨碍我运输与国际

补给交通线，破坏我军事、政治、经济中心，滥肆轰炸，以动摇我国民抗战意志。南京失陷后，我军事政治重心西移，我防空目的，旨在保护国家潜力，以完成战略任务，对防空部署应颁布调整全国防空机构，其办法：成立各省防空司令部，综理全省防空事宜。二十七年春，扩充防空部队，成立高射炮兵两团及照测总队，扩大防空学校训练。培养防空干部，加强夜战防空，以辅助陆海空军及要塞之作战。年来我防空部队遍布全国各地区，为便于指挥调动及管教计，乃于三十二年实施分区指挥制，全国共分五区。第一区指挥部位于重庆，指挥四川境内高射炮部队。第二区指挥部位于巴东，指挥湖北、湖南等处高射炮部队。第三区指挥部位于桂林，指挥粤汉、湘桂二路与闽赣二省高射炮部队。第四区指挥部位于昆明，指挥滇黔地区高射炮部队。第五区指挥部位于西安，指挥陕、甘、宁与豫西高射炮部队。

四、抗战第一期敌空袭之特点

（国民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秋）

敌机初期以政略轰炸为主，战略轰炸为辅。我空军因居于劣势，所有重要地区与要塞地区与要塞之空防皆以防空部队担任，以减少敌机轰炸之损害。至三十年九月敌因南进，将在华空军精锐调走，减少我空军压力。是时，敌亦变更政策，改以战略轰炸为主，我高射炮部队任务亦渐减轻。

五、我高炮编组

在军委会之下，设立防空总监部，以黄镇球将军为总

监；各省成立防空司令部，由各省保安司令兼防空司令；各县市成立防空指挥所，由专员任指挥官；各乡镇村街，成立对空监视哨，若空中发现敌机，所有乡村电话网即报告各处防空情报所，转达空军地区指挥官。指挥官得报后，或命飞机迎战或避战，视情报如何为准。

防空总监部编有高炮部队第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五、四十八、四十九等团，有德式七·五，俄式七·六二高射炮，另有三·七公分高射炮，二公分高射炮，一·三二高射机关枪，对空发射有指挥仪、探测队等。

六、敌机空袭统计

自二十六年“七·七事变”起至三十四年八月敌人投降止，为时共计八载，敌机空袭我全国各地一万二千五百九十二次，机数六万二千九百〇九次，投弹二十六万一千一百四十八枚，约一十三万吨，炸死九万四千五百二十二人，伤一十一万四千五百〇六人，损毁房屋四十六万二千七百八十七间，平均每百枚炸弹炸死六百一十九人，伤四千四百二十三人，损毁房屋一万七千七百二十一间，其它物资财产则无法计算。我国无制空权，故损失惨重。

七、地面防空之检讨

中国土地面积辽阔，共约一千一百余万平方公里，是以敌机可由四面八方侵入我领空。为识别敌我飞机，暨敌机种类、数目，各省市县，各乡镇村街民众均须有组织有训练。当时于各乡镇村街皆架有电话网，以随时传递情报。各地区之空军指挥官接获情报后，可预作处理，以情报为依据，判断敌情或令我机起而迎击，或实行避战。

例如，抗战第一期，当时我空军仍使用俄式E－15、E－16驱逐机，性能较日本零式驱逐机大逊一筹，故航空委员会下令采取避战之战略。某次，适遇敌机来袭，成都地区司令官张有谷即命驻成都空军大队长吕天龙率领飞机十六架，前往西北天水方面避战。是时，吕天龙卧病在床，乃由副大队长余平享率领，机群飞至天水上空，因所带油料有限，乃按照预定计划拟降落下水机场加油，而机场亦铺设白布板，表示可安全降落。就在我机下降时，敌机忽由云层中穿出，实行奇袭，我机因无作战准备，遭敌袭击，几全军尽灭。

当时，军委会据报，委员长即令将司令官张有谷、正副大队长吕天龙、余平享递解重庆枪决。经何参谋总长（应钦）讲情无效，又以吴敬恒（稚晖），等党国元老求情，仍然不准。当时我适在桂林指挥作战，何先生忽来电话，言明电话中不便细谈，要我即飞重庆一趟。到重庆后，何先生把事情原委说了一遍，要我讲讲情。我说："你已讲情于先，又有党国元老说情于后，两次都未准，我何能为力？"他说"你是最后的希望，不妨试试。"最后，我说："等我考虑一晚，明早再复你。"当晚，经过一夜的考虑，我想出一个办法，翌晨对何说："张有谷是地区司令，要枪毙必须经过军事审判，你可提我做审判长。"他果照此向委员长建议，委员长批个"可"字，我拿了这张批条向他说："军法审判必得其平，始可信服部属，若当毙而不毙，则我不做；若不当毙而毙，我亦不能做。"他说："一切依法审判就是。"我就要他亲口说这句话。

审判结果，张有谷按上级命令，作避战之处置，何罪可言？吴天龙既卧病在床，当然无罪。再者余平享率队前

往天水，机场铺安全降落符号，其处理亦无过错，至多仅负降落时疏于警戒之责。若此而判，张、吕二人可得无罪，而余氏至多处以几年徒刑。何成浚（雪竹）为军法总监，我把审判的情形告诉他，他听了问我说："你的意思要救他们？"停一会，他继续说："如果审判的结果，与委座的原意相差太远，恐反致不美。倘第三次他仍坚持枪决，恐怕就无救了。"我反问他："你的意思如何？"他说："每人给他几年徒刑，关了若干时间后，再申请将功折罪，放他们出来，如此既可救他们一命，亦可与原批出入不大，岂不两全其美。"我只得如此，审判结果，由何氏转呈，委员长批"可"，表示同意。

此案之判决，对张等三人固有再造之恩，而亦为空军保留一份有力之力量，故空军官兵尽皆欢天喜地，感谢委座德意。张等坐监不久，即被保出，仍在空军服役。俗云："千兵易得，一将难求。"彼等均为空军优秀人员，空军仍须他们效力。

八、地面防空与民众组训之关系

凡各省有组织训练之民众，易于灌输防空知识。例如：敌我飞机之识别，种类、数目与飞行方向等，均为防空情报所必须之条件。同时，各省县地区长途电话之架设，均应普遍，情报始可灵通。各处防空站（哨）宜用望远镜，以辅助肉眼高空视察之不足，俾空军得报迅速确实。若各省县市欠缺此条件，则敌机易于侵入；倘情报不灵，空军均无从准备。例如：敌机侵入天水上空，而机场未得丝毫情报，空地亦无联络，故遭敌机袭击，损失很大。

据防空机构之评判，八年来全国各省地面防空成绩，

以桂省第一。在若干空次空战中，地面情报都很灵活、正确，此因广西自民国二十六年起，即组织民众，且全省各乡村电话畅通，壮丁大半受过军训，易于接受防空知识故也。

第二十一章　八年抗战中之游击战

一、　游击战经过概述

自民国二十六年"八·一三"松沪抗战至二十七年六月之武汉会战，国军均使用正规战术，因装备较敌为劣，火力不及敌人，且制空权操于敌手，故每一会战、我军均伤亡惨重，元气大伤。

敌自发动侵略战争以来，我海岸线北起渤海，南迄南海，皆为其占领，港口亦为其封锁，而华中、华南之陆上各重要城市，均为其控制；且平津、平汉、津浦、陇海（东段）、京沪杭等重要铁路，亦悉为敌所占。唯敌占地愈广，兵力愈分，敌仅能控制点线，不能控制全面。当时，敌之前线，于华北进至包头、太原、风陵渡；于华中进至开封、信阳、岳阳；于华中至杭州；于华南进至广州，遂于时停止进攻。

是时，敌于军事上，以有力之部队集中于武汉，企图打击我豫、鄂、湘、赣地区之野战军，以减低我抗战斗志，消灭我军实力；于政治上，则扩大组织，冀以华制华；于经济上，则榨取沦陷区资源，希以战养战；于外交上，则发动和平攻势，诱我屈服。如民国二十七年冬，日首相近卫发表了三原则（①善邻友好；②共同反共；③经济合作）。以上为敌对我之策略。

二、军委会对敌之策略

民国二十七年冬季，第一次南岳会议时，我蒋委员长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以三分之一兵力于敌后方扰袭敌人"等重要训示。乃于二十八年春，变更战斗序列，增设冀察、苏鲁两敌后游击区，派遣部队进入敌后，加强游击，扩大面之占领，控制沦陷区之面，使敌困守点线。同时，各战区划分前方若干地区为游击区，指定部队从事游击，打破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阴谋。尤为加强战地政务，于二十八年春成立战地党政委员会，各游击区成立分会或区会。由各战区最高军事长官兼任主任委员，以期党、政、军一元化，确实合作，使力量集中，发挥总体战、全面战之效力，以打击敌人，争取最后之胜利。

军委会对当时敌情之决定，加强游击之方针，十分正确。故冀察、苏鲁二游击区以及各战区指定之敌后游击部队，因国人憎恨敌人，鄙视伪组织，故举凡敌后地方团队，地方民兵，一时风起云涌，莫不自觉自动加入游击队，以打击伪军，将敌后方变成前方，使敌困守点线。

倘照此计划进行，本可获得良好之战果，惟共军宣传共产主义，挑起阶级斗争，以"穷人翻身"为口号，利用十分之八的农民而清算少数之地主，组织苏维埃政府。自此，原为国军所控制的广大农村，逐渐变为共军所控制。日本投降后，共军兵力涨至三十万以上，农村红军自卫队尚不在内。

共军之冀察战区之领导人为刘伯承、贺龙、聂荣臻。国军于冀察战区总司令先为鹿钟麟，继为孙良诚，最后为高树勋，因于河北无法立足，亦退河南，后于鲁西占一小

地盘。冀察战区至此已名存实亡矣！

苏鲁战区总司令初为于学忠，率领正规军约四个军，以及沈鸿烈在青岛之陆战队，当时并以沈鸿烈为副总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德勤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鲁省游击队与各地民众自卫队虽声势甚为浩大，但亦因专对敌人，忽视共军，致为其所乘。共军陈毅、罗炳辉、粟裕等亦仿刘伯承、贺龙在冀察战区之办法，先吞并地方团队，待力量长大后，即向正规军进军。于学忠于山东，韩德勤于苏北，先后为敌与共军双方夹攻，*在沦陷区之势力逐渐移共军之手。与冀察战区同一命运。

三、各战区之游击战

(一)冀省游击战

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中旬，第一战区之主力调往晋东参加保卫山西任务，一部向漳河线撤退。五十三军后卫吕正操团遗一营于滹沱河为敌遮断退路，第一战区乃委吕正操为独立第一游击支队司令，李福和为独立第二游击支队司令，孙殿英为冀西游击司令，军委会又任命张荫梧为河北民团总指挥。张氏曾任将官于山西，于河北深得众望。各地民众为爱国心驱使纷纷参加游击队，故孙、吕、李等各部发展甚快。五十二军孙殿英部迭次向邯郸、磁县游击，一度攻入赤县附近机场，毁坏敌机多架。二十七年春，张荫梧部深入大名一带，击破敌一联队，声威大震。(游击队能攻破敌一联队，在当时算是大奇迹)

抗战一起，共党宣言共赴国难，服从委员长之指挥。

---

* 见本书284页注。

共党由此取得合法地位后，即派遣共党员或其同路人，渗透我部队、机关、学校，以发展其组织。共党又派朱瑞于第一战区任联络组长，藉其职权装设电台，搜集情报，并煽动吕正操部叛变，且打击张荫梧*，压迫张部退出冀中。共军专门发展组织，压迫地主富农，使彼等无路可走而进入沦陷区，此为我方最大损失。

民国二十七年二、三月间，敌第十四师团向我道清铁路进攻，我第一战区令五十三军向陵川、林县游击，以骑兵四师与张、孙、吕各部游击队防守晋、冀、豫边区，于太行山东南要地实施游击，支持达五年之久，牵制敌人，防止中共政权组织，对抗战贡献殊大。

(二)冀察战区

冀察战区于民国二十八年三月成立，任命鹿钟麟为该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府主席，统一指挥冀察境内之游击队及地方团队，民众踊跃率先参加，故势力甚为膨胀。是时，山西境内之共军，见张、吕在汤北之发展，证明平原游击之可能，遂起野心，由山西二战区派遣刘伯承、贺龙率领共军越太行山入河北平原。共军之来，先煽动吕正操反叛，委其为共军冀中军区司令员，继以刘伯承、吕正操夹攻张荫梧，压迫其退出河北；进而将河北民抢收缴，扩大面之占领，势力迅速发展，其后则攻击鹿钟麟部。鹿钟麟于河北之新编团遭敌伪与共军三面夹攻、扫荡，难于生存，退至邢台县西边之路罗镇，势甚危急。是时，军委会乃命第

---

* 张荫梧系河北省保安司令。1938年6月下旬，张率顽军三个旅袭击冀中八路军后方机关，惨杀指战员四百余人。冀中一分区部队奋起自卫，共毙伤顽军五百余，俘顽军旅长以下二千余人，将张荫梧及大股土顽赶出了冀中区。

六十九军石友三部，新编第八军高树勋部由鲁南往鲁北，北调冀中，第九十九军朱怀冰部由豫北调豫西增援。二十九年一月，共军乘石、高两部于敌后长途行军，立足未稳之际，先后于南宫、清河、濮阳等地节节邀击而击破之，迫使偏促于冀南一隅，故难于立足，终被迫退出冀、鲁、豫边区*。朱部虽挺进至路罗镇，然为时太迟，共军已控制路罗镇以南地区，断绝其补给，封锁其粮食，使其无法生存。鹿总司令迫不得已乃率第九十九军于三月中旬退出河北省境。是时，适石友三与共军勾结，企图叛变，由孙良诚逮捕之，与石友三师长一并正法。**中央命孙良诚为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统辖第六十九军与新编第八军，于冀、鲁、豫三省边区游击。旋孙为共军所俘，鹿总司令遭免职，是时，军委会改任高树勋为冀鲁豫三省总司令，兼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以濮阳为根据地。至此冀察战区亦名存实亡。冀省广大地区与三千多万人口皆为共军所控制。

民国二十九年秋，日与德意两国缔结轴心同盟。苏俄深恐日本关东军五十军响应欧战，由伪满攻击西伯利亚之红军，遂策动共军发动“百团大战”，打击日本，攻击敌军

---

* 1939年3月，国民党中央颁发《共党问题处置办法》，12月又颁发《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继而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春，国民党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率部向我冀南军区进攻，2月，河北省主席鹿钟麟率九七军朱怀冰、新五军孙殿英等部与直南石友三及山东省沈鸿烈等部遥相呼应，并调黄河南岸顽军四十一、七十一军向我进攻，3月初，在卫（河）东战役中，被我军歼灭六千余人，石友三部逃往黄河以南。5月，在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中，朱怀冰部被我军歼灭。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派人分别同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划分活动地区的协议。

** 石友三实系与日军勾结，为其军长高树勋所活埋。

交通线*。同时，俄在华军事顾问崔可夫建议国军反攻宜昌，且宣传国军总反攻，以牵制日军。至二十九年冬，日军发动冀中冀西之扫荡战，惟共军善于避战，化整为零，日军并未收到预期之战果。

三十年四月，日派松冈洋石至莫斯科签订日苏友好条约，日军遂决心南进。是时，共军亦与日军妥协，更加紧控制民众，完成河北地下网，以便逃避。日军亦安然建筑德石铁路与各县市公路网，以搜刮物资，实现“以战养战”之政策。我三十九集团军高树勋部退至东明、濮县，继续游击。三十一年四月，敌军三个师团于鄄县、南乐、继泽地区，分途向我高部进攻，激战数次，敌我均有伤亡。高部因抗敌防共，兵力愈战愈弱，且补给困难，除留一部于鲁西游击外，主力退过陇海路于皖北涡阳整补。以上所述为冀察战区游击战概况。

（三）苏鲁战区

1. 苏鲁战区系于民国二十八年为加强敌后游击成立者，当时以于学忠为总司令，沈鸿烈为副总司令兼山东省府主席，沈氏指挥海军陆战队，暨保安新编第四师，又拨第五十一军牟中珩由豫南进驻山东沂蒙山区，另调五十七军缪澄流由苏北进驻鲁北日照，担任山东地区游击。

当时军委会又命韩德勤为苏鲁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及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八十九军李守维与

* “百团大战”的历史背景，邓小平同志指出：“日寇于东方慕尼黑失败之后，乃企图发动向重庆、西安、昆明的正面进攻，以军事进攻配合政治诱降，压迫我国投降。我党又提保卫大重庆、大昆明、大西北的口号，并主张加强团结进步，以克服困难，克服投降危险。华北的八路军、决死队在这样的要求下，发动了‘百团大战。’”（《一二九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第二卷第二页）

苏北保安团队，担任苏北地区游击。

2. 在苏鲁战区之敌为第十二军(司令部在济南)，指挥第五、二十一、五十二、一一四、四个师团及独立第五、六、七，三旅团，分布于胶济、陇海、津浦各铁路之沿线，另有敌华中派遣军独立第十二旅团驻于长江北岸之江都(扬州)南通间。敌人所占者皆为点线，其他广大之面悉归苏鲁游击军所控制，且不断向敌袭击，破坏敌铁路交通，使敌困扰。敌为维护交通及其重要据点，遂强迫沿铁路农村组织护路村，构筑据点工事，且逐渐扩大向游击区发展。故敌之扫荡与我之游击战时生斗争。我因而牵制消耗敌军不少兵力，本可自此日渐扩大，本"积小胜为大胜"之策略，保持敌后政权，奈因共军陈毅、罗炳辉、粟裕、管文蔚、张爱萍等潜入苏北，另徐向前与刘伯承(一一五师)、贺龙(一二九师)潜入山东，形势逐渐改观。共军初至山东、苏北与国军表示友善，互不侵犯，而专欺骗游击队，吞并地方团队，以控制广大地区。至其势力养成后，则分化国军，进而向之袭击。此种政策与在河北之对付冀察战区，先后同出一辙，故苏鲁战区亦功败垂成，殊堪浩叹！兹分别叙述如下：

(1) 苏 北

① 苏北国军以李守维之第八十九军，新编第六旅，及省保安旅团若干，与各县保安队，地方团队及民众武力为主。最初，军民合作，势力日增，控制苏北广大地区，予敌威胁甚大。韩德勤以兴化县为中心，建立游击地。此时，除海州、徐州、南通、江都及江苏境内之陇海、津浦沿线为敌攻占外，运河及通海公路仍为国军所控制。

② 敌军第五、二十一、十五等师团各一部与十三旅

团一部、于二十八年初由陆海二方面先攻占海州，继占淮阴。至同年十月，敌陆军附以汽艇，一由淮阴南进，一由镇江经江都北进，一由蚌埠沿淮河东进，南、北、东面进攻我兴化根据地。当时，我军向淮安以东之曹甸、蚂蚁甸一带转移，一面乘虚各方袭击敌人。此时，敌虽打通运河航路及通海公路，惟我仍控制运河两侧广大地区，继续游击，使敌占地愈广愈备多力分。

③ 共军陈毅率罗炳辉、管文蔚等九团至江都、泰县边境，袭击江苏保安第四旅于黄桥附近；同时，袭击我姜堰保安第六、九旅，我损失很重。我驻海安、徐塘之八十九军被迫应战，与共军鏖战五日之久，军长李守维，旅长翁运阵亡，官兵伤亡五千多人，损失惨重*。陈毅乘机向苏北各地发展，同时，华北之"陇海东进黄克诚支队"向东，于淮阴、海州地区策应陈毅，苏北形势遂日趋严重。是时，江南新四军叶挺，以该军为主力，开始袭击国军，公然叛变。军委会乃令第三战区顾祝同长官，派兵团缴其枪械，将新四军部解散，并俘虏叶挺，解重庆法办。叶一失败，朱德即委派陈毅接掌新四军，并扩编成七师，每师约在七万人以上，窜扰苏北、皖中一带。同年，十二月上旬，陈毅指挥罗炳辉、粟裕二师，向八十九军顾锡九（接李守维者）部袭击，激战半月，陈部被击溃，其伤亡八千余人。惜日军对我牵制，弹药消耗多，未能乘此将陈毅一股歼灭。陈部经此挫败，气焰稍减。至三十年春，高邮、宝应方面

* 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司令于学忠），自视拥兵十万，不抗日，专反共，成为苏北抗战的主要障碍。他为保持苏北反共阵地，企图先消灭新四军，再歼击南下的八路军。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原则，坚决粉碎了韩军的进攻。其军长李守维在仓皇逃窜时落水毙命。

之敌军，攻占我兴化根据地，韩副总司令部人员与辎重向淮河以东转进，粟裕于盐城附近袭击韩总部，我损失很大。至三十二年春，敌第十七师团与第四旅团一部，向我八十九军进攻，激战一周，双方均有伤亡，我军转进至淮、泗一带与敌相持，不断与敌之激战。共军彭雪枫、黄克诚二部十团以上，于山子附近，乘敌我相持之际，袭击韩部与独立第六旅，保安第三纵队，旅长李仲环，纵队指挥官王殿华阵亡，官兵伤亡三千人以上。至三月中旬，我军转移皖省阜阳整补，全苏北地区为共军占领。

（2）鲁　省

①　山东民气强悍，对敌伪组织能同仇敌忾，一心归向中央。自敌占领青岛、济南后，各地纷起抗日，迨我苏、鲁战区成立，于学忠、沈鸿烈分别领导沦陷区游击队，势甚浩大，予敌极大威胁。至二十八年六月上旬，敌集中第五、十一、一一四师团各一部，分由胶济、陇海、津浦各路，向我鲁南游击根据地——沂蒙山区与日照山山区围攻，攻陷我莒县、沂水、蒙阴，敌军伤亡总数在五千人以上。以后我军转进沂蒙山、费县、日照山区配合地方团队，仍控制广大地面。当时，我后方以飞机投粮食弹药，依地面路线钻隙补给，彼此联络依然紧密。

②　共军一一五师、一二九师各一部，由徐向前率领潜入山东，与在河北一样作风策略，初对国军表示友善，互不侵犯，而先将地方团队吞并，发展组织，夺取地方政权，控制民众。之后，遂分化国军，煽动五十七军之旅长万毅叛变，压迫常恩多师长，幸官兵深明大义，仍能保持。山东行政区遭敌与共军夹击，保安师被迫投降，中央乃调回沈鸿烈，以五十一军军长牟中珩为鲁省主席。是时，共

军已形猖獗，势力遍布，我实力薄弱，苏鲁战区亦徒有其名而已。

至三十二年五月上旬，敌集中兵力向我沂蒙山区围攻。我军被迫向南突围，共军乘机占领沂蒙山区，且于夜间袭击我安邱之鲁南行署，主任陈启荣阵亡*。是时，省主席牟中衍请辞，改以何思源继任，仅保有寿光一区，山东游击区，至此名存实亡矣！

（四）山西游击区

1． 山西游击区属第二战区管辖。自太原沦陷后，军委会于汉口开会，决定第二战区部队不得退过黄河，仍于就地打游击，违则以军法从事。

第二战区直辖部队有第六集团军杨爱源，第七集团军赵承绶，第八集团军孙楚，第十三集团军王清国，皆为其基本部队，合共八个军，计步兵二十一个师，骑兵三个师，中央拨归指挥者不计。另有十八集团军三师——一一五师林彪、一二〇师贺龙、一二九师刘伯承、并长官部直属部队四个炮兵团、二个工兵团，势力甚为雄厚。

山西各部队以太行、中条、吕梁、五台、恒山等山脉为根据地，占领广大正面，不断扰袭敌人，使敌消耗很大，并压迫其困守正太、同蒲二铁路沿线狭长地带。直至二十八年春后，敌曾八次攻中条，二次攻泽潞，扫荡我主力根据地，但因兵力不足，并未能达成其愿望。至二十八年四月上旬，军委会令各战区发动“春季攻势”，国军曾分兵攻击闻喜、绛县、横岭关等地区、并曾一度攻入敌军据点

* 在鲁中，沈鸿烈、秦启荣勾结日伪军，从1940年6月至8月多次向我根据地进犯，我山东纵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抗击，歼其一部，收复了被占地区，保卫了根据地。

——夏县、解县，后遭伏敌之反攻，旋即退出。敌据点因筑有坚强工事，我屡次进攻无效，乃以一部监视敌人，主力仍退中条、吕梁根据地。

2. 敌第一军以第二十、三十七师团主力于二十八年五月，由运城、解县分路南进，第八次进攻中条山，攻占平陆及津渡口，后经过国军迂回侧击，敌乃撤退。至二十八年七月，敌又调集第一一〇、一三五、一〇八、三六等四个师团，向我上党根据地，采分进合击策略进攻。我为避免决战，将主力转移附近山地，待敌沿白晋公路至晋东南各城市时，我始全力发动侧击，敌陆续回窜，国军乘机收复已失城市。二十八年十月上旬，敌一〇八师团曾分路进攻我吕梁山根据地，经我军分别阻击，敌未得逞仍退原地。

敌为摧毁我二战区游击区实力，集结六个师团二个旅团兵力，发动中原会战，亦即晋南会战。经六个月之激战，将我中条山根据地攻占，中条山与太行山唇齿相依，中条山一被攻占，太行山即呈孤立，敌乘此际于三十二年四月上旬，以两个师团两个旅团五万多人之兵力，向太行山根据地围攻。我二十四集团军庞炳勋指挥第四十军于林县附近，新五军于临洪镇东南地区，第二十七军于陵川方面，互为犄角，而击来犯之敌。敌以优势空军支援，分路进攻，先陷我外围据点，陵川、林县阵地亦相继被敌占领，我乃向外线转移。当时，太行地形崎岖，运动困难，我军各部形成各自为战态势，不能互相联系。新五军军长孙殿英（魁元）于临洪镇以西地区运动时，中敌伏兵而被俘，所部冲散，仅余二十七军、四十军仍抱与太行山共存亡之决心，与敌苦苦周旋，继续游击奋斗，惟战况日趋恶化。第二十

四集团军总部因突围为敌冲散，与各部失去联络。庞炳勋总司令因腿部旧创复发，行动不便，避居临洪镇附近之东峡脑，不幸被敌侦出而被俘。敌命其招降第四十军军长李振清，庞氏则秘派亲信人员告李军长，协同二十七军刘进部队继续打游击。综合此次战役，敌我伤亡皆约五六千人，新五军则无异全军复没。

敌调集第二十五、三十六师团各一部，于三十二年七月上旬，继续攻打太行山游击区，是时，军委会以刘进接替庞氏，任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仍于陵川附近山区继续游击。我军被敌围攻，伤亡太大，是时，四十军已调河南整补，只余二十七军于太行山，因受敌军夹攻，师长陈孝强受伤被俘，部队损失过半。军委会以该军损失过重，令退河南整补，于八月上旬由陵川以南地区撤退，在济源以北遭共军唐天际沿途袭击，损失一千多人，至九月上旬由孟津、温县渡河，太行山为敌和共军所分占。

3． 共军在山西以朱德为首，煽动二战区新编兵团三十余团叛变，同时，收缴民枪，扩大地盘，专打友军、不打敌人。后朱德由山西派遣重要将领率军越过太行山，至冀、豫、鲁、苏、皖各处，按山西策略，初与国军友善，专收缴民枪，而国军将领对共军认识不深，警觉性亦不大，有于敌后与共军妥协，或取放任态度，让共军收缴民枪，扩大地盘。待共军势力长大，转打国军，国军已难立足，检讨过去，回忆及此，实令人为之痛心疾首。

(五)第五战区游击战

五战区游击战可分鲁东、苏北、大别山三区，分述如下：

1． 鲁东地区——自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下旬，敌第

二军南渡黄河，占领我济南、青岛，续向我进攻。是时，青岛市长沈鸿烈奉命率海军陆战队、地方团队于诸城、沂水一带发动游击战，并以庞炳勋第三兵团收复蒙阴，保有鲁东各城市。敌第五师团于二十七年一月，沿胶济路南进，我游击司令刘镇东守备沂水，力战阵亡。当敌攻临沂时，我军张自忠与庞炳勋两部与敌第五师团激战，我游击队则袭击敌后，牵制敌人，并妨害其补给线，迫其放弃潍台公路，后又转占曲县、泗水一带，于临沂之胜有极大贡献。

自此，鲁东南广大地域与沂蒙山区，沂照山区形成国军之良好根据地，保持达六年之久，于牵制敌人及防止共军、伪军组织之发展，贡献甚大。

山东，于学忠任游击总司令，沈鸿烈为副总司令兼山东省主席，归第五战区李宗仁长官指挥。后军委会为加强敌后游击，于三十三年冬成立第十战区，以李品仙为战区司令长官兼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指挥二十九集团军何柱国、第三十一集团军陈大庆，以及苏、鲁游击部队。

2. 苏北地区——五战区于徐州会战时，韩德勤为江苏省主席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保有苏北、皖东以至运河及通海公路（南通——海州）之北端，且迭次向津浦路南端游击，减轻我五战区主力之特别威胁，于台儿庄之胜利有间接之贡献。

军委会令第六十九军于四月下旬，由郯城以东向临沂挺进，袭敌之后。该军于徐州会战后仍留滞鲁南，并令缪澂流五十七军由苏北转入鲁南，加强该地游击力量。迨沈鸿烈任山东省主席时，令山东各专员县长率领地方团队，于各该区抗敌自卫。山东游击战普及全省，尤以专员范筑先，保有东昌（辽城）及其附近地区，其游击战绩卓著，杀敌独

多，其后壮烈牺牲令人敬佩，后方咸表哀悼。

3． 大别山地区——大别山位鄂、豫、皖三省交界处，丛山峻岭，地形险要。徐州会战后，军事委员会定大别山为华中战略要点，其地可东窥津浦，西出平汉，南下长江，北袭陇海，战守皆宜，于军事上很有价值，故军委会令五战区负责筹划确保。是时，五战区呈请以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兼安徽省主席。省府总部、省党部均设置于大别山中心之立煌县。廖莅立煌后，即积极展开建设大别山根据地，如架设有无线电、开辟山区交通等，并于立煌设有临时飞机场，以便运输弹药军饷。当时飞机投掷军饷皆利用夜间施行，因需飞经敌人地区，白天危险，有时重要将领之来往也赖此机场。又大别山四面为敌人包围，故须于各根据地屯粮储弹以备用。因我对此战区较为清楚，故除立煌外，又于皖东津浦路东之五河，皖北之周家口，鄂东之麻城，分设若干游击根据地，以加强游击力量。凡于皖省境内之游击区、各县与非游击区之安全地域，县长兼国民兵团团长。此外于敌人占领区，视各县需要，县长又有加游击司令之头衔者。副团长为军人协助县长训练国民团。国民兵团分常备兵与后备自卫队两种，凡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之男子，皆须纳入组织，接受军训，与各军合作一同打游击，以打击敌人，保护地方政权。此种民众组训办法，多仿自广西，当时并由广西调来若干干部以利推行，惜廖主席于二十八年冬季因积劳病故(血压高)。抗战初期，廖军在广西柳州奉命参加淞沪战事，将出发时医生即劝其不可操劳过度，但廖将军以抗战乃军人之天职，故仍毅然参加。廖原为唐生智部下，平时律己甚严，练兵亦佳，爱护部属，勇敢善战。作战时常身先士卒，奋不顾身，

其作战危急时，亦不请援兵，是硬汉一条。该区游击部队是以第七军张淦、第四十八军张文纯和三十九军为基干，配合豫、鄂、皖边区游击司令张湘潭及三省边区团队和民众武力组成。其第七军在北伐时有"钢军"之誉，直至抗战时依然能保持此荣衔而不坠。其后扩编为二十一集团军，战力大增。廖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时，勤政爱民，甚得皖人拥戴。廖不幸病故后，由五战区副司令李品仙接替职务。李接篆后，一切措施仍萧规曹随，按原来规模实行。

第二十一集团军指挥三个军与地方团队，迭向平汉、津浦二路南段守备之敌袭击、破坏，使敌不能安全使用，并袭击皖中、皖北敌军。于二十八年五月上旬，我第四十八军之一七六师，由师长区寿年率其主力与林士珍之游击支队，奇袭敌军。同时，郝文波反正，夹攻敌人，与敌巷战数小时，将敌人弹房仓库焚毁甚多，完成任务，安全撤退。至三十年春，我第三十一军之一三八师师长莫德宏，于合肥丘陵地带，迭向淮南铁路南段实行破坏，并袭击守备之敌。敌曾派兵五千多人附炮三十余门，向莫师扫荡，因当时廖派部队策应，故敌未得逞。敌新任司令官冢田攻于三十一年十二月八日，由南京飞汉口，于大别山张家埠上空，为我一三八师击落，机毁人亡，并截获许多重要文件。敌为报复及寻觅冢田攻等尸骸起见，乃于十二月调兵进攻大别山区，以第三师团主力、六十八师团及六十四旅团各一部由鄂东松铺南进，第一一六师团集结望江，第四十四师团集中石灰窑，向大别山游击区根据地分进合击。我二十一集团军以第四十四、四十八、三十九军于大别山各要地阻止敌人，敌我均有伤亡。至三十二年一月二日，敌陷立煌根据地，我军政人员向皖北撤退，我二十一集团军各部分散各要隘

与敌对峙。至三十二年六月上旬，敌分别退去，我恢复原状。

伪组织完全仰赖敌军保护，在敌军占领区始有之，若安庆、蚌埠等伪省府所在地，而于其他各县伪组织则未发生作用。

共军新四军叶挺部在皖南被解除武装后，残部由陈毅、张云逸率领，后经皖省派队围剿驱逐，逃往苏北，势力逐渐长大，甚至夺取苏北政权。皖省在八年抗战期间，共军不敢蠢动，亦未发生组织作用，可见皖省民众有组织，皖省军政当局能提高警觉，且有力制压，不使其生存。倘各省能照皖省作法，密切配合，则中共决不能得逞。

抗战八年，大别山根据地始终保持，我军主力依然存在。敌人虽占领津浦路两侧要点与长江沿岸重要据点，如安庆、芜湖，以掩护其伪组织之成立，然敌之占领区域，仅限于平汉、津浦二路十公里之狭长地带。皖省完整县百分之七十以上仍掌握在我省府中。豫南、鄂北保持县份亦多，且牵制敌人许多兵力。敌军有云："大别山为南京之盲肠"。此言诚不虚也。

南京为伪政府所在地，安徽与之交界，随时予其威胁，或破坏津浦路，敌始终莫奈我何。以上所述为第五战区游击战概略。

（六）第三战区游击战

敌华中方面军进占我京、沪、杭三角地带后，于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为节约兵力，以调往其他战场使用，乃改取守势，以富阳，余杭、吴兴、长兴、宣城、芜湖为第一线，扼要构筑工事，敌所节余兵力第一股渡江至安徽滁县江北之江都，敌共抽二师团与一支队转用华北。三战区遂

予是时普遍发动游击战争，阻敌运输，打击敌小部队，以困扰敌人。民国二十七年一月下旬，敌第十三师团出现向蚌埠进攻，三战区为牵制敌兵力起见，以战区主力向杭州、太湖、宣城、南京、芜湖等重要城市附近大举游击，迫敌向苏、浙、皖边区五路进攻，主力滞留华中，使五战区徐州会战容易。

民国二十七年春季，军委会又命收编奸匪及鄂皖区共军五千人为新四军，以叶挺为师长，并于皖南划铜陵、繁昌二县为其守备区，担任皖南游击。新四军利用统一战线口号，欺骗青年，煽惑民众，裹胁壮丁，扩大其叛乱武力，后因该军违抗命令，擅自行动，我三战区乃将其缴械，并将叶挺俘虏押解重庆，嗣后叶挺又被释回延安。*

民国二十七年，武汉会战时，我三战区编成特种部队多组，每组有山炮兵、战防炮、步兵、工兵等分向长江江边挺进，挺进各小组袭击敌运输舰艇与兵舰，斩获颇多。敌因而增兵沿江牵制，敌第一一六师团派兵扼守沿江重地，掩护交通，减少武汉压力。

武汉会战时，我得谍报，敌大本营曾开会检讨全盘战局。敌因陆军投进我战场有如陷于泥淖，先后虽已动用三十师团（关东军在外），然仅占领若干重要铁道沿线，此外皆

---

*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发出"皓电"，限令黄河以南我军于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同时密令其数十万军队准备进攻华中新四军。中共中央在揭露蒋介石罪恶阴谋的同时，为顾全大局，决定将皖南的新四军撤到长江以北。1941年1月4日，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和部队共九千余人由泾县云岭地区出发，6日即遭顽军的拦击，8日在茂林地区陷入顽军七个师八万余人的重围。广大指战员虽经七昼夜浴血奋战，但终因弹尽粮绝，除两千余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与顽军谈判被扣，项英遇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由我游击队控制。敌拟以武力决战之意图既未得逞，以歼灭战取胜之信念至此亦完全幻灭。因我军非有制胜把握，不轻于打硬战，为保存实力，以劣势装备对敌，庶可持久。武汉会战后，敌于东北仍有十四个师团，本国也有七、八个师团尚未动用，但敌之陆军用以对付苏联为主，故不敢再增加于中国战场。敌既未能达到武力决战之效果，故于武汉会战后，改变战略，注意扶持伪组织，以华制华，掠取战地物资以战养战，作持久战之计，盖其积极意图为南进。我方则采取游击战以配合正规战，此关系战局甚大。

敌华中派遣军自占武汉后，以京沪为补给地，以长江为运输中心。我三战区以遮断敌长江补给线为目的，于二十九年四月中旬，以第三十二集团军之一四七师组织若干支队，每队配以炮兵，战防炮与水雷等，潜往皖南长江南岸各交通要点或重要地区，向敌舰袭击，或掩护布置水雷，或施放漂雷，或用炮击，使敌舰多被我炸沉或击毁，且一度将马当要塞之矶田守备队一部歼灭殆尽。将敌弹药库与司令部焚毁，后敌增派一师团以上兵力守备长江交通线，我已达破坏牵制之目的。

(七)其他各战区之游击战

国军自武汉会议后，决定采用"正规战配合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之战法，由此本可收效甚宏，惜国军对共军认识不够，警觉性太少，且对共军轻视，致为共军所乘。所有敌后游击区除山西、安徽两省外，均被共军所掠夺，功败垂成，至为可惜。

游击区之重要省份，已略如前述，至于各战区之游击，规模较小，关系亦不大，兹简述如下：

1. 第六战区

第六战区以王劲哉之一二八师为游击队主干，并扩编有九旅以及地方团队，共同担任游击，以沔阳为中心，以江汉间之三角地带为游击根据地，该地与武汉接近，可威胁敌人，且有战略之价值，敌曾几度进攻，均被我击退。至三十二年元月下旬，敌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我队伍因装备差，遂放弃沔阳，分散于敌后游击。

2. 第四、七两战区

抗战初期，成立第四战区，辖广东、广西、海南三处，以张发奎为司令长官，至抗战中期，又成立第七战区，以余汉谋为司令长官。

海南保安司令王毅指挥第十一、十五两团与七自卫纵队，担任海南守备。民国二十八年一月，敌因准备南进，派第二十一军攻占海南之海口、榆林等处，王毅率所部退守五指山，直至抗战胜利为止，势力依然存在。广东中山县游击队于三十年五月五日，在县属大赤坎附近，击落敌机一架，此机乘坐新任联合舰队司令海军大将大角岑生及其随员多人，且得有机密文件。

广西境内多山，无山无洞，地形险要，很多山地均可做为游击根据地。桂省民众自二十七年起，凡成年壮丁皆纳入组织，接受训练，每一壮丁均会用枪，且以实弹射击。桂省民团组织，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县长兼民团司令，省府并委以军人为副司令，辅助县长指挥训练壮丁，每县设督练官若干人，专司训练壮丁之用。分镇长兼大队长，村街长兼中队长，里长兼班长。合各县若干大队编为联队，平时专事训练，战时或帮助军队扰袭敌人，或担任破坏工作，或任侦察谍报、运输等勤务。

民国二十九年一月下旬，敌军发动桂南会战，攻占南

宁。桂林行营奉命反攻恢复南宁。在昆仑关战役，曾摧毁敌人一个团，旅团长中村正雄阵亡。后敌大部增援，于邕江南北岸对峙。是时，桂省动员邕江两岸邕宁、永淳、绥渌、上思、思乐等县民团万人以上，有枪者拿枪，帮助国军打游击，无枪者荷锄，担任破路工作，其中尤以邕钦路最为彻底。敌于邕江北岸，因民众拒做买卖，与之不合作（南宁城内，除老弱伤病外，余者皆走避）。故补给困难，（由海道运来之粮弹，很难输送至邕江北岸。）因而敌对南宁能占能守，但无法持久，故不久即知难而退。

民国三十三年九月上旬，敌军为打通桂越交通，遂发动桂柳会战，占据桂境邕、龙、桂、柳等要点。国军于民国三十四年四月下旬，反攻桂柳时，广西境内各处民团皆总动员，协助国军反攻，到处扰袭敌人，声势浩大。由于军民合作，故所向披靡，于短时间内即将敌逐出国境。敌由钦州湾、安南海陆二路分别撤退。此次反攻，国军因得美械装备，空军掌握制空权，战力为之加强，此固为战胜之主要原因，而各地民众武力之协助，亦与焉。

3． 第九战区

本战区之游击战，系以大云山、九宫山、岷山、庐山等为根据地，在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时，协助国军将汨罗河南北公路及湖南境内公路彻底破坏，使敌军重炮、野炮、战防炮、卡车等皆不能通行。故第一次会战，敌知难而退。第二、三次会战，则因补充不及，空投无济于事，遭我空军之袭击、侧击、追击，敌铩羽而归。三次长沙会战，我国军将士在攻守方面，固有殊勋，然民众破路之功亦不可没。

四、抗战中游击战之总检讨

自民国二十六年"八・一三"淞沪会战起，国军正式与日军开战。是时，国军武器远不如敌人，尤其空军力量薄弱，制空权操于敌手，故淞沪、徐州、武汉等战役，与敌硬战，挫败居多，伤亡惨重，其中尤以淞沪之役为最。

至于长沙会战，第一次为敌知难而退，第二、三次亦非打硬仗。至民国三十四年四月——六月之湘西会战及反攻桂柳会战，与远征军、驻印军在滇西、缅北之作战，因得美械之装备及优势空军之支援，故虽打硬仗，仍然得胜。

国军在抗战八年的漫长岁月中，因装备较敌为差，制空权操于敌手，故败多胜少。民国二十七年汉口开会时，我曾经建议采取游击战配合正规战，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蒙最高统帅采纳，通令各战区，并指示以三分之一兵力用于加强敌后游击，变敌后方为前方。同时，成立冀察、苏鲁二战区为敌后游击区。迨第一次南岳会议，蒋委员长并特别指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重于正规战"。军训部为贯彻游击战主张，于二十八年编成《游击战纲要》一书，颁发各战区、各军事学校，作为游击战之教材与依据。在二十八年年底以前，敌人所占多为战略要点或交通要点，其他广大地区全为我游击队与地方分团队所控制，且不断扰袭敌人，破坏交通，予敌极大威胁。自冀察、苏鲁战区成立以来，各战区均遵照南岳会议之指示，派队不断袭击敌人，使敌困守点线，打破敌人"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阴谋。

共军起家于陕北延安，抗战初期，其人数不过三万左右，抗战一起，毛泽东宣言共赴国难，内云："在政治上实

行三民主义，军事上服从最高统帅，与国军并肩作战”。以此欺骗国人。

中共初以朱德任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开至山西，归二战区阎长官指挥。朱德至山西，初与国军表示友善，暗中则扩张地盘，收缴民枪，发展组织，并提出“翻身”口号，清算地主，打倒资产阶级，实行所谓“三反”、“五反”，使多数农民入其彀中。适共军在山西有基础后，朱德即派刘伯承、贺龙、聂荣臻等至冀察战区，遣徐向前、陈毅、罗炳辉、粟裕等至苏鲁战区，以叶挺至皖南三战区，均按山西办法，向各战区发展组织，一面伪装与国军友善，一面收缴民枪。在共军力量壮大控制全面后，即断绝国军粮食，于冀察战区煽动游击支队司令吕正操，于苏鲁战区煽动旅长万毅叛变，并曾袭击山东牟中衍与韩德勤两部。我游击区不能立足，冀察、苏鲁战区伤亡重大，补充困难，最后只有退出。冀、鲁两省人口各约三千万，且都为产兵区，共军得之，势力大增。至抗战末期，共军抽调冀鲁与苏北有战斗经验之徒手兵约十万人以上，在林彪统率下，由山东河北水陆并进，向东北发展。至抗战胜利，共军向俄领取五十万日本关东军装备，我在东北之美械军与地方团队及伪军，几全部为林部消灭。林彪占据东北后，又与聂荣臻、刘伯承联合，将华北吞并。至徐蚌会战，共军以全力参加，国军失利，徐州旋告失守，共军势力继续南伸，整个大陆，遂陷共军之手。

现检讨失败原因如下：

1. 抗战初期，中苏订有友好条约，苏俄曾派驱逐机E——一五、E——一六，轰炸机S、B、D、B及五百以上空军战斗员来华与我并肩作战，并派有军事顾问若干人，

至中央与各战区服务。

2．当时中美英法苏等民主同盟，一致对轴心国之德、意、日作战。

3．共党有其国际性，中共与苏俄关系密切，我于外交上与苏俄友好，故对内容共，此为一大原因。容共政策以前为国父所订，现因中苏友好，希一致对日作战，故亦容共。

4．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八月一日，朱毛由江西突围，转徙川黔，借抗日美名，于毛儿盖发表宣言，提出抗日人民统一战线，要求组织抗日人民国防政府，且以“国共合作”、“抗日救国”之口号，博取人民同情，借政治解围军事。二十五年春，共军负隅陕北，自知不能作军事冒险，于五月五日通电停战议和，接受国府提出之四项原则：(1)奉行三民主义。(2)服从蒋委员长指挥。(3)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4)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同时，在各省发动和平宣传攻势，并勾结张学良、杨虎城，酿成“双十二事变”。

5．日本于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七日，发动“卢沟桥事变”，演成中日全面战争。是时，陕北之共军于国共合作中，提出下列诺言：(1)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所必须，中共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2)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的暴动政策与赤化计划，停止以暴动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3)取消现在之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4)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交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6．中共表示接受国府四项原则，抗战爆发后，又自

动表示四项诺言，故军委会于二十六年八月，将陕北共军按其人枪数量，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司令。该集团军辖三师，以刘伯承、林彪、贺龙为师长，编归第二战区担任游击。军委会继又收编共军在江南残部，成立新四军，辖四个支队，相当于一师兵力，列入战区战斗序列，归顾长官祝同指挥，在江南京芜地区担任游击。

在政治方面，中共以林祖涵、张国焘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副主席。

7. 共军之军事政治，既得合法，于军事上遂避免与敌作战，以保全实力。

8. 自二十八年后，共军已逐渐扩大，晋省与江西地方团队民枪大部为其收缴，其实力发展甚速，且擅发伪币，破坏金融，擅委地方官吏，破坏地方行政系统。共军所及之地，皆成立其政治组织，将各省、县政府所委之官吏或残杀、或驱逐殆尽。此外，又诱惑农民清算地主，掀起阶级斗争。共军实力既已扩大，乃于民国二十八年之后，在晋河流域，由山西潜入河北、山东、苏北；在长江流域，由江南潜入皖中、江北，并窜扰鄂皖等地区，将所占地方团队吞并，扩大面之占领，嗣即袭击国军，使国军或中央派在敌后所占领之广大地区，反为共军所有。国军对日本抗战八年，与盟军并肩作战，终于击败日军，而戡乱之役，反为共军所乘，其中原因为：

(1) 共军之图谋，我全国朝野上下，均未认识清楚。对共军政策之失败，乃宣传教育之失策。

(2) 共军违背国府四项原则，并未履行四项诺言。自二十九年十一月起至三十年十月止，军委会根据各战区正

式文电报告，国军被共军扰袭，发生战斗次数达三百九十五次之多，事态极为严重。我军委会曾屡电制止，均未生效。此时我不欲严格制裁，反令被共军攻袭之国军退出游击区，忍痛退让，待共军势膨胀，遂一发不可收拾。假令国军在抗战初期，即二十八年以前，判明共军之阴谋，非空言所能奏效，因即分兵制裁，江南之战区围缴叶挺枪械，又于五战区将陈毅、张云逸围剿，使其不能在皖中立足；假令各战区当时均能分兵剿共，冀察、苏鲁二战区绝不致为共军吞并，则共军势力不致骤然膨胀，祸国殃民之厄或可减免，此虽事后痛心之言，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故值得忍痛将国军耻辱之事迹，忠实检讨而直书之。

第二十二章 《游击战纲要》

我在民国二十八年冬，为适应游击战的需要，于军训部任内曾收集游击战资料，由军学编译处编成《游击战纲要》一书，分发各战区，各军事学校，作为研讨游击战之教本与实施游击战之依据。

军训部为颁发"游击战纲要"一书，曾有一训令，兹将全文录之如下："查游击战为长期抗战，消耗敌人兵力，争取主动地位，富有弹性之战法。年来，各战区因地实施，颇收成效，山西方面，尤为卓著。兹根据作战最高指导方针，适应现阶段之需要，应在敌侧后发动较前规模更大更坚强有力的游击战，庶可使敌深陷泥淖，穷于应付，而予致命之打击。惟国军各部对此尚欠普遍与深刻之研究，且若无正确完备之教材可资参考，本部缘搜集有关游击战之资料及各区实施经验与心得，加以整理，编成"游击战纲要"一书，随

令颁发，各部队学校一律研究，俾利实用，而歼敌寇为要。”

一、游击战概论

“游击战”建议之提出——国军由南京退守武汉后曾于汉口召开军事会议，是时我认为以我劣势装备对优势装备之敌，以我脆弱之空军对优势空军之敌，若仍象徐州、淞沪、太原等会战，采用正规战，与敌硬拼，势恐难以持久，故于会议上提出“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之建议，并强调“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当场，虽有人认为游击战乃不肯牺牲，保存实力之议论，而予以反对，但此案经一番辩论，终获通过。

“游击战”之释义——现代战术原则中有正规战，有辅助战（或称小战）。至于“游击战”之名称，虽为过去所无，而符合游击战之理论事实，中外军学家早有论例。“游击战”粗释之，“游”者“运动”，“走”也；“击”者“攻击”，“打”之谓；“游击”意即机动之战法，虽于运动间，仍不忘捕捉机会，随时而攻击之。

距今二千四百年前，东方兵圣，中国大兵学家孙武于其所著《孙子兵法》一书中有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是战力，“奇”是谋略。又云曰：“兵者，诡道也”。“诡道”即奇，此可谓游击战之解释。又云：“战势，不过于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兵形象水，激水之疾，可以漂石”。西方兵学家克劳塞维茨曾道：“游击战，似一种云雾或蒸气，从不凝成固体，但于必要时，可以某一点凝为云团，自云雾中爆发可怖之闪电。”足证中外兵学家所见不谋而同。

二、游击战之战例

战例一：元代，成吉思汗之蒙古骑兵，纵横欧亚两洲，所向无敌，先后建立中国本部之大汗国，欧洲与亚洲西北部（窝氏河下游之萨莱黑斯科东南）之钦察汗国、中亚细亚之察合台汗国（察合台汗国，太祖次子察合台之封地）及亚洲西部之伊儿汗国等四大帝国。成吉思汗常道，其对付敌人有如饿鹰之捕小鸡”。蒙古骑兵驰骋于欧亚，飘忽不定，出没无常，经常以寡胜多，故能横扫战场，建立空前之武功。

战例二：法国拿破仑远征帝俄，曾攻占莫斯科，是时，适逢隆冬，俄利用空室清野，毁坏物资，发动民众参加游击战，处处打击法军，断其后路，使其补给困难，饥寒交迫，拿破仑不得已遂引兵撤退，而边退边遭游击队袭击，法国丧亡殆尽，铩羽而归。

战例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游击队之扰袭德军，中国及菲律宾游击队之扰袭日本，均收相当的效果。苏联最重游击战，自一九四二年始，即将游击战列入军事计划内。

三、我国游击战之采用

民国二十七年，国府迁都武汉，曾召开军事会议，研讨对敌战法，于战略上国军采取消耗持久战，于战术上，我曾于大会中提议：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偏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当时，蒙蒋委员长接纳，

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至第一次南岳会议，委员长指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政治战重于军事战”，迨民国二十八年，改订战斗序列，遂设立冀察、苏鲁两游击战区，将正规军开至敌后游击，且规定各战区应以三分之一兵力，于本战区内担任游击任务，化敌后方为前方。是时，沦陷区民众闻风而起，纷纷加入游击队，发展至为迅速。当时沦陷区之面几大部份为我占领，使仅控点线之敌人，穷于应付。

当我正开军事会议于武汉时，适遇太原失守，当时会议中即曾讨论第二战区失守，大本营应如何指示问题。是时，第二战区队伍已纷纷准备渡河，离开山西，我立即建议：“以阎长官统率所有队伍即于战区内担任游击，不论任何部队不得退过黄河，否则，以军法从处。”是时阎长官拟将长官部撤离黄河，我认为长官部应为部属之表率，岂能例外，故极表反对。当时，我更从山西地位之险要与阎长官在山西之深厚关系，说明此命令之贯彻，绝无问题，故此案遂作定论。而我此建议，关系全局很大，直至抗战末期，山西一直控制于我手。

当我提出游击战建议时，曾有人指出，国军未演习游击战，此议是否可行，尚需考虑。我表示说，以打游击战起家的中共，亦为中国人，中共可以打游击战，国军当亦能打游击。再者，又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作法，殊不知于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历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游击战不打无把握之仗，此与孙子所云：“合于利者动。”唐太宗所云：“见利速进，不利速退。”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游击战纲领

1． 游击战应坚定必胜的信念，以奋发充裕之精神，力求主动与机动，并随时与正规军之配合，予敌以打击而迅速歼灭之。当物资缺乏战斗激烈之际，仍需镇静若定，坚韧不拔，俾获最后之胜利。

2． 游击队之任务，主在攻击敌之后方及其联络线，破坏敌伪组织与经济设施，且不予以扰袭、破坏，并歼灭之。

3． 游击队应有自觉之纪律、自治之能力、自动之精神，无论何时何地皆应严守纪律，尽忠职守，临机应变，独断专行，以充分表现革命军人之本能。

4． 游击队系以军事掩护政治之推进，以政治促成军事之发展，故军事与政治务必隔合一体，以增强其效能与保障胜利。

5． 游击队应爱护民众并组织而训练之，使由近亲而信仰而合作，积极以参加作战，消极使不为敌用，俾可争取民众，发动全面战争。

6． 游击作战之主旨，于战略上为长期抵抗，以少胜多，在战术上为速战速决，以多胜少，指挥官需善为体会而运用之。

7． 游击队指挥官必须具备高尚之品格，勇毅之精神，坚决之意志与卓越之识见。凡事须率先躬行，与士卒同甘苦，以为众望归向之重心，以谋士气之振作。

不为与迟疑，皆可陷军事于不利，较之误用方法者为尤害，指挥官应力戒之。

8． 协同一致，为达成战斗目的之要素，故游击队应

与友军确实联络，协同动作，或遂为声援；或同时进击；或里应外合；或分进合击，尤贵在遵守时间，保持秘密，以达成其任务。必要时，虽为友军之牺牲，亦在所不惜。

9． 战斗技术为达成战斗目的之手段，盖技术娴熟足以增强自信心与旺盛之士气，故游击队应利用机会随时随地对战斗技术予以严格之训练。

五、《游击战纲要》摘要

（一）组　织

游击队之组织应灵活严密，便于进退集散，与给养补充，而能担负独立任务为准。故组织游击队需视当地情形而定，若于险要山谷、森林、川泽等有利地形，与敌军势力薄弱，群众抗敌情绪高涨之情形，则组织不妨放大。反之，若于开阔地带，广大平原，或当地社会环境恶劣下，则组织宜小，便于机动。

为求利于精神团结、指挥便利计，应就原有团体及群众予以适当配合。若每村农民，不必分散，以其自家性命所系，易于守望相助。若每厂工人编为一队，亦易收团结之效。

1． 正规军组成者——装备稍优，但官兵不惯游击战，领导方法宜加强游击战术研究与政治训练，在组织与管理方面，应适合游击战，竭力讲求与民众合作。

2． 由于民众自动组成者——熟悉于民情地形，爱国情绪高，惟组织力差，干部与士兵亦缺乏军事与政治能力——除保留原有干部授以军事政治教育，并加派干部加以训练，予以物质上之补充，防止吞并之行为。

3． 派遣干部至民间组成者——其优劣之点与前述第

二项相同，宜择有声望富领导能力者领导之，于敌势薄弱，民气高涨时，发动而组织之。

4． 由民团、警察所组成者——装备训练较好，熟悉地方情形，惟不惯游击战——应加派干部，加强政治训练与游击战术。

5． 由各种帮会组成者——有反抗异族之意识，熟悉地方情形，有革命性，重义气，富情感，惟乃缺军事与政治训练，且门户狭隘——宜慎选干部，加强政治与游击战之训练。

6． 由反正之敌伪军组成者——不免有少数动摇分子或敌人间谍在内，宜发扬同仇敌忾心，稳定动摇分子，肃清间谍。

（二）根据地

1． 游击队之根据地为我机动战之策源地，持久战之堡垒，目的在使部队获得适当之整顿与补充，以争取更大之胜利。

2． 选择根据地应注意多数有同情心之民众而不为敌注目之地区。地形上进可攻退可守，以山岳地带为最有利；湖沼港汊地次之；平原地则利用青纱帐起时，且有充裕之资源，在敌后方可绝对保密。

3． 根据地应创立主根据地，副根据地，预根据地与假根据地。假根据地用以迷惑敌人，虚虚实实。主副根据地应能互相策应，以期安全。游击队应因粮于地，因械于地，以此方式图谋根据地之发展。

（三）政治工作

1． 游击队政治工作之目的，在使部队与民众明了抗战之意义，而忠勇奋发，彻底合作，以争取军事政治之胜利；

同时，破坏敌伪组织，瓦解其阵容，使敌无法获得侵略成果。

2. 游击队之政治工作，其重心应在中队以下（因士兵多），并须深入民间，力求扩展。且须机动与主动，务使干部与队员皆能推动政治工作。

3. 政工人员应人格高尚，以身作则，为部队与民众之楷模。

4. 政治工作在使官兵明了大义，忠勇奋发，要求民众与军队切实合作，患难与共，对敌伪应动摇其军心，瓦解其阵容，破坏其组织。

(四)战 斗

1. 正规军之战斗系以兵力、兵器装备相等或稍强稍弱之敌为对象，按战术原则行之。游击队之战斗，常以少数兵力，劣势兵器与装备，以求达成其任务，故二者大异其趣。

2. 游击队之战斗主在敌后行之，运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攻，声东击西，避实击虚，乘敌不意，出奇制胜之妙诀，以达成扰乱、破坏、牵制、消耗敌人实力之目的。故竭力避免攻坚，打硬仗或死守。

3. 游击战斗以造机、补机、伺机，以打击敌人，若仅敌防我攻、敌攻我防，则非游击战之本旨。

4. 游击队之战斗，力求主动与机动，故进退自如，通常采取攻势。除万不得已时，不能取守势。

5. 游击队之攻击在以少胜多，以弱制强，以柔克刚，故袭击、伏击、夜袭均为其主要手段。

6. 袭击、奇袭、急袭、强袭（以强有力部队袭击）等袭击时间应利用夜间、黄昏、拂晓行之，使我能秘密其行动，乘敌警戒疏忽而袭击之，最为有利。

7． 袭击成功后，应移驻战场适当距离，取隐蔽地方集结整理，防敌反攻。仅留必要人员清扫战场，将战利品迅速搬运为要。

（五）命令、通报、报告

1． 情况为决心之根据，决心为命令之依据，敌后游击队各级指挥官务宜努力搜集各种情报，以便决心适当，下达适当之命令。

2． 指挥官决心定后，需坚决执行，尤贵临机应变，不误时机。

3． 通报、报告为判断情况，实行决心之重要资料，其传达方法须机动、迅速、确实，以能适时到达为要。

4． 各官兵对命令应绝对服从，虽死不辞。

5． 命令下达时应注意事项：

（1） 通常以个别命令为主，鲜有用乏同命令者，且以口授为原则，除万不得已时，不可用笔记命令，若用笔记命令，须用预定暗号或代替语，以防泄露。

（2） 用电报、电话下达命令时，为顾虑敌人劫掠与窃听计，需讲求预定之方法，以预先约之暗号或密码下达之。若以电话下达命令，为防泄漏计应屏去左右。

（六） 侦 察

1． 侦察之目的，在明了敌情、地形、地方之组织，民众之情况，交通之状况及地方之经济等情形。俾供指挥官判断与计划之资料，故无论何时皆须派遣官兵或同情我之民众搜索，代为侦察。

2． 侦察不可单从表面形状观察，应据事实与真像，详加判断，以免受敌欺骗。

3． 敌常用各种伪装、欺骗手段，使我侦察困难。故

从事侦察者，不惟要有肝胆沉着，热心慧敏的性质，且需有科学知识与侦察技能。

4. 侦察活动常在敌后方、侧方，最易因环境而动摇之，故对侦察人员应予严格训练，使能保持机密，临难不屈，始终如一，完成任务。

5. 侦察之组织——游击队之侦察，以目的分为军事与政治二种，以编组分为官兵与民众三种，以方法分为便衣与化装二种，务须妥为配合应用，以期协调而无遗憾。

6. 关于敌情，应侦察之项目如下：

(1) 敌之兵种、兵力、装备、位置及主官姓名。

(2) 敌之警戒情形，运动状态与企图。

(3) 敌之正面、翼侧、背后、附近之兵力配置与工事构筑情形。

(4) 敌之仓库、兵站位置、与守护兵力多寡。

(5) 敌之弹药、给养、补充方法及来自何处，前方后方。

(6) 敌之一般情绪(反战情绪、生活状态、官兵间情感、对我方印象、与民众关系等)。

7. 关于地形应侦察之事项如下：

(1) 主要道路之方向，有无支路及平行路？通到何处？路幅与土质，能否通过机械化部队，炮、骑及辎重车辆？沿途村镇情形与隐蔽程度。

(2) 有无山地、河川、森林？其种类与形态如何？

(3) 游击队之谍报为驻在沦陷区或随敌行动之秘密工作，应以精悍机警之官兵或女子、小孩任之。

(4) 游击队之谍报应力求避免敌人之注目为手段，假借各种背景为掩护，其行动应注意通信方法，秘密其工作。

(七)警　戒

1. 游击队之警戒，非专恃自己兵力，且应节约兵力，除直接警戒由自行担任外，并利用同情我之民众，于四周广阔范围内，担任内接远距离之警戒。

2. 游击队应明了自己兵力及环境，处处留意，周密警戒，故警戒人员常化装或着便装，便于达成警戒目的。

3. 游击队之警戒，分为行军、驻军与根据地三种，分述如下：

(1) 行军间应适时搜集敌情、地形之情报，排除障碍，掩护游击队，使其不受敌突击。

(2) 驻军间之警戒在使游击队获得安全之休息，不使敌发觉我之所在。若为敌发现，与之战斗时，则掩护本队先期撤退。

(3) 根据地之警戒——游击队根据地为敌人最注目之处所，势必摧毁而后已，故主根据地之警戒，应组织强硬灵活之警戒网，使全体民众游击队化，以资协助。若以重要入口处，应增派重兵扼守，远距离则派遣潜伏哨与便衣侦探。全体军民均应有警戒心及战斗准备。

(八)行　军

1. 游击队之行军应以轻装、迅速、秘密为要，俾能争取主动与机动地位，尤须有适切之计划，周密之实行，方达成任务。

2. 游击队之行军，宜避走大道，以行小路为主，通常于夜间，风雨行之。有时白昼行军，可利用山地、沟壑、森林等隐蔽处行之。

3. 行军间应严守纪律，俾获得民众之好感与同情。

4. 政工人员需在本队行进，使可以在停止时，从事政工宣传。

5．行军时，须预先选认明熟悉之官兵为向导，一人与尖兵同行，一人随司令官或本队指挥官同行。夜间则需要多派向导，以每一小队一人为原则。

（九）宿　营

1．游击队之宿营、应以战备为主。不可专重休养，致遭意外。

2．游击队之宿营，应以露营。村落露营为主，若无敌情顾虑，亦可舍营(住民房)。且不可久住一地，应时常变换位置为宜。

3．宿营地转移时，应将一切标志及可供敌人判断之资料，概行消灭，免留痕迹。

4．宿营遭遇敌人袭击时，指挥官应镇静沉着，临机果敢，而为适当之处置。是时，应否坚决抵抗，或尽速撤退，或乘机袭击敌人，视当时敌情，敌军兵力多寡，我军有无胜算把握而定。

（十）通信联络

1．通信联络于游击队极关重要，只有适时获得各种情报，才能出奇制胜，避实击虚，争取主动。故通信联络，必须灵活巧妙为要。

2．游击队之通信联络，以战略战术与装备之联系，通常以人力及各种辅助通信方法为主，但遇情况许可时，则以有无线电为宜。尤须注意保密，以防泄漏，发生障碍。

3．游击队不仅以正规通信人员为满足，更当借游击队人员与忠实民众之协同，构成所需之通信网，以期联络确实与周密。

4．忠实民众所组织之通信网，不仅可保持机密，且能妨碍与破坏敌人通信网，故需尽量组织而运用之。

5. 游击队之通信，务使游击区与战区有确切之配合与呼应，故最重要之通信方法，常以传达、无线电及飞机等行之。

6. 游击队之通信，于夜间通常以无线电为主，如缺乏无线电时，则使用传达，信号手枪及其他简易信号为宜。

7. 游击队之通信，应使用特定之信号、简语、密码，以资迅速机密。发信、收信及通信三方面，尤须有密切之合作与周到之顾虑。

8. 构成通信网时，以能利用地方原有通信机构为最善，若分村之电话与递补哨等，须严密其组织，使为我用。

9. 游击队应利用忠实之民众，潜伏于各分村市镇，以担任秘密通信联络。

游击队与友军、地方机构及通信员（站）相互间之联络，除利用通信网外，需互派联络侦察，加强联络效能。

游击队之通信联络，常须通过敌人占领区域，稍有不慎，不仅泄漏我企图，且有受敌欺骗之危险。故通常不记载我方企图及收发地点，更不拘于形式，使受信者了解为已足。兹举数例如下：

（1）术语之记载——须将报告时间按约定暗号记载，使敌人莫明真像，我则一目了然。

（2）密码之记载——有关机密之电话，可用密码谈话，避免窃听。

（3）技术之记载——系以写生画、漫画等按密码描写之。

（4）药水之记载——将化学药水书于纸上，于后不显痕迹，可避免敌之发觉。

（十一）破　坏

1. 破坏为游击队之主要任务，其目的在使敌行动迟滞，补给困难，士气沮丧，意志动摇，因而削减其战斗力，甚至摧毁之。

2. 游击队之破坏，分精神与物质两种。精神以政工为手段，物质以技术为手段。

3. 精神破坏又分为军事与社会两种，军事方面为对敌伪之政治工作，社会方面为对民众之政治工作。

4. 物质破坏通常分为下列几种：

(1) 交通网之破坏(如铁路、公路、桥梁、渡口等)。

(2) 通信网之破坏(如电报、电话)。

(3) 飞机场之破坏。

(4) 仓库之破坏(如粮秣、械弹、被服、油料等仓库)。

(5) 工厂之破坏(如各种军需工厂与水电厂等)。

(6) 其他之破坏(如敌伪机关与兵舍等)。

5. 精神与物质之破坏均应适合战术上之要求，若能相辅而行，收效更大。

(十二)补充、给养

1. 游击队之兵器、弹药、被服、粮秣等往往不能得良好之补充。故游击队指挥官应勉励部属，为国牺牲，以耐缺乏；且需要与部下同甘苦，使于补充困难时，仍能达成任务。

2. 游击队之兵器、弹药之补充，常感困难，故各级指挥官应注意部属射击技术之训练，以节省弹药。

3. 游击队给养之来源，通常有下列五种：

(1) 取之于敌(截获敌之辎重车辆等)。

(2) 自种自给。

(3) 购备。

(4) 征用(按征用命令行之)。

(5) 募集(以乐输为主，严禁强迫)。

4. 游击队弹药之来源也有下列五种：

(1) 取之于敌、因械于敌。

(2) 由根据地所建立之简单弹药厂修改与制造。

(3) 收集战场所遗弃之弹药。

(4) 由就近之友军补助及由最高军事机关补给。

(5) 购备。

(十三) 卫 生

1. 游击队之官兵及主管卫生人员应注重卫生，以防疾病，减少战力。

2. 游击队之卫生设备，通常很简陋，故对于一般卫生规则之遵守，各种卫生事项之设施，务必于可能范围内，力求进行。

3. 游击队卫生人员与卫生材料之补充，均较困难，故卫生人员必须罗致，卫生材料严禁浪费。

(1) 卫生人员应收罗热心抗敌之中医或西医。

(2) 培养卫生干部，由地方卫生机关、救护团体派员协助。

(3) 卫生材料应取之于敌(夺取敌伪卫生机关之卫生器具与材料)。

(4) 购备。

(5) 募集(由抗战团体或国际友人之协助)。

(6) 万不得已时，可使用草药。

4. 所谓卫生机关，为卫生队医务所与根据地医院及疗养所。

5. 游击队之官兵均应具备卫生常识，对救急方法如

输血、裹伤应加强训练。各官兵应随时携带绷带、救急包各一个，以备救急之用。

6． 游击队每到一处，应检查食品饮水，并调查传染病之有无，讲求实例之处理。

(十四)阵中日记

1． 游击队一切战斗行为及政治工作，多有特殊之点，故应有阵中日记，记载共经过与见闻。以供政治与军事之参考。

2． 阵中日记应记载之事项：

(1) 战斗间自己所用之战斗方法，无论成败，均需记载，使成功者可资取法，失败者可为借鉴。

(2) 战斗间敌人所用之战斗方法，及我们应付之手段。

(3) 敌人所使用之新兵器及我方防御之方法。

(4) 敌人对游击队所采用之手段及我方对策。

(5) 各官兵特殊之功过。

(6) 各官兵于战时情绪及纪律。

(7) 民众抗敌情绪及如何鼓励民众与游击队共同抗战。

3． 属于秘密事项，可记载于另册，秘密保管。至于失效时，再行转载于日记。

4． 阵中日记由下列单位作之：

(1) 游击纵队各处。

(2) 游击支队部(设有各处者，自各处自作)。

(3) 大队，中队部。

(4) 各级政工机关。

(5) 各独立部队(如炮兵队部、机关枪队部)。

(6) 卫生机关(卫生队、医院、医务所)。

(7) 阵中日记应妥为保管，若情况紧急时，应加焚毁，以免委诸敌手。

第二十三章　后方勤务概要

自古用兵，后勤为重。汉高帝业，仗萧何转运关中，光武中兴，赖寇洵河内支援，足食足兵，古有名训。拿破仑称霸欧洲，攻俄之役，惨败于莫斯科，因俄用“坚壁清野”政策，使拿破仑补给中断。抗战中期，日军第二、三次进攻长沙，因后勤为我截断，补给不继，势须退却，致为我军所乘而追击之，故遭惨败。古今中外战史类此者，不胜枚举，足见后勤之重要。

古谚有云：“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军事必须重视后勤，于此可见。现代武器，装备虽获改良，而须后勤之支援，更胜往昔。

一、第一期抗战之后勤设施概要

自抗战起，军政部为支援长期抗战，充实军食，于二十六年八月在陕、豫、鄂、粤、赣、川各省成立军需局，并召集有关机关及专家研究副食品，携带口粮品种，管理屯购办法，拟具有管理粮食大纲，明令颁布。继奉军委会颁发非常时期粮食调节办法，此为我战时粮食管理法案之首创。整理扩建各地备荒储粮，颁行各部队，设有采购委员会，集中采购粮秣。

二、第二期抗战后勤设施概要

1. 后方勤务部于二十八年一月上旬将兵站机构调

整，在重庆设后勤总部办公处，于桂林、天水二行营设置后勤办事处，分别指挥江南江北各战区之兵站业务。

2. 各战区集团军总司令之下，设置兵站分监部，指挥所属兵站机构。

3. 游击部队因行踪不定，以不设置兵站为原则，但给予现金，以就地购粮。

4. 二十八年五月，以江南江北各兵站业务愈趋繁重，原桂林、天水二行营办事处组织简单，不足以应付繁剧任务，遂改成兵站统监部，分别统辖并指导长江南北兵站机构业务。

5. 统监部在组织上隶属于行营，受行营直接指挥，在后勤系统上，仍受后勤总部监督指挥。

6. 江南统监部指挥第三、四、七、九各战区兵站业务，江北统监部指挥第一、二、五、八各战区兵站业务。

7. 统监部之职权，除指挥各战区兵站总监部，办理一切兵站业务外，于粮弹、油料、器材屯储地点与数量之审核，及各战区运输力量之统筹支配与应用，并各战区之紧急业务，均有权处理。

8. 屯粮、购粮、征实。

(1) 屯粮——各战区后方屯粮需三个月，后方总库屯粮需半年，按作战期间三百万人口，一年之食粮计划而屯储。当时设有屯粮监理委员会，由内政、军政、后勤各部，各派高级职员参加，以后勤部长为主任委员，经济部长、农本局长为副主任委员。

(2) 购粮——以现金购买粮秣，各战区各省区均照规定办法组织购粮委员会，主办屯粮、购粮。

(3) 征实——所谓“征实”，即征粮不以现金折抵，而

以实物收取，此为防止通货膨胀，所采用之征收办法。在抗战期间，此为后勤重要措施之一，为防止通货膨胀，用意固佳，亦有其效果，但因征收办法未臻理想，百姓损失，此亦不可讳言。

9．运输之工具，视各区交通情况而定，有人力、兽力、车辆、船舶等，若无公路，只得以人力、兽力搬运。

第二十四章 抗战中之国际关系

一、中美合作

1784年，华盛顿领导北美十三州战胜英国之殖民主义，成为独立自由国家，是为世界第一民主共和国。美国经八年血战，终于获得独立，其独立宣言，旨在使美国人民获得自由生存权利。此国家本其开国先贤遗训，凭借其国民智慧，运用其天赋资源，累积成为世界最富强康乐之国家。美国政府与人民向于国际上主持正义，主张公道，有中国古时王道精神，有“以天下为己任”之气概。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威尔逊总统动员四百余万人，于欧洲登陆，打败称霸欧洲之德国。第二次大战，罗斯福总统再度率领美国参加，将德、日、意轴心国家击溃，在远东战场与国军密切合作，将潜入滇缅之日军击溃，于中国境内日军，因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而宣告无条件投降。二次大战期间，美国援华军经援达五亿美元以上，且有空军及一部分陆军参加实际作战，使我军事上转移攻势，此皆中美合作之赐。今将中美外交与军事合作情形分别略述于后：

（一）中美外交事略

1. 民国二十年(1931年)，日本军阀为实行北进政策，发动"九·一八事变"，我国向国联与九国公约提出控诉，呼吁主持正义，当时美国不是国联会员国。遂援引九国公约，谴责日本之侵略。

2.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一月二日，日军侵占锦州，美国务卿史汀生向中日两国递送备忘录，不承认日军以军事行动造成之事实，予我精神上极大支援。其后，各国对华政策皆援引史汀生之"不承认主义"，似以此为应遵守之义务。

3.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日本入侵华北，并迫我签订塘沽协定。二十三年四月十七日，日本更发表狂妄之天羽声明，当时各友邦均袖手旁观(英法仅向日本质询)，唯独美国态度显明，史汀生本其"不承认主义"力加反对，美国舆论亦大起攻击日本侵略之野心。

4.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为中日战争之序幕。当时美国务卿赫尔利发表演说，反对以武力为推行国策之工具，认为国际间纠纷应以和平途径解决，不当以武力掠夺。美国总统罗斯福亦发表防疫演说，呼吁一切爱好和平国家联合起来维护和平。对破坏国际秩序者，应如防疫一样，予以强制隔离，此实为美国政府正面声援我国之始。

5. 民国二十六年"八·一三"淞沪战起，我因装备较敌为差，武器较敌为劣，故损害很大，又因持久战略，不能将主力消耗于淞沪战场。遂将主力西移，向内地推进。此时美国舆论多以惋惜语气，为我抗战前途担忧，乃开战一年以后，先有台儿庄之胜，继于武汉外围与敌相持半年，我抗战精神反愈战愈奋，于是美国舆论对我乃由普遍之同情，

进而发生尊敬心，愿予我以实际援助。二十八年七月，美国即通知日本废止美日通商航海条约，翌年，更严格限制汽油、废铁、机器及其他军事物资运往日本。三十年七月，更正式冻绝日本在美资金，此为美国对日所实施之经济制裁。同时，对我财政方面，则尽力稳定我国之通货，成立准基金委员会，维持美元与国币之经常汇兑比率，此外复由其进出口银行对我国予贷款美金一亿二千万元。

6. 民国三十年，美国会通过废止排华法案，并在法律上准许中国人民入美籍。民国三十年(1941年)十二月八日，日本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事爆发，美日正式宣战后，美国商请英国于三十一年二月，同时通知中国，废除治外法权与各种不平等条约，另以平等原则，改订平等互惠条例，凡此种种友好措施，足见美国政府与人民其维护正义主持公理之信念，实与我国"兴灭继绝"之传统精神甚相吻合，而尤为吾人所永志不忘者。

讲至此，我记起一事。在美国尚未实行对日本禁运之时，曾派一思想左倾，亦为太平洋学会主要人物，边疆问题专家的拉铁摩尔到来重庆。一日，与我谈话，正谈话间，适日机前来疲劳轰炸，我们相率躲避于李子坝防空洞中，历数时之久。敌机炸弹并炸中山坡，弹片落于防空洞之外。待警报解除后，即到外面透透空气，一出洞口，见眼前有一破片，卫兵捡来给我，觉余热犹在。我手拿破片，笑对拉氏说："日本用你们的废铁制成炸弹，来炸我们，这块破片便是明证，今天日本轰炸我们，明天便会轰炸你们。"说毕，将破片送他带回，要他向政府转达我的意思，赶将战略物资禁运日本。拉氏当即回答说："你的话很宝贵，看法也很正确，我想美国政府一定会采取步骤。"

拉氏曾到蒙古、新疆考察，对于边疆问题有独到之见解，他说："西北地方广阔，人民生活困苦，开发边疆，应先从经济开发着手，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准。"

(二)中美军事合作

1. 民国三十年(1941年)春，美国国会通过对我租借法案，美政府遂于是年十一月派遣一军事顾问团到达中国，负责装备及训练我国新军，惟因当时我国际路线多为敌封锁，交通困难，运输工具缺乏，故美国租借之装备甚少运达，但对我空军之援助，则较为成功。盖由三十年初，美政府批准美国战斗机，得由美国志愿飞行员驾驶，为我对日作战，以是美国空军志愿队，在陈纳德将军指挥下，正式成为中国空军有力部队之一，曾予我西南部以有效之空防。

2. 三十年五月，美政府根据租借法案与我签订租借协定。首先着重于滇缅路之加强运输，且拟以一千五百万美元之租借款项，用以建筑缅甸至中国之铁路(自仰光至曼德勒接入滇境)。但由于日本在缅甸军事上之胜利，此一计划遂未获实现。

3. 三十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日正式宣战。翌年元旦，中美英苏等二十六国，在华府签订共同宣言，表示一致联合对日作战，并推举蒋委员长为中国战区(包括越南及泰国)之最高统帅，成立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为同盟国在东亚大陆上之最高战略执行机构。其后美国政府应我国之请，派遣史迪威将军来华，除指挥中印缅战场上之美国军队及一部中国军队之外，并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委员长之参谋长，而陈纳德将军所辖之飞虎队亦于此时改为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仍驻扎中国境内对日作战。于此中美两国军队合作，更益形密切。

4． 日军于三十一年三月突入缅甸，进占仰光后，继续向缅北推进，直至我滇西，将我中缅唯一交通路线切断。此时我对外交通，仅有经喜马拉雅山驼峰之一条极薄弱之空运补给线，且时遭暴风雪之袭击，致每日输入之物资，仅能供应陈纳德将军指挥下之美第十四航空队以汽油炸弹及火药等，至对中国最感需要之物质，如汽油、大炮、载车等军品，均无法供应。此种恶劣情形直维持至三十二年一月，同盟国始在卡萨布兰卡开会时，决定恢复通往中国之陆上交通，并加强驼峰之空运。

5． 三十二年五月，华盛顿会议开幕，皆以我国抗战已将六年，万一失败，则影响于盟军在亚洲所处之形势极为严重。于是一再考虑，结果同意予空运总队以优先权，俾驼峰之空运量每月可以增至一万吨。同时并决定于三十二年秋间雨季结束后，即发动缅甸攻势，此攻势计划旋于魁北克会议时详细拟定之。

6． 魁北克会议中，盟国决定尽当时所有之手段打通中国陆路交通线，俾予我国以充分之援助，使亚洲战场能获致最大之效果。于是成立东南亚盟军统帅部，以英国蒙巴顿海军上将为统帅，而以史迪威将军为副，至中国战区之军事则仍归蒋委员长指挥，并仍以史迪威任参谋长。在缅甸作战之英美空军则合编为东方空运总队，由美国史特梅耶将军任司令。此时我国驻印军正协同美国工兵连伸展雷多公路，并于公路平行敷设油管直至昆明，俾增强对中国之运输。此除驼峰之空运量已增加为每月二万吨。我国又于四川、云南各地建立空中堡垒基地，以备美空军轰炸日本本土之用。

7． 三十二年十月，我驻印军第二十二师及新三十八

师，依盟军攻缅计划，由雷多公路前端进入胡康河谷与美军密里尔准将之丛林部队会合，企图将日军驱出缅北，重开滇缅路。此除中美两军在极端恶劣之气候下，穿过极端困难之地形，首将日军精锐第十八师团歼灭。我为扩张战果，即以飞机将十四师及五十师空运经驼峰历八日到达印度之苏克瑞丁基地，于重获美械装备后，即加入胡康河谷之战斗。并于三十三年八月攻入密芝那机场，同时我国境内之滇西远征军亦越过怒江向缅北攻击前进。

正当此时，盟军方面发生阵前易将之事。按史迪威将军为一性格坚强之将领，尤富有热烈之责任感，在华期间，对击败日军所作之贡献固足称述，惜其对中共认识不深，误信中共为土地改良派，且曾建议以美械装备共军，美国政府遂于三十三年秋召其回国，以释其重负。为指挥作战便利计，中印缅战区乃划分为印缅战区与中国战区，印缅战区由美方索尔登将军指挥，中国战区之美军则由魏德迈将军指挥。此时中美之军队布防次里瓦以北之更的宛河，正计划南下中缅，直逼瓦城，蒙巴顿上将则由南部发动两栖攻势，以便攻占仰光。至三十三年十一月初旬，索尔登将军指挥之中美部队渡过伊洛瓦底江，攻陷瑞古，并于十二月初旬，肃清通往八莫之补给线。至三十四年一月下旬，与我远征军会师芒友，中印公路至此完全打通。三月下旬，与英军会师乔梅。

8．我为配合盟军作战，于三十三年冬成立陆军总司令部，以参谋总长何应钦上将兼总司令，统辖第一、二、三、四方面军，编训统率装备美械之部队，与日军作最后之决战。

9．三十四年(1945年)一月，雷多公路(以后称史迪

威公路)即已通至中国境内，因此陆路之运输大增，由油管输入之油量每月为五万四千吨，而驼峰之空运量每月亦增至四万六千吨。由于此项物资之供应，使我国得能装备二十九个美械师及若干特种部队，国军战力亦因之增强。凡装备美械之部队，由美军派遣干部，分别于昆明、桂林两地协助训练，成绩卓著。据马歇尔报告，贷予中国之物质，其价值已超过五亿美元以上，运输费用尚未计算在内，但以美国贷予其他盟国之全部约值二百亿美元计算，则我国所得者实微乎其微。

10．国军得美械装备后，中美二军首先表现成绩于滇缅战场，曾将敌在缅甸方面五个师团击破，使敌军为之震撼。不久，美国又令其所在德国及意大利击败轴心国之第五军与第九军，加入中国战区之序列，此时我新装美械部队与驻华美军，于密切合作下，曾将进攻湘西之敌击溃，并继续攻占桂柳。乃中美两军拟于华南方面开始全面反攻之际，而日军已接受盟国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矣。

11．当敌投降之时，国军因拟于华南方面发动反攻，故队伍多集结于此。及至抗战胜利，为早日恢复秩序计，曾分别采用水、陆空运，甚至人伕挑运，赶将队伍往北推进，当时美国亦以海、空运输力量极力协助，将日韩侨及台胞共二百一十万人分别遣送归家，此亦中美合作一段佳话。

二、日 本 投 降

(一)日军在远东战场之失利

1．民国三十年(1941年)十二月八日，日军袭击珍珠港，初期战争至为顺利。负责指挥此次偷袭之日本海军大

将山本五十六，于袭击成功后，曾向美广播，扬言要美国人于白宫门口递出降书，其骄矜之状，由此可见。至1943年，美军在太平洋力量壮大，开始节节反攻，敌陆海空军遂着着失利，敌军首为空军失去制空权，海军活动继遭限制，陆军亦因美军实行越岛战术而呈孤立，因而补给中断。

2．民国三十二年十月下旬至三十四年三月下旬，敌军先后共使用五个师团于缅甸战场，均被击破(一在缅北，一在滇西)，中印公路因而打通。

3．民国三十四年四月上旬至六月上旬，敌军发动湘西会战，遭我反击，损兵折将，因之士气极为低落。其后，我继攻占桂柳，正拟水陆二路用兵，反攻广东，以打通海口，策应太平洋盟军之作战，以接受美援，而敌人已宣告投降。

综合以上所述，日军在滇缅地区、太平洋地区、中国地区等几方面之战斗，均皆失利。

(二)中美英对日提出最后通牒

民国三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我蒋主席、美国杜鲁门总统、英国邱吉尔首相，在德国波茨坦发表声明，对日本提出最后通牒，促其宣布无条件投降，否则将应用中美英三国巨大之陆海空军全部军力，使日本武力及其本土完全毁灭，此声明要旨有：

1．实施开罗宣言之条件，日本之主权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之其他小岛。

2．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负责之政府，上述目的达到后，同盟国占领军队当即撤退。

日本于接获此一最后通牒后，立即召开紧急内阁会议

《御前会议》，当时曾一度企图拒绝投降，并谓："日本政府决心战至最后悲惨结果。"其后，美国见日本尚无投降决心，遂于八月五、七两日，连续以原子弹轰炸广岛与长崎，是时，国军亦配合盟军作战，拟于华南发动攻势，而苏联更乘机于八月九日对日宣战，以争取占领东北之权益。至此日本见大势已去，已无法挽回劫运，遂由瑞士、瑞典转达盟方，表示愿意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

（三）日军向中国战区之投降

1． 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为中国战区受降之最高指挥官，日军投降代表为日军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

2． 受降地区——中华民国（东三省除外，归苏受降）、台湾、澎湖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日本陆海空军于此地区内应接受命令向我国指定之受降主官全部投降。

3． 日本投降之指挥机构、兵力及武器：

（1） 指挥机构

总司令部一个，方面军三个，军十个，师团三十六个，独立旅团四十一个（内骑兵旅团一），独立警卫队守备队及支队十九个，海军特别根据地队及陆战队六个。

（2） 投降兵力

敌军投降之兵力，总共为一百二十八万三千二百四十人。

（3） 武　器

陆军：步骑枪六十八万五千八百九十七支，手枪六万〇三百七十七支，机关枪二万九千八百二十二支，主要火炮一万二千四百四十六门，

海军：舰艇船舶共一千四百艘，计共五万四千六百余

吨。潜艇三艘。

空军：各种飞机一千〇六十八架（可用者二百九十一架），炸弹六千吨，汽油一万吨。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重要军事会议与重要文献之摘要

（一）联合国华府宣言

自太平洋战事爆发后，世界各国对德日意等轴心国家作战者共有二十六国，当华盛顿会议时，由罗斯福总统提议，称此为联合国。至三十一年（1942年）元旦，各国代表在华府签订共同宣言，表示一致对轴心国作战。会议中，盟国推举蒋委员长为中国战区（包括越南及泰国）之最高统帅，并成立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为联合国在东南亚之最高战略机构。

（二）卡萨布蓝卡会议

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美军在西非登陆，并举行军事会议，决定打通印缅与中国之陆路交通，并加强喜马拉雅山驼峰之空运。

（三）华盛顿会议

三十二年（1943年）五月，同盟国在华盛顿举行会议，皆以中国抗战已历六年，万一失败，影响于盟军在亚洲所处之形势将极端严重，遂决定于三十二年秋间雨季结束后，在缅甸发动攻势，一面则加强驼峰之空运。

（四）魁北克会议

三十二年（1943年）八月，同盟国在魁北克举行会议，决定尽所有之手段，打通印缅与中国之陆路交通，并成立东南亚盟军统帅部，以英国海军上将蒙巴顿为统帅，而以

史迪威将军为副，至中国战区之军事则仍归蒋委员长指挥。

（五）开罗会议

美国罗斯福总统、中国蒋委员长、英国邱吉尔首相，偕各该国军事与外交顾问人员，在北非举行会议后，发表概括之声明如下：

1. 三国军事人员，关于今后对日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决心以三国陆海空军最大之压力，加诸残暴之敌人。

2. 三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己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思。

3. 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凡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我三大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独立。

（六）雅尔塔会议

1945年2月美、英、苏在雅尔塔举行会议。会议所讨论之问题至为广泛，若联合国之组织，对德、日、意之作战，及有关中、韩、法、伊、波等国问题，皆在讨论之列，兹就有关中国者简述如左：

第二次世界大战，联合国以欧洲为主战场，英、美、苏集中力量以对轴心国作战。当会议之时，轴心国之意大利业已战败求和，德国在北非战场亦已失利，即于欧战场亦着着失败，距投降之期不远，所剩者仅日本而已。罗斯福总统在会议中，希望苏联出兵远东，攻击东北伪满日军（关东

军），斯大林同意抽调三十师对付日本，但要求继承帝俄时代在东北之一切权利，包括租借旅顺、大连不冻港及其周围地区，中东路（大连——哈尔滨）及向西北延伸至满洲里，向东延伸至海参崴之路权，承认外蒙之独立，苏联所据之理由为保护西伯利亚南边之疆界。

雅尔塔会议，我未派代表参加，经保密若干时间后，方由美国通知中国履行条件。外蒙之独立，由公民投票表决，当时我国并派雷发章（内政部次长）前往监视投票。

（七）波茨坦声明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七月二十六日，我国蒋委员长、美国杜鲁门总统、英国邱吉尔首相，在波茨坦发表声明，对日本提出最后通牒，促其宣布无条件投降，否则吾人将应用三国巨大之陆海空军全部军力，使日本武力及其本土完全毁灭，此富有历史意义之公告，摘要如下：

1． 余等美国总统，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及英国首相，代表余等亿万国民，业经会商并同意，对日本应予以一机会，以结束此战争。

2． 中美英三国之强大陆海空部队，业已增强多倍，其由西方调来之军队及空军，即将予日本以最后的打击，此项武力，受所有联合国之支持及鼓励，对日作战，不至其停止抵抗不止。

3． 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之其他小岛内。

4． 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铲除，盖吾人坚持，非将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新秩序，势不可能。

5．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全国军队解除武装后，可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同盟国占领军队当即撤退。

6．吾人警告日本政府，应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有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

（八）蒋主席对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之广播

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我国民政府外交部正式接获日本投降电文后，我最高统帅即发表对全军国民及世界人士之广播，要旨如下：

1．我们的"正义必然胜过强权"的真理，终于得到最后的证明，这亦就是表示了我们国民党历史使命的成功。我们中国在黑暗和绝望的时期中，八年奋斗的信念，今天才得到了实现。

2．现在我们抗战是胜利了，相信全世界人类与我全国同胞们，都一定在希望着这一次战争，是世界的最末一次战争。

3．我们相信今后地无分东西，人无论肤色，凡是人类都会一天一天加速的密切联合，不啻成为家人手足。此次战争发扬了我们人类互谅互敬的精神，建立了我们互信互任的关系，而且证明了世界战争与世界和平是不可分的。

4．我中国同胞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明，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5．我确信全世界永久和平是建筑在人类平等自由的

民主精神和博爱互助合作的基础上，我们要向着民主与合作的大道上迈进，来共同拥护全世界永久的和平。

6．我请全世界盟邦的人士，以及我全国的同胞们，相信我们武装之下所获得的和平，并不一定是永久和平的完全实现，真要到我们的敌人，在理性的战场上为我们所征服，使他们能彻底忏悔，都成为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份子，才算达到了我们全体人类企求和平及此次世界大战最后的目的。

（九）日本向联合国降伏之文书

1．余等兹对合众国，中华民国，及大英帝国，各国政府首脑于1945年7月26日于波茨坦宣布，尔后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同意之宣言条款，根据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之命令，代表受诺之。

2．余等兹布告，无论日本帝国大本营及如何地位所有之日本国军队，及日本支配下地带之一切，对于联合国无条件降伏。

3．天皇及日本帝国政府统治国家之权限，置于为实施降伏条款采用认为适当措施之联合国最高司令官之限制下，1945年9月2日于东京湾密苏里号舰上签字之，并根据日本帝国天皇陛下及日本国政府之命令，且以其名义，重光葵，根据日本帝国大本营之命令，且以其名义，梅津美治郎，1945年9月2日上九时四分于东京湾，美合众国、中华民国、联合王国，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及为与日本国存在战争状态之其他联合国之利益受诺之。以下署有中、美、英、苏等各国代表名字。

第二十五章　抗日战争之总检讨

一、日　　军

（一）日本自明治维新后，朝野上下一致图强，一战而胜满清，再战而胜俄国，称霸远东，为黄色人种露头角，为亚洲之安定力量。国父孙中山先生于民国十三年底北上路经日本时，曾演讲赞誉日本维新后国力强大，期望日本实行王道主义。领导亚洲各国共同繁荣，切勿使用霸道。

（二）日本田中义一为首相时，曾上一奏折，大意谓："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满蒙必先征服朝鲜。"日本即以此为国策，野心军阀乘机而起，先后发动"五·一五事变"(1932年)与"二·二六事变"(1936年)，杀害重臣，威胁元老，大权逐渐落少壮军人之手。日本按照田中奏折，先并吞朝鲜、征服满洲，使华北特殊化，继发动"芦沟桥事变"，"八·一三"淞沪之役，终于使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战争初起，日本曾扬言以三个师团兵力于三个月内将国军击溃，狂妄不可一世。检讨日本失败原因，其少壮军人应负全责。

（三）日本军阀估计国军战力之错误——中国在清末，执政者昧于世界大势，闭关自守，固步自封。在政治上，贪污无能；在军事上，士无斗志，对外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例如：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八国联军之役，皆遭惨败，终为外人所轻视，订立许多不平等条约。列强当时有瓜分中国之议，各自划分其势力范围，例如：俄于东北，德于山东，英于长江流域与广东，法于滇桂，国势危殆不

可终日。其后，幸国父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革命，于辛亥年推翻满清，创建中华民国，同时以三民主义训导国民，以民族主义求国际上之平等。一般国民经此熏陶后，普遍觉醒，一致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解除帝国主义加之我们之枷锁。国父去世后，今总统蒋公继续领导，本"攘外必先安内"之原则，于民国十五年誓师北伐，扫除军阀，以统一中国。不料日本军阀急于推行北进政策，因妒嫉中国之统一，而于"九·一八事变"，成立伪满组织后，继续发动"芦沟桥事变"，淞沪战争，终于引起我全面抗战。

(四)敌初期对华战略，采"速战速决"，以为短期间内即可将我主力击溃，使我停止抵抗，早日结束战争，故于淞沪战胜后，继续进攻南京。南京失陷后，敌诱我投降，曾托德驻华大使陶德曼试探和议，我中央严词拒绝，并发表宣言表示抗战到底之决心。敌诱和失败，继攻徐州，徐州之役，我于临沂与台儿庄二处，击溃敌第五、十师团，士气为之大振。其后敌续进兵武汉，我军于武汉外围与之相持半年，敌"速战速决"之策略已无法达成。

(五)敌占武汉后，见国军主力仍在，且转入西北西南险要地区，遂停止西进，不再深入。而于政治上，扶持伪组织，在军事上，掠夺物资，以战养战，并以海军封锁粤海口与国际路线，以空军轰炸我政治、经济中心，企图动摇我士气、民气，使我抗战不能持久，结果适得其反，我军民愈战愈奋，愈挫愈坚，出敌意料。

(六)日本于侵华战争中，同时储备南进兵力，并有防俄之关东军，其使用于中国战场者不过三十师团，因占地甚广，需兵甚多，以如此有限之兵力，遂不能作更进一步之深入，日本于南进占领安南、新加坡、菲律宾后，大本

营一度有抽调南进兵力十六个师团以攻打重庆之计划，适美军在太平洋反攻，因日本失去制空权，海陆军亦遭挫败，遂不能抽调，计划乃未实行。敌若专心北进，以原有之三十个师团，再增加二十个师团之兵力，于武汉会战后一直西进，使我国军无暇整顿，则重庆必不可守，如此虽不能消亡已觉醒之中国，然抗战之前途必更艰苦，当无疑议。敌若不南进，则美国不会派兵东来，此乃敌人野心超越力量，故自遭败北，自食其果。

（七）日本民族勤俭耐劳，勇敢善战，为有色人种中最优秀民族之一。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日强，一方面若采用国父所谓"大亚细亚主义"，实行王道，领导亚洲；一方面遵照犬养毅"中日合作"之主张，以日本进步之工业技术而扶助中国，开发中国，以工业产品运输中国，而以中国之煤、铁、大豆、木材等原料运输日本，使经济富足，共存共荣，则中国外交上不须联俄，对内更不必容共，如此则中共不会在中国境内发展。研究远东近代史，日本原为有为之国家，惜因政略错误，不仅自毁前途，且因其侵略中国，遂致中共之发展，日本国几乎亡国，而中国大陆亦陷于中共之手，两败俱伤，孰令致之，此可为长叹者再！

二、国　军

（一）国军对日抗战采消耗战略

自来战略必须与政略配合，我国政略对内为团结内部，收揽人心，对外为广结外援，争取友邦，缔结反侵略同盟，争取民主集团之共同胜利。依据政略而后策定对日战略，在"七·七芦沟桥事变"前，我为配合"攘外必先安内"之政略，对日军之侵略，作有计划之抵抗，以争取时间，削平中共。

自抗战开始，我因国力未充，装备太劣，乃采消耗战略。并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进而发展为全面总体战，以打破敌"速战速决"之战略。在作战指导上，争取主动，见机而进，知难而退，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不计点线之得失，而在全面之控制，使敌偏促于点线狭隘之领域，使我游击队与地方团队在敌后发展，扰袭敌人，控制广大地域，变敌后为前方，使敌陷于泥淖而不能自拔。

（二）与盟军并肩作战

1941年（民国三十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事爆发，美国正式对日宣战，至此我单独抗战四年，进而与盟军并肩作战。

当时我为协同盟军作战，以打通滇缅路，争取外援，故不顾中国战区兵力之减少，而抽调七个精锐军与驻印远征军两个军，在滇西与缅北战场作战。迨滇缅路打通后，我获得二十九个师之美械装备，反攻战力大为增强，故于滇缅战场及湘西，反攻桂柳诸战役，均能克敌奏凯，此证配合盟军战略之正确。

（三）游击战配合正规战之重要性

武汉会议时，蒋委员长曾宣称："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因我对日作战，乃被迫应战，而非自动求战。当时国内虽甫告统一，而西北未平，军队编制不一，武器装备陈旧，军队训练未精，户口调查未清，故不能实行普遍征兵；且财力薄弱，军用物资匮乏，种种缺点不一而足，以此情况应付现代化装备之敌，故于战争中牺牲重大，备感艰苦。敌本其一贯之北进政策，先蚕食东北，继使华北特殊化，进而消亡全中国，我迫不得已起而应战，故于战略上，一者采取消耗战，一者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此为我抗战所

以能持久之重大关键。

（四）抗战中我中央对中共忽视之错误

1. 民国二十六年“八·一三”淞沪战争开始，亦即对日全面战争之开始。当时中共曾通电一致抗日，于军事上取消红军组织，归军委会统辖指挥，服从最高统帅蒋委员长之命令，于政治上取消苏维埃组织，归国民政府管辖。中央为团结国内各党派，一致抗日，本与人为善之意，故接纳其请求，在军事上委其为第十八集团军，在政治上委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表面看来，中央此举纯出于好意，而实不免有忽视中共之嫌。

2. 第十八集团军编入第二战区序列，归阎长官指挥，对日抗战。按理，阎长官应付予其任务，责其执行，不应放纵，听其发展组织，收缴民枪。待其势力庞大，即不打敌人，专袭击国军，二战区长官部事前既未加以约束，事后亦未加制裁，有一时期甚至利用中共薄一波编练新军三十余团，终受薄煽动，大部叛变，占据山西广大地面，幸当时国军在山西兵力雄厚，且阎长官坐镇山西历史甚久，否则山西为中共所占，恐在冀察、苏鲁战区之前。

3. 敌后冀察、苏鲁二战区对中共之放纵——武汉会议时，为加强敌后游击，故增设冀察、苏鲁二游击战区。就冀察战区而言，鹿钟麟总司令兼任河北省主席，除指挥石友三、孙良诚、朱怀冰等西北军外，尚有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及游击支队司令吕正操等，势力发展甚快。其后朱德见机而进，派遣聂荣臻、徐向前等由山西越太行山而入河北，初与国军互不侵犯，国军见其收缴民枪、发展组织，竟置之不顾，待其势力壮大，控制全面，而为时已晚，故冀察战区转落中共之手。

第二十六章 战后整军及行宪

一、战后复员

政府于抗战胜利后，实行复员，首将全国部队予以整编，使全国军队为国家之军队，全国武力为民之武力。民国三十三年时，全国陆军为一百二十个军，三百五十四个师，三十一个旅，一百五十个团，十五个营。至三十四年底，整编为八十九个军，两个骑兵军，二百五十三个步兵师，共裁减三十四个军，一百一十个师，二十一个旅，八十三个团，十个营，旅团营等小单位均编入步兵师，以符合“减少小单位，充实大单位”之原则。

民国三十五年，由中央政府，中共与美军合组之军事三人小组，决定整编国军及统编共军为国军之基本方案，整编后之军队拟为二十二个军，六十个师(内共军十一师)，特种部队之比例为全国陆军之百分之十五，当国军正按计划实行分期整编时，中共不仅不遵照办理，而且反抗命令，到处流窜，以扩大叛乱，致整编计划未能彻底实行。

二、国防机构之改组

政府鉴于整军建军之需要，实行改组军事机构，将以前之军事委员会改成国防部，使陆海空军体系及运用一元化，并划分陆海空军区，确立军事行政体系，策定国防分区计划，以为建国建军之基础。民国三十五年六月一日，国防部正式成立，承国府主席蒋公之命，任余为第一任国防部长。先是中共林彪为共军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统率

共军十万之众，于三十五年三月中旬苏联红军撤出东北时，由红军之手接收得关东军军械五十万支，乘国军未开到之前，袭占四平街，终与国军相持不下。当时我奉令至四平街督战，并迅将林部击溃，继占长春、吉林，本可就此乘胜追至佳木斯或满洲里，将林部歼灭或驱出东北境外，以永断祸根。而中央忽令军事归杜聿明指挥，且军队不准越过辽河，理由为长春有六千便衣红军，若我军越过辽河，恐引起冲突。当我一到四平，下令继续追击时，杜聿明即出示此一命令予我。我说："既是我下命令追击，责任当由我负。"当时我一面去电向当局报告，同时乘飞机返京向蒋先生面陈云："战胜则当进，或追出国境，或予以歼灭，盖共军已仓皇撤退，全无斗志矣！"蒋先生道："据报长春有六千着便衣红军，万一肇事起冲突，怎样？"我说："共军已溃退，多六千红军，亦不济事。"蒋问："若红军再来，如何？"我答曰："此非我人之责任，按撤兵规定，红军应已撤回，若红军再来，此乃联合国之问题。"委座听罢，当场不置可否。

翌晨，我搭机将行，蒋先生因重视此事，亦欲同往，遂同乘马歇尔专机直飞沈阳转长春（当时军队已到长春），委座一见前方军事进展顺利，极为愉快。当时我即建议继续追击，并表示说，若东北剿赤完毕，可以少数部队布防，而先抽回五美械装备师于华北助北平行营剿共，待事毕再行调回。蒋先生说："六月一日国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事。你的意思，我交代杜聿明去做。"我说："委座在此，我也在此！"他当即说："你在此，若马歇尔问你是否要继续追击，你不好说话；你回去，我在这里，可以推到我身上，所以你还是回去。"此来，我只得返京就任国防部长。

其后，马歇尔八上庐山，压迫政府下停战命令。杜聿

明于哈尔滨停顿攻势整编军队，予共军以喘息与反攻机会，大局遂渐于我不利。当时若长驱北进，直下东北，消灭林彪之大患，而后抽兵入关内，如此于戡乱大局或稍可改观。

三、应先剿共后整军

（一）抗战开始，我为增加战力，全国悉索敝赋以赴，以人力补助装备之不足，故队伍番号特多。当二十六年时，全国有步兵师一八二个、独立步兵旅四十六个、骑兵师九个、独立骑兵旅六个、炮兵四个旅、二十四个独立团，其他工兵通讯兵在外。三十三年全国队伍扩大为一百二十个军、三百五十四个师、三十六个独立旅、一百一十二团、十五营。至三十四年年底，整编为二十一个军、两个骑兵军、二五〇个步兵师，共裁三十四个军、一百一十个师、二十一个旅、八十三个团、十个营，所余之团编入步兵师。三十五年，经国共美三人小组拟定之统编共军为国军基本方案，全国军队编为二十个军、六十个师、分二期整编，国军依此方案实行，而中共不仅不遵行，反而扩大叛乱，到处流窜。

（二）自整编以来，至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止，全国编余军官送军官队者有十六万一千六百六十员，士兵第一、二两期共五万三千一百二十五名。士兵经各部队送补给区与供应局者共有三万二千〇九十一名，由各机关直接送复员站者有四千七百一十六名，至复员站遣送回家者有二千七百八十七名，其余皆陆续复员完毕。

（三）本人完全赞成整军，但以时机不对，故主张先剿共而后整军。当国军实行整编时，军训部有令将特种兵集中处理，各部队即纷纷电询，是否还须剿共。当时我亦乘飞机至西安谒见蒋委员长，面陈此意，蒋先生遂下令停止。

四、应先剿共后行宪

1. 抗战胜利时，余曾向重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公建议，应乘战胜余威，先将中共剿平，而后行宪。

2. 中共在抗战初期，自称八路军，人枪不过三万余，偏促于延安地区，其后于抗战中收缴民枪、袭击友军，扩充结果，对外号称正规军六十万，民兵二百万。以正规军言，与抗战之初相比，几达二十倍。

3. 中共在抗战胜利后所占地区：

东北九省：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嫩江、兴安、黑龙江。

东北四院辖市：沈阳、哈尔滨、大连、长春。

黄河流域：冀、察、晋、绥、鲁、豫、陕、甘、宁、青。

长江流域：鄂、皖、赣、苏。

以上各省暨院辖市，共约二十个单位，其中或为全部，或为大部，或为一部，而中共所占领之农村面积则更为广泛。

4. 若中共未剿平即行宪，有甚多矛盾处，且难免违宪。例如：宪法第十一条：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之自由。第十二条：人民有秘密通信之自由。第十四条：人民有集会及结社之自由。而抗战胜利后，由于中共扩大叛乱，中央为军事之需要，不得不采取戡乱之行动。故凡违背勘乱国策之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均在取缔之列，如此显与宪法违背。再者，为防止军机之泄露，通信亦须检查，此亦违宪。又如在军事戡乱期间，对于违反国策之集会、结社、或因戒严法之限制，或因军事法之规

定，均有取缔之必要，如此亦抵触宪法。是以戡乱期间，行宪宜缓。

5．国民大会为代表全国国民行使政权之最高机关，据宪法第二十五条：国民大会依宪法之规定，代表全国国民行使政权。又第二十六条：国民大会以下列代表组织之：

（1）每县市及其同等区域各选出代表一人，但其中人口逾五十万者，每增加五十万人，增选代表一人。

（其余（2）（3）（4）（5）（6）（7）条从略）

按宪法第六十二条：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人民选举之立法委员组织之，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权。

宪法第六十四条：立法院立法委员依左（下）列规定选出之：

（1）各省各直辖市选出者，其人口在三百万以下者五人，其人口超过三百万者，每满一百万人增选一人。

（其他各条从略）

又宪法第九十一条：监察院设监察委员，由各省市议会、蒙古西藏地方议会，及华侨团体选举之。其名额分配依左（下）列之规定：

（1）每省五人；

（2）每直辖市二人；

（3）蒙古各盟旗共八人；

（4）西藏八人；

（5）侨居国外之国民八人。

依据宪法上列之规定，国大代表、立、监委员之选举，必须各省市政权统一，地方完整，始可实行普选。

抗战胜利，所以急于行宪之故，系因受国内友党，与地方号称民主人士，及海外言论压迫所致。彼等均谓抗战

胜利后，应开放政权，不应再一党专政，故希望及早行宪。当时中央有一宣言，表示于抗战胜利后一年行宪，故当胜利来临，中央即一面剿共，一面行宪，而中共却乘机扩大叛乱，占据全国二十个省市。

行宪予中共以扩大叛乱之机会，此为不能行宪之第一理由。又行宪之时，党政军各界负重任者，无不参加竞选活动，凡参加活动者，势必松懈其本身工作，尤以与中共斗争地区，影响最巨，故中共势力日竭，此为不能行宪之第二项理由。

当时竞争之人士，有国民党党员，有三民主义青年团员暨友党党员，因竞选激烈而生争执伤和气者甚多，尤以湖南为最甚。湘西因争执激烈，党团内讧而闹出命案。此为中共未平，不能行宪之第三项理由。

国大代、立、监委之选举，于中共盘踞之地区，若东北、若华北，因无法举行票选而改为推选，与宪法规定之普选殊为不合。此为未剿共，不能行宪之第四项理由。

国大代表于民国三十七年五月，在首都南京召开第一届国民代表会议，实施宪政，选举总统副总统。按一般政党政治惯例，总统由政党内部推出参加竞选，并由竞选总统者提出某一志同道合同志为副总统候选人，以收辅助之功。

三十七年四月，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蒋中正先生竞选第一届行宪总统，以现任总统在全国之威望，卒获全场一致之通过。当时党内竞选副总统提名者有孙科、于右任、程潜、李宗仁四人，按照惯例，副总统之提名，应由总统提出，交全会票选，倘逾半数即为副总统候选人，但以参加提名竞选诸人，竞争激烈，以后遂改

为自由竞选。

中央在表面上依全会决议，采自由竞选，予各人以逐鹿之机会，而实际上党团全力支持孙科，认为孙科可能胜利。在大陆上，一般党团员知识较高，喜欢自由而不愿受拘束，对于中央全力支持孙科引起反感，而转投李宗仁之票，故使黑马李宗仁脱颖而出，获得最后胜利。此事影响戡乱前途至巨，其中经过，因我参与其事，知之甚稔，故概略说出，以供研究现代史者之参考。

民国三十五年冬季，李宗仁将军担任北平行营主任，指挥冀、察、热等省戡乱军事，并负责支援东北军事，任务堪称重大。当时李将军曾有一电与我，表示将出竞副总统，要我转报委员长，探其口气。我报告后，委员长当面训示两点："一、北平行营剿共任务重要，不可轻离；二、我为军人，李某亦为军人，两位军人参加竞选不妥。"要我据此转告，我以为委员长意思正大，遂照此电复李将军，要其中止竞选之念，不可南来。此电一去，即未再接其复电。

一日，李将军忽至南京，并来看我，他说："北平有许多事情办不通，此行除述职外，并将晋见委座，说明竞选之决心，若竞选成功，即不回北平，若竞选失败，亦不返北平。"说毕，即动身前往见委员长。待回来时，他说："委员长之意仍希望我回北平。"

当时竞选党内副总统提名者，有孙科、于右任、程潜、李宗仁诸人，孙科为国父哲子，乃最适当之人选，深获党团及广东之支持；于右任为党国元老，为西北人士所支持；程潜时任武汉行营主任，为两湖所支持，因此中央难于取舍，争执结果，遂决定不提名而改为自由竞选。中央虽予

于右任、程潜、李宗仁等以竞选机会，但认为在党团支持下，孙科定可当选，不料天下事意外者多，结果却是李宗仁登上副总统宝座。惟李虽告胜利，非但于党国不利，于其个人亦无好处，而于其有关者或支持者，更系一大损失，此为始料所不及者。

回忆李在代行总统职务期间，于军事上，自徐州会战失败后，国军精锐消耗殆尽，不能挽回颓势；于政治上，虽有和谈代表团之派遣，终无结果。和战均无结果，反与中央发生许多隔阂，终致情势演变，大局逆转。

当竞选之时，为争取选票，李与孙科双方不免动以情感，致两广之团结亦遭受影响，此亦始料所不及。总而言之，中共未平，而强为行宪，致有如许之恶果，此为不可行宪之第五项理由。

此外，就我个人而论，此次选举副总统，影响我政治生命很大。一切说来话长，且从我与李宗仁之渊源说起。我是广西桂林人，与李将军系为同乡，在统一广西与建设广西期间，大家皆以李、黄、白并称，广西亦有模范省之誉。民国十二年，我任广西全权代表，至广州士敏土厂晋见孙大元帅，请求广西加入广东革命阵营。孙大元帅极表欢迎，秘委黄绍竑为广西讨贼第一军总指挥，我为总参谋长，潜回梧州缴沈鸿英之械，然后进兵桂平至南京。当时李宗仁任陆荣廷麾下之旅长，驻守琼州，当陆、沈争夺桂林时，讨贼军乘机发难攻取南宁，并联络李宗仁共襄盛举，最初李不赞成，经我剖析以利害，始允参加。惟李不用讨贼军名义，而改称"定桂军"。此二军实只二旅之部队攻占南宁后，改组成立讨贼联军，于谭浩明公馆公推李宗仁为联军总司令，黄绍竑为副总司令，我为前敌总指挥兼参谋

长。人事既安排就绪，遂开始统一广西，进行建设广西之工作，其后并加入广东革命阵营，参加北伐。

因有以上所述渊源，故我与李将军之关系特别密切。回忆南京大选开始前，李宗仁、黄绍竑、李品仙、黄旭初诸人暨广西国大代表，立监委等一致要我助李竞选。当时我任国防部长，正于九江之国防部指挥所，指挥军事，攻打中共军队第一号悍将刘伯承，不久，将刘击退，并摧毁中共在大别山之根据地。为此一事，蒋先生于国民代表大会中曾特别为我宣扬一番。

几位副总统候选人中，论历史关系，李宗仁之声誉甚佳，最初我未答应为李竞选，但于公于私，情面难却，终于允诺。当北伐抗战期间，我所经省份甚多，所认识之人亦复不少，再加于中央服务多年，与各方面来往颇多，交往甚广。同时，我信仰回教，西北陕、甘、宁、青、新等省信徒甚多，尤以宁、青、新三省是为基本票所在。又我系广西人，广西自成基本票，且安徽于抗战八年，先后在廖磊、李品仙领导下，故亦成基本票。以上基本票所在共计五省，此外加上东北、华北、西南、东南为数不少之同情票，故使李宗仁脱颖而出，压倒孙科而当选为副总统。一般人以为李之获胜，我居功最大，我本人却不作此想。其后因政治之纠纷，终于被卷入旋涡，此实为始料所不及。

白夫人一向公私分明，从不干涉政治，此次独不赞成我助李竞选，她力劝我仍回前方"剿共"，不可介入政治旋涡。我考虑再三，以决心不够，仍为情感所动，未采纳白夫人远大之建议，至今思之，内心极感痛悔。

前李副总统向在两广地方服务时间较多，对中央方面之人事不太熟谙，自当选副总统后，照例应随总统常驻中

央。按宪法第十九条规定，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而于副总统之职务并未规定，可谓处于备而不用之地位。总统雄才大略，而其幕僚又出类拔萃者甚多，故我向李副总统建议如何与蒋公相处，以期止于至善：

1．副总统系辅助总统，平时不可轻易提出主张——当选举副总统时，因竞选关系，每一候选人皆开出许多政治支票，其实副总统无权兑现，此事既成过去，以后即不可轻出主张，轻于言诺，以免与中央不合。

2．中央各院部会与民意机关，有许多人事不熟，每人之能力，见解如何，副总统应利用此机会，于每周六分别邀请各院首长，各民意代表召集人，与党部负责人及许多外交经济各方面之人才聚餐，每次人数不过一桌，预先妥为安排，一面联络情感，促进彼此间之了解，一面听取彼等意见，增加学问之进益。

此等聚谈作成记录两份，一份自己保存，一份送呈总统，对外不公布。若有建设性意见，经总统审阅后，批交主管参考，一者增加自己阅历学识，一者对各部会多所了解。

3．中枢既有英明总统主持国家大计，副总统宜每年至国内各地巡视，一者代表中央关怀地方之意，一者视察地方建设，探求民瘼。同时借观赏名山大川之便，以收“读万卷书，行千里路”之功。此外，地方民意代表如国大等，应随时与之联系，以增加彼此之了解。副总统出巡时，可率各部会有专才者，组一小型旅行考察团，留心观察，以广见闻，并就每人观察所得，制成记录两份，一份送呈总统，一份自己保存。

出巡时，可视气候之所宜，分期分区前往，若冬天赴

华南，夏天至华北、东北，纯取其气候相宜也。

我身为幕僚，曾将以上三项建议向副总统提出，副总统表示同意，我又报告总统，总统亦认为此议甚佳。不料中共乘选举期间大肆活动，其势猖獗，大局为随之逆转，致此议无暇实行，等于一篇空论而已。

第六篇
军训八年
第二十七章 《现代陆军军事教育之趋势》摘要

为将之道，要能带兵，要能练兵，要能用兵。开诚布公，信赏必罚，此带兵之道；技艺纯熟，指臂相使，此练兵之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此为用兵之道。此外，最要者，革命军应加强政治训练与教育，使官兵认识三民主义，培养革命精神，为三民主义而奋斗，为国家而牺牲。有主义之军队，若人身之灵魂，常能愈挫愈奋，愈战愈勇，不避艰险，一往直前。

以余本身所参加之两次战役为例：辛亥武昌起义，首先发难者为南湖之少数炮工兵，彼等于满清压迫下，公然举起革命义旗，旋全国响应，推倒满清，此为国父宣传民族主义深入人心之功。满清专制皇帝，对内横征暴敛，使人民生活困苦，对外则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故总理提倡民权主义，终于推翻满清。

又如民国十五年北伐，时我任参谋长，革命军以两广为基础，枪不过五万，人亦只十万，而竟击败至少力量大我十倍，训练装备亦较我为精之孙传芳、吴佩孚军队，此无他，政治训练之功也。

民国十三年六月，黄埔军校成立，蒋中正先生任校长，

而学生军数目至为有限。其余革命军虽未经黄埔训练，但军中派有政治部主任(北伐时改称党代表)，特别重视宣传，口号有："打倒北洋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爱国家，爱人民。""不拉伕，不筹饷。"简单明了，虽系具文，仍彻底做到，使官兵人人具有革命精神，以一当十，故能完成北伐，此证政治训练之重要。

我在军训部任内，于抗战胜利之初，著有《现代陆军军事教育之趋势》一书，兹择要叙述如下：

余在抗战期间，蒙委员长蒋公之命，任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为期八年。回忆受命之初，正值抗战开始，我以劣势装备对优势装备之敌，训练亦不及敌人，盖当时全国表面为统一，实则各省各自为政，学系干部地域复杂，无统一军事训练。自知此弱点，如何始可加强军事训练？一曰有形之军事训练，一曰无形之政治训练，以此提高战力，补充装备之不足。

抗战开始，我一面与敌作战，一面加强训练，融讲堂、操场、战场三者于一体。学校讲堂所讲者，即士兵于操场所操者，操场所操者即战场所用者。于此情况下，自觉责任重大，乃托取第二次大战教训，搜求有关军事教育之材料，同时参酌我国军情，并归纳若干个人于八年抗战中视察校阅学校，部队所得意见，写成此书，以供袍泽之参考研究：

一、概　　论

法国拿破仑曾道："战术十年一变。"此种说法，今已不适用。盖人类之进化，科学之发达，乃系加速度。自有史以来，以中国五千年历史与近三百年史相较，则近三百年乃系突飞猛进。若再以近三百年科学之进步与近五十年相

比较，则又可知近五十年之科学亦为突飞猛进，而非渐进。拿破仑所谓："十年一变。"若以为期四年之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论，则战争初期与战争末期已有变化，尚不到十年。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进步更加迅速，可谓日新月异，推陈出新。世界一切事务时刻在变，有变便有新旧之分，新必胜旧，此为进步之原则，进步者必胜落后者，军事上更复如此。倘用兵之目的在求胜，则必须讲求进步，军法上虽有不变之原则，惟实施之方法则恒常在变。

生产工具决定战斗工具，生产技术决定战斗技术。随着军事技术与一般科学之进展，战术科学亦在不断改变中，许多新兵器、新品种之不断加入军中，使原有之兵器、兵种或为之废弛，或为之减色。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至本次世界大战，因技术之进步，而发生战术之变革，诚罄竹难书。例如：电学与光学之进步，蒸汽机与内燃机之使用，核子弹与火箭之发明，使时间与空间缩短几千几百万倍；兵器之威力与射程，使骑兵之效率为之减少，甚至归于无用。筑城技术与火力之配合，使轻装之步兵难于奏效；战车使小口径之火器失效，空军重量炸弹、原子弹与降落伞部队，使要塞为之减色。

在战术方面，拿破仑将以前之横队战术改变为纵队战术，后因机枪与自动武器之发明，又进而演变为疏开队型。再者，两次世界大战，由平面战术演变为立体战术，由立体战术演变为闪电战术，将来则可能演变为按钮战术。时代既为科学时代，战争自为科学战争，故军队几乎全部科学化技术化。

在此科学化技术化时代，一般人对于军事演进看法，发生了误解。唯武器论者，以为武器可解决一切，因而专侧

重武器之发明，过份重视武器之效果。德国名将鲁登道夫有言："军队之组织，系人与武器。"无论武器如何进步，而其操作使用，仍须有人。人必须训练，始能善用武器，始能发挥武器之威力；若无精确严密之训练，则最好之武器，亦等于无用。

德国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所以能横扫欧洲，并不在乎其所使用之武器如何崭新，而是因其军事教育有特殊之处。尤其德国装甲部队与要塞空军之教育，以及普鲁士之军人精神，各国军事学家皆有口皆碑。德国有军官团之组织，借以研究学术，增进情感，此亦有口皆碑。第一次大战德国失败后，凡尔赛条约限制德国国防军不得超过十万人，全国警察之训练则不在此数；而德国实行超级训练，兵士可充任军官之用，警察可充警官之用，此种训练亦有口皆碑。希特勒上台后，以具有军事锻炼性质之劳动服务代替全国征兵制，较之征兵尤为普遍。再者，德国有所谓民间工程学会，实为国防工程训练机构，每人皆须接受军事工程学识。此外，诸如钢铁厂、化学厂，莫不成为变相之兵工厂或学校之实验室。

德国在各方面逐渐有基础之后，希特勒便撕毁凡尔赛和约，首先干涉西班牙内战，进而并吞奥地利、捷克，终于入侵波兰，导致大战之爆发。德国军队经常反复演练，其装甲部队与空军配合，组成闪电战术，以演习姿态，空袭荷兰、比利时，击破马其诺防线。德国之所以能席卷全欧，并非其有何新武器，而在其训练、教育、编制各方面运用配合，故能发挥威力。

处于今日科学与技术时代，吾人固不能抹煞新技术之价值，然吾人实不敢苟同一切唯武器至上之唯武器论者。

但有武器，尚须求高度之技术化，始能日新月异，以新克旧。就余个人意见，并非有好武器即可获致胜仗。若"八·一三"淞沪战役，日本在虹口租界之守军不过三、四千人，而我以十倍以上的兵力，配以飞机、坦克、惟始终无法攻下。第二战例，敌在娘子关有一旅团遭孙连仲集团军包围，敌之一旅多有八千人，而我至少以五倍之兵力围攻不下。再就戡乱"剿共"而言，无论陆海空之兵力与装备，我皆占绝对优势，不料却遭失败。由此证明，武器并非打胜仗之唯一因素。

战争之关键，不全在武器，而仍在人之因素。人必须加以严格之训练，始可使用现代装备，发挥威力，若训练不精，装备等于零，讲战术亦有如纸上谈兵。

二、军事教育之先决条件

以上曾扼要说明技术与战术之关联性，问题之症结，归根究底仍在军事教育。军事问题本很复杂，但其解决则甚简单。军人贵乎有判断能力，能将复杂情况敏捷判断，抓住问题核心，全力以赴，以击中敌人要害。

吾人确应采取列强进步之装备与技术，尤其在科学技术进步之今日，吾人若稍一放松，即告落后。技术日新，战术亦日异。我国之技术、战术、装备均较落后，故应以列强为借镜，始可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俗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即此之谓也。

吾人深知，纯军事不能解决问题，盖今日之战争，乃为全面战、总体战，军事必须与政治、经济、文化配合，始能获致最终之胜利。政治、经济、文化为军事教育之先决条件，兹分述如下：

1．政治——政治与军事之配合，政略与战略之一致，

此为千古不易之原则。二千余年前，中国名军事学家孙子曾云："道者，全民与上同意，可以致生，可以致死；而民不畏危。"易言之，政治合于百姓，上下一心，始可同生死，共患难。一百余年前，德国名兵学家克劳塞维兹道："战争是政治之继续。"足见政治条件于军事教育影响之大。

最近之例则更为明显，例如苏联在帝国时代，国家最不进步，故于日俄战争遭日本之挫败。惟苏联自列宁革命，共党取得政权后，以共产主义为政治号召，积极建设红军，军队设有党代表、政治部，每一官兵所受之政治训练较军事训练尤为严格，红军人人必须了解，拥护乃至服从共产主义，此不仅为口头之宣传，真正为主义而死者亦为数不少，红军因有此政治之配合，故能发生威力。

再如德国，自希特勒登台后，以纳粹主义相号召，利用尼采超人学说，重建德军。法西斯军队时时处于动员备战状态，德国因军国民教育与组织成功，使全国成为一部战争机器。

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后，采联俄容共政策，设立黄埔军校，建立党军。党军仿效俄国红军，设有党代表、政治部，加强政治训练，每一官兵必须了解三民主义，此种训练，于北伐时确曾发生效力。

2. 经济——在经济上，生产能力与生产技术之水准，关系军事教育甚大。在军事教育方面，若教育器材缺乏，武器陈旧，岂能训练出精良优秀之干部？按当时国家经济情况，新兵器皆优先发给部队，而训练学校则因陋就简，大为不如。以我视察第八分校（校长罗列）为例，训练用之机枪不足，竟以木头代之。再如骑兵之训练，本应穿皮鞋着长裤，带轻便之短枪，而我骑兵学校之学生，竟穿草鞋、

着短裤，带笨重之俄式长枪。如此显见对学校教育之不重视，故我一再力争，建议以两师部队之装备与经费，做为充实学校教育之用。

凡一种军事学说或教育主张之提出，皆于其本国之经济条件有关。例如意大利之杜黑将军，主张唯空军论，风靡一时，唯以意大利之资源能否办到，尚属问题。德国古德琳为"装甲之褓姆"，他主张扩充装甲部队，惟认为资源有限，马匹仍不能全废。

以上二例，就军事立场言，军事主张之提出，必须以经济条件为考虑，否则主张便落空。现代技术日进，武器装备亦随之日新月异，因此若不时时谋求改进，以赶上时代，势必误己误国。以法国为例，自第一次大战胜利后，由于志得意满，不求进步，致生产技术落后，生产能力减低，人口仍无增加，一切惟马其诺防线是赖。反观德国自战后即整军经武，加紧生产，人口亦不断增加，故于二十年后得以东山再起，击败法国，一报昔日之仇。

装备、技术落后，全靠友邦之援助，有时而穷。若一国之技术水平高，生产能力强，则改变军事情况所需之时间较前为短。以普法战事为例，战败之法国历四十年始恢复元气。第一次大战，德国自败于法后，由绝对劣势变为优势，为时仅五年。第二次大战，同盟国对轴心国之作战，由劣势转变为优势，为时四年（一九三九——一九四三），此皆与经济条件有莫大之关系。

3．文化——所谓文化条件，指民族历史，国民生活方式，国民教育基础等而言，此皆对军事教育有深刻而微妙之影响者。日本军队之教育，特别以万世一系之天皇，大和魂及武士道为号召，于精神上发生极大作用，故敌人

作战特别勇敢顽强。日俄战争，日本获胜，国人皆感戴日本陆海空，而明治天皇却归功于日本小学教员，足见文化与军事教育关系之大。

意大利自罗马帝国没落后，除艺术尚称席丰履厚外，军事实不足称述。意大利之陆军，在欧洲系"无用"之代名词，以第一次大战言，于东欧战场，俄军不如德，奥军不如俄，意军不如奥，若以德军为标准，意大利系第四流之军队。意大利自墨索里尼登台后，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本有称雄欧洲大陆之心，然与北非苦战一年，虽偿并吞阿比西尼亚之愿，而意大利传统之败象已暴露无遗。迨第二次大战爆发，意大利与德国皆主张极权，惟意国实力相差太远，故当时德国方面有谓："若意大利与我为敌，德国仅三师团即可将之制服；倘意国采取中立，则德必须派遣五师团以监视之；若意大利参加轴心国作战，则德国得出动二十五师团相助。"证之后日，此言诚不虚也。

当意大利正徘徊于两大阵营间之际，某日在重庆，英国喀尔大使于宴会中与我谈及此问题时，说道："墨索里尼登台，只有形式改变，而意大利之精神并未改变。"语意甚表轻视。当时我尚以为他说话随便，不料验之后日，所说果真。

苏联一向教育落后，民生痛苦，自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红军树立新精神，从落后中解放出来，故能于第二次大战中击败入侵之德军。苏联之国民基本教育虽不高，但军队组织严密，特别注重政治教育，故能产生力量。

凡军事教育有成绩之国家，在文化上必有其得天独厚之条件。例如：有以民主自由为招牌，有以种族优越为号召，有以天皇为偶像，有以阶级利益为招徕，口号虽有不

同，皆要以国民教育为基础。

中国号称五千年历史，有悠久文化之国家，实际国民教育未普及，文盲甚多，新募之兵，常由识字教起，既费时亦误事。

总而言之，处今日总体战时代，若政治、经济、文化各先天条件不先具备，或备而不实，则军事教育之前途甚为黯淡。当然，吾人并非等待条件具备，始可谈军事教育。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条件虽较差，但吾人应以人力弥补其不足，此乃吾人不厌其烦谈论军事教育之本意。吾人研究各国军事教育之趋势，应时刻警惕、虚心求进，加倍努力，以补偿我先天之缺陷。

三、战场需要决定军事教育之内容

自有人类以来，便有战争，足见战争与人类之关系至为密切。战争之要素有多种，国防之需要亦有多端，惟近代战争为科学战争，战争需一切科学为其解决问题，在相当范围内，一切科学必为战争而服务，殆无疑义。而军事教育若欲将一切科学技术包括在内，实不可能，其理亦至明。军事教育非万能之教育，为求实际起见，殆有先厘消其定义之必要。

所谓“军事教育”，是养成提高指挥战斗与遂行战斗诸种能力所实施之一种教育。质言之，军事教育之目的在求战场上之胜利。吾人考察列强现代教育之趋势，首应注视现代战场之需要，尤其战场所呈现之一般状况，故军事教育之着眼，在适应战场之状况，战场状况之能否适应，即可反映出军事教育之优劣与否适当。至于战争之失败，则为军事教育之直接结果。当战争中，要求胜利之敌我双方，于战

术、技术、装备、编制各方面，无不推陈出新，以求自己一切设施均较对方更能适应战场状况，此种适应过程，即军事教育发生作用之时机。由于战场状况瞬息万变，故教育之趋势亦随战场之需要而异。

战场之状况，有其轰轰烈烈的一面，亦有其平淡的一面。以第二次大战为例，绵延几千里之战线，行立体战争，飞机战车成千成万活动，数以百万计之各种大小口径大炮不断地发射，无数之战斗兵在火网交织下冲锋而进，降落伞自空中冉冉而下，凡此种种构成一幕壮烈的场面。再如机械化部队之驰骋沙场、工兵架桥之速迅、通信兵联络之敏捷、闪电战之厉害、原子弹之威力，此亦为战场轰轰烈烈之情况。

战场另有其平凡的一面，例如：狙击兵昼夜潜伏于隐蔽处或树上，待机以机枪或步枪狙击敌人指挥官；步兵防战车班以手榴弹、燃烧瓶，或步枪、机枪之对付战车；攻击要塞堡垒组，使用步兵基本武器，潜入敌人要塞堡垒，或待机阻塞枪眼、炮眼，或乘机炸毁要塞，凡此种种任务，看似简单，其实异常艰巨。

此外，黑夜、拂晓、黄昏亦有战斗，战斗不因天时而停顿。良好之天气固宜于战斗，即风雨霜雾雪之时，亦照常有战斗。现代战争，战场遍布全球，各种天候所在皆有，不能因天候之不佳而停战。训练良好之部队，必可适应任何天候之战斗。例如：德军可至冰天雪地之苏联作战，亦可于利比亚酷热地方战斗。日军在中国大陆各种地形均能发挥战力，即于马来亚之丛林地区，太平洋之岛屿地带，亦均不受影响。

以上就战场所见之情况，加以分析思索，对于现代军

事教育之趋势与内容，自不难了解。今将举出现代教育之重点，叙述如下：

1．现代战争虽趋向机械化，但人仍占重要成份，仍须训练人以为使用。飞机战车固增加各部队与兵士之战斗力，惟战斗之结局仍有赖基本武器之完成，故于步兵之教育，体格之锻炼，精神之陶冶，基本武器之使用等，仍应特别重视。

2．战争机械化，运动速度增加，战伤变化快，使指挥官之判断与决心不得不力求迅速，战时之行动，不得不力求敏捷。运动速度增加，战场变化快，使上级对下级之指挥，不能完全掌握，而有待于下级之独断专行，故每一官兵应培养此种能力，以适应瞬息万变之状况。职斯之故，每一官兵对于各种军事演习与战术研究，不能不特加注意，此为战斗教育之范围。

3．由于兵器种类复杂，兵种数量增多，各种兵器与各种性能皆很专门，而于达成任务则同等重要，故协同教育为绝对必要的条件。

4．现代战争，离不开空军，无空防即无国防，无空军掩护，则陆海军之作战异常吃苦。二十世纪为空权时代，空军性能之增强，使部队之运动、战斗，多利用夜间或特种天候、地形行之。现代战争，战场遍及全球，任何部队均有被派至各种天候地形作战之可能，故夜间教育及特种教育之训练，至为重要。

四、基 本 教 育

所谓“基本教育”指每一士兵之基本需要，例如体格之锻炼，精神军纪之陶冶，基本武器之使用，武器之爱护与

保管，常识之讲授等均包括在内。

1．体格之锻炼——在第二次大战初期，德军横扫全欧，攻势凌厉，所向无敌，盖德军身体精壮，于长途行军后仍能执行战斗任务，在取得攻势后，仍不失时机，立刻追击，不怕疲劳，能耐艰苦。一般人传说，德军有维他命丸可吃，始可至此；德军容有药丸可吃，但若以为以此即可改变体力，无异神话之谈。一切耐劳任苦，皆由基本锻炼中产生。当德军重整武备之际，各国驻德武官前往参观德军平时演习，常见德军步行来回宿营地，以为浪费时间，殊不知德军行军力之强，即得自此平时之锻炼。

战争机械化，不但未减少徒步之功用，相反体力之要求更为迫切，例如：步兵重火器在接敌运动、遂行射击时，仍须人力搬运，其他诸如弹药之补充，机枪、大炮之搬运，皆须人力，若体力不行，即不能达成此任务，故于体操行军之教育，宜特别注重。英国之新兵训练，据云经十六周后，可使每一新兵平均胸围增加一点五吋，体重增加十四磅，足见敦刻尔克撤退之成功，并非偶然。一九四〇年五月底，英国远征军自敦刻尔克撤退，而在弗兰德斯之英军遭德国装甲部队突破，陷于孤立，致与后方交通线之保护异常迫切，当时英国后方已无兵力可转用，不得已将新兵临时编组一营，开至前线维持此一交通线，新兵只凭基本武器，仅赖平时锻炼之体力，竟能圆满达成任务。

2．精神与军纪——在中央所颁布之步兵操典纲领第三条有云："军纪者，军队之命脉也。军队必须有严肃之军纪，然后精神之团结力得以巩固，战斗力之持久性得以确保。因战时各部队之任务不同，其境遇亦各有别，上自将帅，下至士兵，犹能脉络一贯，万众一心，从一定之方针，

取一致之行动者，厥为军纪是赖。"吾人读此，当可明白精神纪律关系战力之密切。

以苏联为例，当其进兵芬兰，攻击赫尔辛基时，红军因系工人出身，纪律与服从均差，动作亦随便，故久未攻下，终于英法出而干涉，苏联撤兵。其后，红军统帅由提摩圣科接任，他修改律令，强调阶级服从，违者严办，一向军纪松弛之红军，自此整肃一新。当二次大战期间，德军进攻苏联，于列宁格勒为红军所败。此次胜仗，或归功于红军士气，或归功于战略，殊不知红军之纪律亦为不可抹煞之因素。

当物资愈乏，战况愈惨之际，精神之要素愈形重要。例如：于炽烈之火网下，在坚固筑城之前，以二、三十个携带步枪之步兵与携带炸药之士兵，攻占敌人堡垒，若无旺盛之精神与严肃之纪律，则此种攻击绝不能成功。

由此可见，部队若缺乏精神与军纪，即使有再好之将领与战术，亦属枉然。

3．基本武器之使用——中国旧社会，以"二十八般武艺，件件皆能"，形容有本事之好汉。到了现代，武艺何止十八件，较之从前，不知增加几十百倍，武器种类繁多，构造又如是复杂，若欲件件皆能，实不可能，故有兵种之分，专门之别。

欧战初爆发时，步枪兵不见得能使用机枪，其后阵地战发生，攻防之双方皆须使用机枪，机枪遂成为每一士兵必须熟用之基本武器。后来，战争范围扩大，由平面而立体，故高射炮、战防炮均列为基本武器之一。

吾人欲教育一现代士兵，担当现代战斗任务，则以上所说之几种基本武器，必须能够使用。此外，如手枪、燃

烧瓶等武器之使用，每一士兵亦应熟练。至于其他各种作业，如敷设地雷、伪装等，均列为每一士兵必备之战斗技术，皆应成为基本教育之一部份。

4． 武器之爱护与保管——无论生产如何发达，战场补给如何方便，武器终归军人之生命，军队愈机械化，武器愈须爱护。在生产力强、武器供应不虞匮乏之国家，对武器尚且如此注意，何况生产落后之我国？武器之保管与检查，在军中列为最重要课题之一，尤须各级干部一致爱护。对于军械检查条例，我们早有公布武器之爱护与保管，典范亦早有规定，旨在养成全军上下自动爱护之精神。

5． 常识之讲授——在全面总体战之今日，许多以前认为系军人独有之特殊技能，现已成为每一民众应具备之知识。例如：如何逃避空袭，如何伪装，如何防护毒气与原子弹，凡此种种每一民众皆应知晓。对敌空降部队如何预防监视，非仅是军队之责，亦为民众之责。国防工事之构筑，亦非民力莫办，如此则筑城学原则亦成应具之常识。敌后活动，需要民众如何协助，如此则谍报勤务之若干要领亦成为普遍常识。在列强最近典范令中，亦将常识列为统率要素之一，可见常识之重要性。

以上五项，皆为基本教育之主要科目，应付战争需要之最低限度要求，在教育上，必先打好基础，然后于战场上始可运用自如，始可争取胜利。

附录

《白崇禧回忆录》大事年表

活动分期		公元	民国	大事记	
初期军事活动		1916	5	是年底，	白崇禧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回广西桂军第一师见习。
		1925	14	是年底，	白崇禧、李宗仁、黄绍竑统一广西。
		1926	15	3月24日	国民政府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2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两广统一方案。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白任参谋长兼第二旅旅长。同月底，白去长沙劝唐生智参加北伐。
北伐战争	第一次北伐	1926	15	7月1日	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发表《北伐宣言》。
				9日	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12日	北伐军攻占长沙。
				8月22日	北伐军克岳阳。
				27日	北伐军与叶开鑫部激战于汀泗桥。
				9月7日	北伐军占汉口、汉阳。
				10月10日	北伐军克武昌。取得两湖战场决定性胜利。
				11月5日	北伐军占九江。孙传芳乘轮赴湖口。
				8日	北伐军占南昌，江西大部被克服。
		1927	16	是年初，	白崇禧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
				2月18日	北伐军占领杭州。
				3月18日	北伐军占宜兴、吴江，孙传芳由南京

续表1

活动分期		公元	民国	大事记
北伐战争	第一次北伐	1927	16	逃往扬州。五省割据局面被瓦解。
				21日 周恩来等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
				22日 上海工人起义胜利，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北伐军进入上海。
				24日 北伐军克南京。英美帝国主义军舰炮轰南京，制造"南京惨案"。
				26日 蒋介石抵上海。
				4月2日 吴稚晖、张静江等于上海召开所谓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文告，制造反革命舆论。
				4日 汪精卫、蒋介石、李宗仁、张静江、白崇禧等于沪开反共秘密会议。
				12日 蒋介石于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白崇禧指挥反革命武装袭击总工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武器，死伤工人三百余人。
				13日 上海总工会被封闭，反动派屠杀游行工人，百余人牺牲，伤者无数。
				18日 蒋介石于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与武汉政府抗衡，任命白崇禧为第二路军总司令。
				19日 武汉国民政府于武昌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继续北伐。
				23日 武昌三十万人集会讨蒋。
				5月1日 冯玉祥于西安就任国民革命联军总司令，分兵六路进军协同北伐。南

续表2

活动分期		公元	民国	大事记	
北伐战争	第一次北伐	1027	16		京国民政府下令北伐。
				17日	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于宜昌叛变进攻武汉。
				21日	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原武汉驻长沙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叛变，屠杀工农群众百余人。
				6月1日	武汉政府北伐军与冯玉祥会师郑州，4日占开封。
				10日	冯玉祥、汪精卫于郑州举行反共会议，13日结束。
				19日	冯玉祥、蒋介石于徐州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反苏、反共，宁汉合流。21日结束。白崇禧参加会议。
				29日	武汉国民党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发出反共训令，公开反共。
				7月15日	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反共，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
				8月1日	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北伐军三万余人于南昌起义。5日，撤离南昌向广东进发。
				12日	蒋介石离宁赴沪，13日通电下野。
				22日	武汉政府代表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孙科等与南京政府代表李宗仁等于庐山举行会议，实现宁汉合流。
				26日	孙传芳自栖霞山渡江反攻南京，31日，龙潭战败退蚌埠。

续表 3

活动分期		公元	民国	大事记	
北伐战争	第一次北伐	1927	16	10月20日	南京军事委员会下令"讨伐唐生智"，李宗仁为西征军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
				11月初	白部占武汉，唐生智被迫暂时辞职，部队退湖南。
		1928	17	1月5日	南京政府任白崇禧为总指挥，进攻湖南唐生智部。
				25日	湘军败，白崇禧进占长沙。
北伐战争	第二次北伐	1928	17	2月15日	蒋介石赴徐州开军事会议。
				16日	蒋赴开封，与冯玉祥商定北伐。
				27日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为北伐军第一、第二、第三集团军总司令。
				3月7日	南京国民政府设中央政治会议，蒋介石为主席，另于广州、汉口、开封、太原等地设政治分会，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别任分会主席。
				4月8日	国民党政府改两湖各军为北伐第四集团军，任李宗仁、白崇禧为正、副司令。
				9日	蒋介石下总攻击令，南京政府各路军同时进攻济南。
				18日	日本借口保护侨民派兵赴青岛，阻止南京政府北伐军进攻济南。
				5月1日	南京国民党政府北伐军入济南。
				3日	济南发生"五·三惨案"。日军连日

续表 4

活动分期		公元	民国	大事记	
北伐战争	第二次北伐	1928	17		枪杀中国军民，死伤四千余人。蒋介石下令禁止中国军队开枪还击。
				7日	蒋介石对日妥协，下令全军撤出济南，绕道北伐。
				6月3日	张作霖率部退出北京，起程赴奉。白崇禧率部向北京进军。
				4日	日本关东军策划“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死。
				15日	国民政府对外发表宣言，宣称“统一告成”。
				9月2日	白崇禧由平赴津誓师东征，肃清津东直鲁联军。
				23日	白崇禧改编张宗昌余部，直鲁联军瓦解。
		1929	18	1月1日	国民党政府于南京召开编遣会议，25日闭会，白崇禧提出军队实边建设。
				2月27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责武汉政治分会改任湘省主席为违法。派蔡元培调查，另派李济深、何应钦调查军事。
				3月21日	蒋介石软禁李济深于汤山。李宗仁、白崇禧等反蒋。
				25日	国民党第三次全代会通过讨伐武汉令。
				26日	蒋介石撤消李宗仁、白崇禧本兼各职。

续表5

活动分期		公元	民国	大事记	
北伐战争	第二次北伐	1929	18	27日	李、白被开除出国民党。
				29日	蒋桂战争爆发。
				5月16日	李宗仁、白崇禧称"护党救国军"南路正副总司令，冯玉祥称"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联合反蒋。
				6月31日	陈济棠粤军进占广西，李宗仁、白崇禧被迫逃往国外。
				10月10日	西北军将领宋哲元等二十七人通电，推阎、冯为国民党总司令，分三路进兵，中旬，蒋介石五路进兵，压迫冯玉祥部宋哲元等。蒋冯中原之战爆发。
				11月21日	陈济棠向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宣战。
				30日	国民军撤出河南，蒋、冯、阎大战结束。
		1930	19	5月11日	蒋介石下总攻击令讨伐冯、阎，中原大战爆发。
				11月1日	冯阎兵败，桂军返广西。中原大战结束。
国共之内战		1930	19	12月16日	蒋介石纠集十万兵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1	20	4月1日	蒋介石纠集二十万兵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反革命"围剿"。
				7月1日	蒋介石拼凑三十万兵力，自任总司令，向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

续表 6

活动分期	公元	民国	大事记	
国共之内战	1931	20	12月 4 日	广东国民党四全代会选白崇禧等为中央委员。
	1932	21	6 月12日	蒋介石召集赣、鄂、豫、皖、湘五省民政长至庐山开"清剿"会议，确定进攻红军的"方略"要，"军事与政治并重，"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动方针。
	1933	22	2 月22日	蒋介石以五十万军队对中央苏区开始第四次"围剿"。
			10月 2 日	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大军，二百架飞机，向中央苏区开始第五次"围剿"。
	1934	23	10月21日	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开始长征。
			11月30日	中央红军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人员折损过半。
			12月10日	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发表宣言，称"攘外先安内"，14日闭幕。
	1935	24	1 月 4 日	中央红军强渡乌江，6 日攻下遵义。
			29日	是日至 3 月21日晚，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
			3 月19日	张国焘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向川西逃跑。
			5 月 3 日	是日至 9 日，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
			25日	是日至29日，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

续表 7

活动分期	公元	民国	大事记	
国共之内战	1935	24	6月14日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
			9月18日	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在延长县永平镇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刘志丹为正副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
			10月19日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合。
			11月21日	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在直罗镇歼敌一师又一个团。
	1936	25	10月8日	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全国红军长征结束。
			22日	蒋介石由南京飞陕“剿共”；31日，颁布对红军总攻击令。
			11月5日	红四方面军主力和红五军团共两万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向甘北西进，遭优势敌人围攻，次年3月失败。
			7月25日	国民政府任命白崇禧为浙江省主席，白了解其目的在调他离广西而拒未接受。
			12月12日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
			26日	蒋介石在洛阳发表《对张、杨的训词》。同日到南京，张学良被扣留。
	1937	26	7月7日	夜，日军向宛平县城射击。芦沟桥事变起。
			8月2日	白崇禧从桂林飞南京任副总参谋长，参与制定抗日计划。

续表 8

活动分期	公元	民国	大事记	
国共之内战	1937	26	3 日	日报报导白崇禧到南京，冠以大标题《战神到了南京，中日战争终不可避免》。
			28日	日军猛攻北平南苑，守军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先后殉国。
			30日	北平、天津失陷，傀儡组织“北平维持会”成立。
			8 月13日	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11月12日上海失守。
			27日	国民党军弃守张家口。
			9 月12日	国民党军弃守大同。
			24日	保定失陷。
			10月10日	国民党军弃守石家庄。
			14日	归绥失陷。
			16日	包头失陷。
第一期抗战	1937	26	11月 8 日	太原陷落。
			20日	国民党政府宣布迁都重庆。
			12月13日	日军侵占南京，实行大屠杀。
			24日	济南陷落，守将韩复榘不战而逃。
	1938	27	3 月14日	国民党军进行徐州战役。
			4 月14日	国民党军在台儿庄会战中大胜。
			19日	徐州失陷。
			6 月 5 日	日军攻占开封。
			12日	日军进犯武汉。11月12日武汉失守。
			7 月17日	白崇禧于商城城北岳家祠就任第五

续表9

活动分期		公元	民国	大事记	
					战区代理司令，指挥武汉会战。
	第二期抗战	1939	28	3月17日	南昌会战开始，5月1日结束。
				4月30日	国民党军进行随枣会战。历时三十余日。
				9月14日	是日至10月14日，国民党军进行第一次长沙会战。
				11月15日	日军陷钦州向南宁进犯，白崇禧指挥桂南会战。
				24日	南宁失守。
				12月4日	昆仑关失守。白崇禧组织桂林行营指挥所于迁江，指挥收复南宁作战。
				18日	国民党军反攻昆仑关。
		1940	29	5月1日	是日至6月14日，国民党军与日军在湖北进行宜(昌)枣(阳)战役。
				16日	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在襄河南岸南瓜店殉国。
				10月30日	国民党军收复南宁。
		1941	30	1月25日	国民党军与日军开始豫南鄂北会战，2月结束。
				5月7日	是日至27日，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国民党军大败，两万人投降，十万人被俘。
				9月6日	是日至10月9日，国民党军与日军进行第二次长沙会战。
				12月8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
				12月19日	是日至1942年1月16日，国民党军

续表10

活动分期	公元	民国	大事记	
第二期抗战	1941	30		与日军进行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2	31	5月14日	日军发动浙赣战役，国民党军不战而逃，7月1日，浙赣线为日军打通。
			12月19日	日军向豫鄂皖地区进攻，大别山战役开始。
	1943	32	1月10日	日军占信阳，大别山战结束。
			2月16日	日军在雷州半岛登陆，月底，该岛区附近岛屿全部沦陷。
			7月8日	国民党政府派白崇禧至兰州“剿抚”甘肃回民暴动。
			11月上旬	是时至12月上旬，国民党军与日军进行常德会战。
	1944	33	1月至4月	国民党与日军进行豫中会战。
			4月18日	日军发起河南战役，国民党军四十万大军不战而溃。
			22日	郑州失陷。
			5月25日	日军占洛阳，河南战役结束。国民党失城三十八座，损兵二十余万。
			5月26日	是日至10月10日，国民党军与日军进行长衡会战。
			6月19日	日军侵占长沙。
			28日	广州日军分三路北犯，妄图打通粤汉线。
			8月8日	日军侵占衡阳。
			29日	湘桂战役开始。
			9月上旬	是时至12月下旬，国民党军与日军

续表11

活动分期	公元	民国	大事记	
第二期抗战	1944	33		进行桂柳会战。
			9月27日	日军进犯福州。
			11月10日	桂林失陷。11月柳州失守。24日日军侵占南宁。
			12月2日	日军侵占独山(8月又收复)
	1945	34	1月11日	国民党军与日军进行湘粤边区作战。
			28日	曲江陷落，日军打通粤汉线。
			2月3日	日军侵至南雄。
			3月7日	日军发动豫南、鄂北战役。
			4月上旬	是时至6月上旬，国民党军与日军进行湘西会战。
			5月18日	福州收复。
			27日	南宁收复。
			6月下旬	是时至7月下旬，国民党军开始桂柳反攻作战。
			6月29日	柳州收复。
			7月27日	桂林收复。
	1946	35	6月1日	陆军部改为国防部，白崇禧任国防部长。
远征军作战	1941	30	12月1日	中国远征军开始入缅。
	1942	31	1月1日	美国宣布在西南太平洋设统帅部。魏菲尔为最高统帅，以蒋介石为中国战区陆空联军总司令。
			2月25日	蒋到昆明下达命令，指挥部署。
			3月1日	蒋介石赴腊戍。
			3月15日	美国政府派史迪威为中国战区总司

续表12

活动分期		公元	民国	大事记
	远征军作战	1942	31	令部参谋长。
				4月20日 中国入缅军一度克服仁安姜；24日一度克服吉棠。
				5月26日 远征军二百师师长戴安澜将军殉国。
		1944	33	1月30日 中国入缅远征军克打洛。
				3月7日 中国入缅远征军于瓦拉本区会师美军，共同控制胡康河谷。
				5月11日 中国滇西部队强渡怒江。
				6月16日 中国入缅远征军攻占卡盟。
				26日 中国入缅远征军克孟拱。
				8月4日 中国入缅远征军与美军攻占密支拉，日军溃退。
				10月21日 美国政府召回史迪威，派魏德迈为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兼蒋介石的参谋长。
				11月19日 中国入缅远征军克芒市。
				12月15日 中国入缅军克八莫。
		1945	34	1月15日 中国入缅军克南坎。滇缅公路全线打通。
				20日 中国入缅军克畹町，日军退，滇西失地收复。
				3月7日 中国入缅军攻占腊戍。
	抗战中的空军	1937	26	8月14日 国民党空军第一次升空与日空军作战，击落敌机三架。后国民政府定此日为空军节。
				16日 是日至16日，国民党空军与日空军

续表13

活动分期	公元	民国	大事记	
抗战中的空军	1937	26		于南京、杭州、嘉兴、曹娥等机场和句容、扬州等上空进行“八·一五”空战，共击落敌机四十六架。
			17日	国民党空军轰炸上海敌军司令部，并击落敌机二架。队员阎海文驾机被敌高炮击中，跳伞后被敌包围而自杀。日军为其厚葬，立碑为“支那空军勇士之墓”。
			19日	国民党空军袭炸日军白龙港舰队，炸沉日巡洋舰一艘。队员沈崇海驾机向敌舰俯冲，同归于尽。
			18日	国民党空军与日空军进行南京空战，击落敌机一架，伤敌机四架。
			21日	国民党空军与日空军进行太原空战；1938年2月25日进行南昌空战；4月11日进行武汉空战，三役击落敌机一百一十五架，俘敌“驱逐之王”三轮宽少佐。武汉保卫战中炸伤敌舰六十七艘，击沉二十三艘。
	1938	27	5月19日	国民党空军远征日本。
	1939	28	2月	国民党空军袭炸日运城机场，炸毁敌机十余架。
			2月	国民党空军与俄志愿队同日空军进行兰州空战，击落敌机十五架。
			10月3日	国民党空军袭炸日汉口机场，击落敌机三架，毁敌机七十四架及修理

续表14

活动分期	公元	民国	大事记	
抗战中的空军	1939	28		中飞机十余架。
			11月15日	桂南会战中，国民党空军集结一百一十五架飞机与日空战，击落敌机十一架，毁敌机十五架。
	1941	30	3月中旬	国民党空军与日空军进行成都空战，击落敌机六架。
			9月6日	国民党空军轰炸日军洞庭湖舰队，予敌重创。
	1942	31	1月16日	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民党空军与日空军遭遇，击落敌机一架，伤二架。
			22日	国民党空军远征越南之役中，首创计时轰炸法。
	1943	32	5月19日	是日起国民党空军在鄂西会战中分批轰炸日军汉口、宜昌、沙市各机场，击落敌机四十一架，炸毁敌机六架，伤敌舰二十三艘。
			6月6日	日机轰炸国民党梁山机场，国民党空军四大队中队长周志开单机起飞迎击，击落敌机三架，击伤数架。
			11月10日	是日至12月16日，国民党空军中美混合团及第四十四舰空队在常德会战中，击落敌机十四架，击伤十九架，毁地面机十二架。
	1944	33	4月	国民党空军和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在豫西会战中，击落敌机八十七架，炸毁地面敌机七十九架。

续表15

活动分期		公元	民国	大事记	
	抗战中的空军	1944	33	5月27日	是日至9月6日，中美空军在长衡会战中，以一百八十一架对日机一百六十八架进行大规模空战，共击落敌机七十架（可能为二十九架），击伤十七架，毁地面机五十二架（可能为十余架）。
				7月23日	中美空军混合团与日空军进行洞庭湖空战，击落敌机十架。
				8月22日	是日至11月9日，国民党空军在桂柳会战中，击落敌机三十四架（可能为十四架）击伤十架，毁地面机六架，毁敌军车四百余辆，大小船只五百七十八艘。
	八年抗战之游击战	1937	26	9月25日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平型关大捷。
		1938	27	冬季	蒋介石在第一次南岳会议中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以三分之一兵力于敌后方扰袭敌人"的对敌策略。
				8月25日	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彭德怀分任正副总指挥。
				10月2日	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叶挺、项英分任正副军长。
		1940	29	8月20日	彭德怀等指挥八路军展开"百团大

续表16

活动分期	公元	民国	大事记	
八年抗战之游击战	1940	29		战"，12月5日止。
			10月19日	国民党政府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致电朱德、彭德怀和叶挺，诬蔑新四军，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一个月内撤至黄河以北。
			11月9日	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致电何应钦、白崇禧，驳斥其10月19日电报。
	1941	30	1月6日	是日起国民党制造"皖南事件"，叶挺被扣，项英被害。
			1月17日	蒋介石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
			20日	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委。
	1942	31	11月12日	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开幕，蒋介石要求中共履行"共赴国难宣言，服从政府命令"，27日闭幕。
			30日	中共中央发言人对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发表意见，指出中共并未逾越二十六年宣言范围。
	1943	32	6月18日	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撤退河防大军，欲分九路"闪击"延安。
			7月4日	朱德致电胡宗南，要求停止反共军事部署。

续表17

活动分期		公元	民国	大事记	
	八年抗战之游击战	1943	32	7月7日	国民党军炮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妄图"消灭边区，打倒共产党"。
				9月16日	是日至27日，国民党政府召集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反共决议案。
		1945	34	4月	阎锡山调动六个师五个纵队进攻太岳解放区。
				8月10日	延安总部朱总司令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进军令。
				11日	蒋介石"命令"十八集团军"应就地驻防待命"，不许收缴敌伪武器；令各地伪军"负责维持治安"。
				13日	朱德总司令致电蒋介石，坚决拒绝其11日命令。
	抗战中之国际关系	1931	21	1月2日	日军侵占锦州，美国务卿史汀生向中日两国递交备忘录，不承认日军以军事行动造成之事实。
		1934	23	4月17日	日本发表天羽声明，史汀生力加反对，美国舆论攻击日本侵略野心。
		1938	27	本年	苏联空军志愿队到中国援助抗日战争。
		1939	28	6月25日	中苏通商条约签字。
				7月	美国通知日本停止美日通商航海条约。
				10月14日	苏联空军志愿队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牺牲。
		1941	30	4月13日	苏日中立条约签字。

续表18

活动分期	公元	民国	大事记	
抗战中之国际关系	1941	30	4月25日	美国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五千万美元贷款。
			6月5日	英国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五千万英镑信用贷款。
			18日	国民党政府与英国政府在渝签订《滇缅路南段中英划界换文》。
			10月10日	美国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五千万美元贷款。
			12月8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
			9日	国民党政府对日、德、意宣战。
			25日	国民党政府同英国签订军事同盟。
	1942	31	1月1日	苏、美、英、中等二十六国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
	1943	32	1月11日	中美新约和中英新约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签字。
			5月1日	国民党“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戴笠和美国梅乐斯分任正副主任。
			8月	同盟国在魁北克举行会议，决定打通印缅与中国之陆路交通，成立东南亚盟军统帅部。
			11月22日	蒋介石、罗斯福、邱吉尔在开罗会谈，26日结束，发表宣言。
			28日	斯大林、邱吉尔、罗斯福在德黑兰举行会议，12月1日结束。
	1945	34	1月1日	美国与国民党合作成立战时运输管理局，以控制中国运输机构。

续表19

活动分期	公元	民国	大事记	
抗战中之国际关系	1945	34	2月4日	美、英、苏三国首脑举行会议，签订雅尔塔密约，11日闭幕。
			4月2日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美国发表扶蒋反共讲话。
			6月30日	国民党行政院长宋子文抵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7月14日发表会谈公报。
			7月17日	美、英、苏三国首脑于柏林郊区举行波茨坦会议，8月2日结束，并发表《波茨坦公告》。
			8月6、9日	美国先后于日本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
			8月8日	苏联对日宣战。
			10日	日本政府向美、英、苏、中发出乞降照会。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日宣战。
			14日	日本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
			17日	日关东军司令部向苏军提出停战建议，至20日关东军全部解除武装，我国东北解放。
			9月2日	日本政府代表于东京湾美舰"密苏里"号上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9日	南京举行"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仪式，冈村宁茨代表日军签署投降书。